

七军工作报告^[1]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 八军的经过

(一) 我去年由中央到龙州是二月七号，到后知道龙州已于本月一日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八军全部正在出发会同七军攻南宁，我仅与留守后方的宛旦平^[2]同志会面，得知八军及左江工作大略：1. 左江政权仍在动摇时期。2. 革委虽然成立，然尚无实际工作。3. 大军出发后，留守后方的是极靠不住的收编的队伍。4. 八军本身的基础完全在旧军官手中，甚至有好些同志都没有分配带兵的工作。根据中央不打南宁的决定及这些条件，乃停止了攻南宁的行动，并电七军亦停止此行动，并指出从主客观的条件上来估计，攻南宁必遭一个失败的结果，特别是第八军本身更为危险，如到南宁打了败仗，有全军覆灭的可能。

(二) 停止了攻南宁之行动的第三日即得到七军由右江来的电报，报告已在隆安失败，同时我们召集了一个干部（包括地方党部）会议，决定八军暂时组织一个前委，因为当时我的计划是与七军汇合后八军即取消，健全七军实力。在会议中我根据中央指示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决定了八军及左江工作方针：1. 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一方面分配所有的

同志到下层群众中去做实际的工作，反对机关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分发队伍到龙州附近几县游击，发动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农会等政权及群众的组织，我们是这样进行了。 2. 八军的总方向是与七军汇合向外发展，应多方设法与七军联络，八军的发展方向应向右江推进。 3. 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肃清旧的军官，分配同志以主要的工作。这一工作因作豫^[3]同志执行不力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4. 迅速解决地方有反动可能的武装（因技术上不完善只解决了大半），武装农民（发了三百多枝枪）好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以为扩大红军之基础。 5. 此外对于党、政权、红军的工作均有相当具体的决定。

（三）上面这些决定，在短期内作出了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的缺乏（地方工作干部简直没有）收效仍然不多，发动群众方法完全不懂，不能回答群众的问题，斗不过敌人的把戏。

（四）同时我们注意到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因为左江与法占地^[4]接壤，一般群众反法的热情很高，“打倒老番”^[5]的口号每一个群众都懂得都热烈地拥护。不过过去反法的运动为流氓及封建势力所领导，所以我们将反法运动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与反帝、反国民党联系起来，作广大的宣传，收到了相当结果。在二月中旬群众大会中通过了没收海关、领事馆、教堂财产并驱逐法领事出境（当时并不懂得可以讲一讲外交政策），群众甚高兴，游行时亦甚热烈。我们并利用了无线电发英法文通电子全世界。后法政府曾派飞机一架到龙州附近之上金县侦察示威，适我军一营开往游击，当即号召了千余群众，口号之声震天，士兵开枪，司机慑群众威，致飞机跌下，得机关枪一挺、手枪几枝、炸弹十余个。三法人，一死二重伤（住医院医治）。后阅报载，法政府曾将此事向南京政府抗议，结果不知。总之帝国主义对龙州赤色政权非常重视，特别是对安

南^[6]革命的影响，给法以极大之恐慌，故敌军之迫不及待地向龙州进攻，与法帝之催促有很大的关系。

（五）在龙州工作不久，即确知我七军已退出右江，何往不知，并得探报，桂系^[7]将以重兵犯龙州。我们当时考虑龙州是绝对不能守的，敌来必退，同时八军如不与右江七军联络将感极大之困难，故决定速下靖西，加紧龙州附近的群众工作，地方政权有相当基础时八军即全部向右江推进。决定后我即率一纵队攻靖西，因为与右江联络我自己去比较好，同时八军第一纵队的改造也要我自己去才有办法，靖西有电话，指挥龙州工作不成问题。

（六）攻靖西数日不下，适右江向都^[8]县委书记来到，报告右江沿岸还有果化在我们手中，故我决定带一连人去联络，转达中央指示。临行时电告龙州务须照前决定原则进行，如敌来即向右江前进，即敌不来，左江工作有相当基础时亦须照前决定迅速向右江推进，求得与七军整个的联络。

（七）我一连人冲到右江，始知沿岸完全为敌占领，七军已退入东兰一带，惟沿岸还有几个赤色乡村，故得偷渡右江，在一乡村（赤的）住了半月之久，始得机会冲到东兰，其时已是三月下旬了。

（八）到达东兰之第二日，适作豫派了两个卫队（东兰人）亦到，报告龙州已于我离靖西之第三日失败，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还不知道是桂系主力，以为是土匪，及至接触了两小时后听到大炮机关枪声才懂得，但结果是被敌人冲散，全部无法退右江，只得逼退安南方向之凭祥，又受敌追兵打击（旦平同志即于此时牺牲），曾一度冲向右江但无效，乃又退回粤桂边企图去玉林一带工作（作豫家乡，过去有相当的基础），但中途即发生部队叛变（叛变官长是作豫始终不肯撤换的），

作豫仅得几十卫队，曾一度冲向右江来联络不果，后闻将武装交给地方同志，只身到港遂被捕。攻靖西之第一纵队（龙州的为第二纵队）得到龙州失败的消息，乃经滇边向右江前进，企图到东兰与七军联络。到右江之凌云（接近苏区仅数十里），因技术上及侦探不好，受了敌人极大打击，损失三分之一，乃退贵州边界，受编于贵州一个土匪队伍（改组派收编的），仍与东兰设法联络，几次不成功，直到七军回右江才取得联络，更于七军第二次向外发展才汇合起来，此时该纵队仅存二百枝枪了。这部队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还是改造得比较好的原故。八军失败，龙州政权亦失败。

（九）八军开始成立时的武装约枪一千枝（内坏枪约有三三百枝），组织两个纵队，每纵队两营六连，另有一挺机关枪，一门迫击炮，还有一个手枪连。

（十）以上就是八军的成败兴亡史。

二 七军的经过

（一）由百色转变到隆安之役。

一九二九年十月革命节日^[9]，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转变后兴奋了右江的群众，百色、平马^[10]的群众大会到的群众非常之多而热烈，红军本身的情绪非常之好，战斗力亦甚强，在隆安作战中充分表现出来。

惟当时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上面，而决定了打南宁的行动。当时前委的估量是打南宁极有把握，桂系主力在前线没有开兵回来的可能，轻视了攻坚和敌人的力量，结果到隆安即与敌人接触，经过三天最激烈的作战，

敌人的损伤虽比我们为大，我们的损伤亦不小，好几个很得力的干部亦于此役牺牲，加上作战的指挥太差，双方都成为各自为战的局面，结果是我们失败了，耗费了子弹不下五十万发。

我们对于此次行动指出了不但轻视了敌人，主要的还是忽视了发动右江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当时右江群众情绪虽已开展起来，但过去并没有经过斗争，始终是暴发户，纯粹由红军弄起来的。如果不注意用正确路线来发动群众，群众的情绪是不能保持下去且易走到失败情绪上去的。打下南宁固好，打不下，一失败下来则必给群众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当时作战完全没有运用群众的战术，单凭红军的力量，深入白色区域去打硬战，处处受敌人（豪绅民团^[11]）的扰乱。如果当时作战不在隆安而在赤区的果化，很有消灭敌人三团的可能。我们更指出这次幸好在隆安失败，如果有一个小的胜利，直追南宁，有全部或大部被敌人消灭的可能。

（二）由隆安失败到向外游击时期。

隆安失败后，完全放弃了右江沿岸。平马为敌占领，我军曾一度进攻平马，但无最后决心，故未成功，乃向东兰退去。此次攻平马没有决心是一错误，因为如果攻下了平马，可以保持群众的情绪。事实上是可以攻下的，攻下后可以得敌人不少的辎重。后敌人追至亭泗^[12]与我接触，战甚烈，双方损失均不小，结果双方均同时撤退。这次军事上如果有最后决心，可以全部消灭敌军两团，因在作战中我较占优势也。亭泗作战时我军士气仍好，失败后则大不如前了。

亭泗战后，前委即讨论行动问题，决定向外游击一时期，乃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右江工作，一、二纵队向河池方向游击。本来是一步步发展的计划，后来变更了，一直经怀远到思恩，

在思恩因不小心被敌人袭击，受了一个小的挫折，后又向贵州之古州^[13]（贵州三大城市之一），结果攻下古州，子弹得到相当补充，经济也得到相当解决，士兵情绪也比较提高。本来他们当时欲直出湘南，但因未与第三纵队联络好，故又折回河池。

我们攻下古州，消灭了敌军大部（四五百人），对敌军俘虏的官兵均非常之优待，对贵州军队有不少的影响，甚至不少中下级官长，对进攻红军问题表示动摇。这是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来证明的。后来王家烈^[14]之始终不愿与我们接触，这也是原因之一。

（三）河池会议与回右江的决定。

一、二纵队回到河池时，我已到东兰近一月，得消息后即赶到河池与他们会面，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报告中央指示，同时讨论到行动问题，认为：1. 当时湘南驻有重兵，不易通过。2. 右江群众自红军去后，失败情绪非常之深，对红军表示不满。在发展、巩固右江工作上，需要红军回右江一时期。3. 回右江可以发展第七军。4. 回到百色可以解决服装、经济的问题。因此决定回右江一个短的时期，在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右江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但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此时是阴历五月初）。

（四）回右江后的工作。

回右江后即恢复了沿岸的城市和政权，在百色解决了敌军五六百武装。在百色仅十日，适滇军一师经百色到南宁攻桂，我军在力量上不能与敌人正面作战，故决定暂时退到平马，准备在平马运用群众战术扰乱他，打击他的一部分。结果在果化作战有五日之前，敌人损失甚大，团长死一伤一，营长死二伤一，士兵死伤五六百。我军亦死伤官兵六十余人。但因军事技

术上的缺点，没有能实现打击敌人之一部的计划，仅得到两万发子弹而已。算起来我们还是吃了亏，虽然滇军对我们再不敢轻视，攻南宁失败后再不敢与赤色区域为难。

与滇军作战后即回师攻百色，因等大炮问题及被一个连长领导一营叛变（当土匪）问题牵延了一个时期，后百色加了兵（滇军），难攻下，故又改变，不攻百色，而在平马、田州、思林、果化一带加紧工作，相当创造右江的基础，改造七军发展七军，并在经济上准备向中心区域发展的出发伙食费。

统计在右江约有三月半之久，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至于在右江的群众工作，以后专门讲。

（五）向中心区域发展问题之讨论。

回右江时即已决定在右江仅是短的时间，与滇军作战后又提到此问题，因为：1. 经济未解决。2. 秋收快到，如果红军离开，则农民的收获必全被豪绅抢去，必使农民发生反感，并且农民分得了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必定得到了秋收才能深刻地感到土地革命之意义。故当时决定“相当保护秋收”的原则，计时九月底可出发。结果实现了这个决定，定在十月一日出发。出发之前一日，南方区代表邓拔奇^[15]同志赶到，故改在四日出发。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日政治局的决议^[16]。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决定：1. 改变军队编制为三个师，留二十一师在右江作为发展一军的基础，由韦拔群^[17]同志任师长，十九、二十两师（每师两团）出发。2. 因恐东兰士兵逃，同时与在桂黔边之第八军的一部联络，故大部由凌云转向河池。我及拔奇同志同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纵队出河池。3. 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

全国苏维埃代表（拔奇）的阅兵礼以鼓士气，并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六）河池的全军党员代表大会（十月革命节日开的）。

河池会议完全是在接受立三路线^[18]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不过我们认为，执行此路线不是先下柳州，而是要先取得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19]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这次会议改选了前委，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并特别提到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豪人^[20]同志为书记。

（七）由河池出发到攻长安。

由河池出发时经过一个鼓动，士气颇好，到怀远与敌一个小时的接触即占领了怀远，敌人退到对河与我隔河相持。当时发生一个是否攻庆远的问题，有两个意见：一方面赞成，以为在执行新的路线，应攻庆远，且很可能。反对的意见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守之，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攻回甚难，并且我们到桂林有一条大江相阻，如不迅速渡过，敌一注意很难通过。后一意见不但不赞成攻庆远，且不赞成攻融县。我及李明瑞^[21]同志是后一意见，结果通过了不攻庆远，攻否融县到天河再看情形决定。

到天河时讨论，始终以渡河问题决定不攻融县，而经三防转移敌人视线，还占长安渡河。次日忽得报告说融县有一小河

可徒涉到长安，故又临时决定到融县。行不四十里，即在四把与敌接触，后面敌人追来，前后作战，前胜后败，结果在天河附近与敌相持三日之久。最后乃决定脱离敌人，仍由三防到长安，沿途均有民团相扰，到三防因天雨休息数日即到长安，其时长安已有重兵驻防了。敌人有两师，名义上六团。我们攻长安有五日之久，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白崇禧^[22]亲到指挥，斩断浮桥背水死守。后得报告敌人又加一师兵力，故决定撤退。退得非常之好，致敌不敢追出一步。长安作战的确建立了七军的威风，敌人称我军是全部的北伐老兵，但从实质上我们还是吃了亏。

（八）进攻武冈。

长安撤退后，至福祿渡江，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已有敌军教导师守对河（又一小河）无法过，乃改经绥宁、武冈到桂林。到武冈时原本决定不攻，后因得报告说只有点民团守，故决定攻城，攻下后可以解决七军的服装、经济问题（都是当时的急迫问题）。攻了四日夜，仍决心攻下，当时估量敌援兵不会来得这样快，故一切布置忽视了这一点。到第四日已发觉不当，决定重新布置，但马上接到报告说再三四小时即可攻下，因城上敌人已无子弹，我已架好楼梯也，故未改布置。孰知城尚未攻下，敌援兵已至，以致失败。此次损伤不小，士气大挫，乃向新宁退去，又转到全州，在新、全交界之“八十山”中又受了敌人追兵一个小打击，结果算好，安全地达到全州，此时已由四团而缩为三团了。武冈作战时阵亡了一个很好的团长何子初^[23]同志。

武冈失败后，大家认为攻桂林已不可能，七军的迫切需要是迅速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补充，安置伤兵，故决心到湘南，估量湘南总有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来武冈敌人的援兵，报上载名义十团实则约五团，宝庆两团，长沙用汽车运来一团，还有两团新成立的游击队，飞机两架。如果当时我们军事布置缜密，以战斗力论，决不致失败得如此之狼狈的。

（九）到全州后直到攻连州。

到全州后开会讨论，结果都感觉到要休养补充之严重。当时估量江华、临武一带最少可以休息一下，发动群众，故决定到江华一短期仍向小北江发展。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中央。

在全州驻了三天，筹了点款，发了点零用钱。此时士兵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亦甚多，逃的不仅是老兵，而且许多是农民。

后知敌人（桂系）来全州，故我们即照决定出道州，一路只有小的接触。到道州后已是空城一个，仅有贫民还在，城周围几里路就是豪绅的武装，侦探都难派出。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到了三四百人，都表现还好。仅驻两日，知湘军已从三方向道州前进，此时我军决不能作战，仍照原计划到江华。当天奇寒，苦极，士兵冻死数人。江华的环境比道州还坏，一点党和群众基础都没有，仅没收了大批布匹发给士兵，但无处成衣。

原来对于江华一带的估量成了幻想，宁远亦不能去，只得离开江华，想到湘桂边之桂东桂岭一带工作（皆山地），得到一个被囚在江华狱中的前县长带路达到了桂岭。离江华时四面八方打起来，我军又受了小的挫折，失去枪二十余枝。

到桂岭后即布置工作，但该处豪绅力量太强，强迫农民守住炮楼不出来，如果桂系重兵来，将大不利于我，故计划又不成，乃决心继续到小北江。在桂岭驻了四天，将部队整顿了一

下，缩编两团。为提起士气起见，以主要官长兼团长，李明瑞及龚鹤村^[24]两同志任之，两团组织比较完密，原来团长皆任营长，营长任连长，干部亦较前充实，故战斗力又恢复了一些。

行军三天到了连州属之东陂圩（离连州六十里）。当时讨论到是否攻连州的问题，认为如果攻连州，就一定要在连州工作，因一攻连州，北江即不易通过，同时估量北江此时还无重兵，如能迅速行军，通过北江干路是可能的，故决定到北江湘南宜章一带工作（该处过去是经过斗争的，且多险要山地，鹤村同志很熟悉）。军行至星子圩（离连州八十里），得报说离此三十里之黄沙埠已有湘军千余人到来，名义上是两团。据鹤村云，该处有一山坳甚险，如有千余兵力守住，难通过。故又决定去连州一次，最少可以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到连州后并未决心攻城，仅作了小小的尝试，不到五分钟伤死二十余人。武冈的教训使我们不能再攻。在连州因筹款问题逗留了几天，做了一点群众工作。因为敌人放火烧街，我们救火给了城市民众甚至于商人以很好的影响。后得报告粤军邓辉一团到连州来援，乃决定消灭该团之布置，并退入一好布置阵地之山地。此时我们计划仍然是要到北江。在山地驻三日，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休息兵力，但结果又得报告说并无敌人来，故决定仍出星子经黄沙埠到北江。在星子方知邓辉团亦于是日由星子出发到连州，以致失掉了一大机会，因为从力量上说来，消灭该团是有把握的。

到黄沙埠果有湘军千余驻守，但不敢与我作战，仅一小接触即退守圩场，我即绕过圩场向北江前进。

在连州附近之山中时并与土匪代表有一度接洽，原因是我们如果不能由大路去北江，必经乳源大山（匪巢）运动，接洽

的目的是使他们不妨碍我们的运动，同时想派人打入进去做点工作，结果因时短，土匪心多疑忌，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十）到北江后至乐昌渡河。

到北江后即宜章、乳源交界之梅花^[25]一带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创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几天内有相当的成绩，并即刻武装了几十个农民（发枪六十枝）。但不几天即得报告说，邓辉一团追来，我们认为的大好机会，仍决定布置消灭该部，谁知一经接触方知侦探报告之误，敌人有三团之众，且有两团系由乐昌赶来之生力军，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龙光）、章健^[26]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27]等皆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

作战失败后即退入山中，兵力疲极，失败情绪甚增，伤官兵不下二百，最难处置不过此时，后经多方设法才勉强将伤兵官安置。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息。本定拂晓渡河，因兵疲足痛不能实现，至午前十时前卫团才达到河边，本部两时后才到。又因前卫团没有达到掩护渡河的任务，结果敌人由乐昌、韶州^[28]两处用汽车运兵来，致后卫团仅过一连。七军从此分散两股，我及明瑞过了河，张云逸^[29]同志未能过河。未过的一团即由他率领，过河的一团由明瑞同志兼团长。那边的消息从此割断，后经多方设法均不得达到联络目的。

在梅花时与湘南特委会了面，他们得到三中全会文件及中央的紧急通告^[30]，因作战关系我仅看到一个紧急通告。

我们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创造成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影响湘粤均极大，因该处离乐昌、韶关、宜章

均近也。

（十一）由乐昌分散到退出崇义。

乐昌分散后，我们一团（五十五团）即经仁化边界到江西大庾^[31]属之内良，当时因不知大庾情况，更不知何处是赤区，故不敢冒险去，乃向崇义前进，估量如崇义一带找不到，再深入到遂川一带总可以找到。

到崇义后敌已退，知离城二十五里有红军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经三日才联络到，并会见赣南行委^[32]之一路行委（管大、南、上、崇^[33]四县工作），当即决定在该处工作。因我们看见过中央的紧急通告，知道一点新的路线，故企图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造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发展方向是粤赣大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

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在崇义做了二十日许的工作。因当地向无党及群众的基础，即赤区也是没有的，加之干部的缺乏，故仅创造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始提出分配土地的问题，故只能说群众是开始起来，但如达到巩固的赤色政权，还要一个时期的艰苦工作。假使没有敌人重兵来犯，这一前途在当时用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有可能的。

在敌军未来前几天，我们得到了敌人准备来的消息，但当时赣南行委书记及一委员亦到，讨论结果认为敌如来，群众基础极薄弱，七军力量亦不厚，很难站住，同时信丰自三十五军去后无武装掩护赤区，赤区逐渐失败，如七军去，可以巩固当地赤色政权，更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作用且更大，故决定到信丰去。但方决定于次日出发，敌人两团及一些民团已来攻崇义城了，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才知道，故未与作战即向过埠退去。我即于此时来中央（时为三月初）。后知他们是

向营前到遂川界，大约可以与独立师之第四团会合。近阅报载，大约他们还是在遂川一带。

我在临行时曾告他们仍须设法到信丰去，即使暂时不可能，不能不到遂川一行，也必须经过一时期到信丰，因到信丰作用较大，且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任务也。

（十二）七军的力量。

由右江出发时有六七千人，二千七八百枪，机关枪八挺，迫击炮三门，山炮二门，子弹平均约六七十发。到乐昌渡河时还有枪约千八九百枝（给了湘南特委约二百枝），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山炮藏了。在乐昌虽被分散，但武装无大损失。五十五团到崇义时，有枪近八百枝，迫击炮一门，机关枪五挺，子弹平均二十五发，机关枪子弹每挺不过百发。到崇义后，曾交步枪约八十枝给独立营及苏维埃政府。

（十三）组织。

出发前是三个纵队，出发时编两师（二十一师留右江不计），每师两团，取三三制，另有一教导队特务连，每团有一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到武冈失败后编三团，到桂岭又编成两团。

（十四）党的工作。

七军因干部缺乏，工作不很好，前后发展同志虽不少，但每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同志。还有一很大缺点就是士兵同志比例太少，约占十分之四，因好多士兵同志均陆续升作官长也。

（十五）士兵成分。

出发时还有一些老兵，经过一时期打的打死了，逃的逃了，到现在老兵已到极少处，五十五团不过二十人。旧军官五十五团没有了，五十八团亦然，但现在的营连长十之八九皆南

宁教导队的老兵升任的。

(十六) 七军党的组织。

总指导机关是前敌委员会，下有师团营委，连有支部，每级均有士兵同志参加，但极弱。前委在河池代表大会改选名单为：邓斌^[34]、陈豪人、张云逸（军长）、李谦（师长）、袁振武（团长）、许卓（团政）、许进（师政）、李朝纲（士兵）、黄一平（团政）。候补为：龚鹤村（师长）、胡鹤林（士兵）、杨英（营政）。现在还在军中的，五十五团方面有许进、许卓、李朝纲，在五十八团方面的仅云逸一人。

我们到崇义决定取消前委，仅组织一团委，我兼团委书记，后决定组织上受赣南特委指挥，我去后团委书记为余惠同志（团政治委员）。

三 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

(一) 右江。

右江的指导机关是右江工作委员会，共有东兰、凤山、平马、田州、思林^[35]、向都六个县委及凌云、百色等处设特支。共有千余党员，成分上是雇农、贫农占多数，余为中农，还有很少数的富农及知识分子（都是比较老的党员）。成分虽如此，但党的中心是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中，他们的基础多是破产的地主富农，多是民国十六年^[36]斗争到现在的，故在党的地位上变成了党的中心。他们不但阻止了党和土地革命的发展，且逐渐新豪绅化，把持了党及政权、军事的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常常把他们没办法，后来我及豪人自己下去，虽有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缺乏，每县找不出一个中心，我们又不能常在下面，故甚困难。

东兰的干部比较好，故成绩亦较好，土地革命比较深入。

我们在右江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后一口号主要是反富农的作用，因为富农必然走上反动的道路。我们没有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分配的方式是“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但我们指出，虽然没有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结果一定要做到平分。分配土地是以乡为单位。

东兰、凤山分配土地的结果，共耕仅有两乡，多数地方是平分土地，还有一些地方是仅就没收的土地来分配。至于其他地方，名义上是平分，实际上很少地方分，处处是富农新豪绅反土地革命的作用，同时东、凤等处也发生苏维埃将好土地分配自己及亲戚的事实，故当时提出了重新分配的口号，我们出发一时期正积极执行这一口号。

分配土地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均是个别地解决，一般的问题大致是如此解决的：1. 耕牛、耕具都是向富农借出的，谷种完全由原有田地的所有者拿出，不足的由富农拿出。右江穷，贫农在耕种时多无饭吃，又无钱买，无力耕种，亦向富农借出。2. 红军兵士亦分配土地，可以请人耕种。3. 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田地不够时则将山地分给富农。4. 土地所有权，本来照政纲是交给农民，但因群众表示由苏维埃给以使用证，有了凭据，比较安心些，故分配土地后由苏维埃发给使用证，禁止买卖。5. 两乡区县之间分配土地之多寡相差太远时，则以移民办法解决之。6. 森林特产祠堂庙宇极少，没有成什么严重问题。

对经济政策，小商人仍然继续营业，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极缺乏，特别是盐，苏维埃曾自己设法买运，各乡区办了合

作社，但资本缺乏，故成绩不好。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没有筹到款。

对于富农领导是右江极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可是富农的魔力大，我们党的领导弱，故其影响常能存在于苏区中。有些区域的党和苏维埃对反富农怠上。有些区域雇农、贫农比较组织得好，但又走到另一极端，无条件地反富农，提出了“没收富农财产”、“杀富民”的口号，结果使中农动摇，实际上帮助了富农。我们是注意了纠正这一错误。

右江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右江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均成立苏府。苏维埃中，富农被剥夺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实质上他们仍然在领导地位，因为富农不一定在苏维埃政府中当委员，在外面一样可以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来阻碍土地革命，实现其领导作用，再加上政府中的“老”党员腐化、新豪绅化，使群众对苏维埃不满。前委为此曾公开开除右苏主席雷经天^[37]的党籍。党发宣言指出过去苏维埃的错误，准备开全右江代表大会改造之，同时号召全体民众参加监督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应经常开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并指出一定要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之下来改造苏维埃，当选的一定要是能坚决执行此口号的分子。一直到最后我们出发时还是这一方针。

右江的武装很多，可以集合起来的不下三千，好坏各半，各县均有赤卫军的组织。我们出发时决定将这些武装集合起来，与留下的红军编成二十一师，作为发展一军之基础，不过这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赤卫军的成分多是贫雇农，富农没有，但领导的还有不少新豪绅化的老党员，私有武装的观念非常浓厚。

我们离开右江时的工作布置是加紧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

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

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找不出一个胜任的县委书记，亦没有一个比较好点的中心，故工作推动甚难。对干部的训练，我们注意到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外，不断地办训练班，参加的多半是贫雇农，但成绩甚少（讲的课目均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二）沿途。

沿途没有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仅在连州有几个湘南失败逃亡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支部，但无工作。由连州到梅花一带，有很多湘南逃亡的同志未组织起来。到梅花后，有一个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后改湘南特委，该处亦无群众组织，宜章一带也没有东西，乐昌、仁化一带也没有，直至崇义后才找到一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不满豪绅、民团、县政府、国民党，亦能对我们宣传表示接受，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至于豪绅地主，闻我军到早已跑光了，有些城市的商人都走光，故一路解决经济问题都很难，仅在怀远、全州、连州三处筹了点款，都是分配给大商店负担。

（三）崇义。

崇义原来也没有东西，有些同志没有很好的组织，支部很少开会，没有经常工作，天天在那里叫暴动，或者是同志拿暴动两字来要求党给暴动费，或者是几个同志做一点土匪式的抢劫就算暴动，没有丝毫注意去创造群众的基础。去年底大庾一带的钨矿工人数千，我们仅有相当影响，赤色工会未组织起来，附近农民未发动起来，一路行委即决定来一个暴动，结果还是没有暴动起来。我们到后才纠正这一错误观念，要他们很艰苦地去创造群众基础，创造党的组织。当地党的同志没有统

计，成分多流氓分子，因为斗争没有起来，地方干部更是缺乏，我们到后完全由军中党来做，同时办训练班，企图训练一些干部出来，但因到的成分不很好，收效亦不大。

群众的基础虽有两个乡苏维埃，但是挂名的，且是新成立的，到后即动员全军以一连一营为单位分散游击，经常给以工作方式的指导，结果经过二十余日的工夫做了相当成绩，创造了三个区苏维埃，几个乡苏维埃，找出贫苦农民到苏维埃工作，组织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群众情绪还好。但有一严重问题，就是流氓意识的影响，我们已注意到从发动尖锐的斗争中来消灭流氓意识。经过这样工作之后，党、苏维埃略有发展和改造，惜为时不久方进到分配土地时（赣南当时口号是彻底平分土地），敌人来了，故我军在崇义工作只能说有点影响，说不上创造了什么基础。

（四）富田事变^[38]对赣南的影响。

这件事我们到赣南才知道，得到的事实是如此：过去总前委^[39]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40]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 AB 团^[41]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爆发的经过是总前委派一团长率一连将省行委、省苏维埃负责人通通捕去，后二十军一团长即率一营去救回，并杀死该团长。省行委负责人回后即公开反毛^[42]，当时有一中央巡视员曾批评他们不对。此事传到赣南后，当时赣南行委即在信丰开群众大会反毛。三十五军军委得知此事，指出赣南行委之错误，并将负责人（三人）扣留，后改随军行动，停止活动，并改组赣南临时行委。此事发生后，一般同志特别是干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开口，特别不敢批评总前委。赣南临时行委对此问题的处置是在中央未解决此问题前，与总前委、省

行委均断绝关系。我到后与他们讨论到此问题，批评他们这种脱离组织的解决办法不对，仍须与两方发生固有组织关系，但声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决，目前坚决按照中央紧急通告的国际路线（我只看到一个紧急通告）来布置赣南工作，哪方面的指导合乎国际路线就服从哪边的指导。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写信与双方面发生关系，同时指出省行委、赣南行委之严重错误。我对总前委之反 AB 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另一方面是可以助长 AB 团的发展，如赣南曾发生过 AB 团的分子抓住党来枪毙忠实同志的事实，且在党内恐怖之际给了 AB 团活动以大好机会。但同时我向他们说明，反 AB 团之严重主要是从深入群众斗争的路线中来解决，当然并不是说紧急的处置不能用且必要用。

赣南指导机关的同志能力甚弱，需要派一人去作中心，才能将赣南工作创造起来。

四 个人的回忆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错误，据我现在的回忆感觉到主要的有：

（一）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在右江时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这样的错误。没有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不一定占领城市）而是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错误，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至于沿途是不是注意发动群众呢？是注意了，但因有这一中心错

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群众的工作。

（二）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了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因为在武冈失败后，在环境及本身的估量上，须要到江西与苏区发生一时期的联系，以休养补充，当时七军太残破、太疲劳了，不过由右江到江西，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对于在北江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苏维埃区域，我认为这一决定是不正确的，梅花一带对湘粤影响固大，正因为如此，敌人之注意力亦大，敌必不惜一切来进攻，在七军本身力量及群众未起来之际是无法占住的。当时七军的需要实在应迅速到江西，果如此也不会有梅花之损失了，因梅花之役在该地工作的决定之下不能不打的，固然侦察不好也是一个失败的原因。

（三）集中攻坚的错误，七军是深刻地感觉到了。几次的攻坚都是我们失败，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更成了“左”的空谈，过去的事实是证明了。

（四）过去七军历史上向来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因之屡次上当不小。隆安、长安、武冈、梅花作战都是犯了这个错误。

（五）七军本是和平转变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党的领导仍是薄弱，不能在紧急关头打破官兵的失败情绪。这固然干部太缺乏是一原因，但工作方式不够更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七军路线之错误所形成的困难之反映。

（六）右江的错误是富农的路线，以致土地革命没有深入。

固然当时是加紧了反富农的工作，但工作方式错误，没有动员全军的党去进行这一斗争，结果工作推动不来，仍然成就了富农的路线。

（七）八军的失败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同时我认为当时八军应该早坚决地向右江推进。固然龙州对外影响很大，但是一个保守不住的地方。

（八）侦探工作太差，好几次都吃了这个亏。

（九）敌军士兵运动做得太少，特别是对桂系军中的兵运，是一很大的错误。

（十）七军是坚决地执行了立三路线，碰了不少钉子，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假使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达不到七军，是否我们可以避免立三路线的错误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七军的基础是，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这便是便利于立三路线发展之基础，过去攻南宁正是犯了这一错误（立三路线并未到七军），并且我们未得到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即已决定向中心区域发展。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 error，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这也是我感觉到的。

（十一）以上是我个人感觉到的主要错误。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上海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张云逸等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次年二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二月底，红七军经过千里转战，抵达江西崇义地区后，邓小平受前委的委派，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2] 宛旦平，当时任红军第八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队长。

[3] 作豫，即俞作豫，当时任红军第八军军长。

[4] 法占地，指今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

[5] 番，对外国或外族的称呼。这里指法国帝国主义。

[6] 安南，今越南。

[7] 桂系，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广西地方军阀。

[8] 向都，旧县名，今广西天等县向都镇。

[9] 十月革命节日，指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领导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全国各地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10] 平马，镇名，今位于广西田东县境内。

[11] 民团，旧中国农村中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组织的武装。

[12] 亭泗，村名，今位于广西巴马县境内。

[13] 古州，镇名，今位于贵州榕江县境内。

[14] 王家烈，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三师师长。

[15] 邓拔奇，当时任中共南方局代表。一九三一年九月赴广西右江向红军第七军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进攻中心城市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一月离全州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

[16] 指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策略总路线”。这个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17] 韦拔群，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队长、第二十一师师长、独立第三师师长。一九三一年十月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率百余人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游击斗争。

[18] 立三路线，指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19] 融县，旧县名，今广西融安县。

[20] 豪人，即陈豪人，当时任红军第七军政治部主任。

[21] 李明瑞，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

[22] 白崇禧，桂系军阀首领之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广西省民团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民团司令等职。

[23] 何子初，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

[24] 龚鹤村，即龚楚，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师长。

[25] 梅花，村名，今位于广东乐昌市境内。

[26] 李谦，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二十师师长。章健，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团长。

[27] 鹤村，即龚鹤村。振武，即袁振武，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二十师第五十九团团长。李显，当时任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

[28] 韶州，旧府名，今广东韶关市。

[29] 张云逸，当时任红军第七军军长。

[30] 紧急通告，指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

[31] 大庾，旧县名，今江西大余县。

[32] 行委，行动委员会的简称。是一九三〇年夏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为推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组成的各级统一领导机构。

[33] 大、南、上、崇，指江西大庾（今大余）、南康、上犹、崇义。

[34] 邓斌，邓小平在广西开展革命斗争时的化名。

[35] 思林，旧县名，今广西田东县思林镇。

[36] 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

[37] 雷经天，当时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38] 富田事变，是发生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一次事变。一九三〇年上半年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赣西南地区各级党、政组织和红军第一方面军中陆续开展了肃清 AB 团分子的斗争，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红军第二十军的少数领导干部因对错捕“AB 团”的做法不满，带兵包围了驻吉安县富田村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释放被关押的人员，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脱离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并提出了分裂红军的错误口号。这一事件史称“富田事变”。事件发生后，朱德、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做了重

要工作；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指出富田事变的严重错误的同时，采取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返回赣江以东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同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将这一事件认定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致使红二十军大批干部被杀害。

[39] 总前委，指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40] 刘士奇，当时任红军第二十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

[41]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一九二七年四月初该组织被革命群众冲垮，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〇年上半年，赣西南等革命根据地在肃反工作中首先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后，这一斗争扩展到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反AB团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

[42] 毛，指毛泽东。

磨擦原因与巩固统战具体办法^[1]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副指挥、任主任并杨彭：

(一) 综合这一个时期地方工作所引起的磨擦，有下列问题。

甲、在混乱时我们的工作一般是突击的，如大批收容散兵、自主的群众工作等，未估计到今天比较局部环境之再来。

乙、我们直接组织的游击队数量很多，影响友军补充壮丁之困难。

丙、民众对八路军的最高信仰使人不安。

丁、八路军活动地区甚宽，使人无插足处，且无法争取群众。

戊、加上我们转变方式不及时。

(二) 因此现在各方对我军戒备甚严，友军对我关系很坏，上层更觉不安。郭挺一^[2]弟甚至说八路军在晋北并未作战，要求上级限制我军范围，并闻梁化之^[3]曾电令郭监视我游击队，今日兑九峪驻军七十一师团长扣留动委会^[4]负责人。各方面对我进攻显然是整个问题。

(三) 为巩固统一战线，我意必须避免八路军与其磨擦，缓和对立形势，在某些部分上实行让步。

甲、除部队驻扎区域外，收回其他各县，公开工作应一切经过牺盟教导团^[5]、决死队^[6]去实现。

乙、建立与加强各地秘密党的组织工作，重心放在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将所有游击队集中靠拢主力部队，进行训练，扩大与巩固，其经饷经过主力向政府取借。

丙、凡不便于存在的县区动委会，八路军工作同志撤回，经过积极分子来实现纲领，利用一切方法与友军建立关系，解释各种问题。

丁、部队派出活动的连队，中心是扩大本身，停止征集器材，并公开设立八路军招募处。

戊、是否适当，请示，以便执行。

邓 小 平

十一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并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的复电。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六日，毛泽东在延安连续致电在山西抗战前线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提出要注意同山西阎锡山的关系，“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磨擦”，并“要加紧内部的统战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九月十一日，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2] 郭挺一，当时任阎锡山领导的工人委员会主任干事和训导院负责人。

[3] 梁化之，当时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干事。

[4] 动委会，即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又称战委会。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发布过一些进步政令，如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优待军人家属、组织民众等。一九三七年八月，周恩来等到太原，推动阎锡山共同组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委会保持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

〔5〕牺盟教导团，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教导团的军事干部由阎锡山直接派出，都是旧军官。政治干部由军政训练委员会派出，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政治工作人员也由共产党选派。

〔6〕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属第二战区建制的一支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

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

—

当前的战局，是处于暂时的局部的失利的境况，决不是抗日自卫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

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动员新兵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历史上“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我们还未能给以有力的克服；其次，是由于过去对民众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别是抗日的教育，甚至在抗战爆发后，这一重大的工作，依然表现着异常的不够；第三，是由于我们今天征调壮丁的方式，还不无强迫的错误，这种错误的继续，造成了动员新兵的极大困难，且使入伍者缺乏坚定的意志与作战的勇气，甚至还可造成民众与政府、军队的对立，给日寇、汉奸以活动的口实与机会；最后，也由于对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没有切实实行政府所颁布的优

待办法，给以最低限度的解决，使前线战士能够抛开家庭的顾虑而安心作战，并以这样的影响提高民众加入军队的决心和勇气。

假如我们冷静地回顾几个月来征调兵员的经验，我们当可看到在某些地区，正因为有了上述的缺点和错误，致使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以最高的民族仇恨，奔赴抗日的前线，反会产生和增长避免兵役的心理。这种结果，将使民众不能充分了解政府积蓄与扩大国防力量，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之重要，反会在部分人民中增加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这种结果，将使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前线官兵的艰苦奋斗与国与家的关系，而热烈地拥护和慰劳军队，实现大革命^[2]时代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反会增加部分民众厌恶军队不愿当兵的观念。日寇、汉奸、托派^[3]之辈，则更利用这些缺点和错误，来进行其挑拨煽惑的阴谋，企图造成民变，以威胁和扰乱抗日的后方。这些严重的现象，即使是在一个两个村庄发生出来，即使在一极小部分民众中表现出来，已经足够引起我们的最高警惕了！

不错，这一时期的征调工作，已有其相当的成绩，前线军队一般地得到了相当的补充，但这决不能成为一种根据，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那些不好的征调方式。它纵然可以供给一时的补充，但绝不能满足长期抗战的需要。只有纠正那些不妥当的方式，才能保证今后动员任务的实现。

二

我们指出由于征调方式的不当，而可能产生的不好结果与影响，其意义不在于消极的批评，而在于如何去纠正，采取好

的动员方式，使前线能够得到源源不绝的补充，益能组织足够数量的新军队。

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定能够很快地打破部分民众中的不健康的心理，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自动地奔上前线，鼓励自己的夫、子、兄、弟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这从某些区域进行动员工作收到显著成绩的例子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出来。

这些动员较好的区域，给我们显示出了一些可贵的经验。

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

在那里，进行了团结抗日积极分子与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分子（不是投机想升官发财的那些人）的工作，经过他们去进行招募，常常收效极大。

在那里，进行了抗日军人家属中的工作，召集了各军军人的家属开会，有可能时甚至举行会餐，向他们宣传解释各种抗日的问题，说明他们的光荣，给以光荣牌匾，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困难，已在可能的范围内，向当地政府或民众团体提出意见，求得部分的解决。这些工作的结果，给了一切人民以抗日军人家属光荣的榜样，创造了不少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哥哥送弟弟参加军队的新模范。

在那里，动员了政府和民众团体，来协同地进行这一工作，推动了这些组织进行宣传、慰劳与欢迎新兵上前线的工作。

在那里，驻扎的军队，首先起到了模范的作用。军队本身有了模范的纪律，与民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举行军民联欢晚会，请民众吃饭（常是以连队为单位每家请一人代表）。这些工作给了民众以最切实的影响，使他们从经验中改变了惧怕军队的心理和“好子不当兵”的观念，给了政府与军队招募新兵以便利。

在那里，军队中已动员了自己的战士去进行招募工作。只要保证自己的战士不会扰民，态度和蔼，所收成绩常常是可观的。

最后，在那里，有些地区是处在敌人的后方侧翼，或者处在时常被敌侵扰的范围内，他们充分地运用了组织游击队的方式，动员敌人后方我接敌区域的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些游击队本身的壮大与战斗力的增强，还逐渐成为正规的劲旅，实际上扩大了国防的力量；甚至在可能的时机，在不妨害与削弱游击战争的开展之条件下，还可动员一些游击部队加入正规的军队。这一方式的运用，在今天不少领土变为敌人后方的条件下特别重要，既是增强国防军队的一种良好手段，在持久抗战的战略上更有极伟大的意义。

我们热望全国一切军队能够得到适时的补充与扩大。在全国的征兵制还没有可能实施以前，我们盼望政府和军队都能运用这些经验。固然这些经验仍然是不充分的，但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式，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

三

动员新兵的责任，在于一方面保证动员计划的完成，一方面还要从政治上，保证这些新战士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自动性而开赴前线，这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一工作依靠于动员机关和军队本身协同地完成。

用不良方式征调新兵，巩固部队与提高战斗力的工作自然是极困难的，急需接收新兵的部队，以坚强的政治工作，去弥补征调时的缺点。即是用好的动员方式征调新兵，也不能丝毫忽视这一工作。

必须认识，新战士在昨天还是一个老百姓，家庭的观念是浓厚的，部队的的生活是不习惯的，军事技术是不懂得的。为着巩固新战士，使他们很快地习惯部队生活，很快地成为熟练的战士，我们必须进行许多切实而艰苦的工作。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以为完全用长官的严厉统制办法，就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固然，军队的严格的纪律与合理的统御是必需的，但是不够的，还要求政治工作的配合。我们不仅要武装战士的手足，尤其重要的是武装战士的头脑。完全采用压制的办法，其结果，纵然可以在表面上收到一些效果，也绝不是巩固的，更不会发扬战士的自动性，从战士自己的觉悟中发生出无比的战斗威力，尤其不能在任何困难环境中还会保持一致以支持艰苦的斗争。

政治工作，在巩固新战士与提高其战斗力上，是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其极大作用的。

在接收新兵的时候，必须协同征募机关，举行隆重的慰劳与欢送：在开赴前线的途中，尽可能组织沿途群众的欢迎与欢

送；并在接收部队举行热烈的欢迎。

新战士到达部队之后，应首先了解征募时的情形，战士的情绪，以及可能发生的问题，针对这些，进行及时的解释，特别是立即加强抗日的教育，提高新战士的觉悟。

在部队中，应动员老战士，提倡友爱的精神，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学习军事和政治，反对老兵欺侮新兵的现象。同时，注意新战士的伙食及衣物的供给，尽可能减少新战士的困难与苦痛，使新战士的精神感到愉快。这是巩固部队的重要因素。

提倡合理的统御，采取更多的教育说服方式，推动新战士自觉地遵守纪律，努力学习。

提倡战士写信回家，告诉自己在部队的愉快生活，宣传家属抗日救国。允许战士家属到营地看望，并给家属以很好的安慰和招待。

做好这些工作，不仅可以补足动员时的弱点，且可生长将来动员的新的力量。我们希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能以最大的努力去进行，我们还希望军事长官也能给政治工作以赞助。

新兵动员方式的改善，与部队政治工作的加强，将配合着战略战术的进步，锻炼出最大数量的有优良技术的有最高战斗力量的国防军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八路军总政治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出版的《前线》周刊第三、四期合刊，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邓小平从一九三八年一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2] 大革命，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3] 托派，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

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加紧布置紧急动员工作^[1]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胡杨并报朱彭傅：

(一) 此间正加紧布置紧急动员工作，主要是：

甲、迅速完成基干支队，每县组织等于一个营，接敌的区组织五十余人至一百人的游击队。

乙、驮驮^[2]粮食将接敌区域粮食向内搬。

丙、加紧扰乱敌人，破坏汽车路、大车路。

丁、加强自卫队的工作。

戊、与春耕运动联系起来。

(二) 一切以坚持统一战线与发展本身发展党为原则。

(三) 我们可直接布置汾、武、榆、辽、和、武、涉、黎、潞、襄^[3]等十县，但长、长、壶、平、屯^[4]等五个县因已隔断，晋豫特委不知在何处，故很难布置。

(四) 请转电朱瑞^[5]同志，抵达晋豫特委及八路军基干支队之赵基梅、涂锡道^[6]两同志，并直接指挥他们的工作。

省 委
小 平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和中共冀豫晋省委给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

副书记杨尚昆并报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的电报。

〔2〕原文如此。

〔3〕汾、武、榆、辽、和，指山西汾阳、武乡、榆社、辽县（今左权）、和顺。武、涉，指河北武安、河南涉县（今属河北）。黎、潞、襄，指山西黎城、潞城、襄垣。

〔4〕长、长、壶、平、屯，指山西长子、长治、壶关、平顺、屯留。

〔5〕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

〔6〕赵基梅、涂锡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所辖的独立游击支队（亦称赵涂支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关于党组织设置及 军事划区的意见^[1]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

刘并分转朱彭傅雪峰及朱瑞：

甲、党省委现转区域很宽，如仍照过去小特委制度，其优点是特委区域小，易管理，其缺点是省委无法整理，太多，特委靠近集总^[2]后，对于一、二、三分区更只能给以原则上之指导，它目前干部缺乏，必须与新区调济，特委太多，干部配备必弱，离开省委，各区领导必发生困难。

乙、原一、二分区工作已有相当基础，设立较强中心县委即可代替原小特委之任务，且可集中重要干部于特委，使有独立领导力量，特别在易于脱离省委领导的条件下，更需如此。

丙、特委对中心县委之领导，至多不过两天路程，即敌截制交通大道，亦可实施武装交通不致被阻。

丁、其他各区亦采取大特委制，原三分区因在创造基础中，故暂不动。

戊、关于军事分区，自应与特委一致，否则军区管理单位太多，且在小单位将形成混乱与失掉掌握，荣臻区^[3]的经验应采用。

己、现在各分区之武装亦应有计划地组织起来，使之逐渐锻炼成为正规军队。一、二分区武装亦据此条件，现分散必停留于游击队，并不能从活动中锻炼战斗力，如照小师组织则可

经常集结两团使用，执行任务更好，邹汪^[4]两团亦可抽出使用。问题在于编制后对各县区基干之指挥问题必须解决。我意可在特委领导下，设军事部，并以八路游击司令诸名义出现管理与指挥之，基干团于某地行动时可直接指挥当地之地区武装。

庚、原则确定后再决定组织及干部分配。

小 平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并转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以及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李雪峰、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的电报。

[2] 集总，指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部。

[3] 指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十二月，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大队（相当团），每个大队辖三至四个中队（相当营）。第一军分区兼第一支队，辖第一、第二、第三大队；第二军分区兼第二支队，辖第四、第五、第六大队；第三军分区兼第四支队，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大队；第四军分区兼第三支队，辖第七、第八、第九大队。

[4] 邹汪，指邹国厚、汪乃贵，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团团团长和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副团长。

对付敌“扫荡”华北的措施^[1]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

徐宋并告左刘：

敌已开始“扫荡”华北计划，你们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照朱彭电^[2]示方针布置。我意：

甲、准备路东纵队^[3]下编两个等于旅的大支队，路^[4]西编成两个大支队，旅级干部我们可带几个来。目前新部队应轮换集中训练，中心在巩固与提高战斗力。

乙、路东应用大力筹集一切款子，用提省款^[5]控制流通券^[6]基金与政府存款、募集救亡公债等方法实现之，以百万元为目标。

丙、加速解决冬季用品，并尽可能从路东运大批粮食到路西，或在太行山计划半年以上军粮。

丁、路东兵工器即运路西。

以上请考虑。

邓
十五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任穷并八路军参谋长左权、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电报。邓小平当时正在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2] 指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朱德、彭德怀等向各兵团首长和政治部主任发出的电报。电报指出：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进攻，不过是“扫荡”华北的开始，晋东南、晋西北、河北平原及冀东的严重局势必然会到来。为坚持华北抗战，必须努力巩固与改造新军、游击队、保安队及其他一切抗日武装，巩固与改造政权，在我们力量占优势的地区，使之成为统一战线的抗日的民主的政权。

[3] 路东纵队，指陈再道任司令员、李菁玉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

[4] 路，指平汉路，即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的一段。

[5] 提省款，指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向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提取的抗经费。

[6] 流通券，指抗日战争初期冀南地区为了抵制伪币所发行的临时性的代用币，一九三九年十月，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冀南钞票后，停止发行和流通。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部分 对于华北和冀南抗战的估计

一、华北问题。

（一）首先要认识华北抗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局面，必须估计到有严重的困难放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因为：

1. 敌人重视华北：（1）从战略意义上讲，华北是敌人进攻中国主要的据点。（2）我们占领华北，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3）在过渡阶段（第一期抗战至第二期抗战），敌人要进攻西北，在战略上须对华北来一个“扫荡”，至少扩张它在铁道两旁的交通线。（4）在相持阶段中，敌人要抽调兵力来后方，对付游击区域。

2. 敌人从各方面来着手进攻：（1）军事方面。（2）政治方面，用挑拨离间的手段。（3）提高伪政权的威信，扩大伪军。（4）特务工作深入我们的核心。（5）经济封锁。

（二）但我们有支持华北抗战的优良条件：

1. 华北是全国抗战的一部分，有全国各战场的配合，华北抗战不是孤立的。

2. 我们在华北有相当大的兵力，有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有相当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民众斗争经验逐渐丰富，且华北有广大的回旋地区。

3. 有比较强大的共产党与八路军，有充分的军事经验，并有创造根据地渡过难关的经验。

4. 我党和八路军以及友党友军的力量逐渐加强。只有发展进步，才能支持华北抗战。

5. 六中全会^[2]后，统一战线工作必然扩大与发展，各部门工作都会开展，各党派各军队各阶层的关系会更加巩固。

（三）如何准备支持华北抗战：

1. 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巩固扩大党和八路军及友党友军。
3. 加强政府工作，动员一切生动力量。
4. 加强瓦解敌伪军、汉奸、维持会^[3]工作。
5. 军事上要积极动作，阻滞并击破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
6. 要发扬党政军民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冀南的问题。

（一）冀南是华北的一部分，虽然是平原，但在战略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是两个战略据点的连环（太行山与泰山之间的地区），周旋地区非常大。

2. 有坚持的条件与必要：冀南的位置相当重要，过去有工作基础，政府也有威信。

（二）但冀南在坚持斗争中有严重的困难：

1. 平原作战于敌有利。
2. 各种基础还很脆弱。
3. 磨擦尚多，妨害团结，但在敌人严重进攻下，可能减少。
4. 敌人挑拨离间加剧。

（三）冀南工作的方针：

1. 巩固与友军友党及各阶层的团结，减少磨擦。
2. 坚持并增、强平原地作战胜利的信心，加强各党派各军队的力量，培养游击队，改造地形（挖路），培养地方军事干部。
3. 加强群众工作。
4. 瓦解敌伪军、汉奸伪政权。
5. 研究敌人上次进攻南宫与今日复犯的经验。党员军事化，大家要有决心坚持游击战争。

（四）创造根据地的问题：

1. 要把冀南造成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共产党八路军在冀南影响相当大。（2）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3）可以争取友党友军与我们合作。（4）有六中全会的保证。

2. 但也有困难，现在仍存在着的有：（1）当局在顽固分子的包围中。（2）过去的冀南矛盾与阶级矛盾是统一战线进展的困难。

（五）我们工作的精神：

1. 对统一战线：（1）采取宽大政策，排除外面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怀疑恐惧心理；切实实行五一减租、分半减息^[4]，要通过各阶层来做，不限在一纸命令，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2）吸引士绅参加行政会议，尊重他们的人格，倾听他们的意见，酌量采取，争取其进步分子。（3）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应注意到军官方面。（4）处处顾及群众，顾及各阶层，具体解决其困难与疑问，不做民众所不满的事，逐渐领导民众进步，消除民众对八路军的恐怖。（5）采取固定方针，消除疑心，安定人心。（6）纠正农会直接干政的作风，农会应站在帮助政府军队的立场来工作，建议与监督政府。

2. 对国民党：（1）调整关系，要协助赞助国民党。（2）真

诚合作，建立友军关系。（3）赞成进步分子加入国民党。（4）尊重国民党员的地位，亲近他们，使坏的变为好的。（5）某些地方给予工作上经济上的帮助。

3. 对友军：（1）友军怕我们瓦解其下层，我们要解除他们的疑惑。贪小便宜必致发生错误。（2）发扬友军特长，反对只有八路军才抗日的作风，对友军胜利要宣传，优待一切抗日军人家属。（3）对友军少批评多建议，要有诚恳的态度。（4）要帮助友军解决困难。（5）对友军态度要谦和，尊重他们及其家属。（6）配合友军作战，挽救友军于危难，禁止挖墙角，要帮助他们。（7）大公无私地解决友军与友军间的纠纷。

第二部分 根据地的工作问题

一、武装问题。

（一）把扩大八路军（补充兵员）、组织游击队当作重要的任务，要加强党内军事教育，加强对于游击队的领导，逐渐提高其战斗力，使之逐渐正规化。

（二）对自卫队，要使众多的兵枪用之于抗战上。

二、群众工作。

（一）教育群众学习民主，号召参战，解决自身困难。

（二）战委会^[5]应成为统一战线的民意机关，吸收进步分子参加，设立委员会，实行民主做法。

（三）农会应注意统一战线工作，保证不为富农所领导（地主不能加入农会），争取得到农民信仰。

（四）培养群众领袖，对党与非党的领袖都要爱护。

（五）会门^[6]工作是一个大问题，基本上必须坚持瓦解会门的方针，但要看到它的群众基础与它号召群众的力量。具体

办法则是：

1. 改善与会门领袖的关系，吸引他们积极抗日，协助政府，但以不帮助其发展与提高其威信为度。
2. 取消会门名义，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
3. 政府利用合法地位调会门中的人来受训，接近其下层群众，实施民主民生的改善，争取其下层。
4. 对确被汉奸利用之会门，必要时采取必要手段。
5. 瓦解会门要依靠我们深入的群众工作。

（六）群众工作必须有原则，须与友党友军在共同纲领下进行工作，用民主的方式取得民众的拥护。

三、政府工作。

- （一）承认冀南政权是国民党的政权，尊重其形式。
- （二）逐渐实现民主化，逐渐改造下级政权。
- （三）政府应成为各阶层团结的核心。

（四）培养行政工作人员，顾及政府工作干部的工作，要帮助他们，具体领导，不随便给他们加上右倾的帽子，在政府中不设党团，只设特别小组。

四、党的工作。

- （一）中心是巩固地发展。
- （二）清洗坏分子，但对同志的政治生命应慎重处置。
- （三）加强党的纪律。
- （四）加强教育。

五、工作作风问题。

- （一）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所以收到效果，是一点一滴工作积成的。要求艰苦的工作作风，耐心地工作。
- （二）保持统一战线的形式与内容，不要太突出。
- （三）合法与非合法：今天基本的是合法方式，过去我们

不善于用合法的方式工作，现在要合法斗争，要懂得方式，切实做好工作。

（四）党派性与阶级立场：

1. 自满骄傲不是党派性，不是就站住了阶级立场。
2. 真正的党派性，应解释为真正把握着党的路线，真正保证党的路线之实现。
3. 了解党的路线，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才是阶级的立场，才是忠实于党。

（五）工作计划一定要保证实现，要估计我们的力量和环境，要合乎需要，要做得得到，要培养同志完成工作的信心。

（六）民族化的形式，马列主义的内容。

（七）大众的民主主义的作风，即面向群众，面向下级同志，尊重人家意见，切实解决困难。

六、结论。

冀南工作有很多成绩，依靠着党和八路军及各级同志的努力，才形成现在的局面，但还不够巩固，还需要不断努力，克服难关。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冀南抗日根据地一次党内会议上的报告提纲。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2] 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评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3] 维持会，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指使汉奸建立的临时性

的地方傀儡政权组织。

〔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由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不同，减租减息的额度不完全相同。五一减租，就是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地租均按原租额减去五分之一；分半减息，就是借贷利息的年利率不超过一分半。

〔5〕战委会，即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又称动委会。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发布过一些进步政令，如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优待军人家属、组织民众等。一九三七年八月，周恩来等到太原，推动阎锡山共同组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委会保持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

〔6〕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我们在新的环境下的工作^[1]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一、新形势的估计。

沿平汉、津浦铁路^[2]北段及冀中之敌人，总起来说有几万人之兵力，开始进攻冀中，相继进兵冀南。这证明敌人这次进攻与第一次进占南宫不同，是用了更多更强的兵力，企图巩固交通线，扩大伪组织，发展它的势力。

在全国方面来说，敌人整个计划是企图进攻西北和西南，而华北是全国战争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敌人进攻西北的据点，所以必然要在进攻西北之前，对华北来一次“扫荡”。冀南是华北的一部分，也正处于平汉、津浦两铁路之间，同时也是泰山和太行山两个据点的连环，所以敌人“扫荡”华北，一定进攻冀南。敌人企图完全摧毁冀南和冀中的抗日根据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敌人进攻冀南，想占领各个城市，也得要三万人，但我们估计敌人再想抽调兵力来，也是不可能的。敌人经过进攻冀察晋的教训，胆子也是小了些，战斗力也减弱了。我们的本钱虽然没有敌人大，但有许多优良条件战胜敌人的进攻。

我们的回旋区域大。敌人钉“钉子”，我们要拔“钉子”。拔“钉子”要有巧妙的办法，很好的战略，如何拔呢？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战术原则是运动游击战，特别是用普遍的游击战争

来坚持冀南抗战，不断扰乱、疲惫和袭击敌人，打敌交通部队、运输队，包围县城，伏击它的增援部队，断绝敌人交通。拔下一个“钉子”，地方就宽广一些，再继续拔。我们要不断地消灭和消耗敌人，但不为敌人所算，避免敌人消灭我们的企图。

硬拼正是敌人所希望的，我们要想巧妙的办法对付它，不为所算。等到麦子长起来的时候，到处都可以隐蔽，到处都可以袭击敌人。等到青纱帐^[3]起来，那就是我们大大活动的时候。但今天地里一点隐蔽的地方都没有，只可埋伏在村庄内。敌人偏偏就不从村里走，只从地里走。因此，挖路还是我们急需的工作。

根据以上办法，我们的工作中心放在哪里呢？

（一）用运动游击战，来消灭与消耗敌人，骚扰敌人，适当地使游击队与自卫队配合起来。

（二）普遍地发展游击战争。

（三）用最大的力量，巩固群众情绪，深入工作。

（四）阻止敌人建立伪组织和组织伪军。

（五）继续努力战争动员工作。

我们要集中力量来完成工作，应付敌人残酷的进攻。

二、党如何领导游击战争。

（一）首先我们估计到，在这样的环境内，地域要分割了，交通不便，我们各级党部，上下级的联系就更不密切了，军事的联系亦困难了。我们要求各级党部将独立性和战斗性把握在党的总路线下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对分区的领导，游击队要坚决执行党的指令，要在政治上有保证。在这艰苦的环境中，特别加强游击队的领导，要着重党的路线的保证。对军队的指挥要注意，如要从军队里面抽调枪或人，一定要经过军队党和军

事系统来办，不要乱抽乱调，并且要时常检查军队是否执行了党的路线。

（二）要在地方上选择最坚决能干、忠实于党的路线、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同志，来发展起普遍的游击队。必须指出，八路军与其他部队都要发展。党应认识八路军是自己的队伍，八路军有了错误，地方部队有了错误，党应当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应当负责任地诱导它进步，帮助它很好地发展。

我们要用八路军的名义去组织游击队，这时候是合适的。游击队可以渐渐地发展变成正规军。这时要特别指明的是，我们的一切军事责任，应由军事系统去负责（军区分区），党在政治上要负责。

（三）普遍组织基于自卫队、游击小组，要由支部同志负责领导。不管自卫队、游击队，党必须加强领导，加强教育，防止个人领导与军阀土匪主义的发生，保证党在游击队中的领导。要选择对党最忠实的同志来负责，要培养他的威信，使游击队发展。

（四）今天游击队的普遍发展，占工作第一位置。更加依靠普遍发展游击队，才能战胜敌人，才能阻止敌人。成立武装宣传队，宣传与组织群众，摧毁伪组织，提高群众信心。县以上的党组织必须随游击队活动，用游击队掩护自己，掩护党，掩护县府，掩护群众团体来进行工作。党和政府要依靠军队武装，检查领导工作。

（五）游击队应配合正规军作战，要统一指挥，游击队、自卫队、正规军三位一体地配合作战。

三、党怎样领导政府工作。

（一）党在战争中积极活动，表现给民众看，提高政府威信。

(二) 行政人员要表现得坚决勇敢，深入群众，为民众解决问题。为民众爱戴的模范，在斗争中来试验。

(三) 在斗争中最好培养群众领袖，作为以后民选的基础。要真正为民众所爱戴，为群众所认可。

(四) 政府工作一切面向群众，面向下层，真正要从下级打下区村政权的基础，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士绅，缩小汉奸的基础，加强区村工作。

(五) 军队的供给问题也是目前新环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府应用最大的力量，依靠群众团体，依靠团结士绅，依靠党向群众说服的工作来解决。党在这个问题上，要负起重大的责任。

四、群众工作。

党政军要协同努力，坚定群众信心。在这战斗艰苦的局面下，很可能有部分人表现出悲观失望的情绪而动摇。我们党政军要坚决不动摇地坚持在这个环境下工作，即可稳定民心。要发扬和提高群众斗争情绪，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件艰巨的工作。

(一) 党加强对群众的领导。

我们党员在一切工作中要起到模范作用。党的代表、行政长官、游击队长、八路军各级干部，均应经常接近群众，向群众宣传、谈话，来影响群众。政府要团结民众，正规军与游击队要起武装宣传作用，要爱护民众，减轻民众的负担。

(二) 减租减息、公平负担^[4]，仍是我们坚持的工作，不应在这种环境下放手，更应抓紧这个工作。需要更多的耐心来说服士绅地主阶级。方式要更民主一些。

(三) 群众宣传教育工作。

(四) 提高民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五) 宣传要点：

1. 要有持久的艰苦的斗争，最后战胜敌人。

2. 向群众普遍地宣传，我们的作战方法是运动游击战，是在于保存自己的力量，并消灭和消耗、疲惫和袭击敌人，不是硬拼，这样才能实现战胜敌人的目的。正面抵挡和轻易决战，正是敌人所希望的。

3. 要向群众解释，敌人占领区域太广大了，兵力不敷分配，只要我们利用游击战争，不断地疲惫和袭击敌人，便可以收复县城。并且急需破路，多种高粱，来增加敌人困难。

4. 要以事实来宣传敌人残暴，要使群众明白不抗日活不成，相信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

5. 要说明，必须军政民一致合作，才能打败敌人，保卫冀南；民众要供给军队吃饭，军队才能英勇杀敌，饿着肚子是不能作战的。

6. 要告诉群众做些什么工作，如组织自卫队，站岗放哨，破路藏粮，参加游击队。

7. 要不断宣传我们的胜利，使群众知道。

我们的宣传工作应是经常的、普遍的、深入的。在战争环境中，各村的救国堂^[5]、夜校等更应积极出来活动。

(六) 要提高警觉性，加强锄奸的群众运动，根据六中全会^[6]的精神来进行教育。对被动的维持会^[7]，如县城附近的，必须特别注意。加紧肃清死汉奸，争取动摇的，利用他们为我们做事，报告敌人消息，但我们要特别为他们保守秘密。

五、党的工作。

(一) 我们党工作的重心是巩固地发展。在有工人工作基础的地方力求发展，但巩固是首要的，从巩固中求发展。在无基础的地方，从发展中求巩固。总之是要消化，我们的发展如

不能消化，就会变成没有战斗力的党。现在是战争的环境，这是最能锻炼我们的。在巩固中来整理我们党，根据战斗环境来检查我们党。

（二）工作重心应放在下层。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创造真正的有战斗力的党支部、区委、县委。培养战斗力应有正确的指导方法，我们不要过分看轻自己的力量，要相信自己的基础，真正把工作放在下层，了解下层，帮助下层，替下层解决困难。

（三）今天的党与过去不同了，不只领导党，还要领导军队，帮助政府，领导群众，进行锄奸工作。现在环境是一天比一天复杂了，所以要求领导同志，更要耐心地细心地来分析和了解问题，从各方面了解问题，加强党的领导，树立党的威信，在斗争中使群众真正认识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四）在新的环境下，在这艰难困苦的局面中，要求我党有创造性，更要求每个党员有高度的积极性。要了解不同环境下不同的工作，创造新的工作方式，细心地、大胆地进行工作。在工作当中要真正体现一点一滴的工作精神、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要真正地面向群众，不武断，不包办；要真正地把握住党的路线，和群众搞在一起，艰苦奋斗，支持战争，不要因新的环境改变方针；要坚持六中全会精神。此外，我们党要特别注意在这种环境中有计划地培养干部，培养群众领袖。党员与非党员都要爱护，帮助他们进步。

六、敌我交界处如何工作。

在敌我交界区域里面工作，要注意下列问题：

（一）敌我交界区是一个游击区。我们要以游击队去开展工作，建立极端秘密的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规定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消息、破坏道路、帮助群众，坚定群众的抗日情绪，创

造下层基础。在政治上，处处为群众着想。上层领导群众是公开的，游击的方式，下层应该是秘密的，以村为单位来联系。

（二）将来如县城被占，敌人会更多地收买汉奸，树立伪组织，组织伪军，扩张他的势力。我们要用游击队普遍的活动方式，来阻止敌人的一切活动，阻止伪组织的建立。

七、党内团结。

团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有了党内团结，才能有阶级的团结。在困难的环境下，最容易发生意见分歧的现象，特别是在没有中心干部的区域。但是也可以避免，需要明了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努力。

在我们党里面，有些同志表现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态度和狭隘的心理，只看到个人利益，这是使党内发生不团结的原因之一。党的道德问题，应提出特别注意。党内磨擦是非常不必要的，即对男女关系问题也应注意。要特别加强党内教育，使一般同志都能了解，党内团结是一切团结的基础，注意敌人、汉奸和一些顽固分子的挑拨离间。我们要用党的团结，来应付艰难困苦的局面。

地方党与八路军的党要团结，要双方负责解决问题。地方党对八路军要认为是自己的军队，八路军的党要尊重地方党。

最后，我们应该估计到，将来这个区域的县城都有被占去的可能。现在已有五分之三是卷进这个新的环境中了。尚未被敌占的区域，应加紧战争动员、破路、减租减息、团结士绅等。用一点一滴的工作，创造我们的工作基础。

现在环境是复杂了，磨擦不免要多起来。在敌人进攻的时候，磨擦似乎是少了，但并不是完结。我们要站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互相让步，求得团结。但要认识到，如果没有我们的阵地，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是处处做不

通的。

今天正由于统一战线的关系，一个县里面两个县长。这个问题完全是靠双方各方面的工作强弱来决定，也只有真正创造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进行一切工作。同时我们真正在三民主义^[8]的立场上，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9]的方针下，来进行工作。

我们党与八路军，是在艰难困苦斗争当中锻炼出来的。只有这样的党，才是最坚固、最有力量的党。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冀南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召开的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2] 平汉铁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的一段。津浦铁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的一段。

[3] 青纱帐，北方成片的高粱、玉米等农作物如同绿色的帷帐，称为青纱帐。

[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5] 救国堂，是抗日战争初期晋、冀、豫等地抗日军民开展群众性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其名称各地区、各部门有所不同，山西一些地方通常称民革室（即民族革命室），有的地方称救亡室。

[6] 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评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7] 维持会，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指使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组织。

[8]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9]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后来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让步没有兑现。

艰苦奋斗中的冀南^[1]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 冀南进入了艰苦斗争的新环境

此次敌人向冀中、冀南的总进攻，是日寇进攻西北前之必然到来的一次大“扫荡”。

在冀南、津南和鲁西北，敌人的进攻是从一月七日开始的。敌人进攻的部署是：筱塚第十师团沿平汉线^[2]石家庄、磁县转向东横扫；林永见少将南部防卫部队以沧州为据点向东压迫，配合敌十师团夹击我军；末松一一四师团秋山旅团首先协同林永见部队向东进攻津南、鲁北，然后移转主力向临清、清河、枣强进攻。总计敌人对冀南使用之兵力在两个师团左右，部队的转动均用汽车装载，并附有坦克、装甲汽车，运动极为迅速和突然。我军虽以顽强之袭扰和运动防御，配合对敌侧背之不断突击，然敌人依靠其优良之技术，特别是汽车快速部队与飞机、坦克、毒瓦斯之配合，终于在四十天的时间进据了整个冀南、津南、鲁北的县城，及鲁西北的一部分县城，打下了梅花桩似的“钉子”。

在敌人的严重进攻下，整个冀南转入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的新环境。全冀南的军政民也用了并且还正用一切努力，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以反对敌人的进攻。

二 过去一年努力的成果成为 坚持冀南斗争的基础

当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时候，正是我国大军退走，土匪蜂起，维持会^[3]到处建立，整个冀南在日寇清水司令统治之下的时候。那时，八路军受冀南人民之不断的请求，才有冀南挺进队与东进纵队之组织。八路军在广大民众和爱国志士热烈爱戴拥护与协同奋斗之下，从不断地作战中，终于打跑了清水司令和日军，摧毁了伪组织，争取和消灭了伪军，肃清了土匪，在冀南的几十个县城上重新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苦奋斗，整个冀南局面开展起来了，民众开始组织与动员起来了，抗日县区村政府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也在民选的方式下建立起来了，直到去年八月，一切均开始上了轨道，一切都在大踏步地前进着。

迄至省政府到冀南，鹿主席^[4]在其北上宣言中宣布了进步的施政方针，冀南民众更为兴奋。在“九一八”欢迎鹿主席的大会上，到会人数达五万以上，情绪之热烈，为历来所未有。不幸鹿主席的施政方针，为一些守旧的不顾大局的个人利益超过民族利益的分子所阻碍，不但毫未见诸实现，过去有效的进步的合乎三民主义^[5]的、利于抗战的设施反而被加紧阻挠。有些地方的民众团体被取消了；有些民众团体的领导人被逮捕了；在冀南最有历史且最为民众所拥护的战委会^[6]也被认为不合法了；抗战最有成绩，在民众中最有威望，且为民众所选举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也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取消了。诬蔑共产党八路军，说共产党八路军“实行赤化”，“毒化青年”，“只宣传不打仗”等等谣言，被某某机关散布出来了。接着好几个

县区出现两个县长、两个区长、两个专员，于是行政被破坏了。然而，这一切违反蒋委员长^[7]意旨和抗战利益的举动与言论，并未能吓退广大民众和抗日志士，相反的，更增加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以克服这些困难，为准备一切力量迎接敌人的大举进攻而努力。

不可否认的，这些内部的磨擦与阻碍，不能不妨害抗战动员的工作。冀南的共产党八路军曾屡次要求各方面合作，在抗战建国纲领^[8]的原则下，克服各种磨擦，一致致力于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共产党八路军曾屡次说明敌人于进攻西北之前，对华北之大“扫荡”必将到来，各方应如何珍贵地保持与发扬过去一年来奋斗之成绩，而不应加以摧残。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敌之进攻。不幸这些诚恳的表示，终未能得到少数自私的人们的谅解，甚至有人主张“宁肯匪化，不要赤化”，“宁肯弄滥，不要八路军干”。在这样的状况下，冀南工作当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犹幸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八路军，始终能在民众爱戴之下，坚持努力，虽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仍能收到好些成绩，打下抗战的基础。在这次敌人“扫荡”的严重情况下，军政民之所以仍能应付自如，亦即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虽然它还不够巩固，不够普遍。

三 我们怎样同敌人作战

正确地认识敌人作战方式的特点，才能正确地确定自己的作战方式。

这次敌人的进攻与过去对冀南的进攻，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不仅在于敌人用了雄厚的兵力，而且在于：

第一，敌人有了前次进攻南宫的失败教训，故在前进时非

常慎重（如由邢家湾到巨鹿四十里，敌人在我不断袭击下，整整用了两天的时间），在其兵力微小时则避开我之主力。

第二，敌人不仅占领城市，而且逐渐控制一些乡村要点，以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束缚我之机动。

第三，敌人于占领城市据点后，即集结相当兵力（多者为二千人），利用汽车速度，企图寻求我之主力而消灭之，而且敌人于进攻某一点时，常取几路包围的方式。

第四，敌人在几次被打击之后，每次作战均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的配合。

第五，特别是敌人于此次进攻中，加强了政治的与经济的进攻，特务机关之散布，对侦察通信之有力设施，与伪军伪政府之培养。

因此我军之机动，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战胜敌人，保持冀南抗日根据地，我们必须具有正确的作战方针。

这里，在冀南是曾经发生过分歧的。

当敌人进攻之前，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八路军即已向各方面及广大民众说明，敌人于青纱帐^[9]前必然要大举进攻冀南，而且我们曾向各方建议并向民众提出下列的紧急动员，以准备迎接敌之进攻：

第一，从政治上向广大民众解释敌人进攻之必然到来，以及我们坚持冀南抗战的条件和胜利信心，同时指出坚持敌后方艰苦奋斗与保卫大西北之意义。

第二，向群众深入解释，只有游击运动战的方式，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保持抗日根据地。

第三，加紧民众的战争动员，加紧毁路、拆城堡、空舍清野及自卫队等工作。

第四，亲密各军队之间，各党派各阶级之间，军政民之间

的团结，因为这一团结是支持艰苦局面的决定条件。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上的准备，以及冀南军政民过去一年的斗争经验，所以从敌人开始进攻一直到现在，并没有表现张皇失措、悲观失望的现象，相反的，他们协同一致地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正因为我们预先解释了作战方式，而且在正确地执行游击运动战的作战方式下，曾经取得了屡次的胜利，不断打击敌人，所以在军队进退转移时，并未引起民众不安与惊慌的情绪，反之他们从切身经验中处处证明与领会了这种作战方式之正确。正因为进行了毁路、拆城堡等战争动员工作，所以能够给进攻之敌以大的困难，而便于我军之机动。

在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根据游击运动战的原则，作战的方式主要是：集结相当的兵力，主动地寻求运动战的机会，求得消灭敌之一路，击破敌之他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加强敌侧背之活动，以侦察钳制与消耗敌人之进攻部队。因为我们采取了这样的作战方式，所以才能制止敌于隆河以西至半月之久，迫使敌人不得不花去很高的代价和一个月的时间才将南宫占去。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大量地消耗敌人而未为敌人所算，敌人始终没有实现其消灭我军主力之企图。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于敌人军事占优势的条件下，寻求机会打击敌人，而取得香城固、安儿寨、大杨庄及南宫、巨鹿间的屡次胜利。

这些真理是否为一切人们所了解呢？是的，广大民众是了解的。然而，可惜得很，竟有某些应该了解的人还没有愿意去了解。

有种人在敌人未进攻时，简直不愿意听说敌人将要进攻的预言，更不愿积极进行战争的准备，而一意以制造内部磨擦为能事，甚至反对与阻挠拆城毁路等工作，这不能不使战争动员受到很大的损害。

有种人简直不愿意去了解如何才能打败敌人进攻的问题，反而大言不惭地说：“我拼着五百个伤亡，定把日本赶走。”这样的认识也曾使部队受到不应有的损害，而事实证明了日本并不是这种人所想象的日本，他们虽然花去了五六百人的伤亡，但并没有收得效果。

有种人责备八路军不应该把县城失掉，甚至到处造谣说“八路军不打仗”。也有人说“八路军吃小米打软仗，某某军吃白面打强仗”。事实证明了正面挡仗的办法，并不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责备八路军的人也不能不放弃应该放弃的县城。事实证明了敌人怕我们的“软”仗而不怕我们的“硬”仗，因为用主力去向敌人硬拼（这与主动地打击敌人不同），正是敌人的希望。事实证明了八路军不但打了仗，而且每天不下十余仗。一月底，由国民党、共产党、政府、士绅、名流、群众团体的代表所组织的前线慰劳团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们到处听到民众诉说八路军的战绩，他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医院的千余受伤官兵。

四 用普遍的民众游击 战争击败敌之进攻

今天的冀南情况是更加严重了。敌人于占领各个县城之后，还控制了一些乡村的要点，经常以“汽车讨伐队”向四乡进行“扫荡”，同时敌人的“扫荡”部队也由数百人、上千人而有时增到两千人，其目的在消灭我之主力，打击我之指挥机关，破坏我之行政系统，以煽动起群众中的失败情绪，而树立发展伪军伪组织之基础，以图进攻西北时，后方交通可无顾虑。同时，敌人加强了特务机关挑拨离间、威胁欺骗、经济封

锁等诡计，以配合军事的进攻。

在敌人的严重“扫荡”下，我军虽能由于灵活的机动的战术，没有遭受严重的损失，但受敌袭击的消息是时有所闻的。然而，不管怎样，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即我们始终在冀南坚持着，敌人并没有实现其预期的目的，不能不以很大的兵力消耗于对付我之广泛的游击战争中。这是我们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实际上尽到了保卫大西北的具体任务。

伟大胜利之获得，如果只归功于正规军队的努力是绝对不够的，而必须同时归功于普遍的民众游击战争之开展。只有充分估计广大民众游击战争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才能发现我们为什么能够支持平原艰苦奋斗至三个月之久的真理，这才能正确地选定今后支持更艰苦局面之方向。

还在敌人进攻之前，我们即已不止一次地指出，发展普遍的游击战争，是支持平原抗战的重要因素。八路军、冀南军区和军分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各专员公署、县政府，在培养游击队与自卫队的力量上，曾经尽了相当的努力。所以在敌人进攻中，在广大无边的原野，散布了无数的大小游击队，所有的县长和一部分区长都兼任了游击队长。这些游击队成了正规军的耳目和有力助手，成了民众保卫身家与国土直接的武装，成了政府领导民众、训练民众坚持抗战的核心，成了维护政府与摧毁伪政权的坚强力量。他们积极地神出鬼没地活动于敌人的周围，给了敌人以极大的困难与精神上物质上的消耗，他们的伟大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假使没有这些游击队去塞着敌人的耳目，去迷惑、疲惫与钳制敌人，正规军队要想得到必要的休息并寻求机会打击敌人，是不可能的。

假使没有这些游击队伸到敌人驻地周围去进行宣传民众，

树立我国政府和军队的威信，摧毁已经建立起来的伪组织，并教育民众如何去反对日寇、汉奸，拒绝使用伪钞等工作，要想阻止日寇扩张汉奸势力的企图，是不可能的。

假使没有这些游击队来掩护政府和民众团体坚持自己的工作，要想在困难环境中组织与动员广大人民来反对日寇，也是不可能的。

冀南的斗争，可能遭受比今天更加困难的环境，我们还须以更大的坚持力，更巧妙的斗争方式，才能渡过难关。而主要的关键仍在于更广泛、更有力的游击战争。那里还需要在普遍的自卫队中培养出更多的游击队以至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并大大地提高游击队的政治质量与积极的动作。甚至我们的正规军也应抽出适当的部队去加强游击队的骨干。我们要做到每一处的敌人，每天特别是每晚总是处在游击队的袭扰、威胁与政治瓦解之中。

然而，这一方针之实行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在抗战中，特别在平原抗战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战争，并未得到一切人的了解。有些人轻视游击战争的作用，有些人甚至在有意无意地破坏游击战争之开展。

在冀南，有些部队不积极对敌，反而抱着“大鱼吃小鱼”的宗旨，已经有好几个小游击队甚至八路军分出部队的通讯人员被“大鱼”吃去了。这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举动，不仅有伤团结，而且对于游击队之存在发生了极大的威胁。接近这样部队的游击队，不但要防敌人，还得防备自己的邻居。

还有一种部队，也自称为“游击队”，其行动是“游而不击”，但对于老百姓却尽了蹂躏之能事。这种现象若不加以制止，必将造成民众之怨恨，而有利于日寇汉奸之欺骗。假若把

民众闹翻了，而无异使自己失败。

各方面重视坚持平原抗战的意义，克服发展游击战争的障碍，是争取胜利的重要条件。因为没有普遍的民众游击战争，就无法支持平原的抗战。

五 冀南的民众在坚决地战斗着

冀南有种人，始终抱着害怕民众的观点，他们不愿意群众真正地组织起来。他们宁愿采用一种空洞的机关来代替正在开展的群众救亡运动，而且照他们看来，在作斗争中，冀南最有威信的战委会、农救会、青救会等组织，似乎都是不合法的。自然，在某些地区内解散民众团体、逮捕民众领袖的事，也就随着连续发生了。

八路军在冀南，始终坚持着扶植民众团体、开展民众运动的方针，始终坚持着以统一战线的立场去调节各阶层的关系以团结各阶层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得到广大民众与各阶层人士的同情与赞助的。正因为努力坚持了这一方针，所以才能够真正地动员起民众，支持起冀南局面至一年零三个月之久，而且还在继续支持着。假如我们过去没有发动民众，没有团结各阶层，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不要说支持一年零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冀南抗日根据地之建立与巩固，是由冀南民众的血汗垒积成的，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估计。

远在一年半以前，冀南的一些爱国志士就在日寇清水司令的铁蹄下，建立了秘密救国会的组织，进行了许多民族教育和宣传工作。八路军到冀南后，依靠了这些先进分子及救国会的基础，才顺利地建立了战委会和各种救亡团体，开展了广大的民众运动。及至农民、工人、商人、学生、青年等抗日救国会

相当壮大与普遍后，一切抗战动员工作才得到了顺畅的进行。因为依靠了这些组织去向民众解说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所以每一个动员工作，都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民众自愿地协助政府与军队，而不需要去施行强迫的方式。

冀南群众团体在领导群众参战上，是有着极大功绩的。

自卫队、儿童团实行了经常的放哨，在锄奸上收到了相当的成效。每次重要的战斗，都有自卫队的配合，故伤员的救护、粮食的供给等等都不致发生困难。

拆城堡、毁道路的工作，也收到伟大成绩，给了敌人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假如不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的热情，是绝不能实现这样巨大的工程的。

在此次敌人进攻中，更表现了群众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到处可以听到与看见群众热烈参战的事实。在束鹿^[10]、宁晋，在巨鹿、南宫，在其他地方，群众拿起梭标、锄头同军队一块作战，并常有缴获。

群众对于抗日军队的爱戴是难以笔墨形容的。只要你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他们愿意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你吃，他们不避危险地为战争服务，他们热烈地慰劳作战的部队。在巨鹿、南宫一带作战的时候，某军曾遗弃伤兵及枪枝于敌人占领地内，群众用麻袋将伤兵、枪枝，偷运出敌人警戒线，送还给某军。在束鹿、宁晋一带作战时，那里的自卫队由县区长率领跟在军队的后面，军队吃的经常是群众慰劳的油果子，军队缴得的大炮，也是由自卫队冒险抬出的。在威县、丘县一带作战时，群众把捉到的日本兵和缴得的枪枝自动地送给军队。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更在“普遍的游击战争”的口号下，群众的游击小组也逐渐地普遍起来了，这些都指明着冀南的光明前途。

冀南民众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呢？

第一，是由于把广大群众组织在各种救亡团体之内，并运用这些组织进行了民族教育，提高了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第二，是由于这些救亡团体不是形式的官僚主义的机关，而是由群众自愿加入的组织，由群众选举出他们自己信仰的人来当他们的领导者，许多工作都经过了群众的讨论与决议。在这样的民主方式下，更加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与这些组织的效能。

第三，是由于这些群众团体为群众解除了一些切身的痛苦。如要求政府取消了摊派制度，实行了公平负担^[11]，相当地减少了租息，提倡了互助，部分地改善了民生，所以更增加了他们的抗战热情。

第四，是由于这些组织是在战斗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从不断的参战动员中锻炼了他们，使他们特别富于战斗性。同时也培养了群众认识“抗日高于一切”的真理。

第五，特别重要的在于这些群众组织是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建立与壮大起来的。他们始终站在民族利益上，去团结各阶层来抗日。即五一减租^[12]、分半给息^[13]的要求，也是根据“照顾这一阶级也照顾那一阶级”的团结精神提出的。当然这是调整阶级间的关系，求得阶级团结的有效办法。事实上冀南各阶层之间都能表现和衷共济、团结于安的精神。自然，不可否认的，在个别村庄也曾发生过幼稚的方式，但是很快就纠正了。

最后，必须指出，军队、政府对于民众团体之扶植与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假如由那些专门压制、摧残民运的顽固分子任性地做去，不要说民众不会起来，恐怕冀南局面早就不能

支持了。

在敌人大“扫荡”下，冀南的民众运动已经转入秘密的环境，但广大的群众始终表现着无限的忠诚与英勇。然而，必须看到一种危机存在着。这种危机表现在：

一是敌人的不断“扫荡”，斗争带着极度的艰苦性，没有坚强的组织力与毅力是不能长久支持的。

二是敌人的欺骗，特别是汉奸活动之加紧，可能消失一部分群众的斗志。

三是某些军队之土匪化，使民众感到很大的痛苦，这些军队的奸淫虏掠，有时甚于日军，这无异为日敌汉奸的欺骗造成很好的机会。

四是某些军队及某些分子，至今未放弃其摧残民众团体打击区村政府的行为。

最近的消息，冀县^[14]、新河、衡水等县的汉奸活动特别厉害，维持会的组织也较普遍。而这些县份恰恰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政令不行的区域，恰恰是不准战委会、农会等救亡团体存在的区域。反之，在过去群众运动开展的县份，就完全表现出不同的情形，不但汉奸组织难于形成，即我军之活动亦较便利，因为有群众的拥护。

难道这样沉痛的教训，还不能促使顽固分子觉醒吗？

采取新的方式去加强群众的组织与工作，去坚定群众的胜利信心，巩固各阶层间更亲密的团结，不断地揭破敌人汉奸的欺骗，暴露敌人的罪恶，并采取一切方法去保护民众的利益，保护民众团体的存在，是再迫切没有的工作了。

六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冀南

冀南各级政府，除少数的县份外，从村、区、县，一直到行政主任公署，都是经过民众选举的。一年来，特别在去年八月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后，政治日益走上轨道，政府威信更加提高，各项施政方案均收到重大的成绩，为全冀南人民所爱戴所拥护，无怪乎当省政府于去年十一月间以“莫知去向”的罪名取消主任公署的命令公布后，广大人民表示了普遍的不理解，普遍的群众大会一致通过，请求中央及省政府保留主任公署，这正说明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之存废与冀南抗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抗战是最好的检验。冀南的政府，恰恰在战争中表现了它应有的效能。我们有可能举出许多的例子，即是下面几件简单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

第一，在平时，政府即已不绝昭告民众以抗战的形势和敌人必然进攻冀南的估计，以及我们胜利的条件与保证，并在实际上号召民众加紧拆城、拆堡、毁路、锄奸等等战争准备工作，以迎接敌之大举进攻。所以，在敌人进攻下，民众并未表示慌乱，而且广大民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更加证明了政府领导之正确。

第二，当敌人占领了巨鹿的时候，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还召集了一次冀南行政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距敌人不过二十五里的地方，在炮声隆隆的情况下举行的。到会的有各县的士绅名流与民众代表，远处津浦路^[15]东的第六区代表也化装赶来参加。在会议上收到的提案达百余件，主任公署向代表们详细报告了自己的工作，并进行了热烈的争辩与讨论。主任公署的财政，

也由代表们推举出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查。在约一个礼拜的会议中，表现了各阶层的团结，表现了民众对于主任公署的爱戴。这次会议对于反对敌人进攻的斗争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三，不管敌人如何破坏我国政府的威信与组织，加强其伪政府的活动，但民众仍然明白谁是中华国民自己的政府。一直到现在，冀南主任公署及各专署县署的政令，并未因环境恶劣而降低威信。游击的县政府还不能不接受民众的诉讼，民众也还能缴纳他们应该缴纳的钱粮，虽然比平时要困难些。

第四，由于战争的严重环境，迫使各级政府采用游击方式去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主任、专员、县长、行政人员）除了率领游击队作战外，还亲身去接近民众，解决民间问题，并推行政府工作，同时为减缩机关便于游击起见，把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分到区村去工作，使区村工作更为加强，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自然而然地更加密切起来。

第五，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都表现出他们是对于民族无限忠诚与英勇的模范。主任公署在杨秀林、宋任穷^[16]两主任领导之下，坚持在冀南指导抗战工作，特别在省政府及鹿主席西走后，他们愈加感觉自己责任之重大而奋不顾身地努力着。主任公署也曾两次受到敌袭，第二、第四专员公署都曾与敌遭遇，他们虽被冲散，而幸无大损，事后又集合起来照常办公。各县县长、各专员和杨、宋两主任都过着游击的艰苦生活，他们指挥着游击队，给了敌人以不断的创伤，虽有屡次的挫折，但并不能丝毫损伤他们的坚强意志，因为他们明了自己的责任。他们没有一个人表示畏惧与逃避，他们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奋斗着，他们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也没有辜负人民的委托。三月来，成安县长、束鹿县长均因袭敌受伤；宁晋县长因公积劳咯血而犹带病工作；隆平^[17]县长、阜城县长均不绝亲

率部队袭敌，屡奏奇功；临清县长与敌作战因伤被俘后，在敌人的法庭上表现着誓死不屈的民族正气。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这种忠勇为国的精神，值得国人的钦佩与景仰。

这些部分的材料，已足够说明冀南政府的效能和在人民中的威信了。为什么冀南政府能够在极端严重的环境中坚持呢？我以为主要是由于冀南政府是真正实现了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民主的、廉洁的内容。

抗日政府，决不是把“抗日”二字加在政府上面就算了事，而应当切实实现其真正抗日的內容。在敌后方我们曾发现某些地区的政府，县长是由白面犯^[18]及与日寇汉奸有关的人来充当的；有些地方的专员或县长为了增加收入起见，不惜与敌人实行“经济提携”，替敌人开煤矿并保护运煤到敌区的轻便铁道；有些地方政府的施政方针完全违反了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一味以搜刮钱财为能事，以每日两台花酒、八圈麻将为阔气。至若战争动员、组织教育民众等等工作，在这种想“发国难财”的人们看来，简直是没有意义的事。山东某某等县当局始终拒绝我们拆城毁路的建议，结果一被敌占，即使我们袭扰敌人都感困难。难道我们能说这样的政府是尽到了抗日政府的责任吗？

冀南主任公署及各级政府之所以成为抗日政府，不仅由于它是从日寇汉奸手上夺回来的，也不仅由于它在自己的八大施政方针^[19]上写下了“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智力、财力，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拥护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及鹿主席领导，彻底实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抗战建国纲领”等条文，更主要的还在于它真正在实现这些方针。各级的行政人员都是抗日最坚决的分子，这些分子也许最不熟练公文体式与逢迎上级，也曾有一个县长因为犯了忘记将上官姓

名抬头的“错误”，而几乎酿成撤职的风波，然而他们之赤诚救国，努力工作的精神，正是实现这些方针的保障。

冀南政府是统一战线的，不仅由于它吸引了各党派、各阶层的人士参加到各级政府工作，主要还在于它的施政方针都是以“巩固统一战线，团结各阶级一致抗战”的原则为准绳。每一政策之确定，都是照顾了这一阶级也照顾了那一阶级的，即为一方面决定实行五一减租、分半给息的办法，以发挥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公布“一经减少，即不准拖欠不还”的命令。这正是大公无私的统一战线立场，也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得到各阶层的一致拥护。

冀南政府是民主的，一方面因为行政人员是人民选举的，政府的一切施政，都顾及民众的利害；另一方面是因为民众有了自己的组织，经过这些组织可以经常向政府提出人民的意见，以供政府之采择。人民与政府有了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更加信赖政府，政府的政令也更易推行。

冀南政府是廉洁的，政府工作人员最高薪金只有二十元，各级政府的经济是公开的，同时真正做到了严惩贪污，所以在冀南养成了廉洁刻苦的作风。也曾经发现有一种人，他们不赞成政府最高薪金只有二十元的规定，并讥之曰“钱少买不到好货”，可惜说这样话的人现在居然也荣任要职了！

根据以上材料，可见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各县政府是为民众所信赖和拥护的，杨秀林、宋任穷已经成了坚持冀南抗战的旗帜，他们始终在冀南坚持着。当然，广大人民要求省政府撤回取消主任公署以及撤销十余县县长的命令，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冀南也曾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的喜剧，这种分裂行政的方法，对于民族究竟有何好处呢？也是值得人们反省的。不

幸省府西移后，双专员、双县长的故事，又在冀西重演了。

七 力求进步呢，还是开倒车呢

为大家所熟知的，冀南的问题自省府到后，曾引起不少的争执。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全国人士的重视，因为这不仅关系于敌后能否坚持抗战的问题，而且也是与全国抗战相关联的问题。设使华北的抗战受到挫折，使进攻西北之敌无后顾之忧，必然会影响到全国的各个战线，首先直接影响到保卫大西北的任务。

问题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呢？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抗日，要不要坚持华北抗战，而在于如何才能坚持华北抗战。显然的，在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有着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的性质，又关系于华北抗战之命运。

什么分歧呢？

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拥护中央政府蒋委员长的方针，坚决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过去冀南在主任公署领导下所坚持努力的工作，并没有丝毫离开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原则的地方；另一方面，有种人，他们的一切措施，完全离开了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

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拥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因为这一机构正切合于敌后方抗战的需要，广大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行政人员正是赤诚救国，爱护人民，坚决努力的人员；另一方面，有种人不顾及敌后方的环境，不顾及人民的要求，而简单地以“三级制”的理由，坚持取消主任公署，并不惜把“不知去向”的罪名加在主任公署的身上，不顾及过去各级政府与行政人员艰难创造冀南局面之功绩，反而以细小的事故，甚至没有丝毫

“罪状”，而撤销他们的职务。成安县长在袭敌受伤后，不但未获奖励，反遭撤销职务的待遇。在这些抗日积极分子被宣布撤职之后，代替他们的是一批鱼肉乡民、残民以逞、反对八路军、反对共产党、反对统一战线的分子，曾任江西瑞金第一任专员而且在冀南专门进行反八路军、反共产党活动的邵鸿基^[20]，于是也被任为南宫专员了。

一方面，坚持“组织一切无组织的民众到抗日战线中来”，并“尊重民众团体应有的独立性”的方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民众的积极性以利于抗战；另一方面却有种人不愿意民众真正组织起来，宁愿民众永远处于无权报国的地位，一任民族意识在被少数人残酷压迫的奴役生活中消磨下去。当然，这种有利于敌不利于国的办法，是不会为广大人民所赞成的，无怪乎当省动委会成立时，冀南各民众团体派遣代表要求列席陈达意见，以期得到当局之谅解而求得合理之解决，不幸这些代表受到了“闭门羹”的待遇。

一方面，广大民众主张实行五一减租、分半给息与公平负担，因为这正是合乎抗战建国纲领的要求，也是调节各阶层关系，巩固民族团结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有种人则反对这些主张，诬蔑这些办法为“赤化”、为“过火”，要在“对外辟赤化之谣，对内纠正过火之实”（某要人语）的口实下，达到取消之目的。

一方面，主张建立正当的税收制度与财政经济政策，使之有利于抗战而顾全民众，使抗战的军队不致受饥受寒；另一方面，有种人则不惜以“取消一切捐税”，禁止筹集救国公粮的口惠，来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税收供给制度，同时限令某县为某军筹集多少粮款，且往往是超过可能的数字，以增加各县政府之困难。

一方面，主张一切问题应采取正当途径以求合理解决；另一方面有种人如赵云祥、胡和道、张超^[21]等部，却采取捕捉、暗杀、活埋等方式来对付八路军及救亡人士，以吊打村区长、农会负责人等方式来摧残政府及民众团体，甚至有人专门利用会门^[22]来与政府对立，也曾造成会门进攻枣强县城的流血惨剧。

一方面，主张冀南问题应从整个纲领、组织上来求得全盘的解决，以固团结而利抗战；另一方面，则有种人处处以“合法”为标榜，一切以“千钧压力”出之，使人无法透气。双专员、双县长之出现，更表现了行政系统的破坏。

一方面，坚持统一战线，而同时认为统一战线不是“投降”，大家需要在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去求得统一与团结；另一方面，有种人则采取“一切交给我办，八路军回山西”的态度，几无协商之余地，说不上统一战线。

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两方面主张的分歧是很明显的。

究竟是坚持过去年余努力的成绩，保持已经发挥起来的抗战力量，以便于顺利地反对日寇呢？还是取消过去一切进步的设施，消减民众的抗战热情，以便于日寇的进攻呢？

究竟是力求进步，落后向进步看齐呢？还是开倒车，进步服从落后呢？

一切关心民族存亡的人们，是善于认识真理、维护真理的。

八 结 论

冀南今天正处于严重的环境中，而且更残酷的斗争还在后面，那里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战场。

正由于冀南有了年余的斗争经验 有了相当的群众组织力

量，有了坚强的政府领导，有了富有战斗经验的八路军和友军，特别是有了各阶层的团结，所以能够应付今天的局面，而且可以寻求有利的时机去反攻进攻之敌，以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假如我们能够依靠今天的基础，更加努力地各方面去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巩固我们的团结，实施进步的纲领，并依靠民众克服种种困难，渡过种种难关，我们就一定能够从无数次一进一出的血斗中，把冀南巩固得铁一样，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稳固地插在冀南的领土上！

但是，必须同时指出，冀南的斗争还存在着严重危机。这不但由于敌人拼命“扫荡”的环境，使我们的活动发生极大的困难，而且主要的还在于内部团结之不足，某些部队溃兵的土匪化，顽固分子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未丝毫放松破坏团结、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破坏民众团体，打击政府的活动。某些地区内已由于军队的苛索，土匪溃兵（甚至有些正式军队）之抢掠，弄得民不聊生了。对于这些现象如不加及时的纠正，而任其发展下去，那正可以帮助日寇汉奸的进攻，前途也是不堪设想的。

冀南抗日根据地之能否坚持与巩固，不决定于敌人的意愿，而决定于我们自己能否巩固团结，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作结论的权力不属于日敌，而属于我们自己！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七十一期。

[2] 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的一段。

[3] 维持会，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指使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组织。

[4] 鹿主席，指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

[5]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6] 战委会，即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又称动委会。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发布过一些进步政令，如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优待军人家属、组织民众等。一九三七年八月，周恩来等到太原，推动阎锡山共同组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委会保持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

[7] 蒋委员长，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8]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后来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让步没有兑现。

[9] 青纱帐，北方成片的高粱、玉米等农作物如同绿色的帷帐，称为青纱帐。

[10] 束鹿，旧县名，今河北辛集市。

[1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1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由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不同，减租减息的额度不完全相同。五一减租，就是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地租均按原租额减去五分之一。

[13] 分半给息，即分半减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规定借贷利息不得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减息额度有所不同，一般实行分半减息，就是年利不超过一分半。

[14] 冀县，旧县名，今河北冀州市。

[15]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的一段。

[16] 杨秀林，即杨秀峰，当时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宋任穷，当时任冀南

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

〔17〕隆平，旧县名，今河北隆尧县。

〔18〕白面犯，指吸食毒品者。

〔19〕八大施政方针，指一九三八年八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宣布的施政方针，主要内容是：一、动员冀南一切人力、物力、智力、财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二、拥护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及鹿主席领导，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三、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体同胞，建立坚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战到底；四、建立民主廉洁的、有工作能力的各县抗日政府，严惩贪官污吏；五、整理各县金融，发展农村经济，提倡土货生产，击破日寇破坏我华北金融之毒计；六、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税收，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并在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改善人民生活原则下，安定民生，发挥抗战积极性；七、实施抗战教育，普遍组织民众于战委会、农工妇学商各会，及自卫队等抗日救国团体之内；八、肃清汉奸敌探，实行抗日戒严。

〔20〕邵鸿基，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21〕赵云祥，当时任国民党军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所辖的津浦游击纵队司令。胡和道，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所辖的冀察挺进军司令。张超，不详。

〔22〕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1]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

一 敌后方的环境及其特点

我国军民在敌后方与敌人进行生死的斗争，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因为交通的阻隔及某些特殊的障碍，使得这一为大家所关心的事，至今尚未充分了解其真相，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为使国人较多地明了敌后方的各种问题，我把华北一部分地区的材料，加以简单的叙述，以供国人之参考。

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敌后方？这就需要说明敌后方所处的环境和它的特点。

第一，敌后方，大约存在三种不同的区域：一是敌人占领区，如冀东及平津等大城市和沿铁道及各重要交通线，这是敌人统治较强的区域，为敌之进攻与巩固后方的基点；二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为我之坚持敌后抗战、钳制敌人、削弱敌人，以配合我主力军正面作战，以至将来配合主力军实行反攻的基点；三是游击区，为敌我时来时往，互相争夺的区域。这几种区域之间，并没有间隔着牢不可破的“长城”，而是时常变动的。敌占区在我国进入反攻阶段之前，将较长期地处于敌人蹂躏宰割之下，但某些次要的城市和地区变成我之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仍是可能的。我之抗日根据地，在敌人严重进攻之

下，亦有暂时被敌占领，或变为游击区，或失而复得的可能。至于游击区，则时有变为敌之占领区或我之抗日根据地的可能。

第二，在敌人，企图巩固其占领区和交通要道，继续扩展其占领地，摧毁我之抗日根据地，由点与线的占领求得面的占领，以便于充分利用广大占领区之人力、物力、财力，加紧向前进攻，以达成其灭亡全中国，实现其所谓“东亚新秩序”〔2〕之目的。

第三，在我们，则以最大的坚持性与顽强性，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加强并扩大我之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区，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不断地击破敌人的进攻，大量地消灭与消耗敌人，积极地疲困与钳制敌人，破坏敌人以华制华、挑拨离间、经济开发等等阴谋诡计，提高我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胜利信心，并从长期艰苦斗争中，从各面积蓄与增强自己的力量，真正担负起“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伟大任务，以便于在今天，能够配合正面，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能够使长期锻炼出来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的力量，成为反攻敌人的重要战略基点与强大的战斗力量。

第四，由于敌人必须求得敌后方的面的占领，否则其进攻将遭到莫大之困难；由于我们必须坚持敌后方的斗争，否则我之抗战将遭到极大困难，这样，形成了敌后方的极端残酷与困难的斗争局面。更由于我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战，在停止敌之进攻后，还须经过较长期的相持阶段才能达到反攻的阶段，这更形成了敌后方的抗日斗争带着长期的艰苦性与残酷性。困难是多得很的，今天我们虽已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尚未达到最困难的时候。在必将到来的犬牙交错、进进出出的长期的残酷斗争中，抗日根据地有时可能有很程度的缩小，作战上有

时可能受到很大的限制，人力、物力、财力有时可能受到很大的摧残等等，这尤需我们具有最大的毅力与顽强性，不断地克服新的困难，以达胜利之途。

第五，足够地认识敌后方斗争的复杂性。必须看到，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狡诈百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它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与巧妙的斗争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灵活的斗争策略。特别要依靠于团结、进步，依靠于民众，这是战胜敌人的基础。一成不变，顽固守旧，自起磨擦，逼翻民众，就是无异于帮助敌人，自取败亡。

只有清楚地认识敌后方斗争的特点，才能使我们懂得，如何才能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中，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否则，即使你有最高的抗战决心，也不过是徒尚空谈，无济于事，而终必走人灰心丧气、悲观失望之途。

二 两个不同的路线在敌后方

为大家所熟知的，在敌后方，我们内部经常发生一些不应有的磨擦。为什么发生这些磨擦呢？主要是由于在敌后方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两种不同的做法。

一个是真正的三民主义^[3]的路线，一切做法都是依据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依据于抗战建国纲领^[4]和蒋委员长^[5]的历次指示，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为出发。另一个是违反三民主义的路线，一切做法都是以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为出发。

一个是真正主张统一团结，不仅求得各党派，而且求得各阶级的团结，真正求得“力量集中，意志集中”的路线。另一个是表面上以“统一”为幌子，处处表现惟我独尊，排斥异

己，自起磨擦，破坏统一团结的路线。

一个是真正依据于敌后方的特殊环境，兢兢业业地站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上，在整个的国策之下，采取适当的方法与步骤，以便于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最后战胜日寇的路线。另一个是违反国策，不顾胜利或失败，处处在所谓“合法”的幌子下，排斥进步，压抑民众，固守成规，有利于敌的路线。

一个是眼光远大，不仅着眼于如何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且着眼于如何建国，以便于将来胜利地建立起崭新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达国家、民族于强盛之途的路线。另一个是目光如豆，惧怕进步，无利于国，有害于民的路线。

一个是共产党、八路军及一切至诚救国分子和广大民众所拥护的路线，也就是忠实地执行着蒋委员长的路线。另一个是少数代表一部分守旧势力的顽固分子的路线，亦即是违反民族利益，违反蒋委员长指示的路线。前者是使抗战胜利、民族复兴的路线；后者是使抗战失败、民族败亡的路线。

回忆前年冬季，敌寇南进，我国大军南撤的时候，河北等省各级政府亦随军退走。此时，河北等广大地域均处于敌人奸、掳、烧、杀的蹂躏之下，人民失去军队与政府的依靠，流离失所，任人宰割，伤心之事，不可言喻。当时八路军负国家民族之重托，坚决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忠实于自己的职责，配合友军坚持敌后抗战。一面配合友军巩固自己的阵地，加紧创立抗日根据地，以便于在敌后方与顽寇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一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派队伍深入冀鲁广大地区，协同当地志士，收复既失土地，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政府，把人民从黑暗中挽救出来，并不断地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大大地增加了敌人的困难。八路军配合友军，经过了极艰苦的努

力，才有今天的收获，才能牵制敌人至十五个师团之多，才支持了华北抗战至近两年之久，才成为了保卫西北、配合全国各个战线作战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八路军之所以能够把一个破碎的局面收拾起来，并使之日益壮大，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成为坚持抗战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个部分，便是由于它真正执行了三民主义的路线，真正执行了蒋委员长的指示。它曾不惧任何牺牲地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的英勇的战斗；它在抗战以来，没有一天不是服从命令，恪尽职守，不怕困难，尽忠民族的模范；它一切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出发，始终不懈地去进行组织和动员民众，协助政府和友军的工作，并依据敌后方的特殊环境，与敌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的斗争，因此，它始终是敌人所痛恨所畏惧的一部分。它在敌后方所取得的成绩，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已经成为全民族一部分最珍贵的财产。正因为这样，所以它能够成为敌后方的广大人民所爱戴所拥护。

然而，竟有一种人，他们在环境恶劣时，曾经束手无策，带着满脑子的失败情绪而逃之夭夭，一到敌后方的状况略有好转时，又厚颜地回到敌后方去。他们忘记了敌后方斗争的残酷性与长期性，把敌后方看作自己的乐园与天堂，因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专门与八路军磨擦，与人民磨擦，与进步力量磨擦，加紧破坏团结和统一。他们似乎认为八路军和广大人民年余来的艰苦奋斗等于犯了弥天大罪，所以必须把抗日第一的原则抛开，而以“防共”为第一要义，所以必须向八路军和民众去实行所谓“收复失地”的工作。他们的一切措施，都违反了三民主义的原则，违反了抗战建国纲领的方针和蒋委员长的指示。他们的倒行逆施，已经给了敌后抗战以很大的损害。

敌后方的问题，已到不能不严重提出的时候了。因为这不

仅是敌后方的局部问题，而且是关系于抗战前途与民族兴亡的问题了。为使国人明了敌后方各种问题症结之所在起见，实有分别加以简单地说明与研究的必要。

三 如何巩固团结统一问题

巩固团结统一，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在全国如是，在敌后方尤其如是。因为敌后方的斗争极其艰苦，敌人的挑拨离间特别加强，没有坚强的团结，没有意志的统一，是无法与敌人作顽强斗争的。

如何才能求得团结与统一？

第一，必须各方面具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纲领。即是说在敌后方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都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一切努力都是为着如何去战胜日本强盗，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一切都以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蒋委员长的指示为准绳，并使之具体地实现于敌后方。要反对那些口是心非的人，他们天天高唱“抗日”，“拥护蒋委员长”，并自称为三民主义的信徒，但其所作所为，却处处违背了这些原则，违背了民族的利益。

第二，必须各方面具有互助互让的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求得相互间的亲密合作。所谓互助，就不是互相磨擦，造谣中伤，乘人之危，对消力量，而应减少不必要的磨擦，一致对敌。见人有危，加以援救；见人有难，加以帮助；见人有过，加以劝导；见人有功，加以奖励。所谓互让，就不是片面的投降，而是应以某一问题是否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国家，作为是否可以让步及确定让步程度之标准。如果这种让步对于抗战，对于国家有很大的损害，那无异是对于民族的背

叛。

第三，必须各方面以民意为依托。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力。如果轻视民意，压迫民众，就不可能依靠民众的力量来克服抗战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困难，也就说不上抗战的胜利，而且可能把民众逼到敌人方面去，给敌人以很大的便利。没有广大民众对于政府、军队的拥护，没有军政民的一致，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团结。

第四，不仅要有各党派、各军队之间的团结，而且要加强各阶级之间的团结。必须明白地认识，过去劳苦大众在严重压迫下，阶级矛盾存在的事实。问题不在于蒙蔽这一事实，而在于采取如何的方法去调节各阶级间的关系。一方面适当改善工农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与法权地位，以提高他们的抗战热情；一方面不使富有者发生不安的心理，以防止停业怠工，缩减生产甚或为敌所用等现象之发生。

第五，必须严防敌人的造谣欺骗与挑拨离间。敌人是一个以诡计多端、狡猾百出知名的帝国主义，深知我国团结之可怕，而且敌后方又是一个最接近敌人、敌人的影响最易侵入的地方。过去曾经有过一些意志不甚坚定的人，为敌人、汉奸、托派^[6]、敌探所鼓动，所诱惑，大造磨擦，破坏团结，甚至不惜为敌人当留声机，跟着敌人叫嚣“防共”，“防止赤化”等等无稽的谰言，并进行反对八路军、反对民众的行为，这是值得惋惜与警惕的。

八路军在敌后方之所以能够完成伟大的任务，能为广大人民，不仅工农劳动者而且富有者所爱戴与拥护，能与各方面取得密切的合作，便是因为它真正把握了统一战线的方针，真正为了巩固团结统一而努力。八路军所做的一切，从来没有离开过三民主义与抗日第一的原则，没有一天不在真诚地奉行抗战

建国纲领和蒋委员长的指示，对于那些阳奉阴违的人和违反抗战利益的行为，曾经进行了不断的诚恳的建议和忠告。八路军没有一天不在积极作战，遇友军有危难，没有不挺身援助，并经常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介绍给友军，以为友军之参考；对于一切抗日政府、民众团体、爱国志士加以积极的帮助与尊重，对于友党友军也曾作了多次的让步；但同时对于那些无理的不利于抗战的要求与主张，也曾经而且应该加以严正的批评与拒绝。八路军坚持着自己的正确立场，正表现了它对于民族的无限的忠诚。八路军始终尊重民意，实现了军政民的团结一致，同时也实现了各阶级的团结。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依靠了内部的团结，击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有一种专门吃磨擦饭的人，以破坏团结为能事。如张荫梧^[7]之流，专门乘人之危，当冀中吕正操^[8]部正在前线与敌血战之际，突然派兵袭击博野后方，占领当地行政机关，屠杀救亡人员。如鹿钟麟^[9]先生所属赵云祥、胡和道^[10]之流，不打敌人，专门摧残当地抗日政府民众团体，更在冀南八路军与敌进行严重斗争之际，消灭我军失去联络的部队至一连之多，活埋我工作人员、通信员至二十余人之多。如山东的秦启荣^[11]之流，素以反对八路军为职志，最近竟伏击八路军一个游击队，逮捕和杀害团级以下干部二百余人。这种人一贯违反民意，用高压的手段去对待民众，破坏各阶级间的团结，挑拨阶级间的斗争。他们甚至不惜利用与日寇有关的“六离会”^[12]，围攻冀南的枣强县抗日政府。

这种人常常以“统一”、“合法”为标榜，以实现其排除异己、惟我独尊的私欲，甚至有利于敌，亦所不惜。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是冀南军民年余奋斗的结晶，是执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最忠实的地方政府，是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爱戴的

行政机关，是统一的国民政府和省政府下的一部分，所以它既是统一的，又是合法的。但是有种人竟诬蔑这样坚决抗日的政府为非法政府，并采取各种手段去破坏抗日政府的统一。八路军到河北，到山东，为的是从敌人手中夺回我国的领土，而且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却有人认为是“八路军不劳而获”，要把八路军赶出河北、山东去，以实现其所谓“统一”与“合法”。试问把成为坚持冀鲁抗战核心的八路军赶走之后，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经验告诉我们，山东为了调开某军而“统一”，结果某军离开一县，日军接防一县，这不是中国政府的统一，而是敌人的“统一”了。又如豫北的临漳县为八路军收复后，建立了抗日政府，但为避免磨擦起见，慨然交给专员公署接收，以资统一，但不幸又为敌人“统一”去了。

只有在团结一致的原则之下，只有在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原则下，只有在整个国策与三民主义的原则下，才是真正的统一。凡是一切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事，都应该认为是合法的。八路军不怕任何困难，一切努力为着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实现，这正是拥护统一、奉公守法的模范。如果统一合法这样庄严的原则，为少数不明大义的分子所玩弄，并诽谤之为破坏团结、危害民族的护符，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了。

四 在敌后方的政权问题

敌后方的政权问题，是一个敌我的严重的斗争。一方面敌人要树立与扩大其伪政权，摧毁抗日政权；一方面我国军民要坚持青天白日旗的抗日政权，阻止并摧毁伪政权。这个斗争关

系于能否坚持敌后抗战，关系于能否削弱敌力与增强自己，关系于民心之维系、抗战之胜利与民族之复兴。因此，举国人士都应重视这一问题，特别是敌后方的各党各派及一切军民，都应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共同的方针下与敌人斗争。

与敌人进行政权斗争的中心的一环，在于谁能获得民众的拥护，谁能真正具备民众的基础。因此，敌后方的政府应该成为：

第一，民族主义的政府，亦即是真正领导抗日的政府。它必须在平时加紧民众的民族教育，提高民众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它必须用一切方法揭破敌伪之欺骗离间，并阻止与摧毁伪政权之建立与扩展；它必须不仅组织与动员民众积极参战，而且本身亦应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它的一切工作一切政策，均应以如何才能战胜日寇和汉奸为出发点。

第二，民权主义的政府，亦即是民主的政府。它必须尊重民意，成立各级参政会的民意机关，接受民意的监督，使本身取得民众的支持，成为民众的依靠。它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它必须给民众以抗日的组织、行动与言论、出版等自由，并严厉取缔敌人汉奸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

第三，民生主义的政府。它必须在“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下，去适当地改善民生，如取消苛捐杂税，建立正当的税收；取消不合理、不公平的负担，建立公平合理的负担；适当地减租减息^[13]，改善民生，既无害于富有者，又可发扬民力，巩固团结，提高人民参战积极性；注意春耕秋收的领导，增加生产，保障军需民食；奖励土产，排斥敌货；整理金融，禁用伪币；禁止军需原料之输出，免资敌用，同时奖励非军需品的出口，以调剂民生。此外，它必须成为廉洁的政

府，严格规定行政人员的最高薪金，如冀察晋边区、冀南、冀中各级政府人员最高薪额为每月二十元，确定预算决算的审查制度，严惩贪污贿赂。

第四，统一战线的政府。不仅是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因此，它必须坚决执行为全国各抗日党派所共同拥护的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它在各种政策上，必须是不仅顾及这一党派、这一阶级，而且要顾及那一党派、那一阶级，如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要拿租拿息。它必须不分畛域地吸引一切忠诚为国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工作。

第五，这些政府必须与人民建立最密切的联系。这就不仅在政策上真正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且必须郑重地选择行政人员。行政人员之标准，应该是忠诚为国，廉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这种分子最为民众所爱戴与拥护。民众是最善于选择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的。所以由人民选举行政长官，是物色这些抗日分子的最好方式。这种分子在任政之初，也许并不熟悉公文程式，更不会逢迎敷衍，但他们在执行国策坚持抗战的事业上，却能做出光辉灿烂的成绩，较之那些残民以逞、为害国民的贪官污吏，真有天渊之别。

第六，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以适应于抗战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以河北而论，冀中、冀南两区均曾根据这样的原则，建立了两个行政主任公署，故在抗日斗争中收到了伟大的成效。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组织，当此次敌人严重“扫荡”，省政府被迫西移后，仍有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坚持领导，不致使军政民发生张皇溃乱现象。可见行政主任公署这样的组织，是有其成立与存在的必要

与价值的。同时每一区域之行政长官，必须是当地最有声望、最有信仰的人物，那也是很明显的。

上述这些方针，是敌后方广大人民所拥护的方针，是为某些地区，如冀察晋边区、冀南、冀中区所依据的方针，这些地区所造成的伟大的政绩，证明了这些方针之正确。

但是，另有一种人却反对这样的方针。他们把与敌人汉奸政权斗争的中心任务抛在九霄云外，一心一意地对内磨擦，甚至有利敌人亦所不惜。如上面所说过的，他们在“合法”、“统一”的招牌下，采用命令、取消、撤换及捕捉行政人员等等方法，去破坏和打击那些抗日有功且系合法统一的抗日政府，即如冀中、冀南这样有威望的政府，也在被取消之列。他们不惜采取一县双县长，一区双专员的办法，以破坏行政之统一。他们为了打击抗日政府，甚至可以违反国策，一面布告取消正当的税收和征粮，一面却又增加临时摊派，故意苛索，以增加抗日政府之困难。在他们领导的区域，民众负担之重，实在是惊人的。他们遴选行政人员，常以反共为标准，因而其中分子极为复杂，有恐日成病、敌来即逃的；有假瓦解汉奸之名而遂其勾结敌人之实的；有与汉奸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至若贪赃舞弊，鱼肉人民，那更是普遍的了。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呢？当然是不可能的。

五 如何动员民众坚持敌后抗战问题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是一个浅近的真理。离开民众，坚持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

敌人在欺骗民众方面曾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果只看到敌人奸、掳、烧、杀的残暴行为，那是万分不够的。敌人一方面到

处发泄兽性，每至一村，老妇少女均被奸淫，烧杀之惨，不忍目睹，强掠什物、烧毁食粮，极尽横暴之能事；实行收缴民枪，实行人民的身份证书，禁种高苗，保护交通，以增强其统治；大倡建设，强占我国工厂矿山，大发伪币，吸收法币^[14]，收买原料，倾销日货，统治各种企业，排斥英美势力，以增加其占领区的收入；加强毒化政策，奖励种鸦片烟，大贩白面^[15]，制造汉奸基础，并扩大汉奸政府的宣传，以削弱我之力量，增强伪组织的力量；利用汉奸四处招募华工，实行老弱者运出关外做工，少壮者强迫当兵，以为扩大伪军之用，不从者活埋处死；特别是加强特务工作，利用隐蔽的汉奸、托派，拼命宣传国共即将破裂，中国必败，吴佩孚^[16]出山，日本必胜，并加紧挑拨我国内部磨擦，以破坏我之团结，散布失败情绪，以削弱民众的斗志。同时在另一方面，敌人还加紧实施欺骗民众的怀柔政策，如宣传孔子^[17]之道，组织敬老会，抚抱小孩，散发糖果等等，以迎合农民的落后心理，企图消除国人对敌人之仇恨，而遂其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的目的。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事实。在敌后方的我国党政军民，不但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抗战，而且要与敌人这些阴谋诡计进行残酷的斗争。团结民众，坚定民心，发扬民力，则是进行这一斗争的关键。

如何才能团结民众，坚定民心，发扬民力以与敌人斗争呢？

第一，要把一切民众分别地组织在各种民众团体之内，如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商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等。这些民众团体，必须在自动自愿的原则下去组织，采取自愿加入的方式，并经过宣传教育，特别是实际的工作，去启发民众加入某种团体的要求，

而达到普遍广泛的目的。用强迫加入的方式去组织民众团体，结果会使这些团体变为空洞的机关，无灵魂的躯壳，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

第二，要善于运用和经过这些群众组织，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战教育，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自觉自愿地协助政府和军队。因此，必须健全这些组织的生活，如定期的会议、民主的选举等等。

第三，每个民众团体，应关心会员的要求，尽可能地领导会员解决一些切身的困难与痛苦。如学生的求学，青年的特殊要求，农民、工人的改善生活，妇女的解除虐待和放足等等。否则，既不能使会员对于团体产生高度的信仰与密切的联系，更不能提高他们的抗战积极性。

第四，军队、政府必须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并给以必需的协助。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必须是由会员自己选举出来的领袖，由政府或军队派人或圈定都是不妥当的。民众团体的工作，必须由它自己去讨论与决定，政府、军队只宜作一般的原则的建议，否则亦必限制群众的自动性、积极性，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第五，在民众中进行统一战线的教育。在解决各阶层间的问题时，必须双方兼顾，采用调解、仲裁、协商等方式，求得合理之解决，以巩固各阶层的团结，使敌人、汉奸无可乘之机。

第六，在每一个重要的事件或敌人进攻的关头，必须足够地计算民众的力量。能否动员民众参加，常常成为这些斗争胜负的关键。在动员中，应清楚地向民众解说问题的真相，可能发生的问题，与敌斗争的方法，以及胜利的前途。这样去使民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证明领导之正确，更加增强其信心。

在初次的严重斗争环境中，张皇慌乱的现象是难免的，但正确的指示与深入的动员，可以减少慌乱现象的发生，并可从不断的斗争磨炼中，不断地增强民众的战斗力和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七，在敌人占领区域，必须了解群众所处的特殊环境与困难，因而那些地方的民众组织和斗争方式，应该是不同的。要站在保护民众立场上，去教育他们如何与敌人进行隐蔽的可能的斗争。蛮干乱干，都不会得到当地民众的同情，或者招致不应有的失败，更增民众的失败情绪。

在敌后方许多地区，根据这样的方针去组织和动员民众，克服了民众觉悟程度不足的严重现象，打击了敌人的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揭破了敌人、汉奸的欺骗，打破了民众中部分的失败情绪，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每次反对敌人的斗争中，民众都发挥了伟大的力量。军队、政府也依靠着民众力量，克服了许多困难。

反之，另有一种人，由他们轻视民众或惧怕民众的观点出发，完全反对上述的方针。他们常常采取“包而不办”的方法，去取消民众运动；用空洞的官办的机关，去代替真正的群众组织；用“赤化”的帽子，去镇压群众的抗日斗争及合理要求；用“不合法”的名词，去取缔抗日的民众团体；用军队、政府的威力，去解散民众团体，捕捉民众领袖；用破坏造谣等方法，去打击民众团体。所以，在这种人统治的地方，是看不见民众运动的，敌人一来，伪政权也是最容易建立起来的。至于这种人得不到民众拥护，且遭民众反对，那是不足奇怪的了。

六 武装问题

武装问题，我只提出下面几个问题来说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存在着两条不同路线的分歧。

第一，对敌作战原则问题。

我们基于敌后持久抗战的方针，敌我力量的对比，敌我的优缺点，确定我军在敌后作战的原则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此原则下，每个抗日军队和游击队，都须具有高度的自动性、积极性与灵活性，要不断地经常地去袭扰敌人，疲困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并且要不放松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运动战的良机，也只有在广泛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顺利地求得并取得胜利。同时，我军无论在任何时机，均须站在主动的地位，这样才能算着敌人而不为敌人所算。敌人企图消灭我之主力，并逐渐肃清我之游击队；我们则以游击运动战的原则，机动灵活地去消耗与消灭敌人，以便于与敌人进行持久的艰苦的斗争，一直到反攻的胜利。

这里，游而不击，击而不游，或不游不击，都是错误的，都将无损于敌，而使自己处处陷于被动地位，易遭敌人打击与覆灭的危险。同时，不打敌人固然不对，不顾一切与敌硬拼，也是不对的。在主动作战时，应坚决勇敢、不惧牺牲，以达成歼敌之目的；但在不利和被动的条件下，则应大胆转移，以寻求另一有利机会打击敌人。轻易决战，对拼消耗，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

过去八路军和许多友军在敌后方与敌进行武装斗争，所以能够取得不断的胜利，给了敌人以打击，正是这样的原则，起

到了极重大的战略作用。他们不但没有被敌消灭，而且还大量地消耗和消灭了敌人，增强了自己，为敌人所畏惧。

但是，另有一种人，他们有的抱着无法与敌作战的悲观情调，以保存实力为基本立场，敌人不来，则乐得苟安，不游不击，敌人一来，则张皇失措，退却逃跑。有的在开始时满腔热血，自骄自大，及到在敌人面前碰了两个钉子之后，则又变为悲观失望，毫无信心。这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不了解抗战的长期性，所以发生悲观论和速胜论，结果都会变成失掉灵魂的人，没有丝毫光明的前途。可是这种人，却也有一种特殊的本事，惯于骂八路军“游而不击”、“只宣传，不打仗”等等，然而民众偏能从事实上去认识真理，民众懂得，这种人所骂的，不是八路军，而是他们自己。

第二，游击队与自卫队的问题。

正规军的作战，如果没有游击队、自卫队的配合，就等于失去耳目和手足一样，由此可知游击队、自卫队的重要性。用不着说，游击队、自卫队在抗战中所建树的功绩，是难以数计的。

什么是游击队呢？游击队是民众参加抗日斗争的武装组织。名副其实的游击队必须具备下面的条件：1. 它必须由抗日民众所组成，且为抗日积极分子所领导；2. 它必须保护人民的利益，与人民打成一片，成为民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3. 它必须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并积极地向敌行动；4. 它必须有严格的政治纪律，不扰民，不违反国策；5. 它必须懂得游击战术；6. 它必须与正规军取得密切联系，协助正规军作战。正规军于指挥游击队时，亦须善于分配它的任务，如侦察、警戒、扰乱、迷敌、诱敌等等，并尊重游击队的独立性，给游击队以必要的帮助。

自卫队是带半武装性质的群众组织。它的作用是：1. 在战时，有组织地动员民众参战，如拆城、破路、抬担架、运输、侦探、带路等；2. 在平时，实施军事政治教育，提高民众的战斗力和进行放哨、锄奸等经常工作。

有种人不明了游击队的真正作用，他们不赞成自卫队的组织，即使组织起来，也把它变成一种劳役队的组织。他们也组织游击队，但那些所谓“游击队”，一般是由土匪、溃兵所编，并不加以任何的改造与训练，对敌则畏若蛇蝎，对民则猛似虎狼，甚有与敌伪勾结，变为半汉奸性质的武装的。“抗日不力，扰民有余”便是对于这种所谓游击队的典型的批评。同时，他们对于真正由民众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则又是采取吞并的政策。所以在这种人统治的区域，是无所谓游击战争的。

第三，对伪军、土匪的政策问题。

敌人要巩固其占领区，必须加强伪政权，扩大伪军，以补其人力之不足，而遂其以华制华的毒计。伪军之来源，有从招募训练而来的，敌人已开始注意这一方面的建设，但所见尚属不多。现有伪军，多系由叛军、土匪所形成。敌人正变本加厉地招收土匪，瓦解类似土匪的军队游击队，以扩大其伪军。最近鹿钟麟部竟也有部分叛变投降敌人，是值得引为最痛心的教训的。

所以，瓦解伪军、肃清土匪的工作，需要我们加以极大的努力。

估计伪军的特点，我们瓦解伪军的方针是：1. 不断地向伪军进行民族的宣传教育，使伪军认识敌人必败，我国必胜的前途；2. 采取一切方法与伪军发生关系，并抓住时机，促其反正；3. 对无法争取的死汉奸部队，应坚决采取消灭的方针。打击伪军，可以使伪军觉悟到中国军队的力量，感觉到当汉奸

的末路，更有利于我之争取； 4. 伪军反正后，必须加强教育和改造，使之真正变为抗日的部队。

肃清土匪，可以削弱伪军基础，安定民生。对土匪基本上采取争取的方针，使其接受抗日政府和军队的改编。并应以坚决抗日，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扰民众等为改编的条件。对于那些企图投降敌人，或不愿改编，为害人民的土匪，则应坚决消灭，以绝后患。

过去，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华北采取了这样的方针，所以给了敌人扩大伪军、争取土匪的诡计以严重的打击。

但是，另有一种人，他们反对这样的方针。他们也在叫瓦解伪军，但忽视政治的方向，多限于联络感情，消极谈判，或金钱收买，故常为日寇、伪军所欺骗所蒙蔽。有些部队，不但没有瓦解到伪军，反为伪军所瓦解，如石家庄附近某部与伪军订立条约，互不侵犯，并相约敌胜则某部投伪，我胜则伪军反正。这种脚踏两只船的所谓抗日部队，在华北还有一个相当的数目。即或有一部伪军反正，他们便心满意足，不加任何改造，结果或成土匪，或再度叛为伪军。他们对于收编土匪，确实尽了极大的努力。可是既无改编的条件，改编后亦无适当工作，只求土匪挂着他们的为国家颁发的光辉的番号，便心满意足，结果土匪依然是土匪，不过比过去更便利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害国扰民罢了。豫北某专员曾收编不少土匪，结果某专员并不能指挥土匪，土匪反而指挥了专员。诸如此类的奇形怪状，不胜枚举。这便是他们对于伪军、土匪的路线，他们之为害国民，不问可知。即使他们自鸣清高，也难免鱼目混珠之讥。这些人站在这样的基础上，其所作所为，不问可知了。

第四，游击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为着发挥游击队的效能，统一指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

此，应该在每一区域（如冀察晋、冀南、冀中）设立一个军区司令部，下设军分区司令部。而指挥员的选择，必须是为游击队所拥戴，为人民所信仰的分子。同时，对于游击队的指挥，亦应估计其特性，而给以可以担负的任务。

但是有一种人，他们反对甚至破坏这一方针，他们的做法，实际是消灭游击战争。

第五，抗日武装的发展问题。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今天我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强盗。所以，必须在持久斗争中，不断地积蓄与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从民族利益的观点出发，过去一时期全国各军都有了相当的发展，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已有的发展还不够得很，还要继续地发展，这也是全国各军的任务。

但是，在敌后方有一种人，为了自己的发展，不惜破坏其他友军的发展，特别是采取一切卑劣手段，来限制或破坏八路军和某些坚决抗日友军的发展。这种排除异己、妨害团结、削弱抗战力量、客观上有利敌人的举动，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值得他们反省的。

七 结 论

在叙述了敌后方的各种问题之后，显然的，在每个问题上，都表现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国人自有分辨。

顽固分子最喜欢用“赤化”帽子加在抗日分子、广大民众和八路军的头上。他们认为上述的正确路线，就是实行“赤化”，所以他们要以自己的错误路线来“对外辟赤化之谣，对

内纠正民众之过火”。

“赤化”这种名词，是日寇所惯用的，敌人把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叫做“赤化”，敌人骂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也说是因为蒋委员长和国民党“赤化”了，所以要“防共”，要灭亡“赤化”的中国。蒋委员长说，防共就是灭华，真是一针见血的至理名言。

不幸得很，这般顽固分子，竟把日寇的口号变为自己的口号，把日寇的“防共”方针当作自己的方针，不惜做汉奸汪精卫^[18]的应声虫，拼命反对合乎三民主义的、合乎蒋委员长指示的路线，拼命制造磨擦、破坏团结，以便于日寇的进攻。这种人如果再不回头，继续发展下去，其结果之危险，令人不寒而栗。

敌后方的环境日益严重了！没有内部的团结，就无法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持久的斗争。如何团结？如何求内部方针的一致？是正确的方针去迁就错误的方针，还是抛弃错误的方针一致执行正确的方针呢？假如人们懂得，只有正确的路线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路线，执行错误的路线就会招致民族的败亡的话，是不难选择自己拥护和努力的方向的。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七十二期。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对共产党组织进行严重摧残和打击，在敌后战场以种种借口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军事磨擦。邓小平在这篇文章中说的两个路线，实际上一个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坚持团结抗日的路线，一个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当时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文中没有直接批评蒋介石。

[2] “东亚新秩序”，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3]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4]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后来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让步没有兑现。

[5] 蒋委员长，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6] 托派，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7]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军总指挥。

[8] 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行政主任公署主任。

[9] 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

[10] 赵云祥，当时任国民党军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所辖的津浦游击纵队司令。胡

和道，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所辖的冀察挺进军司令。

[11]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兼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12] “六离会”，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主要由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组成。他们以宗教迷信为纽带，拥有武装。由于存在封建性、落后性，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1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14] 法币，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后所发行的纸币。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因物价暴涨而业已崩溃的法币。

[15] 白面，指毒品。

[16] 吴佩孚，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二三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所部在湖北被北伐军击溃。一九三一年后，隐居北平（今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多次争取他组织伪政府，遭到他的拒绝。

[17] 孔子，名丘，春秋时期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18] 汪精卫，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〇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任代主席。

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1]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

两年来，八路军驰骋于广大的华北战场，在蒋委员长^[2]领导之下，肩负着民族的重大使命。事实证明：它没有辱没自己的使命。谁都知道八路军的武器是最坏的，生活是最穷困的，但它却能与装备最现代的日寇进行顽强的斗争，并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钳制了敌人的九个师团，即占全国寇兵的四分之一的兵力，给予日寇以严重的打击与消耗。它配合了华北友军，协助了当地政府，动员与组织了广大的华北人民，从日寇、汉奸手上夺回广大的国土，创立了许多块的抗日根据地。它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没有一天不在与敌人战斗。它不断地打破敌人对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坚持着广大平原的游击战争；它始终至诚地执行着三民主义^[3]和统一团结的方针，实行了一些进步的措施，启发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依靠着这些，给了华北抗战以新的生命。因此，活跃的华北战线，给了全国各个战线以很大的助力，特别是在保卫西北的任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所有这些，证明了什么？

第一，华北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以劣势的武器去与日寇进行胜利的斗争。

第二，华北的事实证明了抗战的过程是长期的、艰难的，但是有光明前途的，只要坚决地抗战下去，就能够逐渐削弱敌

人，生长自己，最后战胜日本强盗。

第三，华北的事实证明了只有巩固团结，真正地实行三民主义的进步纲领，充分地组织、动员和依靠民众，才能使抗战获取胜利，否则虽有抗战的决心，亦无补于事。

第四，八路军之所以能在最困难条件下坚持华北抗战，为敌人所畏惧，便是由于它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处处表现着自己是尽忠职守，服从命令，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模范。它保持与发扬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以数千次的战斗、林贺^[4]两师长的光荣负伤、数万将士伤亡的鲜血，粉碎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谰言。

当此抗战两周年纪念之际，八路军和华北人民献给全国同胞的，不但是它的光荣战绩，更主要的，还是它的一颗赤诚为国的心。华北的斗争日愈严重着，它将一如过去两年，准备在任何困难环境中，为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奋斗。

让汪精卫^[5]和其同类者去进行下流的投降勾当吧！八路军的将士，华北的人民，一切有气节的黄帝子孙，是誓死反对这般无耻之辈的，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的理论刊物《群众》周刊（重庆版）第三卷第八、九期合刊。

[2] 蒋委员长，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3]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4] 林，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山西隰县被国民党

军队误伤。贺，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一九三九年四月在齐会战斗中因日军发射毒气弹中毒负伤。

[5] 汪精卫，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〇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任代主席。

悼丁思林同志^[1]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不幸的消息，日寇的魔手又在七月八日的战斗中，夺去了我们的丁思林同志的生命。

丁思林同志，共产党员，二十六岁，湖北黄安人，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参加了红军，历任班、排、连、营、团长的职务。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被委为某团的营长。抗战以来，屡立战功，乃于去年秋季升任独一团团长。他以自己的英勇的模范和紧张的工作，协同与团结全团的同志，把一个新的部队，锻炼成了一个主力兵团，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富有本军优良传统的青年兵团。他率领全团，转战冀、豫、晋广大地区，几乎没有间断过，冀南香城固的胜利战斗^[2]，该团也是参加部队之一，而且是缴获较多的一部分。此次敌人以三万大军分九路进攻^[3]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时候，该团亦加入了重要的战斗序列，在上级的意图下，奋战近月。七月八日，该团复受命截击由太谷向榆社增援之敌，与敌千余激战一昼夜。丁同志率领全团身先士卒，进行反复冲锋的肉搏战斗，终于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击溃了优势的敌人，成为收复武乡、榆社两县城的胜利的重大因素。然而，不幸也就在这次战斗中，在坚持华北抗战与保卫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事业中，丁同志和三百多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

丁同志不仅是一个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好的指挥员，而

且从十年的斗争中，锻炼出了他的忠于民族，忠于劳动人民，忠于党的坚强的意志。同时他还富有青年的突击精神，勇于任事、不怕困难、奋勉前进的特质，因而他为上级同级所信赖，为下级所尊敬。他的死，在叶成焕、邓永耀^[4]两同志牺牲之后，是全师的重大损失了！

丁同志的牺牲，只有增加全体指战员和广大民众的愤怒。他们不会啼哭，他们将以自己的愤怒，去彻底地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完成丁思林同志的未竟事业！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

[2]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河北威县香城固地区伏击日军第十师团一个中队，歼敌二百余人。

[3]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日本侵略军为解除其后方的威胁，集中三万余人的兵力，自同蒲铁路线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铁路线上的邢台，正太铁路线上的平定，邯长大道上的涉县、长治和临屯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及其他抗日武装进行围攻。八路军总指挥部决定采取集中主要兵力击破日军一路，以一部兵力钳制其他各路日军的作战方针。经过十几天的战斗，除三路日军深入晋东南根据地外，其余各路均被阻止。四月十六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抓住战机，转入内线，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歼灭日军二千二百余人，各路日军闻讯后纷纷回撤。至四月二十七日，八路军彻底粉碎了日军围攻，共歼敌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4] 叶成焕，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一九三八年四月在长乐村战斗中牺牲。邓永耀，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委员、冀南五支队政治委员，一九三九年初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年三月三日在武邑东南地区与日伪军战斗中牺牲。

在太北军政委员会 扩大会上的报告^[1]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

一、抗战形势与华北抗战。

(一) 区代^[2]后基本形势未变化，但投降妥协宣传公开了，如王宠惠^[3]、胡适之^[4]公开谈“荣誉的和平”。“荣誉的和平”即面子过得去之和平也。英美活动积极，英日谈判开始，美日也准备谈判。日外相野村是美国系外交家。国内反共活动未减轻，但同时反投降运动之增长抵制了王宠惠之广播及公布的新法令^[5]。投降妥协运动在发展，如不努力反之则前途危险。

(二) 投降妥协必首先牺牲华北，故反妥协投降即是坚持华北抗战之一面，必须把“反投降”、“坚持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两种口号联系起来，把人民与共产党八路军联系起来。

(三) 必须认识坚持华北抗战是非常困难与持久之斗争。华北敌后无相持阶段，而是时时连续的进攻与退守。困难还要加上顽固派的活动和我工作之弱点。敌军事“划格子”^[6]束缚我活动，加上政治进攻，如会门^[7]之被运用，及组织其他封建团体，利用汉奸托派^[8]挑拨国共关系。敌人又烧杀又怀柔，如计口授盐，经济上倾销日货，有计划地高价收买粮食，限制、缩小、削弱我根据地及抗日力量。华北顽固派遭到我反击并未放弃反共，反而采取更多巧妙方法，决心与我进行政治斗争。

不要以为他们光是剥削人民，不懂政治斗争，他们也可能以一时之让步，取得人民之拥护。这些是更厉害，更严重，更值得警惕的。他们的活动给我以鞭策，使我进步，弥补弱点，坚持抗战。

二、冀西环境与工作估计。

(一) 冀西工作已两年了。第一时期是我单独来搞。由于我政军党的弱点，予人以可乘之机，故第二时期是顽力量大于我。五月以来我又占优势，但为时不久，张荫梧^[9]之疯狂又打击了我们。八月半后我应大量开展工作，但尚未能很好利用机会。今日之局面严重并不亚于张荫梧在时。过去民众痛苦怨顽固派之搅乱，而今日则民众怨我们了。今日是我力量削弱，敌顽力量发展，民众逐渐离开我们。

(二) 形成如此现象之原因有五：

1. 从政策上说，党政军民各机关都未站稳阶级立场，注意民生痛苦，并以此为中心。我未行“善政”，故未改善民众生活，反致民力枯竭，民生凋敝。

2. 我武装未积极打击敌人，加之纪律坏，故民众看不出我与顽军之区别，降低我威信，且纵敌活跃。

3. 党政军民机关干部中存在不少阶级异己分子及汉奸敌探，破坏抗日政策，造成失败空气，违反政治路线，损害我党工作的威信。

4. 党政军民指导机关缺乏应有的警觉性，工作多限于事务活动，不能研究问题，及早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武装工作之不合理关系影响了工作，一般各方隔离，工作不深入。

5. 党政军民配合不好，影响了工作。

三、今后的方针。

(一) 从各方面与友党友军比进步。友党友军之阻碍只是

客观环境条件，我仍是优势，我能胜利，应从政策及设施上争取民众，这是主要的，不要光靠力量打击人，而忘掉检查自己缺点。

(二) 一切为着战争，发挥民力，巩固根据地。

(三) 所有地方部队全部出动打仗，就是比进步，争取民众。

(四) 一切重要部门要把握在可靠分子手中，党的机关要放在经过审查、考验、锻炼的干部手中。

四、政权与政策。

(一) 迅速改造各级政权。村长民选是主要的，先从有保障的地方做起，树立榜样。原则是保障我提之候选人能通过。充分准备，集中力量，学习总部民众工作之精神。选举要与民生问题联系起来，使民众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知所鉴别。政府用各种方法，给予候选人以便利，培养其威信。清洗政权干部中坏分子，吸收士绅参加。注意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村子，不平板地做。要真正做，决不马虎。

(二) 重新公布主任公署八大施政方针^[10]及朱彭七大纲领^[11]。要发动群众、各团体机关讨论。只有能坚决执行这些方针及纲领者才能当选。发动斗争，解决村长贪污、压迫人民诸问题。

(三) 政府人员经常下乡，召集群众讲演、士绅谈话、座谈会，慰问抗属，解答群众各种问题，反对机关主义，加里宁^[12]每日以一点钟接见农民，力求“与民更始”。

(四) 举善政，兴利革弊：

1. 低利借贷。使贷款真正落到受灾抗属身上，及落到生产者身上。依靠工会、农会，免被富农、中农利用去。

2. 提倡生产事业、工商业。纺织，解决棉花来源之困难，

养猪羊，运销山货。根据军队及民众需要发展生产，鼓励民众过路^[13]买原料、盐等向山西卖。

3. 开荒。今年开荒，明年春耕下种。荒地属地主，农民不敢耕。应颁垦荒法令，规定土地必须耕种，不耕之田可归他人借耕。借耕权首归抗属，次归贫苦者，借耕一年不纳租，以后荒地归原主。荒山，原主可归耕，否则他人垦荒三年不纳租不纳税。政府各机关自己耕种、开荒。防水治水等要召集老农会议。

4. 办学校，增加教育经费。训练教员，编教本，教员训练出来设法录用。教育机关要掌握在纯洁分子手中。

5. 节省开支。政府严格预算、裁员，村政府开支多些，小学教员优待些。地方武装经费经指挥部批准，党审查。补充连经费归主力负责。

6. 严禁游击队向民众索粮索款，敌区可筹，但须向政府报销。游击队不准在抗日现有区吃粮。

（五）几件事情：

1. 政府设公安局。须由党决定、检查、批准公安局干部。其警察专司锄奸、保卫政权和党。县专署设警卫队司警卫，归公安局长指挥，其余武装俱归武装部门。

2. 改变派差办法。主力买骡子自己运输。所有合作社一律禁要民差。要差必经军队及政府开条子。要差不给钱，准予群众告发。

3. 募集公粮。募富有的存粮，到敌区筹粮，过路东运粮，同时赈济贫困，用上面政策舒息民生。努力完成筹粮计划。

五、武装问题。

（一）编制原则。目前最基本的原则是着重统一。每县编一个大队，三四个连，每区一个中队，一个或半个连，每村成

立游击小组，接敌区可有二三十人的精干游击队。游击队按人枪对半来编制。

（二）干部重新审查，重新配备。审查干部的标准是政治第一，其次是敢打。

（三）武装编制及改编。防止急性病，方法力求合适。地方注意补充教育训练，主力帮助动员教育，同时反对放任主义。加强游击队的管理及纪律。

（四）整理武装，全部出动，应下决心不怕死人，不怕打垮。过去最大的毛病是不打仗，破坏纪律。群众最憎恨的游击队宁肯解散、缴械，甚至杀一儆百，以回答民众。

（五）各县指挥部成为二大队的系统建制。主力部队组织的游击队归所在县指挥，委派能力强的干部参加指挥。

（六）各县各级政府干部兼八路军游击队首长，这是巩固政府的办法之一。反对用武装来看门。

（七）保卫根据地，发展民众斗争必须要民众有枪，一县至少一二百条枪，保证村有二三条枪及其他武器。应逐渐设法解决民枪问题。

六、民众组织。

（一）重新审定干部，加强干部，原则上提拔与民众有联系的干部。

（二）各方尊重民众团体，提高其威信。

（三）政府依靠民众团体进行工作，培养民众团体。

（四）目前民运工作要注重自下而上地建立。干部到下边去，到民众中倾听民众呼声，协助政府解决民众问题。

（五）研究讨论民运工作。

七、统一战线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争取落后知识分子，如小学教员及可能抗日反妥协

的分子。利用座谈会等“比进步”的方式争取之。

(二) 采取各种方法争取士绅。由政府军队负责，可组参政会^[14]，使之参加，相当尊重及考虑其意见。

(三) 公开批评友军，帮助友军，使其下层及民众知我之帮助及态度，以争取及孤立顽固分子。中心放在比进步，不放在消极抵制。

(四) 报纸应替老百姓说许多话，批评一些现象。

八、党。

(一) 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军政民的政治领导，真正做党的工作。

(二) 审查干部。

(三) 党政军民要有充分的战斗性，雷厉风行地干起来。党和政府环绕战争，保证军队之一切。党政军民上下掀动，造成热潮，彻底讨论，彻底转变冀西工作，创造、巩固根据地。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河北省赞皇县黄北坪召开的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摘要。邓小平当时任太北军政委员会主任。

[2] 区代，指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山西武乡举行的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3] 王宠惠，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4] 胡适之，即胡适，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

[5] 新法令，指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在这些文件里，规定采用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联保连坐法”，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6] “划格子”，是对日军实施“囚笼政策”的形象说法。

[7] 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8] 托派，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9]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军总指挥。

[10] 八大施政方针，指一九三八年八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宣布的施政方针，主要内容是：一、动员冀南一切人力、物力、智力、财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二、拥护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及鹿主席领导，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三、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体同胞，建立坚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战到底；四、建立民主廉洁的、有工作能力的各县抗日政府，严惩贪官污吏；五、整理各县金融，发展农村经济，提倡土货生产，击破日寇破坏我华北金融之毒计；六、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税收，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并在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原则下，安定民生，发挥抗战积极性；七、实施抗战教育，普遍组织民众于战委会、农工妇学商各会，及自卫队等抗日救国团体之内；八、肃清汉奸敌探，实行抗日戒严。

[11] 朱彭七大纲领，指一九三九年九月八路军总司令部暨政治部公布的《七大纲领》，主要内容是：一、改善民生，减少阶级对立，强调阶级合作，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实现民主，改善政治机构；三、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四、发展生产合作事业；五、加强抗战教育与文化事业；六、厉行锄奸运动；七、加强抗战部

队，动员民众自愿加入军队，切实优待其家属。

〔12〕加里宁，即米哈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一九三八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3〕路，指平汉路，即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的一段。

〔14〕参政会，即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而设立的，具有人民代表会议性质的机构。

冀南战役政治保障命令^[1]

(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

冀南：

甲、石友三^[2]配合日寇摧残抗日根据地已经年半，驱逐军中抗日分子，屠杀、活埋共产党员、八路军人、抗日分子在千人以上。我军始终坚持团结，处处容忍，惟望其以民族为念，幡然觉悟，回头抗战，石友三竟恬不知耻，近更与日寇亲密来往，并接受日寇指示，公开武装消灭我七七一团、东三团^[3]共一个营，复于一月三十一日向我青三团^[4]进攻，公开发动战争，因此，我军不能不被迫采用自卫战争。

乙、全体指战员必须认识，石友三过去当过几年汉奸，现在又由暗藏在抗日营垒中的投降派公开变为汉奸了。他之进攻抗日军队、抗日政府、抗日人民是在日寇意旨之下进行的。他的目的是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和民众团体，替日本强盗当清道夫，以便于日寇完全统治冀南进而统治全华北，使全冀南、全华北的人民都变成亡国奴。我军为了坚持冀南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不能不予汉奸石友三以回击。消灭石友三，就是消灭日本强盗的一部分。

丙、全体指战员必须明了此次战役关系至大，消灭了汉奸石友三就可以：

(一) 严厉地打击日寇以华制华的毒计，更有利地坚持华北抗战。

(二) 严厉地打击投降派石友三，就是投降派的末路。这是争取时局好转的重要步骤。

(三) 更进一步地巩固河北、山东、山西抗日根据地。

(四) 更便利地进行抗日设施建设，改善人民生活。

(五) 保障本军的安全、一切抗日人民的安全。反之，假如我们不能消灭石友三，那么，将来的斗争更加困难。因此全体指战员必须以最大的顽强性、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无论如何要消灭汉奸石友三。

丁、为了保障本战役的彻底胜利，必须：

(一) 坚决服从命令，细心研究命令，完成任务。对命令打折扣，或者以不坚决的敷衍的态度去对待命令，都必将在作战中造成不可宽恕的罪恶。

(二) 保证动作的协同和准确是争取胜利的重要条件，反对游击主义习气。必须认识，一班一排的胜利都可以推动整个战役的胜利，一班一排的错误都可影响到整个战局。游击习气、自由行动、不遵守时间都将造成罪恶。

(三) 要有高度的顽强性。在进攻时要坚决、勇敢、迅速，要克服工事围寨的困难，在防御时要沉着，并适时地以反突击消灭进攻之敌来遂行防御的任务。在行动时要保守军事秘密，要忍耐急行军、夜行军的困难，在转移时要机动灵活，要明了一切行动都是为着战斗的胜利，打垮敌人时禁止拿东西，一切为着逼击敌人，消灭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 发扬战场上的比赛精神。比赛夺围寨，比赛缴获人枪，比赛战场纪律。在战后本师将赠给模范指战员以光荣的奖励。

(五) 在战场上、行动中发扬阶级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供给机关保障战场的饮食，卫生机关保障伤员的治疗，政治机

关、供给机关负责胜利品的收集。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

（六）责成各级政治委员、政治机关、政治工作人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紧张性，从各方面去进行政治的保障，随时注意战士的情绪，给以及时的解决，巩固战斗情绪，动员居民配合我军作战。

（七）在火线上喊话，宣传被欺骗的官兵脱离石友三。对俘虏要优待，争取百分之九十补充部队，打破过去惧怕俘虏的观念，反对打骂、虐待、搜腰包等行为，要认识争取俘虏是补充的主要来源之一。

（八）肃清地方上的特务机关，清查俘虏中的特务分子。

刘 邓

二月三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接到毛泽东二月三日的来电后于同日给冀南军区发出的讨伐石友三的政治动员令。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四〇年一月，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在冀南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两个连和青年纵队一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三团和清河县大队等部，并企图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于二月三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指出：“对石友三部采取争取的方针已不适用，应在其向我出击时坚决彻底消灭之。”

[2]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3] 东三团，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所辖的东进纵队第三团。

[4] 青三团，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所辖的青年抗日纵队第三团。

在北方局高级 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

(一九四〇年四月)

一、行政机构问题。

(一) 联合办事处^[2]是一权力机关，用指示信方式实现政策法令之指导，以达实际上内部的统一。以三专署^[3]为工作机关。每一指示对本区直接指导，对其他区间接指导。下设办事处，编制同专署。划区一般要将就旧省界。

(二) 政权改造：

1. 足够认识还没有群众基础的状况。目前阶段是准备工作，要以支部与农会改造为基础，秋收后再进行普遍的村选运动。在个别区域（某县或某区某村）可以先试办。

2. 各级人员编制：今天整个区域，政民工作人员约有十万，这是过去军队困难及民力枯竭的原因。缩减后的人员要具体解决，如动员到军队、教育工作及各种社会事业中，要稳定他们。

二、财政经济问题。

(一) 人口、粮食、财政、经济等之状况。

(二) 我们政策的出发点：

1. 自给自足完全可能。路^[4]东、路西、太岳可调剂。

2. 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而且都可奖励。如把他们赶到敌占区去，就等于增加敌人收

入。

3. 政权及经济机关的作用是调剂作用，而不是包办作用。银行的作用在于帮助和刺激国民经济发展。

4. 统一收支。要节流，第一个工作是反贪污浪费。

三、财政政策。

(一) 统一收支：

1. 首先执行预算决算制度。只有结算各系统过去的收支，才能保证今后。如晋钞^[5]，埋伏很多。党的经费由北方局统一起来。政民等均各按系统报、拨。所有武装经费均由军区系统管理，除预算决算外不能滥用一文钱。

2. 建立经费制度。各级党设“审核委员会”，审核预算和决算，政、民都要有。军队每月点验一次，由旅负责。整个统一于北方局财经委员会。

(二) 开源节流：

1. 重新审查税收标准，三个月到半年审定一次（随我经济状况的发展而定）。小盐、土布可以不收税。为抵制敌人，海盐可收重税。路西、路东一般只收出口税（因不知出向哪里），不收入口税。

2. 田赋：按正税加收一半。整理“红布”^[6]不是主要的问题，有基础的县可以试办。一般保持过去的收法。清查黑地不要成为普遍运动，在某些地区由于工作发展去做是必要的。

3. 税收：军队完全不管税收。军用品优待办法要有限度，不按比例减少，而应规定种类。

4. 军队、游击队、党、民均不准筹一个钱，不允许“乐捐”^[7]。政府除正当规定外，不准筹款。合理负担^[8]之权由联合办事处负责，其他谁都无此权。根本取消村“合理负担”。军、政、民、党不准支一文差，如粮、灯、油等，不麻烦村政

府，支差由兵站，兵站设兵站饭店。支应局取消。

5. 生产主要是农业和一部分工业。军队一定要种地，今天首先种菜，将来要减菜金。军队如能解决百分之二十，则全年可省四百万元。

（三）银行：

1. 发行额：冀南钞票^[9]为基本票子，今天发行太不平衡，未发地区可投资，向人民购买东西。银行必须了解市场情况，加以调剂。地方票采用兑现、收积金等办法解决。晋东辅币^[10]只发一角与五分的。法币^[11]要保持其信用，要其流通，吸收一部，要有外汇的。

2. 贷款问题：已贷出的要马上整理，建立合同。以后要有组织地贷款，有计划地收回。

四、经济政策。

（一）经济委员会由联办改组为财经委员会，财政必须与军队供给部分开。

（二）合作社由贸易局完全批发，与大商人竞争，勿与小商人争。因此军队的小合作社应成为简单的自己消费性质的，不卖与人民，不军民合办。军队供给机关只管自身，工业只限军需品，如鞋子、帮带、枪油等，营业科改为军用经济科。

（三）财经委员会之生产，还要官民合办，奖励民办，借钱给人民办，也可借钱与富人开办，不征税或轻征税。

（四）对于敌占区来的货，采取逐渐排挤办法，有代用品时才可禁止。

（五）农业生产，提倡种棉，执行四一减租^[12]，已实行五一减租^[13]的不要再改。

五、其他方面。

（一）每县办一个两级小学，一个区（晋东、太南等）办

一个中学，基本上收学费，津贴贫苦学生。

（二）锄奸问题。禁止捕人杀人。今天会门^[14]发展可能与乱捕杀人有关。一般规定区村无捕人权，县无杀人权，一切要经过法律。军队杀人要经过军法机关决定。对于特务分子，基本上是在群众中斗争，有破坏行动的才可以捕。

（三）交通问题。军政民设发行系统，电话网须迅速建立，一定要军用军管。设立军用电话局。

（四）粮食问题。军粮一年征收一次，两次缴纳。县委以上的粮食由军中拨。政、民自己去买，实行粮票制度。

六、建军问题。

（一）现有补充兵可以充实一部分，用好干部，大力巩固新的部队。五月底以前补充好，党政民干部大力帮助。各分区以后自己在自己区补充。要有计划地动员。本身供给是巩固工作的大问题。每件衣服要穿二年，要很好保管。

（二）创造规范部队问题。

标准：战术、技术、管理正规化；经常保证满员；模范干部的标准是，除忠实、积极等外，同时他带的部队别人也可以带，即他是用党的办法，不是用个人的办法带部队；能团结部队，要看他拿什么办法团结，不只在个人能吃苦；反对流氓习气，反对游击主义。

（三）每一计划必须贯彻，反对官僚主义。

（四）战术问题。中心目标是对敌，向着敌人，向着铁道线，向着敌人据点。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黎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即黎城

会议。会议总结抗战三年来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讨论关于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的问题。

[2] 联合办事处，指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办，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成立。当时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并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联办撤销。

[3] 三专署，指薄一波任专员的山西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

[4] 路，指平汉路，即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的一段。

[5] 晋钞，指由国民党山西省政府控制的银行发行的在山西省境内流通的纸币。

[6] “红布”，即红簿，是农村中登记各个农户交纳田赋的账本。

[7] “乐捐”，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农村中实行过的一种筹粮筹款的方法。其做法是，把农村中的富户集中起来，根据本村所要交的粮款，让富户自报，然后由村民或村民代表议定，确定每户富户交付的粮款。

[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9] 冀南钞票，简称冀钞，是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停止发行和流通。

[10] 晋东辅币，指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省第五行政区救国合作社发行的兑换券。

[11] 法币，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后所发行的纸币。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因物价暴涨而业已崩溃的法币。

[12]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情况不同，减租的额度也不完全相同。四一减租，就是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地租均按原租额减去四分之一。

[1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由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不同，减租减息的额度不完全相同。五一减租，就是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地租均按原租额减去五分之一。

[14] 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迎接一九四一年^{〔1〕}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过去了。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我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我们进行了一些严重的但是胜利的斗争。

这是世界巨大变化的一年。我们看到，两大帝国主义的战争，由片面转入全面，正向世界范围扩大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由于他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有正确的政策，没有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得以超脱于战争之外，而加紧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乐园，并准备积聚最大的革命力量，为着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与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斗争。以苏联为领导的和平阵线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战争的革命运动，也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着。所有这些，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大大地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世界革命的力量大大地发展了，革命的胜利大大地接近一步了。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到处碰壁的一年。在外交上，既亲德意，又怕过于得罪英美；急于南进，又怕引起日美战争；讨好苏联，反为苏联冷眼相待。国际地位始终是孤立的。在对华战争上，表现出非常焦急的状况，要想乘机南进，非迅速解决中日战争不可。为了结束中日战争，日寇曾采用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法，其结果是军事进攻的成绩很少，虽曾一度企图进攻西安、重庆、昆明，以压迫我国投降，但为事

实上的困难和华北百团大战^[2]的胜利所击破；政治诱降的阴谋，在一个时期曾收到相当效果，但在我国军民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之下，屡遭失败，直到最近，又不能不搬出下贱的汪精卫^[3]来玩弄，这证明日寇的泥脚已更深地陷入中国的深渊，而无力自拔了。正因为国际环境孤立，中日战争无法结束，反映到日本国内，表现着政治经济的极度不安。中日战费已用去了一百六十余万万元，国债已欠到二百六十万万余元，一九四一年的预算还要百余万万元，国内现金几已用尽，庞大预算只有取之于民。人民反战，士兵厌战正在发展，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今年内阁换了三次，也无法解决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显然已经更加苍老了，虽然它还能在生死线上多挣扎几天，无疑地，它是更加接近死亡了。

这是我国国内局势非常紧张的一年。最初，我们遇到了“东方慕尼黑”^[4]的危险，我们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东方慕尼黑”的危险，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加上国际环境的变动，德意日订立军事同盟，“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才算克服了。接着，日寇于“东方慕尼黑”失败之后，乃企图发动向重庆、西安、昆明的正面进攻，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诱降，压迫我国投降。我党又提出保卫大重庆、大昆明、大西北的口号，并主张加强团结进步，以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华北的八路军决死队在这样的要求下，发动了百团大战，取得了空前的伟大的胜利，迫使日寇不能不去考虑到正面进攻中的后方问题，而被迫停止正面进攻，转到敌后进行反复的“扫荡”。正面进攻的企图被击破了，日寇又采取政治诱降的政策，于是德意劝降、日本诱降的危险又临到中国人民的面前。伴着这次严重危险而来的，是国内亲日派和内战挑拨者的活跃。这些混蛋在日寇指使之下，拼命挑拨反共的内战，企图用内战方式，置

统帅于火炉之上，拖一批友军下水，以便经过反共战争转到直接投降。于是反共高潮弥漫全国，二十九个师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进攻，二十万大军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周围，并构筑五道封锁线，华北某军整装待命等等噩耗，纷至沓来。我党乃又奋起号召全国，一致起来反对投降，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时局好转。我党我军一面实行了一起让步（见朱彭叶项通电^[5]），一面被迫作必要时自卫之准备。经过两月来的呼吁，反投降反内战的运动开展起来了，不仅进步势力，而且中间势力也感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同我们一块致力团结抗战了。广大的友军也表示着对内战厌恶，加上苏联始终积极帮助中国抗战，英美在日寇南进的威胁下，贷款中国以制日，于是亲日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顽固派也不能不顾及人民的意志，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现在投降反共危险依然存在着，但争取好转的可能显然是增加了。从整整一年中，我们看到，投降危险没有一天不威胁着我们的民族。这固然是由于日本诱降政策和英美利用中国、随时准备牺牲中国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国内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亲日派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也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政策、倒退政策的结果。困难增加，动摇也就随之而增加。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坚持团结抗战的进步力量大大发展了，广大的中间势力和大多数友党友军还是赞成团结抗战的，亲日派的力量是不大的，顽固派虽有钱有势，但为数不多，真正强大的是抗战派的力量，特别是我党我军已发展成为团结抗战的决定力量了。所有这些，充分证明我们民族时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我们有足够力量不断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走上胜利的道路。

这是华北斗争非常紧张的一年。即以本师所在冀南、太行、太岳区而论，我们的斗争是很艰苦的，我们的收获也是很

大的。年初，我们遇到了日寇和顽固分子朱怀冰^[6]、石友三^[7]等的夹击，使我们一面加强对敌斗争，一面却不得不对朱、石的进攻实行自卫的回击。只有在回击了这般顽固反共分子的进攻之后，我们才能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才有可能一心对敌进行严重的交通斗争。随着朱、石的南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8]成立了，几个休戚相关的区域，联结成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根据地了。各种政治改革，财经、文化等建设工作，也在联办统一指导、统一计划之下，顺利进行了，群众工作更加深入了，抗日根据地更进一步地巩固了。随着朱、石的南移，在冀南展开了整年的交通战争，虽敌据点大大增加，但我们给予敌人的打击是极其巨大的。在太行、太岳，我们第一次发动了破击白晋路的战役^[9]，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接着从八月二十日起，我们全区的八路军、决死队^[10]参加了华北的百团大战，在党政军民一致努力之下，我们达到了战役的目的，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计划，缴获之多，胜利之大，也是空前的。整个的一年，我们全区军民都在自卫斗争、交通斗争、进攻敌人和反“扫荡”的战斗环境中，斗争是艰苦的。虽然由于某些区域某些同志掌握政策不紧，甚至发生某些错误，使得我们党政军民的进步，表现出不平衡的状况，各种力量的发展也嫌不足，但这仅是前进中的弱点，发展中的不足。我们是胜利的。

这是本师战斗最多、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本师军事政治质量大大提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进行了一千四百余次的大小战斗，几千个优秀共产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根据地的巩固，或者光荣负伤，或者流了他们最后一滴血。然而，我们获得的却是克服时局危机的胜利，根据地的巩固，战斗力的提高，敌人的挫败，

以及二万余敌人的伤亡和无数的缴获。在这一年中，我们的部队发展了百分之七十，特别是经过五月整编之后，部队的组织性加强了，正规化的程度提高了。在这一年中，我们坚持了干部轮训制度，我们经过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供给、卫生、通讯等训练班，以及各种各色的各级训练队，培养了大批的干部。所有经过训练的干部，一般的党性提高了，政治文化进步了，军政技能也增强了。在这一年中，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也有了一些新的建树，军民关系也更加进步了。不可否认的，我们还有不少弱点：我们还没有百分之百地完成发展的任务；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地方武装的建立大大不够；巩固部队的工作太差；发生了阚兴学、高恒如的可耻叛变；某些部队的进步不够；干部关心战士不够；供给制度尚未健全起来等等，还需要我们作极大的努力。但是，总的任务我们是完成了的。一二九师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前进一大步了。

一九四〇年是胜利的一年。我们的努力，不是空过的。世界革命和中国抗战的胜利更加接近了。让阚兴学、高恒如这般下贱东西去悲观失望，动摇叛变吧，我们是要继续前进，继续胜利的！

一九四一年开始了。

这将是世界革命更加发展的一年，也将是中国抗日战争更加困难，更加接近胜利的一年。

我们不可能对未来的一年作出详细的准确的估计，但一般的趋势是可以想象的。

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更加向着世界范围扩大。资本主义世界继续削弱。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大大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进入了第四年，很快要出现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将

给全人类以显明的奋斗目标和无限的希望。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战争的运动将蓬勃地发展起来。两个世界的对比将起着更显著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坚持贯彻其灭亡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11〕}的基本方针，其南进政策，必然引起日美在太平洋上更尖锐的矛盾，甚至有爆发日美战争的可能；其解决中国事件之要求，亦必更迫切，而解决中国事件之方法，亦不外政治诱降、军事进攻双管齐下；其外交上的孤立状态不会得到多大改善；其财政困难不会得到解决；其国内不安现象，人民不满情绪，必然增长。所以，这个先天不足的帝国主义将在愁城中去度过一九四一年，而将其希望寄托于迅速解决中国事件之上。只要我国坚持抗战下去，日本必败，这是肯定的真理了。

中国抗战，必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接近胜利。无论日寇用政治诱降，或用军事进攻以压迫我国投降，投降危险是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而亲日派制造投降运动，挑拨内战的活动，也必然是变本加厉的。英美帝国主义目前虽在帮助中国，利用中国以制日，但它们并没有放弃争取日本，孤立德意的战略企图，所以英美牺牲中国，再来一个类似“东方慕尼黑”的把戏，也并非没有可能的。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还在于中国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这种人惧怕困难，没有自力更生的信念，熬不过战争的难关，同时不愿进步，反对民主，害怕民众力量，致使抗战更加困难，所以时有被敌引诱，屈辱求和的危险。因为这种人不愿表里一致地联苏，而甘心情愿跟着英美走，所以时有被英美出卖的危险。因为这种人抱有很深的反共成见，所以时有被敌挑拨，被亲日派利用，发动内战，经过内战走到投降的危险。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全国一切拥护团结抗战、拥护民主进步的力

量，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停止地主资产阶级动摇的程度，所以投降反共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假如我们只看到困难，看到投降反共的危险，看不到全国抗战的进步的力量曾经克服了无数次危险和困难，也有力量克服不断到来的危险和困难，那必然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一九四一年的环境，将给我们以更多的克服投降反共危险的条件。国际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特别是英美日在太平洋矛盾的加深，给我国以更好的机会去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苏联力量的更加强大与始终如一地援助中国抗战，将给我国人民以无限的鼓励和兴奋。日本强盗的困难激增，弱点更多，更便于抗战胜利的取得。而我国抗战力量进步力量必然发展，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尤必须发展，这是不断克服危险，克服困难的决定因素。我们认识困难和危险的目的，在于寻求各种办法去克服困难和危险。条件是具备的，不管情况如何变化，我们都将以正确的政策去争取继续团结抗战和继续进步。团结下去，抗战下去，进步下去，中国是一定胜利的。

华北的斗争也将是更加艰苦、更加进步的一年。在任何条件下，敌人是不会放松华北的，我们坚持华北抗战也是肯定的方针，斗争是极其尖锐的。敌人必将企图增加其公路网、铁路网和据点的密度，以缩小抗日根据地，打断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束缚我之机动。我们亦必进行更残酷的、更带群众性的交通斗争，打击敌人的企图，缩小敌占区，扩大抗战区，使我各个根据地之间，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和更灵活的配合。敌人必将更残酷地实行其分区的连续“扫荡”，甚至可能由分区“扫荡”变为分区“清剿”，大肆摧残抗日根据地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也必进行严重的、连续的反“扫荡”斗争，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去削弱敌人，用坚强的正规军去消灭敌人，用

充分的战争动员工作和不疲倦的建设去打击敌人的破坏，以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敌人必将加强其政治经济的进攻，必将强化其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政策，必将厉行其特务活动和内奸政策。我们亦必将以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去加强政治经济斗争，与敌人进行严重的文化宣传和斗争，并以群众的锄奸政策，最高的警觉性去打击敌人的特务活动和内奸政策。我们相信，依靠于已有的基础和不断发展的力量，特别是正确的政策，我们一定能够坚持华北抗战，打击敌人各方面的进攻，使抗日根据地更加坚强，更加巩固。

根据上面的估计，显然的，我们华北的党、华北的八路军、华北各个根据地的政府和人民，责任加重了。我们要以最大的毅力，最坚强的斗争勇气，来坚持华北的艰苦斗争。同时，还要以华北抗战和建设的模范，去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打击投降妥协的危险，并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我们有着充分的条件和信心，去迎接一九四一年新的发展与新的胜利。

迎接一九四一年新的发展和新的胜利，决定于我们的力量，尤其决定于正确的政策。

在晋冀豫整个区域说来，我们有了力量，但是无论在数的方面、质的方面都很不够。在军事方面，我们正规军的充实不够，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发展尤其微弱，军队建设和战术素养亦嫌太差。在政权方面，还不善于运用政策，贯彻政策；还没有认真执行三三制^[12]的原则；下级政权改造极其不够，还有一批土豪劣绅把持下级政权，破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政权与人民的联系还差，部队行政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还是严重的，因而政权力量的发挥是非常不够的。在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了比较普遍的工农青妇的群众组织，而且也起了很大作

用。但是组织生活是很差的，是经不起风浪的，还有不少地方是形式的；某些地方还存在官办民众运动的严重错误，真正的当地的群众领袖还没有大批地涌现出来，所以基础是不够巩固的；特别是在群众组织中缺乏正确政策的教育，某些地方表现出过左过高的要求，不少地方对基本群众的生活改善，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或“左”或右的错误，都不能把群众力量广泛发挥出来，都有害于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都无法使群众工作向着健全的道路上发展。在党的工作方面，我们有了大的发展，有了相当的基础，在全区党努力之下，我们创造了晋冀豫的局面，而且胜利地领导了三年半的艰苦斗争。但是，无论军队或地方党都尚未能掌握住“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的方针，缺乏严格的组织生活，缺乏坚强的支部工作，缺乏必需的民主，缺乏党的和政策的的教育，缺乏群众工作的研究与对群众痛苦的关切，因而党与群众的联系是极其不够的。离开群众来建设布尔什维克党是不能想象的。在团结二百万友军抗战、团结知识分子、团结士绅、团结各阶级等工作上，在敌占区工作、敌伪军工作上，我们有着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弱点以至个别错误。个别区域、个别同志常常忽视这些工作，忽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甚至多树了一些敌人，当然这对抗战力量有损，而对敌人有益，必须纠正。

所有这些证明，我们力量的发展是不够的，尽管这是发展中的不足，前进中的弱点，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与警惕。

克服这种不足的现象，克服这些弱点，以适应于一九四一年的新环境，我们必须努力于三大建设的工作：

第一，建设我们的军队，重心就应该放在正规军的加强、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军区工作的健全上。一切努力为着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在全党中要造成爱护党军的热潮，在人民中造成爱

护自己子弟兵的热潮。保证党军的壮大与充实，保证党军的物质供给，共产党员应起到模范的作用。

第二，建设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重心应该放在掌握与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三三制的原则，首先完成村区的民选，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以及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上。一切为着团结各阶层，发扬民力，增加根据地的财富，保证彭德怀^[13]同志提出的一九四一年经济建设计划之完成和密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第三，建设我们的党，重心应该放在加强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政策的领导，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和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上。一切为着高度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提高党及群众的战斗力，树立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路线的基础。

三大建设的胜利，就可以使我们有足够力量和正确方向去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开展敌占区和敌伪军工作，完成全部的任务。

三大建设的胜利，依靠于正确的政策。离开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发展，能够胜利。

三大建设的胜利，依靠于细心的有计划的组织工作。反对粗枝大叶的不实际的作风。

三大建设的胜利，也必须依靠于坚持地努力和工作的战斗性。要保障在战斗环境中不放松工作，在敌人连续“扫荡”中还能完成任务，保障一定的任务在一定时间完成，反对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一二九师的党和全体指战员，在执行党的政策上，在完成三大建设的任务上，都应起到模范的作用。

因此，一二九师的党和全体指战员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和全体民众一样，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一定能够胜利的信念，来迎接一九四一年的艰巨任务，我们的责任加重了。

一二九师的党应把自己的努力放在下列的中心工作上：

第一，保障正规军的经常充实，保障战斗力的提高，保障在一九四一年打几个更大的歼灭敌人的大胜仗。

为了部队的充实，除了协同地方进行兵员补充工作外，部队本身必须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巩固部队首先在于巩固部队的团结，发扬本军阶级友爱、团结一致的传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要爱护战士，关心战士的生活，注意对部队的管理教育，消灭个别的打骂现象，在生活上、遵守纪律上成为战士的模范。战士要爱护干部，接受管理教育，服从指挥命令，要帮助邻近的同志，尤其是老战士要帮助新战士。能如此，就可减少以至消灭非战斗减员，巩固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加强战术和技术的教育，加强部队体力的锻炼，改善部队的给养，特别是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

为了歼灭敌人，打大胜仗，必须发挥部队作战的顽强性，不但要有消灭敌人一部和几部的决心与信心，而且当我们抓住了消灭敌人的机会时，应不惜牺牲以求干脆的消灭，任何犹豫迟疑都是不能容许的。所谓顽强性，应具体表现在敢于白刃扑搏上面，不能进行坚强的白刃战的部队，就没有资格称为顽强的党军。敌人在一九四一年的“扫荡”是严重的，我们有着消灭敌人的良好机会，而不消灭敌人，我们就无法巩固与建设根据地。

第二，发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用普遍而有力的游击战争去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用普遍而有力的游击战争去消

耗、疲惫和削弱敌人，去配合正规军，反对敌人的连续“扫荡”，去打击敌人对根据地的摧毁政策。

为此目的，必须在补充正规军的任务完成之后，立即进行充实与发展游击部队的工作。要大量发展地方部队才能支持残酷的斗争局面。

为此目的，必须大大提高游击部队的战斗能力和政治质量。我们对于游击队的要求必须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不能比正规军相差太远，而在游击战术的素养上，应比正规军还要灵活，还要熟练。也因为游击队经常处于独立活动的环境，更需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更需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

为此目的，必须把地方兵团、游击队放在地方党的领导与监督之下。地方党对于同级的地方武装，必须定期地检查指导工作，保障这些部队能够执行上级的命令，保障它能够执行党的政策，保障它有模范的纪律，保障它与当地群众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所有的地方部队，尤必须接受地方党的领导，任何轻视、骄傲的态度，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为此目的，必须要求正规军积极地帮助游击队。我们的党军要善于领导、使用和帮助地方武装，使地方武装成为自己有力的助手。在必要的时候，正规军应抽出适当的部队去加强游击队的战斗力，在必须动员一部地方武装补充正规兵团的时候，尤应反对连根拔的现象。

第三，加强军区的建设。各军区、军分区除了善于领导地方兵团和游击队外，应把自己的重点放在民兵制度上。我们需要在一九四一年训练出大批的自卫队和青抗先^[14]的干部，这些干部应该是最坚决的、最有斗争勇气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我们需要在一九四一年全区完成发展民兵十万的计划，并使这十万民兵真正成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基础，成为正规

军补充的泉源。我们需要在一九四一年打下自卫队、青抗先的组织和工作的基础，使之像晋察冀一样，能够担负起抗日戒严、配合军队作战、侦察锄奸等任务。我们要求军区工作能够保证每期兵员计划的完成。我们要求地方党、政府、群众团体对于军区的建设、民兵基础的树立和兵员的补充，起到坚强的保证作用，每个共产党员更应成为参加军队领导民兵工作的模范。

第四，打下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的基础，加强所有干部的职务技能的教育，首先我们的正规兵团必须做到。

打下政治工作的基础，一九四一年政治工作的重心应该是：1. 依据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5]，而以一九四〇年本师颁发的《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16]作参考，来重新训练所有的政治干部，务使每个政治干部以至军事干部，通晓政工条例的精神和内容，切实地贯彻执行政工条例的规定，使每个政治工作干部熟练政治工作，特别熟练战时政治工作。2. 加强连队工作、支部工作，每团创造一个到两个模范连队和模范支部，用模范去影响落后，树立连队政治工作的基础。3. 高度地树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威信，反对破坏政治委员制度和轻视政治机关的任何表现，特别是要求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模范作用，从自己工作中树立自己的威信。4. 进一步地审查干部，培养干部，进一步地加强党的意识的锻炼，学习党的政策，以培养干部独立活动的的能力。各级干部的提拔必须经过政治机关（班排干部必须经过支部）的审查。5. 切实做到指战员一体、军民一体，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军人大会的制度，发展青年工作，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发动全体指战员爱护党军，发动全体人民爱护自己的子弟兵。6. 提高民族的和阶级的警觉性，加强锄奸保卫工作，严防民族敌

人和阶级敌人内奸政策的破坏。

打下管理教育的基础，一九四一年的军事工作的重心应该是：1. 根据本师拟发之内务条令，在干部中进行深入教育，保证准确地执行内务条令，实行阶级管理。2. 提高部队的纪律，特别是战场的纪律，严明赏罚，有功者一定要奖，有错误者必须适当地惩罚，要善于运用模范例子去压倒坏的东西。3. 建立经常的教育制度，学习晋察冀的同志，善于利用一切空隙来进行部队的训练，以提高战术和技术。4. 健全参谋工作，选拔优秀的、有能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党的意识很好的干部，来加强参谋部门，用加强政治工作的注意力去加强参谋工作。

打下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的基础，决定于干部。我们的轮训队、抗大分校及其他各种教育部门，都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上面。

第五，健全供给制度，发扬本师艰苦的作风，与一切贪污浪费现象作斗争。供给干部必须尽一切努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去改善部队的的生活。各级军政首长应加强对供给工作经常的注意与领导，加强卫生部门的工作，爱护伤病同志。

第六，根据师政治部颁发的条件，创造模范兵团、模范干部、模范党员和模范战士。所有干部，所有共产党员，所有阶级战士动员起来，为争取模范而斗争，为创造模范党军而斗争。

依靠于过去三年半努力抗战的成果，依靠于一九四〇年胜利的基础，依靠于我们不断地努力，不管未来的环境如何困难，我们都是能够克服的，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我们以胜利的姿态结束一九四〇年。同样，我们也以胜利的姿态迎接一九四一年。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二十六、二十七期合刊。

〔2〕 百团大战，指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了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3〕 汪精卫，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一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任代主席。

〔4〕 “东方慕尼黑”，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美国、英国帝国主义曾多次酝酿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个阴谋同一九三八年英国、法国两国通过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的阴谋相类似，所以称之为“东方慕尼黑”。

〔5〕 朱彭叶项通电，即《佳电》，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这个电报，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何、白强迫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內撤到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同时，为了照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

〔6〕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二、三月间率部进攻太行区的八路军，被击败。

〔7〕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8〕 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办，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成立。当时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并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联办撤销。

〔9〕 破击白晋路的战役，指一九四一年五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根据地人民群众配合下，对日本侵略军抢修的白（圭）晋（城）铁路实施的破击战。此役破

坏铁路五十余公里，摧毁大小桥梁五十余座，歼敌三百五十余名，打破了敌人的修路计划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图。

[10] 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属第二战区建制的一支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

[11] “东亚新秩序”，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12]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13] 彭德怀，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副总司令。

[14] 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

[15] 这里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是指八路军政治部制定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对一九三八年颁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修订，全文载于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四期、第五期。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正式颁发。

[16] 《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指一九四〇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颁发的《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支部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和《“朱德青年队”与各级青年组织及工作暂行条例》。

胜利的回顾与胜利的期待^[1]

（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

如果在结束一九四〇年的时候，需要把晋冀豫区（即冀南、太行、太岳区）全年的努力作一个清算的话，下面的事实已足证明，我们的成就是极其伟大的。

在一年内，八路军和决死队^[2]打了一千三百多次仗，毙伤敌人一万五千余名，缴获之多，为前所未有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五月间的白晋战役^[3]，八月二十日开始的百团大战^[4]和冀南整年未停的交通斗争。至于这些战斗胜利的意义，特别是百团大战胜利的意义，早有定评，勿庸再说，其对全国影响之大，对敌损害之重，以及对根据地的坚持与巩固，对我军民的锻炼，其成果都是不可估计的。

在一年内，我们进行了统一的斗争。过去冀南、太行、太岳几个区域，缺乏很好的联系，今年新受到敌人和顽固分子张荫梧、朱怀冰、石友三^[5]等的夹击，各种建设无法进行，几个区域有被隔断的危险。经过一度斗争，才打开了局面，才有可能一心一意地与敌人进行交通斗争，也才有可能把几个区域联结成一块合乎战略要求的根据地，顺利地进行各种建设工作。于是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6]应运而生，开始奠定了统一的基础。在联办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根据地的各种建设，显然是进步很快的，混乱现象基本上被克服了。

在一年内，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在走向巩固、走向深入。

依靠党政军民一致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正规军、游击队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经过五月整编之后，正规化的程度提高了。在全年交通斗争中，证明了群众工作有了相当的进步，冀南民众（自卫队、青抗先^[7]）参加破击交通斗争的，总计起来，当以百万计。假如没有这种广泛的群众的交通斗争，那现在情况之严重是不难想象的。太行、太岳区的广大民众，参加百团大战，参加平汉、正太、白晋、平辽^[8]等铁道、公路的破击，参加反“扫荡”，实行各种帮助抗日军队的参战动员，都是非常热烈而成绩卓著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进步，则表现于政权工作开始走上轨道。三三制^[9]的民主制度开始实行，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等建设工作，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特别是在掌握正确政策上，引起了初步的注意。保障人权法令^[10]之颁布，合理负担^[11]办法之修正，财政之统一，经济建设计划之确立，北方大学^[12]和各级正规中小学校之创办，无一不象征着抗日根据地之日趋坚强与巩固。党在自己的巩固工作上和对各种工作的领导上，也有了不小的进步。

在一年内，我们在“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的口号之下，克服了向后退缩的现象，某些地区收到了初步的成绩。有些区域抓住了百团大战的胜利，收效尤大。无论如何应该承认，抗日政府、抗日军队在敌占区的影响，经过了一年的工作和战斗的胜利之后，有了一个大的变化。敌人曾经拼命造谣说八路军被消灭了，抗日政府被打垮了，现在还有谁相信呢？敌人曾经灵敏地利用了我们某些游击队纪律不好，某些同志到敌占区筹集资财，乱打汉奸，不做艰苦工作，不执行正确政策等等弱点与错误，大肆宣传、欺骗，并强迫敌占区同胞与抗战区对立，巩固扩大其伪组织，保护其交通线，以达其“以华制华”之目的。但在我们克服了这些错误、弱点的区域，以及在

我军不断胜利，敌人弱点愈益暴露之下，敌人的诡计再无法施展了，敌占区同胞对祖国的胜利信念加强了，伪军伪组织的动摇程度增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年内的重大收获。只要我们在正确政策之下努力下去，我们是一定能把敌人缩小于点线之间的。至于对敌伪军，我们的工作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亦收到了部分的效果，十余起伪军反正和五次日本士兵自动投诚的事实，可以证明这点。

在一年内，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上，无论团结友军，或团结各阶层，也收到不小的成绩，这是与执行党的政策不能分离的。在文化事业与群众教育上也有了新的成就，这是与华北的党报——《新华日报》^[13]的努力不能分离的。

难道还不明显吗？一年的努力，不是空过的，抗日根据地的基础进一步地打定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更加接近了。一九四一年的成就，给了我们更好的条件，去迎接一九四一年的新的发展与新的胜利！

不可否认，一九四一年的斗争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华北斗争的艰苦性与残酷性。敌人曾经企图在一九四一年内增筑许多铁道、公路和据点，构成稠密的“囚笼网”，在我们不断打击之下，敌人并未能完成其计划，但是部分实现了它的计划。冀南已由一九三九年的五十八个据点增加到现在的一百六十二个了，晋东南也由一百九十八个（包括平汉、正太、同蒲线上的）增到二百五十五个了。德石铁路^[14]已经修成，济邯铁路^[15]还在赶修，公路数目也有些增加。这证明今天的斗争环境较之一年前要严重些了，如果我们没有整年破击交通斗争的努力，那不知还要严重多少倍。敌人在去年曾经进行了对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实行大烧、大杀、大抢的政策，大肆摧毁根据地的人力、财力、物力。敌人曾经厉行其经济封锁，货币斗争，欺

骗宣传，奴化教育，特务活动，设置内奸，制造敌占区与抗战区的对立等等“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所有这些阴谋诡计，曾遭受我军民的严重打击，而敌人之残暴行为，适足以增强军民之愤怒与抗战决心，但由于我党政军民工作之不足，敌人也是收到部分效果的。

至于党政军民的工作，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弱点。以军队言，正规军的补充不够，战术素养不够，正规化程度不够，特别是游击战争的发展不够。以政权言，三三制的执行不够，政策的研究不够，与人民的联结不够。以群众工作言，组织与教育都嫌不够，群众领袖的培养不够，特别是民兵制度、自卫队工作不够。以党的工作言，组织严密性不够，党员的教育不够，特别是政策的教育与掌握不够。

自然，这些仅仅是我们前进中的弱点，发展中的不足，胜利中的困难，用不着大惊小怪。一九四〇年我们是胜利的。只看到弱点，只看到困难，难免悲观失望；只看到胜利，不看到困难和弱点，也会麻木不仁。

一九四一年的斗争，无疑地比一九四〇年还要艰苦，还要残酷，对一九四一年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是极端有害的。敌人的“囚笼政策”^[16]必然加紧，连续“扫荡”和对根据地的破坏必更残酷，甚至有由分区“扫荡”变为分区“清剿”的可能。敌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务的进攻，亦必变本加厉地施行。而我们亦必进行更坚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去击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和各方面的进攻，扩大抗战区，缩小敌占区，取得比一九四〇年还要伟大的胜利。

新的困难与新的胜利摆在我们的面前。新的困难，需要我们加强工作去克服；新的胜利，还有待于我们去争取。

迎接一九四一年，一幅严重斗争的场面展开了。

我们要一致努力，加强正规军，充实正规军，发展游击队，健全军区工作，建立民兵制度的基础，动员民众积极参战。我们要用广泛的群众的游击战争、交通斗争去削弱、疲惫、消耗敌人，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要用正规军的顽强战斗，打几个更干脆的歼灭敌人的大胜仗。一切党政军民的努力，都是为着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一切都是谈不到的。

我们要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保证三三制的执行，切实掌握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以一年的时间首先完成村区两级的民选，进一步地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一切努力为着团结各阶层的力量，发挥人民高度的积极性，以与日寇、汉奸进行艰苦的斗争。

我们要加强财政经济建设工作，保证彭德怀^[17]同志提出的“晋冀豫一九四一年经济建设计划”之完成，并进行严重的统一财政、保护冀钞^[18]的斗争。一切努力为着打击敌人的封锁与破坏，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同时，必须估计到敌人的破坏政策之严重性，而进行充分的准备，以防止敌人的破坏，并且要有破坏了还要建设的顽强性。

我们要加强文化战线，与敌人进行顽强的宣传战。采用一切形式、不同方法，不疲倦地去加强民众的抗日爱国教育。要估计到由于战争频繁，敌人摧毁，可能引起部分群众失败情绪的增长；要估计到敌人的欺骗宣传如果不受到我们的揭破与打击，也可能在部分落后群众中起到若干影响；要估计到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一般是薄弱的，不够深入的，所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失败情绪，提高胜利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继续努力于“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的方针，加强敌伪军的工作。我们要与敌伪进行一村一村的争夺斗争。

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缩小于点线之间。

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政策，我们才能胜利。

党政军民一致动员起来！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依靠于一九四〇年胜利的基础，依靠于不断的努力，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期待一九四一年的新胜利！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

[2] 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属第二战区建制的一支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

[3] 白晋战役，指一九四〇年五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根据地人民群众配合下对日本侵略军抢修的白（圭）晋（城）铁路实施的破击战。此役破坏铁路五十余公里，摧毁大小桥梁五十余座，歼敌三百五十余名，打破了敌人的修路计划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图。

[4] 百团大战，指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了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5]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参议兼战区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十七军军长。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6] 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办，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成立。当时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并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联办撤销。

〔7〕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

〔8〕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的一段。正太，即正太线，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白晋，即白晋铁路，指日本侵略军为分割太行和太岳抗日根据地而修筑的自白圭到晋城的铁路，日军称为东潞线。实际上在根据地军民不断破袭下，只铺轨到夏店镇。平辽，指山西平定至辽县（今左权县）的公路。

〔9〕三三制，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10〕保障人权法令，指一九四〇年五月二日山西省第三区行政专署公布的《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利益和生命财产之安全；一切抗日人民有抗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自由。后又发布公告，摘要公布了条例的主要内容。条例的实施，为保障人民权利，促进社会安宁，揭发敌人谣言产生了重要作用。

〔1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12〕北方大学，当时在筹建中，后由于形势变化，直到一九四六年才成立。

〔13〕《新华日报》，这里指《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创刊。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

〔14〕德石铁路，指德州至石家庄的铁路。

〔15〕济邯铁路，指济南至邯郸的铁路。

〔16〕“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太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

〔17〕彭德怀，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副总司令。

〔18〕冀钞，又称冀南钞票，是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停止发行和流通。

军区建设中诸问题^[1]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

茂林事变^[2]暴露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大阴谋。这个阴谋证明了这些顽固反共派已经接受了日寇和亲日派头子何应钦^[3]之流的挑拨，企图以分裂代团结，以内战代抗战，企图经过反共内战的桥梁，达到投降的目的。虽然茂林事变还不过是分裂与内战的开端，但是局势的发展是很危险的。虽然在事变之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合理解决事变的十二个条件^[4]，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一条争取时局好转的途径，使国人继续团结抗战的要求，还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但是谁也知道，既然顽固反共派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亲日派一起玩弄这样危险的火焰，证明他们是下了最大决心的，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与强大的国际压力，想要他们悬崖勒马，接受十二个条件，是很困难的。

全国人民和华北人民必须提高自己的警觉性，严密地注视事变的发展。因为亲日派与顽固反共派的联合大阴谋，其范围之广泛，其心计之险毒，是极其惊人的。他们懂得，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最坚决的部分，是对日投降的极大障碍，所以他们不仅要消灭江南的新四军，还企图消灭整个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懂得，中国人民是不愿投降的，所以他们

不仅对付共产党，而且他们的刀锋正对着整个的抗日人民，他们不但不释放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5]，连马寅初^[6]这样有名的学者也因主张抗日而被捕了；他们懂得，民主政治和三民主义^[7]是合乎抗战需要，能够制止少数人胡行乱为的，所以他们坚持一党专政（实际上仅是少数人的专制），压制人民的自由，处处违反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8]；他们懂得，华北由于实行了民主政治和三民主义，故能成为坚持抗战的堡垒，所以他们企图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迫入华北地域，然后采用寇奸夹击的方式，使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北人民同归于尽，以达到帮助日寇完全控制华北，使华北人民变为亡国奴的目的。

摆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军民面前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局势。一方面我们要以一切努力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去与日寇进行严重的斗争，一方面却不能不与投降反共逆流斗争。我们希望能够经过一切努力，迫使当局接受中共十二个条件，以期合理解决皖南事变，并保证继续团结，继续抗战，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但我们却不能不准备足够力量，以应付不幸到来的寇奸夹击的局面。

如果说寇奸夹击抗日军民是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话，我们抗日军民反对寇奸的夹击也无疑地应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特别是在坚持华北抗战上，如果我们忽视了武装的建设，那我们就无法与日寇进行胜利的斗争，几年敌后抗战的经验，给我们清楚地证明出来了。

所谓武装建设，应该包括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等三方面的建设。这三种抗日武装和半武装的力量，在抗日斗争中是缺一不可的，而将三种武装与半武装力量结合为一个整体，以进行胜利的武装斗争，则是军区的责任。所以，军区建设成为武装建设的中心一环。

忽视了武装建设，就无法应付寇奸夹击的局面，就无法战胜日本强盗；忽视了军区建设，就没有坚强的武装建设，更没有坚强的胜利的武装斗争。

二

谈到军区建设，我们已经有三年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了。抗战开始，我们就根据过去苏维埃运动时的经验，在敌后提出了军区建设的问题，在每一个战略基地，设立了军区组织机构，并且规定军区的任务是：

（一）组织与领导强大的地方武装，包括地方兵团和游击队，开展普遍的顽强的游击战争，并配合正规军作战。

（二）组织与领导强大的群众的半武装组织，建立普遍的自卫队，特别是建立坚强的民兵（由基干自卫队和青抗先^[9]组成）制度，实行有组织的参战动员，戒严、锄奸、游击敌人、侦探、报信、配合军队作战，转送军用品、战利品和伤病战士，及兵员补充等。

（三）依靠游击队的基础，发展成为正规军；依靠民兵的基础，有计划有组织地补充正规军。

这就是说，军区担任了积蓄武力与使用武力的责任，担任了把劳动力与战斗力结合起来的责任，担任了把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结合起来，开展全面的武装斗争的责任。也只有这样全面武装、半武装力量的结合，方能顺利地执行我们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与现代装备的日本军队进行斗争。

不可否认，三年多的军区建设收到了一些成绩，主要表现在：

(一) 前后生长了相当数量的地方武装，并经过地方武装组成了相当数量的正规兵团。

(二) 各地方武装，一般还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起到相当的作用，如抗战初期之晋中游击支队，最近之冀南武邑游击大队，及太行区几个县的游击队等等。

(三) 开始锻炼出一批新的当地的武装干部，并经过地方武装输送了一批到正规兵团里去。

(四) 部分地区开始脚踏实地建立民兵工作，特别是青救⁽¹⁰⁾对于青抗先的组织与工作，收到了初步的成效，某些地区的民兵已经能够起到配合军队作战，主动袭扰敌人，保卫抗日政权和人民，戒严锄奸等作用。

(五) 某些地区的游击小组，更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六) 对正规军的兵员补充，尽了部分的努力，虽然成绩不大。

经验告诉我们，哪里的军区工作做得好些，游击队、自卫队比较健全些，战斗力和政治领导比较坚强些，则那里的抗日政权就比较巩固，正规军就不致“裸体跳舞”，且能得到适当的休整机会，而敌伪的活动也就比较困难。反之，哪里的军区工作做得不好，则一切情形就大大不同了。

应该承认，这里军区工作做得好的地方还是不多的。如果拿冀察晋的军区工作来比较，那真是天渊之别了。冀察晋有着强大的地方武装，而且具有相当的巩固程度和战斗力，有着坚强的民兵工作，能够调动自如，能够整批地动员民兵加入正规军，所以那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兵员补充的困难。我们这里呢，军区工作还没有走上轨道，严重的弱点表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 地方基干兵团和游击队的数量和质量均极不够。从数量上看，我们晋冀豫整个区域的地方武装数目，还不及冀中

一处之多。从质量上看，还有不少游击队表现出政治不健全的现象，行动不够积极，对党及政权不够尊重，对政策的执行很差，常常发生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行为，对群众关系不够密切，因而这样的游击队是无法巩固与发展的。

（二）民兵工作还未打下初步的基础，还未引起一般同志的重视，不了解这是武装工作的泉源。建立民兵制度是去年四月就提出的，除了青救对青抗先有初步的努力外，一般只有号召而少实际工作，大部地方没有利用百团大战^{〔1〕}来推动民兵工作，整整地空过了七个月，最近才开始引起一般的注意。即以一般自卫队而论，经过三年余之久，现在连组织都是空洞的，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正因为游击队和民兵基础极不强固，所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没有开展起来，影响正规军常常“裸体跳舞”，影响到对敌斗争与根据地的巩固。

（四）对正规军的补充和帮助是很不够的，一般不了解这是军区工作的责任。过去对正规军的一些补充，常常以改编游击队的方式去完成，这种不正确的方式，也影响到地方武装的坚强与壮大。至于那种连根拔的消灭游击战争的方式，更是严重的错误。

（五）党政军民在军区工作中的协同一致是很差的，大家舍不得抽调最好的干部做武装工作，直到现在各级武装部门还未健全起来。

显然的，不纠正这些弱点和错误，要想把军区工作做好是不可能的。

三

要把军区工作做好，首先要求党政军民的同志明了军区建设的重要性，即是说建设军区首先要从思想建设做起。

所谓思想建设，就是不仅懂得武装斗争的意义，还要懂得正确的武装政策。过去无论党政军民，对此了解都是非常不够的。

正规军的同志，只看到自己的正规兵团，不懂得建设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重要，因而常常发生吞并地方武装，不帮助地方武装，不帮助民兵工作，舍不得多拿出几个干部，小眉小眼，这是不懂全面武装斗争的狭隘性。我们发现有些同志，某些时候很热心地帮助游击队和民兵工作，可惜他们的用意仅仅是为着补充兵员，为着抓一把，否则他们就不热心了。他们不懂得，没有强大的地方武装，正规军就缺少了耳目手足，就得不到群众游击战争的掩护而进行必须的休整，结果一有敌情不能不亲自出马，“裸体跳舞”。他们不懂得，没有民兵的基础，正规军不会得到源源补充的。狭隘观点的结果，难道不是“自作孽”吗？

军区系统和游击队的同志，一般的缺点是只看到本区域的基干武装，如军分区的基干兵团、县基干营，看不到普遍的游击队、游击小组的作用，更看不到自卫队和民兵的作用，所以他们的精力只用之于基干武装，忽视了小游击队和民兵工作。晋中分区对平定、昔阳、东冶头游击队长期不管，即其一例，甚至也与野战兵团一样，喜欢并吞游击队。有些军区系统的工作同志，对于军区的指示是不大注意研究的，本身任务还弄不清，更谈不上把工作做好了。还有些“老子天下第一”的人，

不尊重同级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这不但得不到地方党政的指导与帮助，工作做不好，而且是很危险的倾向。这种人有的是由军队中派出的，有的也是由地方党、政府、群众团体输送到武装部门工作的，似乎一拿到武装，人的性格都起了变化似的。这证明武装是最好的东西，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是因为它掌握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最危险的东西，是因为它不尊重党的领导，脱离党的掌握。这些不听党招呼的“老子天下第一”的同志，难道还不深自警惕吗？

党政民的地方工作同志，注意武装问题的固不乏其人，但忽视武装问题的亦大有人在。在武装开始创建的时期，许多党政同志曾把武装工作看成为最主要的工作，把最大的精力用在游击队上面，这种精神是很好的。但是那时的缺点在于忙于游击队的供给，而忽视了游击队的政治领导，忙于脱离生产的武装，而忽视了民兵自卫队的工作，尤其是忽视了对党的政权和民运的领导，对正规军的联系帮助也很不够。在后一时期，因为要有计划地进行地方武装的组织训练与作战，所以把所有武装统一于军区指挥，而置于地方党的政治领导之下。这种改变无疑是正确的，但因为解释工作不充分，发生了一些偏向。某些地方工作同志以为这是军区的事了，采取不管的态度；某些军队同志以为这与地方党政无关了，发生了不尊重党政领导的现象。结果弄得互相关系疏隔，甚而互相埋怨，游击队民兵工作始终做不起来。这种现象经过百团大战和敌人的连续“扫荡”之后，有了一个转变。大家重视武装问题了，但实际工作还是很不够的。说到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和归队运动等工作，应该在政府的法令之下，由党政民的工作去保障实行，但恰恰也是大家所轻视的，不了解这正是站在自己岗位上去建设武装，去巩固军队战斗力的具体工作。甚至有个别干部，某些机关，

不但不进行归队运动，还要吸收逃兵参加政府、群众团体的工作，这等于瓦解部队，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至于群众团体，除青救对青抗先、青年营等有了相当的努力外，其他如工救、农救、妇救^[12]，对武装问题本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惜一般是忽视的。

最后谈到我们军队党和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在主观上大家的确想把军区工作弄好，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我们还未能采取一切有效步骤，把军区工作认真做起来，如干部培养、具体指导、切实检查等，尤其对那些忽视军区工作的倾向，没有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教育，这也是必须用自我批评精神指出的。

只有严正的自我批评，才能了解过去军区工作薄弱的原因之所在，也才能找寻出今后努力的方向。

四

我们党政军民同志一致努力的军区工作方向是什么呢？我们的正确的武装政策是什么呢？

（一）先说军区与野战军的关系。

在作战方面，需要野战军、地方兵团、游击队与民兵有机的配合，才能以广泛的经常的游击战争去疲惫、消耗、削弱、封锁敌人，才能以顽强的正规军去抓住“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歼灭敌人。所以军区的责任是使用多支地方兵团、游击队、游击小组和民兵，进行不断的游击活动，以遂行保卫抗日政府和民众，扩大抗战区，缩小敌占区，并掩护主力兵团休整之任务。正规军的责任是利用一切可能争取的时间以至战斗的间隙，加强自己的整训，提高战术技术，加强政治工作，高度发挥顽强性，以便于遂行抓住机会坚决消灭敌人一路或几路之

任务。这种一般的分工是必要的，但这不是说不相配合不相联系了，恰恰相反，正规军必须领导地方武装遂行游击战争，并且亲自参加游击战争，地方武装或半武装必须切实地配合正规军作战。

过去正规军的缺点是不切实帮助领导地方武装，在作战时总是不善于使用游击队，所以弄得“裸体跳舞”，一有敌情就不能不自己出马，弄得休整都很困难。正规军不断地分散游击，无疑地要减弱自己的战斗力与顽强性，所以常常放过消灭敌人的机会。过去地方党政、地方武装同志，也常常埋怨正规军不打仗，这是对正规军过分的苛求。过去正规军一般是小仗打得过多，好仗打得过少。个别部队不积极作战，是应受责备的。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正规军的性能，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地方武装的不信任。在这种观念之下，也必然产生忽视地方武装的倾向。还有一种对正规军的责备是，正规军中某些干部对地方党政不尊重，以及吞并地方武装。这种责备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样也应指出，军区同志、地方工作同志对正规军的帮助也是不够的。

正确的关系是怎样呢？

正规军对军区的责任是：

1. 切实帮助军区建立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要供给军区以好的干部。正规军每到一处，必须帮助训练游击队和协助民兵自卫队的组织与教育，要把这种工作当作是自己的责任，成为经常的制度。在没有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的地方，正规军更要负创立的完全责任。

2. 在作战时，一定要注意到游击队的使用和民兵任务的分配。在使用游击队时，要估计到游击队的性能，使用于适当的方面，交代任务要很清楚，必要时应派得力军政干部去帮助

游击队遂行战斗任务，要用一切方法使游击队能够取得一些小的胜利，从胜利中提高其战斗力。对民兵的指导更要细心与耐烦，莫使它吃亏，莫编散其组织，态度要很和蔼，注意其生活，不可以军队的严格纪律去对待民兵，处处要尊重民众干部的意见，即有不对也应采取说服方式。同时参战时间不可过久，对民兵的一切允诺都要讲信用。打仗的胜利品，要有计划地分给配合作战的游击队和民兵。一切方法为着密切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的关系，使游击队和民兵乐于与正规军亲近，乐于参战，这对于加强正规军的信仰和吸引力，有极大的好处。就是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关系也应如此。

3. 不得强编或吞并游击队，即在必要时也只能经过军区、军分区有计划地抽拨若干补充正规军，反对连根拔的错误。对民兵更不能以强迫或用参战名义等欺骗方法编入正规军。在有民兵组织基础的区域，只能经过军区系统（县为武装科）的统一计划，依靠党政群众团体的努力，用真正的政治动员去动员民兵加入军队，但正规军必须派干部协助动员工作，反对坐待补充的现象。

4. 野战兵团应经常派出慰问团到自己的联系县，进行抗属慰问工作，对自己的联系县的武装工作应负极大的帮助责任。在协助地方武装工作时，一定要依照军区当时的工作计划，不可自作聪明，另来一套。

5. 野战军到任何一处，均须与军区、军分区、县武装科或游击队取得联系，取得其各方面的帮助，如敌情、地形、居民状况、粮食供给等等，并商得一致的工作计划。

军区对野战军的责任是：

1. 负责正规军的兵员补充，在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协助与保证之下，完成每次兵员补充任务，并保证兵员的质量。

2. 随时调查地方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状况，并向政府及时提出建议。

3. 指挥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配合正规军作战。在一般情况下，应以积极的迫近敌人的灵活的游击动作，掩护正规军之休整，随时将所得情报通知野战兵团。

4. 协同政府帮助野战军动员逃亡战士归队，防止地方军政机关收容逃兵。

5. 随时将本区域的状况及武装建设计划通知自己的联系兵团，如军分区对联系旅，县武装科对联系团，以求得野战兵团之协助。

6. 担任野战军的后方勤务，如兵站、医院、供给等，帮助正规军维持纪律，密切与人民的关系。

7. 推动当地党政群众团体组织对正规军的慰问，特别对联系兵团的关系，务求密切。

（二）加强地方武装与广泛发展游击战争。

没有广泛的游击战争，就没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没有坚强的地方武装（地方兵团、游击队），也就没有广泛的游击战争。我们晋冀豫区的地方武装和游击战争都是很薄弱的，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因此必须：

1. 大量发展地方武装，今年上半年内至少要发展一倍以上。所有游击队、地方兵团的组织，都要非常精干，成分要求纯洁。过去某些游击队老弱残病、亲戚朋友等非战斗员很多，骡马一大群，既耗费公款，也不会有战斗力，必须坚决纠正。

2. 大大提高地方兵团、游击队的战斗能力。地方武装要有扭住敌人、不怕疲劳的顽强性，要有坚决消灭少数敌人的信心与战果，要积极地确实地遂行自己的战斗任务，同时要有比野战军还要熟练的游击战术。要反对某些游击队“保安队化”，

不敢接近敌人，不积极活动，做假报告等惧怕敌人的右倾情绪。

3. 加强地方武装的政策教育，特别要懂得敌占区工作的各种政策，因为游击队不仅执行钳制、封锁、疲困、消耗和打击敌人的任务，更主要是执行缩小敌占区、扩大抗战区的政治任务。不懂得正确政策，不但不能完成政治任务，连在敌占区存在都是不可能的。过去某些地方部队到敌占区去胡行乱为，破坏党的政策，乱筹粮款，乱捉人，乱安汉奸帽子，把敌占区看成为“殖民地”，其结果是帮助了敌人的统治。因此，加强地方武装的政治领导，是极端迫切和重要的。每个地方部队中，都要有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民运工作队（组），每次军事行动必须与政治工作连接起来。要努力进行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这是与遂行游击队任务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游击部队的模范的群众纪律，亦极重要。

4. 要建立地方武装的军事、政治、供给等各种制度。虽然不可能要求地方部队同正规军一样的严格，但一般的要求是必须的。首先是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制度，必须切实建立，特别估计到游击部队独立活动的环境，没有坚强的政治制度，是很容易出毛病的。正规军的各种军事制度，不应机械地搬到游击队中去（对地方兵团是完全适用的），但一定的营规、指战员关系、适当的纪律以及人员武装的统计等等，还是非有不可的。至于供给制度，尤须严格，否则容易发生贪污腐化的危险。军区、军分区必须有计划地保障游击队的供给，否则在“独立自主”的美名下，违反政策贪污浪费的现象，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在游击部队中执行各种制度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要求更带群众性，即比正规军的民主成分更要多些，只有当所有游击队员都懂得自己任务和关切本队命运的时候，

游击队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

5. 游击队要发展成为野战军，这是游击队最光荣的前途。把游击队局限于现存的阶段是不对的，党必须采取不断的教育方式，诱导游击部队不断发展，逐渐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反对保守观念，同时在转变游击队成为野战军时，亦不可操之过急，反对一扫而光、连根拔的观念。

6. 游击队应是土生土长的，要与当地群众结成亲密的关系，要有坚决与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的决心，要为人民所信赖。同时游击队还要有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要善于选择和培养这样的干部成为坚持当地斗争的领导者。当然我们不认为一切本地人都是好的，仅仅土生土长的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政治条件，因为没有政治条件的本地干部，是最易产生土匪主义、军阀主义的，是必然与群众脱离而遭失败的。

（三）建立民兵制度与加强自卫队工作。

军区的任务既然是要把劳动力与战斗力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抗日武装斗争，并担负起补充正规军的责任，那没有民兵基础和加强一般自卫队工作，是不可能实现自己任务的。所以民兵和自卫队，是武装工作的基础，是正规军的泉源。

依据“太行军区的组织及其工作纲要”的规定：

1. “一般自卫队（警备）、基于自卫队和青年抗日先锋队等都属于军区不脱离生产者的武装组织”，而以“基干自卫队与青抗先为自卫队骨干”，亦即为民兵之组成部分。

2. “凡年在十六岁以上至五十岁以下之男子，二十岁至四十岁（此次会议改为十六岁至四十五岁）之妇女，均应参加自卫队”。“基干自卫队是动员二十岁至三十五岁之壮年男子以自愿参加组成之”，“青抗先是动员十六岁至二十三岁男子以自愿参加组成之”

3. 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的参战任务（这是参战任务，决不是支差）如次：

(1) 抗日、戒严、铲除汉奸、肃清敌探；

(2) 破路、拆堡、空舍、清野；

(3) 侦送情报；

(4) 救护伤病员（无论任何情况，白天夜晚都应随有随送），运输战斗器材（弹药、战利品等）；

(5) 游击敌人，配合军队作战（游击小组）；

(6) 进行敌伪军以及土匪会门^[13]工作；

(7) 组织兵员补充。

并规定一般自卫队之任务，着重于（1）、（2）、（3）、（4）、（6）诸项，而基于自卫队、青抗先（民兵）则应全部执行之。

此外，对这些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系统干部任免等，该纲领都有明确的规定。

这里还要说到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1. 规定一切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都属于军区管辖，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武装工作是具有其特殊性的，要有军区系统（本身也是党及政府的一部分）的组织机构，去统一计划组织训练、参战、补充等事项，才能发挥其效能。如果把群众武装组织附属于各个群众团体之内，则会发生武装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的毛病，实际上等于取消武装组织，或取消群众组织，而且群众组织也不可能去计划和指挥训练、作战等事项。我们规定军区来统一群众武装组织的管理，绝不是放松了群众团体对武装工作的责任，反之武装工作得不到群众团体的协力，是绝对做不好的。过去青救注意了青抗先的工作是对的，农救、工救、妇救忽视了武装工作是不对的。

群众团体对于武装工作的责任是：动员自己的会员加入自

卫队、基干自卫队和青抗先，教育自己的会员成为参加武装斗争的模范，输送最好的干部到武装部门工作；在扩兵动员时，积极动员会员参军；组织对军队的慰劳；优待抗属等等。同时，为了密切与军区系统的联系，经常注意武装工作，各群众团体应有武装委员的设置，并参加同级的武装委员会。

军区系统的武装工作计划，除某些必需的秘密之外，一般地应通知群众团体，取得其配合与帮助。对于民兵自卫队的干部，一般地应商得群众团体之同意，如青抗先干部的调任应商得青救之同意。军区系统组织之武装委员会应吸收群众团体的武装委员参加，并须有定期的会议。

2. 政府法令上规定一定年龄的男女公民，都有参加一般自卫队之义务。这是为争取抗战胜利所必需的，也是为打下将来民主共和国的军事建设基础所必需的。但这不是说依靠政府和军区的一纸法令就把自卫队工作做好了。要懂得没有充分的政治动员、解释工作，使民众明了参加武装斗争之必要，同时加以党的切实领导，党员的模范作用和群众团体的有力配合，那一切都是空洞的。过去用造名册的官僚主义的方式，其结果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至于基干自卫队、青抗先，既是由自愿参加组成的，更非有艰苦的一点一滴的工作，不能打下民兵制度的基础。

3. 一切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都是带半武装性的。我们的工作方式以至组织形式，都必须估计这个特点，就是要带更多的民主性。如果照军队一样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必致产生与群众脱离的现象，过去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点。所以各级自卫队、基干自卫队和青抗先的军事政治干部，均应做到由队员大会、代表大会选举。首先要从区村做起，县以上的干部，在目前过渡期间还不能不采取委任的形式，但一到基础相

当打定时，就应选举。但同时因为这是一种武装组织，必须维持其上下的指挥系统，故各级干部在选出之后，必须经过上级的加委，一切参战活动，也必须以命令和说服相配合去完成，单纯的命令方式是不会启发群众积极性的。

各级民兵自卫队干部的加委，太行军区已经规定“县级干部由办事处（专署）军分区报告于联合办事处^[14]及军区任免之。区村干部由县府任免之”。有同志主张这些干部由群众团体选任，如青抗先的干部由青救选任，这是不妥当的，因为群众团体是没有而且也不应该有行政权的。

4. 各级政府对不脱离生产的武装干部有任免权，有武装使用权，但一般应经过自己的武装部门，即军区、军分区、县武装科、区武装助理员去执行。政府应定期讨论武装工作，接受武装部门的报告，并给以指示。

5. 民兵不应有专门的经济开支，不能吃公粮，否则会浪费公款，增加人民负担。其脱离生产的干部和工作机关，应列入政府预算开支（军分区以上则由军事系统开支）。民兵参战在三天以内自带给养，由县政府统一筹发，第四天以上则由军队供给之。

（四）把一切地方武装置于地方党的政治领导与监督之下。

保证党在武装中的绝对领导是极其重要的。地方武装具有更多的独立性，经常分散活动，故必须放在地方党的指导与监督之下，因地方党对于这些分散活动的武装的一切情形，能够最灵敏地收到反映。这与独立军事系统不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地方党对于地方武装，区党委对于军区，地委对于军分区，县委对于独立营（大队），分区委对于小游击队，支部对于游击小组，必须尽到下列的责任

1. 政治上负责保证执行上级军事的政治的命令，保障执行党的政策和对群众的亲密关系。

2. 定期接受地方武装军政首长的正式报告，每月至少讨论一次地方武装的工作，及时派人检查其党政工作。

3. 有权在不违反上级军事机关的命令之下，决定同级地方武装的军事行动。

4. 注意研究上级军事政治机关的命令、训令，才能确当地指导同级地方武装之行动与工作，且对锻炼各级党部学会掌握武装，学会领导战争的艺术，有极大的好处。

5. 输送最好的干部和党员到武装中工作。

6. 关心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补充、供给工作，及时加以指导和帮助。

所有军区系统的地方武装，确定在军事系统上、政治工作系统上，隶属于军区、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但必须接受同级地方党的政治领导、批评与检查。至少一个月向同级党作一次正式的报告。在不违反上级军政命令之下，应该接受同级地方党的独立军事任务。同时要负责掩护地方党之安全。

为了保障地方党对地方武装的政治领导，军区、军分区、地方兵团、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及党的条件合格的军事首长应参加同级党的委员会为委员。

为了加强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的领导，必须把这一重要工作放在各级党的日常议事日程之上。各级党部的军事部、科和军事委员，应当健全起来，应指定最得力的干部充任。

此外还要说到政府、群众团体与地方武装的关系。前面已经说了对不脱离生产武装的关系，这里只谈对脱离生产武装的关系。

1. 地方武装（野战军一样）的政治任务，是扩大抗战区，

缩小敌占区，保护抗日政府、抗日人民，打击汉奸伪组织。因此要绝对执行抗日民主政权的各种政策，要与政府、群众团体协同开展敌占区工作。

2. 地方武装任何时候都要尊重抗日政府和群众团体，并成为模范。接受政府、群众团体的意见和批评，与政府、群众团体取得密切的联系，邀请行政首长和群众团体代表到部队中作报告，由军人大会选派代表参加群众团体会议、群众大会。掩护政府机关、群众团体之安全。

3. 政府、群众团体要关心地方武装（对野战军一样）的生活、兵员补充、群众纪律和执行政策的情形等等。爱护人民的子弟兵，如同爱护自己的手足一样。

五

最后，为了军区建设的胜利，必须还有下列的保障：

（一）要有坚强的干部。正规军、地方党、政府和群众团体都要舍得干部，把最好的干部源源不绝地派到武装部门去。

（二）要有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党要加强党员军事化的教育与工作，一切党校训练班都应有军事课程，使每个党员都懂得掌握武装之重要性。党员无论在参军、参战、参加民兵等工作上，都应起到先锋的作用。

（三）青年是天生的武装柱石，要把青年参加武装工作的积极性大大发扬起来，这不应只是放在青年同志身上，而应放在党的整个领导上，放在军区的整个计划上。

（四）要有党政军民一致的努力，不是互相埋怨，互相观望，而是互相配合，协同一致。

（五）要反对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我们有了正确的武装

政策，有了军区的工作计划，这仅仅表示了我們要求胜利的愿望。武装建设任务的完成，要依靠我們忠实于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计划，要经过不断的努力与切实的检查。不检查、不执行或缺乏完成计划信心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只有遭致失败的结果。

毛泽东讲：没有武装就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中国革命想前进一步都是不行的。“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15]

今天的局势，更加迫切地要求我們加强武装建设，特别是加强我們最薄弱的军区工作。党政军民全体同志，大家努力起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太行军区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刊载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抗日战场》第二十期。

[2] 茂林事变，即皖南事变。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一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3]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4] 指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内容如下：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一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一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一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

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5] 张学良，东北军爱国将领。一九三五年十月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副司令，一九三六年与中国共产党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同年十二月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长期关押。杨虎城，西北军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次年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一九四九年在重庆被杀害。

[6] 马寅初，一九三八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曾在立法院提出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议案，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因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战时经济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被蒋介石逮捕。

[7]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8] 总理遗嘱，指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病危时的遗嘱。全文如下：“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9] 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

[10] 青救，指青年救国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抗日根据地团结各界青年进行抗日活动的群众组织。

[11] 百团大战，指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了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众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12] 工救、农救、妇救，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抗日根据地组织的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13] 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14] 联合办事处，指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办，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成立。当时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并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联办撤销。

[15] 见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 423 页）。

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 临时参议会的提议^[1]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

本人受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之委托，向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2]第二次行政会议，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其理由如下：

第一，华北敌后抗战已进入新的阶段。新阶段之特点表现为：一方面斗争更加艰苦，一方面胜利更加接近。敝党自抗战以来，始终与华北人民及各党各派各阶层先进分子，一致主张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坚持华北抗战，努力于根据地之建设与巩固，使华北能于今日成为长期消耗、削弱、疲惫、钳制敌人，配合全国作战之堡垒，他日成为反攻、最后驱逐日寇之前进阵地。并在抗日根据地中，真正实行抗战建国纲领^[3]和革命的三民主义^[4]，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打下坚实之基础，以示范于全国。此种努力，数年如一日，且已获得很大成效，今后尤当适应新的斗争环境，采取更有效之步骤与工作，以期顺利渡过难关，克服困难，而使既定方针日底于成。

第二，联办所辖区域，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及冀鲁豫四区，由此四区组成一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之具有战略性质的抗日根据地。而本根据地适处华北各战略根据地之中心，在连接各根据地及与大后方联系上具有特殊之意义。因此加强本根据地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设施很为重要。

第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其中心环节，厥为民主政治之树立与发挥，以及三三制^[5]的抗日民主政权之认真建设。过去三年以来，本区因为在敌寇伪军进攻之下，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需时，反共顽固派对民主政治的多方阻挠和民意机关尚未全部成立，以致三三制民主政治之建设，甚嫌不够。及联办成立，其施政方针、组织机构，一本统一战线原则，处处照顾各阶层利益，尽力邀请各党各派各界先进参加领导，半年以来，政绩卓著，为全区人民所拥戴。然真正由人民选举之有权力的民意机关，尚未成立，虽事实尚难办到，究属缺陷。

第四，联办半年努力，已将全区事实上统一起来，而为晋冀豫边区奠定统一行政机构、统一政令之基础，建立统一的有权力的晋冀豫边区参议会实为刻不容缓。

第五，晋冀豫边区参议会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议员组成，不应丝毫草率，致伤民主政治之真实意义。此项选举工作非短期准备所能完成，而统一全区的民意机关之树立，又为目前敌后抗战所必需，故建议由联办召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以加强全区行政机构，更加团结全区人民及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各抗日党派于一堂，以利敌后抗战，及本根据地之进一步巩固。

根据上述理由，迅速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实属必要。并建议于本年抗战第四周年纪念日即七月七日，召集第一次会议。

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之产生，以顾及事实之可能与真能代表人民意见为原则，主张采用下列推选办法：

1. 已成立参议会的冀南，由主任公署参议会推选三人，各县参议会每县推选一人，为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
2. 冀鲁豫区、太行区、太岳区每县推选一人，为边区临时参议会议

员，由各县县长负责召集各党各派各界临时代表会议推选之。各县临时代表会议由该县宪政促进会^[6]、牺盟^[7]、工农青妇文商各救国团体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各推代表五人至十人组成之。各党各派各抗日团体，均可提出边区临时参议会候选议员一人，冀南尚未成立参议会之县，亦适用此方法。3. 联办行政会议现任委员，得为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4. 晋冀豫区抗日军队，得推选二人为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5. 抗大^[8]推选一人，其他中等以上学校联合推选两人，计太行太岳区一人，冀南冀鲁豫区一人，为临时参议会议员。6. 各商业联合会推选三人，计冀南一人，冀鲁豫边区一人，太行太岳区一人，为临时参议会议员。7. 公正士绅名流学者，请联办聘请若干人，为临时参议会议员。8. 所有由主署参议会、县参议会或县临时代表会议推选之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均应向全区全县人民公布。9. 主署参议会、县参议会或县临时代表会议，均有向边区临时参议会提出各项提案之权，并不限制各议员在边区临时参议会上由个人提出议案及发表个人意见之权。10. 各区各县推选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之工作，应于五月十五日前完成。

最后，中共北方局希望边区临时参议会之组织成分，能切合三三制之原则，能真正代表各党各派各阶层之意见。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原则，为本党所提出，为本党全体党员所忠实奉行的主张，即在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中，无论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的组织成分，都主张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其他党派和无党无派的，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人士，占三分之二，即是说，除了汉奸、亲日派和反共反民主的人以外，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士，都有参加抗日民主政权之权利。我们认为，三三制政权形式，不仅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最好形式，是

符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且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最好形式。我们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都只能顾及一党之私，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在今天民族危机异常严重的关头，必须集中全民族一切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必须有代表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三三制政权，才能实现这样伟大的任务。并且我们认为，在战胜日寇之后，我们还必须团结全民族各阶级各党派的力量，建设中国成为真正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以那时依然应实行三三制政权，以完成建国任务。因此，我们主张在华北各地抗日民主政权中厉行三三制，如果某些地区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的比例，不符合三三制的标准，则应加以改正，并望晋冀豫边区临时议会中，能符合三三制标准，此不仅为敝党与全区人民所期望，亦为敝党党员及全区人民所愿努力实现者也。谨此提议，尚希裁决。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

[2] 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办，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成立。当时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并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联办撤销。

[3]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后来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于人民的某些让步没有兑现。

[4]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

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5〕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6〕宪政促进会，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开展宪政运动成立的抗日民主团体。

〔7〕牺盟，即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它名义上是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一个地方性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省的抗日战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阎锡山在牺盟会建立初期表示支持。后来阎锡山追随蒋介石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宣布解散牺盟会，许多牺盟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杀害。原牺盟会中坚持抗日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8〕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初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延安。先后共办八期，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二所分校，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宣告结束

加强平汉线两侧敌伪军的 政治瓦解工作^[1]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太岳，冀南，太行，一、三、四、五、十旅：

一、最近我们决定对平汉线^[2]工作的具体布置特简告你们，参考布置白晋^[3]、同蒲工作：

(一) 接敌区及敌占区加强武装斗争，以区为单位成立游击队。每区至少三十人至六十人以上，由区长兼任游击队长。成分要纯洁，不准有一个兵痞、流氓、土匪、逃兵混入，要非常精干，要有本地与群众有联系，政治坚定，刻苦勇敢的干部率领。这些游击队的名义不必统一，以群众所愿意的名称出现，不冠八路军决死队^[4]、游击队亦可，主要是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这些游击队穿便衣，给带枪证，供给要统一于军区，不准到敌占区筹粮款、乱捉人、杀人。这些游击队要坚持在当地活动，着重接敌据点的封锁、侦察、破袭。

(二) 加强沿铁路线工作，以县为单位，指定专门同志管理这个工作。目前每县都要找出三个以上同志，利用社会关系，深入铁路线，进行长期埋伏工作与秘密情报工作。一切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都要切实研究，按照北方局指示执行。

(三) 对铁路两侧之敌伪据点，应每个据点指定一个专门同志管理，进行长期瓦解敌伪，尤其是伪军及争取群众的工作。这些线索不发生横的关系，由县委指定常委一人专门管

理，严防泄密破坏。

（四）沿平汉线，按工作需要设立几个大据点，并指定专门同志主持，配备足够干部进行较大的争取瓦解工作，由区党委或军政委直接管理之。

（五）敌占区、接敌区政策，北方局已有专门指示，目前主要是打开门路多方面去做。争取青红帮^[5]工作是打开土匪、会门^[6]工作的一种门路。要舍得干部，要用必须的经费，请你们讨论一次。

二、根据冀南经验，宣传日寇拉中国人到太平洋打大仗事，对瓦解伪军，提高民族意识，加强对敌斗争起了很大作用。目前应特别抓住下列事实，在敌占区、在根据地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

（一）敌强拉壮丁，训练青年，集中伪军，目的是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最近日本允德国在华招兵五十万开到欧洲打大仗、做苦工。日本拉中国人开到太平洋同英美打大仗，打死了抛在海洋里喂鱼虾，永世不得回家。

（二）东北同胞亡国的惨状，新华报^[7]已登几个材料，都是新由东北回来人讲的。

（三）日本在占领区强占中国人财产，如霸占工厂，邢台敌圈地，随便没收等事实及其毒化、奴化政策。

（四）敌人善于挑拨离间，以华制华，如首先制造土匪大肆抢掠，然后利用防匪组织会门，以达其伪化目的。

（五）日本泥脚陷入中国，又要南进太平洋打大仗。只要中国抗战下去，日本死亡是肯定了。

类似以上要点，抓住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利用各种形式不断地反复宣传。把一个地方的例子迅速传播到各地去，特别送到报馆去，同时态度要非常诚恳，才会令人相信。对伪军，

要站在关切他们的利益上，收效尤大。

刘 邓
三十一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给太岳、冀南、太行抗日根据地及所属有关部队的指示。

[2] 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的一段。

[3] 白晋，指白晋铁路，是日本侵略军为分割太行和太岳抗日根据地而修筑的自白圭到晋城的铁路，日军称为东潞线。实际上在根据地军民不断破袭下，只铺轨到夏店镇。

[4] 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属第二战区建制的一支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

[5] 青红帮，指青帮与红帮两个中国民间秘密结社。青帮源于明朝罗祖教支流，成员为江浙等地的无业游民和浪荡江湖者。红帮最早为明朝天地会代称，其支派有哥老会、小刀会、红钱会等，由福建、台湾发展至两广及长江流域。民国成立后，有些组织渐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沦为以流氓匪特为主体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青红帮部分成员沦为汉奸。

[6] 会门，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7] 新华报，指《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创刊。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

时局和几个政策问题^[1]

(一九四一年三月)

茂林事变后的局势

(一) 茂林事变^[2]在国内在国际都起了很大的震动。

在国内，各党派的表现是： 1.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亲日派，以何应钦^[3]为代表，积极策动内战，主张痛快干一下，以便实现其经过内战达到投降，出现“贝当^[4]政府”的全部阴谋。 2.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英美派，历来反共是坚决的，亲日派投其所好，策动其爆发了茂林反动事变，并发布了一月十七日反革命命令^[5]，一月二十七日的蒋介石讲话^[6]，大有气势汹汹，非干不可之势。但在其主人（英美）忠告之下，和全国人民反对之下，乃又企图将巨大的全国性的茂林事变，尽量解释为地方事件。但反共政策仍在继续，变本加厉地继续其反共政治动员，通令称我党为“奸党”，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办事处人员，打击和肃清抗日进步分子等等。而其军事反共计划亦未停止，仍在步步实施着。这般顽固家伙，虽在主人忠告、万人责骂之下，略呈窘态，不能不收敛一下，然其反共之志未尝稍懈，企图对我各个击破，这是很清楚的。 3. 中间派则一般对我同情，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措施。有痛骂何应钦阴谋者，有表示愤慨忧虑者，有电蒋^[7]责斥何应钦者。而华侨的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显。 4. 各小党派均甚愤激，有主张坚决反

对者，有主张发起民主联合运动与中共一块抵抗者。5. 各杂牌军表示恐慌，他们认为八路军是大杂牌，他们是小杂牌，而且清楚了解他们也在被排斥之列，国民党一贯政策是用杂牌打杂牌，并把他们放在反共的最前线。6. 至于全国人民，无疑是对我党我军同情，反对茂林反动事变，反对反共的。

在国际方面：1. 苏联坚决反对反革命的茂林事变。2. 英美赞成限共，但不主张反共大内战。因为中国内战有利于日本，不利于英美，英美今天需要的是以中国牵制日本。居里^[8]来华，港督代表赴重庆，美大使调任，英援华委员会主张中国团结抗战，都可看出英美态度。3. 日本当然兴高采烈。事变有利于中国分裂，日本可利用此机会加强诱降，以便达成其迅速解决中国事件，实行南进之迷梦。但日寇是要打击中国的，反对英美倾向的，也不赞成国民党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挤到华北的方针，因为这对日寇确实掌握华北的方针是不利的。所以日蒋矛盾还是严重的。

所以，国际国内的条件，都是有利于中国团结抗战，有利于打击亲日投降派，有利于打击反共派进攻的。

（二）事变后我党的主张。

1. 事变后，我党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十二条件^[9]，接着又向国民参政会^[10]提出了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11]。这些条件是全国人民、进步人士及广大中间势力所拥护的正当要求，表示了我党光明磊落仁至义尽的立场，表示了我们愿意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表示了我们始终主张团结抗战的真诚。所谓组织新中央政府的主张是错误的。而且事实上也只有国民党实行了十二条，中国的团结抗战才有保障，所以必须坚持十二条。

2. 事变后，特别在一月十七日的反革命命令公布后，我党公开地明白地发表了独立的政治立场，并采取由中共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挺身而出，保护坚决抗日的新四军的有力步骤。这在全国人士面前表示了我党有办法，不是吓得退的，也不是打得坍的。我们向来主张团结，不愿分裂，但如投降反共派制造分裂时，我们并不怕分裂，而且有责任有能力出来收拾局面，继续抗战。这种态度，这种气魄，对团结大多数，团结中间势力，均极重要。

3. 同时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加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以应付可能到来的寇奸夹击的局面。

（三）时局发展的趋势。

1. 中日矛盾是基本的，日蒋矛盾也仍是目前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无论其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中日战争，它的条件是不会降低的，即便在条文上似乎不很苛刻，而在实质上总是灭亡中国，所以中日矛盾始终是基本的。同时，日本诱降与挑动中国内战的阴谋也是不会放松的。最近畑俊六代西尾^[12]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时，日本即声明将以政治方法解决中日问题，甚至放出汪政权移华北的空气，以引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派上钩。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派今天基本上仍是倾向英美的。英美为了自己帝国主义目的，绝不是为中国的利益，要求切实掌握中国当权派，利用中国以制日，而中国当权派也对英美负有牵制日本之义务，所以还要抗日。不管其出发点如何，抗日的积极性如何，总表现目前日蒋矛盾是严重的，这对于抗战还是比较有利的。固然对日投降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在今天说来，这不是主要的。中国人民坚决抗日，这也逼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不能不利用抗日，即在反共问题上，也还企图以抗日来作幌子。

2.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是不会停止的，且在准备上，

在行动上，在宣传与组织上，还会更加积极。最近事实（进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布置没有停止，且在继续逐步实施；继续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庞炳勋^[13]受命积极准备东进向我军进攻；大批特务派入八路军新四军区域进行破坏；全国到处摧残进步势力等等）都可证明这点。因为日寇的挑拨，亲日派的活动，还要继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英美不赞成目前爆发大内战，但也绝不赞成中国实现独立自由和解放，所以对限共反共还是赞助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成见是很深的；全国人民和进步势力、中间势力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停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动摇的程度。我党提出之十二条，如果没有更大的国际压力与全国各种势力的压迫，是不会为国民党当权派所接受的。

3. 因此，在目前国际国内局势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反共大内战的企图，虽受到相当的限制，但各个区域的反共行动还在发展，而且仍有由各个区域反共行动发展到全局破裂的危险。时局的严重性并未减轻。

（四）我党目前的策略。

1. 掌握住中日基本矛盾，充分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在国内表现为日蒋矛盾），坚持抗战下去，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2. 坚持我党提出的十二条件，因为只有这样的正当解决，才能保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局面。

3. 大大发展统一战线，一切为着争取大多数，团结大多数来克服内战与投降的危险。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面，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三民主义^[14]，坚持各党各派（国民党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

4. 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准备自己，以应付可

能到来的寇奸夹击的局面。任何松懈都是不容许的。

（五）坚持华北抗战是我党的确定方针。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不仅今天要坚持，即使全局破裂也必须坚持，并使华北成为应付寇奸夹击局面的战略基点。

前一时期，我们曾提出南援问题，这与坚持华北的方针是不矛盾的。要知道只有坚持华北才于全局有利，同样只有从全局着眼，才更有利于华北的坚持。认为南援即等于放松华北的观点，是错误的。今天不是强调南援，而应强调坚持华北抗战。

坚持华北抗战不是口号，而是实际的工作。我们不但要从宣传教育上动员，使党政军民认识华北斗争的长期性与艰苦性，而且要懂得如何以高度的胜利信心，充分的组织工作，去深入各方面的工作，从不断努力中发展足够力量，以便顺利地对敌斗争，坚持华北抗战，并能应付任何困难的以至寇奸夹击的局面。

决定政策的原则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15]茂林事变把国内局势推到非常紧张的程度。应付严重局面的关键，在于力量，尤在于正确的政策。有了正确政策，才能发展力量，才能争取大多数，以争取时局好转和应付大的突然事变。

必须认识，今天的政策与过去内战时有原则的区别。苏维埃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革命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了许多过左政策，如：以五次“围剿”与反五次“围剿”^[16]为两条道路的决战；消灭

资产阶级的过左的劳动政策；消灭富农（分坏地），肉体消灭地主（不分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政权中共产党员的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夺取大城市与否认游击战争；白区中的盲动政策；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

这种政策适与大革命^[17]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18]相反，而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其结果都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损失。这种政策不仅今天不能适用，就是过去也是错误的。

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我们今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与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其具体的原则是：

（一）一切抗日民众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联合），又须独立（斗争）。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基本的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争取多数，反对少数；是有理、有利、有节；是硬，不硬到破裂统一战线，软，不软到丧失自己立场。

（五）在敌占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政策，是一方面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政策；是在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上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政策。

（六）在针对国内阶级关系规定我们的政策时，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反共势力，与打击亲日势

力。

（七）对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方面是联合政策，对其坚决反共方面是孤立政策。顽固派在抗日方面又有两面性，即对其坚决方面是联合政策，对其动摇方面是斗争与孤立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亦有两面性，即对其尚不愿从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方面是联合政策，对其向人民高压及军事进攻方面是斗争与孤立政策。要把这种两面派分子与汉奸亲日派区别开来。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亦有两面分子，我亦应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亲日方面是孤立政策，对其动摇方面是拉拢与争取政策。要将两面分子与坚决的汉奸分别开来。

（九）既须对于反对抗战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主张抗战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战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两面性较少（不是没有）的民族资产阶级及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中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种不同政策，都从这个阶级关系的根本区别而来。

（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但须区别：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英美与德意；德意与日本；“东方慕尼黑”^[19]的英美与赞助抗日的英美等等。同时要区别社会主义的苏联与帝国主义，英美人民与英美帝国主义等等。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外交政策。国民党认为敌人只有一个，其他都是朋友，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政策。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則则是，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外交政策的运用则是，在坚持独立战争与自力更生原則下，尽可能利用外援，而不是放弃独立战争、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依靠任何帝国主义。这是我们与国民党不同的。

党中央在提出这些明确的原则之后，特别指示我们，克服干部中对于策略问题上的顽固的片面观点，必须从历史上及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与发展上，作全面的统一的贯通的了解，才能克服左右的摇摆。^[20]

几个具体政策

（一）武装政策。

1. 巩固与加强正规军。今天主要是充实正规军，提高正规军的战斗力与顽强性。这始终是冀南党（军队党、地方党）的严重任务。不能因为加强地方武装而放松了正规军（野战军）的补充。为了加强正规军，对正规军的要求是：大大提高军事、文化、政治水准，应抓住机会（一切可能争取的空隙）整训，大大发挥顽强性；野战军的使用，不可过于分散、过于频繁，平时可分小部带领地方武装游击，特别在地方武装未培养起来时，必须分散一部游击活动，主要求得于破击中，克复必需的据点中，和反“扫荡”中消灭敌人；正规军应善于诱导培养地方武装，要舍得抽调干部到地方武装；正规军要做到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不仅纪律好，并且真正关心民众疾苦，到一处做一处地方工作，要成为遵守政策、执行政策的模范。

2. 发展广泛的群众的游击战争，这是冀南武装建设的中心。第一需要广大的地方武装即地方军兵团、游击队；第二需要广大的民兵基础，包括游击小组；第三需要普遍的自卫队组织与活动。

对地方军兵团、游击队的要求是：要有足够的数量，地方武装要培养坚强的战斗力，要有比正规军还要灵活的游击战术，要能在任何困难条件下撑持当地的艰苦斗争局面，平时要

积极地活动；地方武装的成分要纯洁，组织要精干，在组织要求上不应如正规军之严，但一定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营规、统计等必须建立；地方武装必须以当地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为骨干去组织，正规军派去的干部应起帮助培养当地干部的作用，当地干部的选择亦必以政治条件为主；地方武装不应再采取过渡到正规军的方式，但必须在地方武装中有计划地宣传八路军、野战军，并依靠原有基础发展成为正规兵团。反对保守观念，即在不能不抽调一部补充正规军时，也只能在不损害当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原则下抽调三分之一以下（以不采用此方式为原则）。

地方武装要与人民结成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这决定于：本地有威信的地方的率领；成分的纯洁；纪律的优良；与社会各阶层建立密切联系；执行政策，不筹粮款，不乱没收等；积极作战，积极对敌，积极保护人民利益；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地方武装的领导关系，确定为军区的统一指挥，军区政治机关的统一领导，但必须置于当地地方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另有指示具体规定）。

对民兵的要求是：民兵以模范班（基干自卫队）、青抗先^[21]合组，成为发展到义务兵役制的基础；民兵必须以自愿方式组成，必须在武装斗争中建立起来，发展起来，不能丝毫采取强制抽签，抄名册等方式，不要重复过去错误，不能采用物质引诱（吃公粮）等欺骗方式组成；不应把民兵缩小到狭小基础上，在冀南必须完成民兵计划，群众组织应输送自己会员到民兵中去；要建立经常的教育训练制度；要在建立基础之后，能实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动员加入军队（目前不应以此列入民兵任务中）。

对一般自卫队的要求是：这是普遍的公民义务，但不能简

单以造名册方式组成，必须经过充分政治动员；过去仅有形式的组织应加以整理，并建立其工作。无论民兵和一般自卫队，必须实行充分的民主，任何官办方式都要失败。民主表现在：队员选举、罢免干部；队员讨论本队问题，干部尊重队员意见，使队员关心本队命运。如此才能发挥队员的积极性。

3. 确实建立军区工作。建立独立的军区系统。军区系统干部必须以本地干部为主，但野战军必须供给必需的干部；照规定确定地方党与军区系统的正确关系；军区必须以同样的注意力去指导地方军兵团、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军区必须有强大的巡视团，加强对下级的检查与帮助。

4. 地方武装、民兵武器的来源。从敌人方面缴获；军区有计划地收买；在群众中动员（不能丝毫强迫）；土炮、地雷及各种民间武器的大量使用。依靠上级发枪是不可能的，上级只能在可能范围内适当调剂。

5. 武装干部问题。应尽可能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及无党无派的军官参加我军，给以特殊优待，以增强我军的军事建设。这在基干的正规军特别重要。

我军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制度现在应改变。自然不应在我军实行三三制^[22]，但只要军队领导权在我党手里（这是不能丝毫动摇的），便不怕大量吸收同情分子（不是破坏分子），这是没有危险的。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扩张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在发展地方武装问题上，不惧怕由同情分子、进步分子组织军队，并应帮助之。地方干部在地方武装中有决定的意义。

6. 发展交朋友工作，利用机会建立外围军（另有建立外围军的专门指示）

7. 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

发展交朋友工作。

（二）接敌区和敌占区政策（北方局二月二十五日已有专门指示^[23]）。

1. 决定接敌区和敌占区政策的原则。

估计到敌人在接敌区和敌占区（特别敌占区）的压迫掠夺政策，特别在所谓新体制之下，亡国奴的命运直接威胁着人民，故统一战线有着更广泛的基础，认为地主阶级是敌人的基础是错误的，我之政策应带更大的广泛性。估计到敌人的欺骗、利诱、造谣、武力压迫等作用，我之政策应带非常的谨慎性。政策错误反可帮助敌人，过去许多地方都产生了这样的恶果。

敌占区，特别估计到我一时不能收复的地区，必须采取长期的埋伏政策、隐蔽政策与组织上的精干政策。接敌区应采取敏捷灵活的组织形式与政策运用，在敌人据点附近不能不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把基本区的具体政策和一切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机械地搬到敌占区或接敌区，只有自取失败。武装斗争是中心环节，无论敌占区、接敌区都要掌握这一中心环节。争取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争取会门^[24]、土匪、青红帮^[25]成为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的重要环节。反对惧怕到敌占区接敌区工作、步步退缩的右倾观点，认识那里具有开展工作的充分条件。反对粗枝大叶、公式主义，认识那里是细密的组织工作，是长期的艰苦工作。

2. 广泛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中国人，保护一切中国人。

在敌占区强调阶级矛盾，发展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只有在阶级团结的精神下，才能开展那里的工作。一切政策运用都必须依此原则。因此减租减息^[26]、雇工增资^[27]、合理负担^[28]等

法令不能机械搬到敌占区去用，只有在地主雇主愿意和双方同意的条件下，才能部分实行。

在接敌区也不能把基本区的政策机械地搬去，应估计不同村庄，运用不同政策。我有群众基础区，在群众拥护抗日政权条件下，纳缴负担（公粮、田赋、合理负担等），但亦应估计到那里对敌还可能有负担，故应教育群众应付敌人，减少对敌负担，我则减其负担。我无基础区，则应不强迫其负担，而集中力量指导群众减轻对敌负担，做到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区域。

禁止到敌占区、接敌区去乱捉人、罚款、没收、乱杀汉奸。一切要放在对付敌人，打击捕捉少数死心塌地的为群众痛恨的大汉奸，不准暗杀，必须经过群众公审处置。共产党员要善于找出与帮助当地与群众有联系、有威望的人士，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只要是抗日的，采用各种形式去团结群众，对敌斗争，并须在敌占区善于利用已有的合法组织，经过长期工作，逐渐增加其抗日内容，如会门、联庄^[29]等。

对敌斗争（敌占区更多是合法的，但亦有非法的，如武装斗争；接敌区则是合法与非法并用）以不致使群众受到大的损失为原则。利用一切生动例子，如邢台敌没收土地、抓青年当兵等，扩大宣传，提高抗日情绪。

3. 对伪军伪组织。

确定认识其中死心塌地的汉奸是极少数，大部是两面派。我必须利用这一特点，加强争取伪军伪组织工作。利用一切线索，如朋友家属等关系，打通伪军伪组织的关系，这是一个经常的组织工作，要有计划地训练与派遣同志打入，做长期的埋伏工作。对伪军伪组织要求不可过高，第一步达到建立关系，交朋友，送情报，然后达到进一步的关系，如争取伪军反正等。争取伪军不可急求反正，要选择于我更有利的时机才反

正，但暴露时应坚决反正。要切实保守秘密，不准记入日记本，不准知道的人太多，只能一二人知道，不准写书面报告等。要建立专门组织，指定某人专门负责某个线索，但要由指导机关统一进行。

4. 对土匪。

对敌占区土匪，我不可能消灭，树敌是愚蠢的。反之，我应利用土匪实现下列作用：抢日本财物，使它发生特种游击队的作用，保护我之交通，给以若干便利；经过艰苦工作，改编之为抗日游击队（外围）。如敌占区土匪是敌人组织的，我则一面不放松对其争取瓦解，一面则可在防匪口号下组织民众（加上抗日内容）。对这样的土匪，也只有在极有把握条件下，才可决心一鼓歼灭之（这是消灭汉奸武装）。

对接敌区土匪，如可能消灭时，则一鼓消灭之。利用防匪，组织民众防匪抗日武装斗争，使民众懂得土匪是日寇组织起来的。同时不放松打入土匪进行瓦解争取的工作。轻易决定打土匪，是弄巧反拙。用抗日政府公开接交土匪，也会失掉民众信仰。

5. 对会门。

敌人拼命组织与引诱、挑动会门以对我，因此，我应加强争取瓦解会门的工作，这在敌占区、接敌区都很重要。对会门，我们是采取争取与瓦解的方针，但须估计各种会门有其不同的背景和内容，我之策略运用亦应不同。粗率急躁反可帮助敌人，过去已有不少教训。

对敌占区会门，不应采取强迫取消其名义办法，而应利用原有的会门组织形式，打入进去进行长期工作，逐渐增加其民族意识与抗日内容，一直发展转变成为抗日群众的合法组织形式。对接敌区会门，应首先采取有效步骤，停止其蔓延，如加

强会门附近各村工作，政府军队布告禁止组织会门，宣布组织会门为敌人的阴谋等。已经组织起的会门，如距敌据点很近，则争取其变成实际的抗日群众组织。如不能做到这点，则采取对敌占区会门策略，进行长期争取瓦解工作。对反对我、通敌有据之会门，一面打入，长期争取瓦解，一面抓住良好机会打击消灭之（不可事先宣布），打也是为的争取。打时以不杀伤群众为原则。无论哪种会门，都要切实注意，争取其群众。

6. 组织问题。

党的组织。在敌占区应是隐蔽精干政策，重质不重量。组织是绝对秘密的，采用过去白区党的组织形式。在接敌区则应严格分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确定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党的小组不可有横的关系，由支委会分工领导。做公开工作的同志，可设一小组，不与其他各组织发生关系。支部书记、副书记以一人领导公开小组，一人领导秘密小组。一切新发展的党员，都应该是秘密的，不与原有党员混合编小组。一切开会接头方式，都要变更。如遇情况严重，存在困难时，公开同志应暂时退出，保存干部和党员，不可蛮干。

群众组织。敌占区应利用合法组织去团聚与组织群众，谨慎地组织群众，但不放松采取类似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去团结抗日进步的群众，即这样的组织亦以灰色名义为好。接敌区应按工作基础和距敌远近来决定组织形式，如基础好的村庄，则可保存原有群众组织，必要时亦可以灰色名义迷惑敌人；基础不好或无基础的村庄，则取灰色形式组织群众。

政权组织。敌占区主要是争取伪政权，打入伪政权作长期埋伏，应付敌人，保护抗日人民，进行可能的抗日工作，而不是成立抗日政府的问题。接敌区则应争取保存抗日政府的组织和组织，但应容许运用革命两面派的政策，即实际是抗日政

府，但可另设村长应付敌人。党应有专门同志管理敌占区、接敌区工作。

7. 干部问题。

党应选择适当干部去做各种不同的工作，并且必须加以训练，否则不起作用。要舍得本钱，不可在狭小范围去找干部，数量要多，不同干部给以不同任务。要善于运用非党进步分子、同情分子去做这些工作，不可束缚于党员的范围。

8.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要有正当的联系，但不能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起来，要严格分开。不能把秘密线索交给军队或其他同志。

(三) 财经政策。

要保证实现北方局决定的一九四一年经济建设计划，要保证完成一九四一年的财政计划。这里只提到几个小意见：

1. 合理负担。坚决做到百分之八十负担户的规定，累进率要重新研究。

2. 税收贸易。反对乱没收，过去没收的错误是自杀政策。严格纠正合作社的贸易统治政策。

3. 建立严格的财政制度。冀南要结束旧账，切实建立金库，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打埋伏，要建立严格的财政纪律。

4. 积极发展工农商业与商品流通，争取逃亡地主资本家回来，吸引外来资本家到根据地开办实业。应奖励私营企业，国营企业只能当作民族企业之一部分，避免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

5. 关税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与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保护冀钞^[30]是一个严重的斗争，是党政军民的责任。最近敌人拼命破坏，我应加强保护冀钞的斗争：(1) 政治上强调坚持华北抗战；(2) 加强对敌斗争；(3)

繁荣市场；(4) 打击伪钞；(5) 正确执行对法币^[31]的法令。

6. 财经是认真精细的工作，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口号或计划。

7. 冀南供给太行山是严重的政治责任。冀南同志对这个责任应有明确的认识，过去是了解不够的。

(四) 三三制与民主政策。

1. 三三制不仅在形式上做到，更重要的在其内容。现在冀南党员包办政权的现象，仍未停止，这是一个艰苦的教育与斗争过程。所谓内容，主要是民主问题。没有民主，即使党员少于三分之一，也是空的。因此，要切忌党员包办，党员更无杀人捕人权。

2. 行政机关、民意机关，必须允许国民党员参加，民意机关中还可容纳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在开始建立抗日政权的区域，党员还可少于三分之一。

3. 公安局不是恐怖机关，而应是民主政权的一部分，有保护一切抗日人民、抗日党派之义务。一切不反对抗日政府的地主资本家，与工农有同等的人权、财权及言论、集会、思想信仰之自由。政府只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与暴动的分子，其他一律保护，不加干涉。

(五) 其他政策问题。

1. 在劳动政策方面，应注意工人加薪不应过多，以维持一人至一人半生活为原则。今天还不可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某些生产部门可实行十小时或十一小时，一般是比原有工作时间略为减少。要教育工人遵守劳动纪律及合同，资方亦然。乡村工人工资待遇更不宜过高，否则还会引起农民反对、工人失业与生产缩减。

2. 在土地政策方面，要严防过左的没收土地、随便处理

公地、无偿收回典地等错误。

3. 在锄奸政策方面，要坚决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与坚决的反共分子，但决不要乱杀人，牵涉无辜分子，要禁止任何机关都能捉人杀人的混乱现象。对动摇胁从分子要予以宽大待遇。对叛徒也予以自新之路，在其不继续反共条件下，可予以不杀待遇，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优待，惟不能入党。

4. 在文化教育方面，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文化人、技术家来根据地与我们合作办学校、办报、做事。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到我们学校学习。要放手任用、放手提拔知识分子和文化人。

5.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保障党的各种具体政策之执行。下层在执行政策中错误是难免的。领导机关的责任是及时检查、及时纠正。冀南党对政策的注意，虽较前略好，但极不够。必须加强政策教育，善于利用具体例子去教育同志，要加强政策的研究和检查。军队的党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要给地方党以应有的帮助。

最后，冀南工作的转变，要依靠于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充分的自我批评，要依靠于大大发扬党内民主，要依靠于细心的组织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冀南工作的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出版的《党的生活》增刊。

[2] 茂林事变，即皖南事变。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一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的突然袭击。经七

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3〕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4〕贝当，一九四〇年时任法国内阁总理，六月下令法军全部停火，对德投降，组织亲法西斯的法国维希政府，任总理。

〔5〕指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解散新四军的反革命命令。

〔6〕指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的讲话，声称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

〔7〕蒋，指蒋介石。

〔8〕居里，当时任美国白宫行政助理，一九四一年二月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来华访问。访华期间曾与周恩来会谈，了解皖南事变情况。随后，他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美国的态度给当时的国民党以很大压力。

〔9〕指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内容如下：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10〕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而且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11〕指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作为共产党的部分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临时办法。内容如下：“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

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六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枝；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一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12〕西尾，指西尾寿造，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13〕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4〕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15〕见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762页）。

〔16〕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结果，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17〕大革命，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18〕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至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9] “东方慕尼黑”，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美国、英国帝国主义曾多次酝酿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个阴谋同一九三八年英国、法国两国通过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的阴谋相类似，所以称之为“东方慕尼黑”。

[20] 见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765页）。原文是“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

[21] 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

[22]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23] 指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正确了解与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隐蔽精干与长期埋伏的敌占区工作总方针，必须明确认识敌占区工作环境与特点，足够估计敌人的统治力量及其统治的方式与方法；执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精干组织，谨慎地组织群众。

[24] 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25] 青红帮，指青帮与红帮两个中国民间秘密结社。青帮源于明朝罗祖教支流，成员为江浙等地的无业游民和浪荡江湖者。红帮最早为明朝天地会代称，其支派有哥老会、小刀会、红钱会等，由福建、台湾发展至两广及长江流域。民国成立后，有些组织渐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沦为以流氓匪特为主体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东南沿海沦陷，青红帮部分成员沦为汉奸。

[26]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27]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发展战时生产、提高劳动热情、保护工人与增进劳资双方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颁发过有关

雇工增资内容的法令。其中规定：雇工的工资依照各地生活状况，一般以除工人本身外再供一个人至一个半人的最低生活费用为标准。延长工时必须按钟点增发工资；假日继续工作，除发原工资外，应按标准增发工资。

[2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29] 联庄，即联庄会，是旧中国地方士绅为使地方免受战乱、土匪的侵害而建立的民间自卫武装组织。由于存在封建性、落后性，易受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利用。

[30] 冀钞，又称冀南钞票，是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停止发行和流通。

[31] 法币，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后所发行的纸币。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因物价暴涨而业已崩溃的法币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政工作^{〔1〕}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

各旅、军区与政治部并报王谭罗陆：

甲、原河南滑县县长兼黄河支队长陈树辉同志系抗战后县长，为该县有声望的群众领袖，我党很好的同情者，后到抗大^{〔2〕}学习，毕业后由抗大鉴定为文化干事，经由师政调回冀南军区，复由军区政治部分配到八旅任文化干事工作，不幸于去年十二月于曲北寺头战斗中牺牲。

乙、陈树辉同志之牺牲是我们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在过去，这样好的在群众中有声望的同情者未被发现，尤其说明我们为培养知识分子而耐心了解考察非常不够，在工作过程中了解考察工作更差。陈树辉同志的工作经历，师及军区政治部的组织部门均未能及时发觉，而在八旅一个相当工作时间亦未能在审查中发觉。这表现出我们组织工作上的马虎与非常不细密，实际是埋没了有特长与特殊地位的知识分子人才，也是我们在知识分子工作上一个很大的缺点。

丙、本师各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及团结与培养是有了基本的转变，但是还未足够了解到，部队如不吸收与团结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工作，想要部队很快进步及提高政治水平与军事技术是不可能的。然而至今尚有些部队（特别是老部队，尚存在农民狭隘观点的干部），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培养不够，特别是大胆提拔更为不够，要求苛刻，并不了解

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后来源不易。这还是我们今日对知识分子工作的一个严重问题。

丁、为了今后更正确处理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特提出以下几个具体意见：

（一）有计划有组织地重新在知识分子中来一次了解考察，用各种方法使他们将自己过去历史、特殊技能说出来，以便按其历史及特殊技能分配以适当的工作，勿使其埋没或作代价不够的牺牲。

（二）对现任职的军事政治干部知识分子应很好地在工作中斗争中培养，耐心教育，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长处，并应大胆地提拔，不应久在一级，压住他的能力及其积极性。

（三）连队文化干部，工作一定时期，号召政治测验和部队生活锻炼，应即按其思想能力（特别是特殊技术）提拔其参加政治工作或军事工作，不应长期停留在文化干事岗位上。发现不适宜当文化干事而应分配以其他工作者，即应调动其工作。

（四）在各地特别是新地区应以各种方法（如军队教导队、政府办学校、文化团体等）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参加工作。

以上各项望各部讨论实行。

邓 蔡 黄

四月三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副主任黄镇给第一二九师所属各部并报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的电报。

[2]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初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延安。先后共办八期，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二所分校，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宣告结束。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

一 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

三三制^{〔2〕}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三三制政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同时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三分之一，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以为调剂。

第二，在政策性质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

第三，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既是在政权中有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

第四，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优势从何而得？一方面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这在三三制原则本身是包含着的；但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由此可见，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二 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

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

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

现。

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这也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最近虽有不少转变，但彻底纠正这种错误观念，还需要一个教育与斗争的过程。

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它所造成的恶果也不小，主要表现为：

第一，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3]时，宋哲元^[4]用了自己的权力——军队、监狱、警察、大刀、水龙去对付革命的学生，试问我们能说当时的优势是在宋哲元手上吗？这当然是说不通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 Q 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其结果怎样呢？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有的消极不敢讲话，有的脱离我们以至反对我们，进步分子则反为我忧虑。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

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结果党的各级指导机关日趋麻木，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结果党员“因党而骄”，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非党员，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甚有少数党员自成一帮，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于是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从各方面来破坏党。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是吃了不少亏的。

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首先是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其次是把非党干部、把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必然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反对；再次是党和党员都会因此麻痹，失掉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于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总之，“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

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三 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

然则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呢？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指导与监督政策的具体运用是：

第一，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5]，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

第二，今天在华北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基本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与优势，党的政策一般能够保证贯彻于政府的法令中，这个特点，必须认识。因此各级党部必须研究上级政府，特别是一个战略区的高级政府（如本区的联办^[6]）的法令指示，并根据这些法令指示去指导同级政府党团的工作。党的责任是研究上级政令运用于本区本县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及时检查执行程度，以保证上级政令之实现。所以党的各级委员会应把政府的领导，放在自己经常的议事日程中。如果发现上级政令有不妥处，或有不适合于本区本县之处，也只能经过党团提到政府讨论，由政府向上级呈报理由，党也应该把这些问题迅速反

映到上级党部，设法改正。但党没有任何权力去命令政权工作同志不执行上级政令，或者自己来一套。过去某些地区，政府法令没有党的同等内容的通知，等于具文；某些党的领导同志根本不愿意研究上级政府的法令指示，甚至把上级政令故意置之高阁，单凭自己的聪明去指导同级政府工作，这等于胡行乱为！这等于叫政权工作同志犯法！必须切实纠正。上级政令中既然贯彻了党的政策，所以研究政府法令就是研究党的具体政策，不应该再等待上级党部的指示。不研究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指示，就没有资格去指导同级政权。

第三，党要切实保证三三制。在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的选举中，在各级政府行政人员的配备选拔中，必须切实经过党的指导作用，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自流主义的选举，无计划的选拔，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在村选及区级干部配备中，尤须注意及此，且应切实保证村区长的人选，掌握在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可吸收一部分有正义感且能执行上级政府法令的中间分子）手中。

第四，既然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要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他们在政权工作中，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要能够团结非党干部，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反对“因党而骄”。党要实现了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五，既然三三制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有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有各个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也就必然有政治上的争论。只要是真正地发展民主，民主

政治斗争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正是好现象，因为它可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暴露某些党派的实质，使群众认清其面貌。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所以，党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言，敢于工作，不對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开展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

第六，党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政权，使大家懂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同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全体人民对于抗日民主政权都应采取绝对拥护的态度。在人民中，要养成遵守抗日民主政权法令的习惯。在政权中工作的同志，要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反对混乱现象，反对不尊重上级政权的行为。地方党、群众团体和军队的责任，是要扶植与帮助提高政权的威信，党和群众团体绝对没有捕人杀人等权力，不能对政府采取干涉的行为，军队不许把政府当作支差机关。也有这样的情形，个别地区的某些政府，不能保证接受党的领导，制定一些错误的法令，做一些违反人民利益违背统战原则的事情。现在有些区村政权就是这样。在实行民选之后，这种现象还有可能发生。在这样情形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拥护而不是反对这个抗日民主政权，但是反对它的某一项错误的法令，反对某一个坏的行政人员。而且解决这样问题的办法也要适当。有的可采取政权内部斗争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在群众中作公开斗争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局部改组的方式，

有的可采取公民罢免重新选举的方式，有的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有的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总以能教育群众、纠正错误、保证党的领导为原则。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绝不能采取非民主的不正当的方式，即使他是一个反革命，也必须经过民主斗争或合法手续，才能加以逮捕与处理，否则有害无益。

第七，党的指导机关要定期讨论政策，讨论法令，检查党团工作，要有专门同志管理政府党团和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党对党团的指导也应放在政治原则上，给党团以灵活运用的余地，不可涉及细微，这样才能培养党团的能力。党对政府工作同志的理论学习、个人操守和党性锻炼，必须注意，遇有错误，及时纠正。但在公开场合，必须注意培养这些同志的威信。

四 党团的运用

为了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为了统一党员在政府中的步调，在县以上的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中均应组织党团，由同级党部指定几个负责干部组成，人数以不超过七人为好，在同级党的指导与管理下（上下级党团不发生关系），执行下列任务：

第一，受领党给予的训令、命令和指示，把党的政策，党的决定，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的同意，把党的主张变成政府的主张，并使之付诸实行。

第二，善于在政治原则下，团结共事的非党干部，让他们充分理解、乐于接受、赞助和执行我们的政策主张，大大发挥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并经过他们去达到团结各阶级各抗日党派，团结大多数之目的。

第三，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党的影响，解释与阐明党的主

张；高度地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提高其威信，真正做到政民一致，以加强反对日寇汉奸政权的斗争。同时，不放松一切机会反对一切破坏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行为。

第四，指导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员，统一党的行动。定期向同级党部报告党团的工作，并将自己在政权工作中的经验，发生的问题，党的政策主张在群众中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反应等等，迅速反映到党的指导机关，帮助党加强对政权的指导。

为着实现上述任务，党团同志的工作方式，必须注意下列问题：

甲、要民主。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一般问题也要尽量征求非党干部的意见，取得大家的同意。比如当县长的同志，切不可大权在握，一切武断独断，要多找一些人商量，各科的事要经过各科去办，大胆地信任非党干部去做各种工作，而加以必要的指导和检查。

乙、要能团结人。每个党员都要接近非党员，在政治上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同他们一块工作，一块学习，一块讨论问题，避免过去党员与非党员格格不入的现象。特别对于中间分子士绅名流，尤为重要，过去我们同志对进步分子都团结不好，对他们更差了。我们同志的态度要谦和，要诚恳，要尊重其人格，尊重其意见；不要锋芒毕露，自以为是政治家，而要善于根据不同对象去进行政治解释工作。感情的联络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对政治上的接近是有帮助的。

丙、要坚持政治立场。遇到违反统战原则的意见或反对我党的行为，我们绝不能随声附和，也不应取缄默态度，而应根据不同对象进行解释或者出而反对。这里在方式上要讲究，一般采取诚恳的解释方法，只有对方是顽固分子或另有阴谋的人，才应加以有力的反对，并且要吸收非党干部一齐去反对。

如果只是党员说话，非党员旁观，那也无异于说明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在我们提出一个意见或者一个提案时，应征求一些非党员，不仅进步分子而且中间分子，同我们联名提出。这种方法不单可以密切与非党员的关系，而且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要吸收非党干部参加政策法规研究，也可以请他们起草文件，但在起草前，一定要好好讨论，确定原则后再起草，否则起草后要不得，加以全部否决，也会影响到非党干部的情绪。再者所谓坚持政治立场，并非遇事固执己见。须知我们要坚持的是政治原则，不是一切细小的技术问题，细小的技术问题如与总的方向无大损害（即使有些毛病），都是允许让步的。而且还要了解，我们自己常有考虑不周之处，非党干部常有许多正确意见，所以我们应倾听和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

丁、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尤其不能够每个党员都代表党。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只有党正式决定的代表才有权代表党说话，提提案，或其他党派接头。党的代表的一切言论行动更要特别慎重，他所发表的文章、演说、提案等都必须经过党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即使来不及也应经过党团的正式讨论，事后还要报告党委员会追认。一般同志，如果他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一个党员的面貌进行活动；如果他是一个秘密党员，可以进步分子的面貌进行活动。

戊、为了保证党的行动一致，党团内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首先，对同级党委负完全责任，并接受党委的严格监督。其次，党团内部要有民主的讨论，但一经决定必须一致行动，不能有个人的自由。党团对其他负责党员（如参议会中党团对所有参议员中的党员）有指导之责，党团的决议应通知他们，他们亦必须服从党团的决议。为了求得意志统一起见，党团可

召集专门会议传达党团决定（或党委决定），进行讨论，这样更能保证行动的一致。党团对于普通党员则不必发生关系，如有意见可经过政府机关支部去解决。

己、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

庚、一切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干部，必须成为工作中的模范，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 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

政府机关支部的任务，基本上与一般支部相同，它没有党团的权力和责任。过去有些机关支部变成了第二党团甚至变成第二政府，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政府机关支部与一般农村支部的对象不同，它还有其特殊的任务，而且要有比较健全的支部委员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些特殊的任务。

政府机关支部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在本机关范围内，有系统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地向非党员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要通过组织本机关工作人员的读书会、研究会、救亡室（民革室、救国堂）^[7]、座谈会、学术演讲会等方式，来实现这个任务。

第二，党员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团结与推动非党员积极负责地工作。对于不接近群众，喜欢出风头，自逞英雄，“因党而骄”等现象，必须在支部中不断地进行教育，不断地进行批评斗争。

第三，党员在政权中要奉公守法，遵守纪律。如果发生党

员有犯法舞弊等行为，除了行政上应依法惩治外，党内还应给以处分。

第四，支部无权干预各种行政工作，但支部要在群众中了解群众的问题、群众的意见和舆论，以及党员非党员的表现，及时通知党团和报告党委注意。支部有权检查所属党员个人的工作，但不是检查哪一部门的工作。

第五，支部直属于由党委指定的部门管理，不属于党团指挥。但党团的决议凡涉及应动员全支部党员执行时，应通知支部，支部亦必须执行。同时支部对党团、党团对支部均有互相建议之权。为工作上的便利，党团应有一同志与支部发生经常关系，以求密切地配合一致。

第六，支部的组织是绝对秘密的，不得以支部名义进行活动。

第七，支部定期向上级党部做报告，并接受其指示。

六 加强民主教育

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无论在党内或在群众中，过去这点都是极其不够的。

实际的政治斗争，是党员和群众的最好锻炼。我们除在学校中、民革室中、训练班中，应注意民主政治的教育外，对每一个民主运动都要精细地布置，不可丝毫草率，要使之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真正动员起广大民众来参加，动员起全党来领导。如此，才会使运动本身收到效果，也才能教育党教育群众。

最近北方局向联办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8]，已经联办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民主运动。今年的村选，明年的

县选，全边区大选，都一步步地临到我们面前。而在我们各种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有了民主主义作风，才有广大的群众运动；有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9]的党。

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报的《党的生活》第三十五期，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2]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3]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今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次运动，历史上称一二九运动。

[4] 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5] 党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和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

[6] 联办，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简称，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成立。当时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并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联办撤销。

[7] 救亡室，是抗日战争初期晋、冀、豫等地抗日军民开展群众性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其名称各地区、各部门有所不同，山西一些地方通常称民族革命室（即民族革命室），有的地方称救国堂。

[8]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议，邀请党政军民各界组织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在管辖范围进行选举参议员的活动。同年七月七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今左

权县)开幕,参加会议的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四个地区的参议员。七月九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它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

[9] 布尔什维克,是俄文 *Большевик* 的音译,意即多数派。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激烈的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了多数票,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主义者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曾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

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 严重局面^[1]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

百团大战^[2]给了晋冀豫边区各方面工作以最大的考验，也给了一二九师工作以最大的考验。百团大战证明了晋冀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但百团大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弱点，使得我们在百团大战之后，虽在主力兵团方面得到一些补充与休整，但在根据地的巩固上，则甚为严重。这表现在：敌占区日益扩大，抗战区日益缩小。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影响到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而遭致不应有的恶果。革命者的责任，不是掩饰局势的严重性来麻痹自己，而是以足够的警惕性去认识这种严重性，寻求形成严重性的根源，并提出克服严重局面的办法。

二

形成严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由于敌寇、汉奸从各方面加紧对我们进攻。敌人的“囚笼政策^[3]有了进一步的成就，铁路、公路和据点加多了，正在逐步地侵入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内部。敌人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及时改进某些战术上、宣传上、特务工作上的弱点，大胆地抛弃不合用的东西，一点不守旧，不顽固。所以，最近一时期，敌人无论在军事上或在经济、政治、文化、特务上，对我们进攻的方式都更加巧妙而毒辣了。特别指出的是，敌人弱点很多，但它非常善于利用我们的弱点去弥补它自己的弱点，善于针对着我们来进行各种破坏工作。如我们进行归队运动，敌人则提出“保护逃兵”的口号；我们进行屯粮工作，敌人则破坏屯粮；我们进行春耕，敌人则破坏春耕；我们提出在敌占区采取革命两面派政策，敌人则提出在我抗日根据地内采取“汉奸两面派政策”（在某地已发现）；我们提出南援新四军的口号，敌人则抓紧造谣说八路军退出华北了。即以游击战术而论，敌人尽力学习，并善于组织游击集团的活动，在军事上，敌人也有许多比我们还要高明的地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

其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反共派在亲日派何应钦^[4]辈的策动之下，积极挑动内战，也从各方面向我们进攻。的确，要承认这般亲日派、顽固派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抗日根据地也时刻在他们的破坏与威胁之中，无论在太岳或太南，都曾几次遭到他们的袭击与扰乱。几百个特务人员位置于我们附近，专门进行对我党、我军及根据地的破坏，积极实行其内奸政策，叛徒阚兴学、聂广云就是他们勾引跑的。他们同日寇一样，派遣武装便衣队到根据地内部，破坏抗日秩序。特别是这般“内战内行”的家伙，也善于利用我们工作上的某些弱点来弥补其自己的弱点，如在茂林事变^[5]后，好几处都发现

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活动，冀西破坏分子大肆宣传所谓“国法军纪”，西井发现“巩固团结扑灭叛乱”的标语，武乡有若干村在其领导之下破坏屯粮，此类事实发现不少。最近庞炳勋^[6]在何应钦的指示与强迫之下，已开始东进，向冀鲁豫区和冀南、鲁西区进攻。以目前局势而论，反共大内战的爆发，在国际国内条件下，是要受到限制的，但这不是说某些地区的寇奸夹击局面都没有了，更不是说反共行动放松了。这也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

但是，形成严重局面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敌人和顽固反共派的进攻，而在于我们自己工作上的弱点。事实证明，敌人并不特别厉害，敌人的弱点比我们多得多，敌人的战斗力也较前薄弱。在我们周围一般是日军减少，伪军增多，敌人没有多大社会基础，我们有一切把握能够战胜敌人。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工作还差，以致敌人能够利用我们的弱点，而我们不会利用敌人的弱点。我们在对敌斗争上，不少地方表现无能，所以形成了严重的退缩现象，右倾情绪和恐日病大大增长起来。谁要忽视了这个事实，那不仅是麻木，而且是罪过。

三

那末，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在武装政策上，我们犯了一些原则上的错误，就是对地方武装的并吞主义与放任主义。因为并吞游击队的结果，地方武装始终建设不起来，当地群众的武装领袖也培养不起来。因为放任主义的结果，游击队的党政工作、作战训练、供给卫生都不去管，结果许多严重现象发生，有了武装也无力量。所以并吞主义和放任主义，都是忽视地方武装的倾向，都

是违背“基本的游击战”的战略指导的原则错误。这个错误主要是军队党负责，首先是我们领导同志要负责，地方党在放任的错误上也要负一些责任。特别要指出的，我们这个区域在武装建设上，缺乏长远打算的精神，对地方武装的培养极差，尤其是长期忽视民兵自卫队的建设，结果群众游击战争发展不起来。正规军又不得不分散打游击，兵员补充困难，使我们在武装建设上兜了一个大圈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对过去错误的处罚。

因为百团大战后，把一部分游击队补充正规军，正规军集中整训，于是敌人趁虚而入，大肆摧残，增设据点，根据地缩小，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失去依靠，悲观失望情绪大大增长。所以说武装政策的错误是形成严重局面的基本原因。

第二，在本区内存在着“关起门来建设”的倾向。以太行区而论，我们在基本区的建设和巩固工作，的确是有成绩的，但在总的对敌斗争方面，我们则太缺乏能力了。地方党、政府、群众团体如此，军队党亦如此。我们的地方工作，在基本区都还是热热闹闹，但在接敌区和敌占区则是严重的退缩。甚至对敌在根据地内的内奸政策和破坏活动，也表现麻木不仁，失掉知觉。不少地方误解保障人权法令^[7]，明知敌探汉奸活跃也毫无办法。我们的军队在集中整训方面有了不少成就，但不幸各分区的地方武装也集中整训，而放松了对敌武装斗争，结果敌人步步逼近，休整也困难了。经验告诉我们，不把对敌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不把对敌斗争与根据地的建设密切联系起来，其结果将是一无所成。敌人在根据地横冲直撞，人心不安，说得上完成春耕任务吗？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地区被敌人占去了，说得上经济建设有成绩吗？兵员补充不发生困难吗？敌人由点线到面，把我们各个根据地隔断，还能说得上各

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与配合吗？最近一时期物价高涨，冀钞^[8]跌价，敌探奸细到处活跃，晋中区春耕消沉，不是偶然的。

第三，“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一般还停在口号上，而缺乏真正的细密的组织工作。就连宣传工作我们都做得很少。不能认为我们的组织工作只是在巩固党、建设根据地方面需要，而应了解在各方面，在对敌斗争，伪军伪组织工作，土匪、会门^[9]工作，敌占区、接敌区的政策运用，文化宣传工作等等，都需要有坚强的组织工作。没有坚强的组织工作，任何响亮的口号，都会变成空话。口号喊了几年了，成绩是不多的。要是研究一下敌人破坏我们的方法，是何等精细，何等巧妙，真令人惭愧无地。特别在敌占区、接敌区的政策运用上，我们各地都很差，不懂得敌占区的长期的隐蔽精干政策和接敌区策略的灵活运用，所以在那些地方说不上多大工作成绩，即建立好的部分工作，也很快被敌破坏。这类血的教训已经不少，可惜至今没有足够认识与应有转变。

第四，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败情绪，恐日病也在发展，不敢到敌占区和接敌区活动，不敢到那里去做工作，武装部队不敢接敌，不断向后方退缩，这是恐日病的具体表现。一切感觉无办法，不相信地方武装，军队同志与地方同志互相埋怨，这是失败情绪的具体表现。有一种人，口里说得非常勇敢，实际上毫无办法，不是说干部困难，便是说别人不对，不研究敌人，不研究对策，一到敌情严重，环境困难，便束手无策，这是失败情绪的另一种表现。一个真正勇敢的人，真正不怕敌人的人，不仅表现在个人不怕死，主要表现在敢于同敌人作各方面的斗争。还有一种人，一提到对敌斗争，只知道一个打字，如何打，如何斗争，他是不想的，局势如何严重，他都觉得不在乎，这种在政治上害麻木病的人，其前途

也必然是悲观失望的。

第五，党政军与群众的联系都非常不够。群众一般感觉到军队、政府无力量，不能保障他们，失望情绪大大发展起来。邢西群众大吃大喝，二分区群众大用大赌，有些村干部把春耕贷款拿去吃喝嫖赌，都是“得过且过”的失望表现，也是敌人腐蚀民族的成绩。我们军队党、地方党对这种现象，也表现无能，不懂得从加强对敌斗争中去领导群众，振奋群众，教育群众，细心了解他们的痛苦，及时为他们解决疑难。敌人加紧活动，我们要是没有办法，群众一定不满和不安。事实证明，群众是抗日的，是拥护抗日政府和军队的，只要我们军队一活动，不断地打击敌人，军队、政府处处关切他们，他们就马上起来积极参加斗争了。

第六，党政军民的配合很差，这是影响对敌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敌人的“总力战”^[10]，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配合得很好，我们则零乱分散与各自为政，所以表现不出大的力量。至若某些地区发生一些不融洽，互相埋怨，闹无原则的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之争，那更是自杀。

四

百团大战后，尽管我们在基本区收到不少成绩，但在整个区域来说是严重的。我们不应过高地估计工作成绩，而应清楚地看到目前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与工作弱点。麻木不仁是非常危险的。

全区同志必须以高度的警觉性，用一切努力来克服目前的严重局面。我们有足够信心与充分条件来转变这个局面。

甲、党中央及军委给我们指示的路线、策略和战略战术指

导原则，是绝对正确的，只要我们细心地研究，切实地执行，就一定能战胜敌人。这在过去我们是不够的。

乙、敌人的弱点是根本的，无法补救的，基本是一个民族问题。中国人是不愿当亡国奴的。敌人的残暴压榨，引起了群众的仇恨与愤怒。敌人兵力不足，兵力分散，不能不大量利用伪军，而伪军是中国人，只要我们执行瓦解、争取伪军的正确政策，将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要南进，脚踏两只船，国力日益削弱。日本必败，这是肯定的真理。

丙、我们的弱点是前进中的弱点，是能克服的弱点，而且我们总在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弱点减少，工作加强，正确执行政策，宣传教育深入，党政军民团结一致，敌将无隙可乘而束手无策。

丁、我们有几年艰苦创造出来的基础，有大批干部作骨干，只要我们不骄傲，不老大，不麻木，有前进精神，没有困难不能克服。

戊、最近一个多月的经验，也证明我们能够打开严重的局面。冀南在认识了严重局面之后，积极加强各方面的斗争，收复了十个据点，消灭了一些敌人，争取了几股伪军反正，展开了游击战争，结果群众兴奋起来了，局面有了初步的转变。我们太行区的三分区由于给了敌探、奸细、伪组织以大的打击，使敌人失去爪牙，目瞎耳聋，而不敢横行无忌了，群众斗争也活跃起来了。三分区这个初步胜利，是因为党政军民密切配合的结果。一分区一部分地区由于武装斗争的一些小小胜利，也大大发动了群众。这证明只要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积极对敌斗争，任何严重的局面都是能够打开的。

五

但是我们太行区的局面，还没有渡过困难的关头，许多地方还是很严重的。即以一、三分区而论，也仅是展开斗争的开始，成绩也还不大，只能证明我们有条件去打开严重的局面，而不能有丝毫的满足与松懈。

如何打开严重的局面呢？

第一，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因此必须：

甲、党政军民以一切努力，完成每县一个独立营，每个接敌地区一个游击队的武装建设计划。确定这些地方武装是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当地斗争的武装，不得再有并吞行为。为使某些地方的武装能够顺利地建设起来，并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从积极袭扰、封锁、打击敌人的行动中去建立与扩大，保证这些地方武装成分的纯洁性和党的绝对领导。最近某些县份把地方武装用去为机关磨面、打柴、守卫，重复过去纠正过的地方武装“保安队化”的错误，或让逃兵当干部等等现象，必须立即纠正。

乙、野战军在地方武装尚未培植起来时，应分散一部领导现有地方武装，积极向敌活动，从积极行动中打击敌人，保护群众，掩护春耕，以提高群众斗争热情，提高地方武装战斗能力，并号召群众加入地方武装。过去正规军同志不会诱导、帮助、接近地方武装的错误必须纠正。

丙、积极组织广泛的人民武装，特别是民兵。最近某些地区民兵活跃的模范，应发扬到各地去。有了正规军、游击队，没有普遍的民兵自卫队，还是不能打下武装建设的基础，也还

不能进行长期坚持有力的对敌武装斗争。同时必须指出，冀南某些县份的党，最近集中力量组织模范班（即太行区的基干自卫队），而放松县区基干游击部队的建设，这又是另一偏向。其来源是怕组成之后又编了。这个偏向是很危险的，必须克服。太行区也必须防止。因为只有民兵而无游击队，则游击集团永远不会形成起来，武装斗争永远没有力量。

丁、地方党必须学会管理武装，领导战争。我们早已确定军分区要受地委的政治领导，县区基干队要受县委、分区委的政治领导，但是这一时期是执行得不好的。有些县干队、独立营还在军分区、县委之间钻空子，对县委则说军分区有任务，对军分区则说县委有任务。这种干部，除了教育之外，还须加以纪律的制裁。同时，为了避免这一现象起见，特别是为了便利武装建设与武装斗争起见，确定接敌的县和区，由县长、区长兼基干队队长，县委、分区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另设副的军事政治干部，进行日常作战管理教育等军政工作。对地方党政同志不兼军职的县区，上级的命令应同时通知地方党，以便实际起到监督指导的作用。地方党政群众团体必须把爱护党军、爱护武装作为自己的责任，只会埋怨军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冀西同志，只埋怨某团不打仗，纪律不好，不了解该团生活极苦，极大部分时间背了粮食，同时由于借不到席子和麦草，睡在湿地上面，很多人生病生疥疮，这样部队是不会提高与巩固战斗力的。我们固然主要责备军队同志管理教育太差了，但如地方党政能在可能范围内给部队以多少帮助，使之能以更多时间积极作战，不是合算得多吗？

戊、武装斗争不是打一两次仗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坚持不断地努力。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地区打了一两个小胜仗就松懈下来了，这是错误的。军队党、地方党对武装斗争的指导，要

做到认真地组织游击集团，把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结合起来，进行不疲倦地扭住敌人的据点、交通线的活动。这样，没有较固定的游击集团是不可能的。

第二，要环绕着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武装斗争能够打开局面，但要巩固与深入斗争，就必须从各方面去努力，而且只有全面斗争的配合，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孤掌难鸣的。在目前，我们尤要加强下列工作：

甲、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加强敌占区与接敌区的工作。对敌占区、接敌区政策，党已有不少指示，可惜我们的同志不研究，执行马虎，所以局面开展不起来。因为不懂得运用隐蔽精干政策，不懂得秘密工作，甚至暴露夸张，我们的同志在敌占区牺牲的何止一二百人，干部不断牺牲，工作基础也不断被敌摧残，这是很大的损失。在接敌区，一般不懂如何去领导群众斗争，如何为人民着想，如何打下长远的工作基础，如何坚持那里的武装斗争，如何采用必须的革命两面派政策，而且不少地区把根据地的一套搬去，结果反为敌所乘，我们工作开展不起来，反日益退缩。我们的部队不断受袭，干部牺牲不少，都证明我们在那些地方还没有与人民建立血肉不分的联系，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没有群众作依靠，要想不受袭击，不遭损失，是不可能的。

乙、利用一切线索、一切机会，加紧争取与瓦解伪军伪组织。敌人强化伪军伪政权，我们则应强化瓦解、争取工作，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不可马虎、敷衍。冀南在这一工作上有了初步成就，我们太行区还要切实努力。

丙、展开强烈的文化斗争。敌人的奴化教育与造谣宣传，是收到部分效果的，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太少太弱了。我们过去的宣传品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差，我们有

真理说不出。敌人则数量多，方式灵活巧妙，且善于针对农民落后性进行宣传，善于说假话，故能收到一些效果。今天必须动员一切文化机关，改善与加强文化工作。要研究敌人，揭破敌人的造谣欺骗；要利用沦陷区的具体事实，指明亡国奴的惨痛；要利用一切生动例子，指明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真理；要善于传播斗争经验和教训，教育群众斗争的方法，特别要提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斗争顽强性，启发人民的民族觉悟、民族气节与爱国热情。要把文化宣传工作做好，首先要教育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去了解群众，针对敌人，按照群众的水准，去进行我们的宣传。过去我们宣传教育老百姓的东西太少了。

丁、加强锄奸斗争，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敌探奸细，严厉镇压秘密维持会⁽¹¹⁾等活动。对这些混蛋的容忍等于自杀。在进行这个斗争时，必须要有很好的侦察工作、周密的计划，不放过一个汉奸，不冤枉一个好人。在处置时，对首要分子要严办，对胁从者要宽大。最近三分区在严密侦察之后，把汉奸、敌探、秘密维持会一网打尽（自然还有未发觉的），结果敌人失掉耳目手足，群众情绪大大提高，各种工作开展起来，这是很好的经验。有些地方还存在误解保障人权法令，放纵汉奸活动的现象，应即纠正。

戊、要开展对敌斗争，必须开展根据地内和敌占区、接敌区的统一战线工作，要采取一切步骤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能如此，我们便会增加许多瓦解、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人员、进行群众教育的宣传员和了解敌情的侦察员，而且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机会去建立点线工作。

第三，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只说是没有用的，主意打定之后，就要继以组织工作。如对敌伪军，必须指定专门干部负

责，一定对象要有一定的同志负责，并及时检查其工作，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不可因一时工作无成绩而轻易调动，只要坚持做下去，一定能收到效果的。

第四，要克服失望情绪和恐日病的心理。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必须指明抗战胜利条件、艰苦道路与光明前途，提倡卧薪尝胆的工作，以克服失望情绪和恐日病。一方面从耐心教育着手，着重激励政治节操，同时对那些把公款拿去吃喝嫖赌、贪污腐化、恬不知耻的人，还必须加以适当的纪律制裁。

六

党政军民的同志，一致警觉起来，在党的正确政策之下，以坚强的意志、奋勇的精神，不疲倦地工作，克服当前的严重局面。如果因为我们的麻木不仁或因我们的张皇失措，而使根据地遭到不应有的损害，那我们的罪过太大了。

几年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认识了困难，我们就能够克服困难；只要我们懂得了局面的严重，我们就能够改变这个局面。今天我们需要从发展对敌斗争中来进一步地巩固抗日根据地，并大大地发展根据地，我们要把“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的方针变为实际。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三十六、三十七期合刊，后又刊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七期。《战斗》加写的编者按说：“邓小平同志这篇文章严肃地指出本区目前的严重形势，并明确地指出克服这种严重局面的条件与方法。希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负责领导同志，能于接到本刊时，立即联系当地具体情况组织讨

论，动员全党为打开目前的这个严重局面而斗争。”

[2] 百团大战，指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发动了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3] “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

[4]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5] 茂林事变，即皖南事变。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一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6]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7] 保障人权法令，指一九四〇年五月二日山西省第三区行政专署公布的《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利益和生命财产之安全；一切抗日人民有抗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自由。后又发布公告，摘要公布了条例的主要内容。条例的实施，为保障人民权利，促进社会安宁，揭发敌人谣言产生了重要作用。

[8] 冀钞，指冀南钞票，是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停止发行和流通。

[9] 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10] “总力战”，指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以控制占领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1] 维持会，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指使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组织。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 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

（一九四一年五月）

我讲三个问题。

一、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

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

今天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2〕}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以实施其诲淫诲盗、毒化奴化政策。他们还制造谣诼流言，散布失败情绪，

推行怀柔政策，破坏我抗战法令，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反共顽固派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主义。他们提倡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主张尊孔、复古，保存“国粹”，读经救国。压制新文化运动，摧残新文化事业，封闭进步书店，禁售进步书籍报刊，压制抗日言论，镇压与取缔人民的反帝运动。宣传反共，排除异己，反对进步，鼓励倒退。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破坏抗日军队、抗日政府和抗日根据地。颂扬独裁政治，反对民主政治，宣传“安分守纪”、“严守国法”，使人民任其宰割。

这种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起了帮助的作用，对民族前途危害至大，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三）抗战民主派，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洛甫^[3]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

“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

“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4]

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

二、本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

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5]中指出的：“在抗日战争中，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求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同时也是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其具体内容应该是：

（一）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要经常地了解与研究敌人，及时地不懈地驳斥敌人，开展我们的政治攻势。

（二）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无论对本军、友军，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人民，以及伪军，都需要灌输以民族的爱国的思想，提高其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

以有效的打击。更要激励民族气节，反对动摇变节，提高对敌斗争的勇气，树立必胜信念。

（三）积极会同地方党组织、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及地方文化机关，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释抗战法令，推行民主政治；向敌占区人民宣传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

（四）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这不管对人民群众或部队，都是同等重要的。尤其需要加强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科学为指战员所掌握，创造现代化的正规兵团。

（五）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要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行；要启发指战员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忱，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宣传教育部门应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六）必须用一切办法和尽一切可能供给友军以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考究输送的技巧。设法组织互相参观互相观摩，融洽与友军的感情，扩大交朋友工作。

（七）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抗战以来，由于部队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使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向上提高了一步，也为文化艺术工作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是，在进行中尚有不足的地方，这是在工作发展中所难免的。发现缺点是改进的开端。这些缺点表现为：

（一）“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新华日报》华北版^[6]五月三日社论中的这两句话，正是我们文化工作缺点之写照。我们文化工作在高深的研究上是很不够的，但在

深入底层，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这方面，又何尝够了呢？这具体表现在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的薄弱，以及连队救亡室^[7]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死气沉沉。这是每个文化工作者都应注意的。我们要求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

（二）宣传内容不善于迅速地反映和宣传某一个紧急任务，不善于很及时地批驳敌人。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三）某些作品缺乏丰满的现实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性，缺乏强烈的政治性，有的甚至与政治原则还有抵触之处，起了不好的作用。宣传形式不够大众化，往往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也不善于多方面地多样地表现政治内容，有时在表现急遽多变的现实上显得无能。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高级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的形式发展。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

（四）对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发挥得不够，同时对后起的文化工作者的培养工作也做得不够，致使今天部队有文化干部荒的现象，使连队文化宣传工作受到影响。

（五）对外宣传工作显得极微弱，“打哑巴仗”的现象严重存在，经常用各种方法对外宣传我们的战斗生活大为不够。我们虽设有随军记者，但由于大部分记者兼管编辑，以致影响了新闻采访工作。政治机关对此项工作具体指导不够，也是对外宣传工作削弱的一个原因。今后随军记者、旅的文艺组及政治

机关，应加紧弥补对外宣传工作的缺陷，全师同志都应一致为加强这项工作而努力。

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是：各级政治机关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认识得不够，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做得不充分。某些地方对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注意得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做得不够。文化工作者不够群众化，尚缺乏部队工作和群众工作的经验，致使文化工作被限制于狭隘的范围中，不能为大众所掌握。

今后部队文化工作应该怎样做？我没有很好地研究，只提几点意见：

（一）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要经常鼓励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

（二）要造就大批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要提高原有文化工作者的素养。加强他们在文艺方面的修养和政治学习，给以必需的可能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渗透到现实的底层里去，更充分地发挥其才干，使他们能够真正担负起部队文化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三）文化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应深切了解：只有提高政治素养，才能提高对文化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性之艺术品，才能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作品要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现实，适合于现实的需要，就要既提高创作水准，又深入大众。提高自己，向大众普及文化，需要政治与文化的密切结合。

（四）文化工作者要具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态度。要

将自己的作品就教于大众，倾听大众的意见。现实是一天天发展的。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学习是绝对不能少的，而要想学到一些东西，就要虚心，不虚心的人是会一无所成的。互相探讨是集思广益的好办法，一个作品经过大家研究和讨论，是会更臻完善、收效更大和不易发生毛病的。能接受别人意见，才能使自己进步。我们现有的文化工作者，一般说工作还仅仅入门，只有虚心学习，将来才会有伟大的成就。

三、关于宣传队工作。

宣传队是部队文化工作的基本队伍。努力提高自己，努力追求深造，努力做文化普及工作，都是万分必要的。要使宣传员成为文化教育的得力干部，使宣传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军。

宣传队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不仅要培养文化工作的干部，还要培养政治工作的干部。在调动或提升宣传队的干部时，领导机关要照顾到宣传队的工作，切忌调之一空。宣传队的负责同志也要舍得让干部出去发展。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着眼。

今后，宣传队在政治机关的宣传教育部门领导下要完成以下任务：

（一）组织部队的文化娱乐工作，帮助政治机关检查连队政治工作，帮助宣传教育部门检查连队宣教工作。要面向连队，深入连队，了解连队，加强实际工作的锻炼。

（二）要进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不间断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三）要推动并帮助连队不间断地进行对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四）要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小学教员等取得密切联系，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推动与帮助地方的文化运动。

（五）要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准，提高工作技能，不断增进新的知识。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的报告要点。报告全文刊载于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出版的《抗日战场》第二十六期。报告要点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2〕“东亚新秩序”，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3〕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4〕见张闻天《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252—253页）。

〔5〕这里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是指八路军政治部制定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对一九三八年颁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修订，全文刊载于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四期、第五期。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正式颁发。

〔6〕《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创刊，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

〔7〕救亡室，是抗日战争初期晋、冀、豫等地抗日军民开展群众性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其名称各地区、各部门有所不同，山西一些地方通常称民族革命室（即民族革命室），有的地方称救国堂。

对抗大的新希望^[1]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

热烈地庆祝抗大^[2]五周年，因为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给予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

几万个革命青年，经过抗大火炉的锻炼，一批一批地输送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大的威力，已经在全国每个角落里显示出来。几万干部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

希特勒^[3]的徒子徒孙们，用各种各色的卑鄙手段打击抗大，把成千成万的优秀青年送到“集中营”里，过着囚犯的生活。他们没有任何罪名，仅仅是因为他们要爱国，要抗战，要进步，要进抗大。然而，反动派的企图是徒然的，抗大还是愈抗愈大，青年们还是一批一批地进了抗大，一个一个的分校设立起来了。而且正在“集中营”受难的青年们，也还是身在“集中营”而心在抗大，他们没有亲身领受抗大的培植，也没有抗大的文凭，可是他们，除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外，都能在囚犯的生活中去认识真理，认识奋斗的目标和对象，锻炼自己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把这批因要进抗大而遭难的青年们，称之为抗大的“名誉学生”也未始不可的。

在前线的八路军中，抗大的威信是由抗大同学们的实际工作建立起来的。一般的呼声是抗大同学太少了，这应该成为抗大还要壮大的理由。

斗争的发展，自然不仅要求抗大“愈抗愈大”，而且要求

“愈抗愈深”，使抗大成为建设抗日军队的火车头，成为提高军事政治科学的领导者，这是大家对于抗大的新希望。在抗大主要部分亲临前线的条件下，是一定能够满足大家期望的！

一如过去一样，抗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必将继续壮大，继续深入，继续发展它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

[2]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初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延安。先后共办八期，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二所分校，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宣告结束。

[3] 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我们站在反法西斯的最前线^[1]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

当中国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神圣抗战第四周年的时候，德意志法西斯匪徒在奴役欧洲十四个国家之后，又将其血手伸进苏联了。苏联人民掀起了极度的社会主义的爱国热忱，展开了保卫祖国，保卫民主，保卫人类文化和自由的英勇战斗。全世界一切拥护民主、拥护文化和自由的国家和人士，正在组成坚固的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以粉碎希特勒^[2]及其帮凶们——日意法西斯征服全世界，奴役世界人民，毁灭世界文化的迷梦。

中国站在反法西斯的前线。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同奉希特勒为盟主的日本法西斯鏖战四年了，今天更与苏联和其他反法西斯的国家并肩作战着，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年来，我们曾经得到苏联大量的诚挚的援助。苏联给了我国抗战以无限的鼓励和帮助，解决了我们许多的困难。今天我国与苏联之间，更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中国和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我们互相声援，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中国的胜利就是对苏联的实际援助，苏联的胜利也就是对中国的实际援助。

日本强盗一贯执行其“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3]”的不变方针，而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为其先决条件。正因为它的先天不足、国力不厚，所以总希望以取巧方式来实现其“东方盟

主”的幻梦。几年来，特别在占领武汉后，敌人没有一天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法来达其解决中国事件亦即是灭亡中国的目的。在一年零十个月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中，日本强盗在东方起其半独立性的助威作用，以声援德意。它曾利用英美无暇东西兼顾的弱点，胁迫英美让步，以制造“东方慕尼黑”^[4]的危险；它曾两次进攻苏联边疆，企图占领苏联土地并诱使英美让步，最后在苏联红军威力之下，不得不屈服而有苏日中立条约^[5]之订立；它曾利用每一个国际上和中国内部的事件，或以政治诱降，或以军事配合迫降，虽屡遭失败而丝毫不懈。在今天，德苏战争^[6]已经爆发，英美加强了东方注意力，日本地位并无多大的改善，但日本法西斯的欲望必因而更炽。最近一礼拜的消息已可看到这一点：对苏联，它企图趁火打劫，用履行三国盟约^[7]，撤退苏联境内妇孺，加紧渔业谈判，阻止他国供给苏联等恫吓手段，以期获得苏联的若干让步，但这种强盗式的图谋，在苏联强大国力和正确政策之下，是不会有有多大成就的；对南进，它是不会死心的，且必乘机加紧起来，但在英美较多注视东方的时候，日本南进的困难显然增加了。然则日本强盗的“出路”在哪里呢？依然是“迅速解决中国事件”，依然是企图巩固占领区，进一步诱降迫降中国，以便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像希特勒奴役捷克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一样，把中国人压迫到前线，为日本法西斯的“东亚新秩序”而牺牲。不管敌人对苏联采取如何步骤，不管敌人如何执行其南进方针，它对于灭亡中国的决心是不会有丝毫改变的，而且必然要利用当前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变本加厉的。

我们中国人民要以高度的警觉性，注视时局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更亲密地结合全民

族的力量，与日本法西斯强盗战斗到底！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与苏联联合，并肩作战；与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联合，为拥护民主，维护人类的自由与文化而战斗！我们要反对敌人的诱降迫降，反对亲日派破坏抗战的一切阴谋诡计，因为只有抗战我们才有生路。我们要反对倒退，反对黑暗，因为只有进步才能使抗战事业底于胜利之境。我们要反对一切反苏反共的言论与行为，因为这是帮助德意日法西斯的。只有团结，只有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只有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最后解放。坚决反苏反共二十余年的丘吉尔^{〔8〕}都放弃了过去的成见，中国反苏反共的人们也应有这样的觉醒。四年抗战证明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它曾击破了日寇速战速决的计划，它曾使敌人陷入困境，它曾不断克服困难和投降妥协的危险，它已经树立了长期坚持抗战的基础。尽管抗战的道路是艰难的，只要我们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我们一定能够在长期斗争中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敌后华北的军民，更要以高度的警觉性，密切地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因为敌人强化华北是必然加紧的。在百团大战^{〔9〕}后，我们即曾估计到敌人有由分区“扫荡”到分区“清剿”的可能，最近敌人以大兵力“扫荡”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就是这样打算的。自然这一企图在冀东军民坚强的斗争之下，没有获得很大成果，但是敌人这一毒辣的诡计，应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反对敌人的“总力战”^{〔10〕}，亦应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反特务的全面斗争，而以政治进攻为主。过去我们曾经不断强调武装斗争是正确的，因为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为核心，就会使全面斗争缺乏支柱，减弱力量。但是强调武装斗争决不能解释成为单纯的武装斗争或以武装斗争为

主。全面斗争应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武装斗争为骨干。武装斗争的目的是为着打击敌人，更便于政治进攻的发展与胜利的获得和巩固。武装部队必须要成为政治进攻的有力工具，必须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过去有些同志只强调武装斗争，以致忽视了基本的政治进攻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武装斗争只有当它获得了政治进攻的效果时，才能巩固，也才能发展，否则武装一走，那里的工作还是原封不动的。百团大战在军事上的胜利是极大的，但由于缺乏政治进攻的努力，其结果是不圆满的。而我们的游击队如果不把政治进攻作为其主要的任务，便无法完成其任务，且在政治上缺乏注意力的状况下，还容易为敌人所腐蚀，过去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在武装斗争上，我们必须真正掌握住“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指导原则。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发展普遍的群众游击战争，认真组成有力的、巩固的、与当地人民具有血肉联系的、为当地群众领袖所带领的游击队，因为只有这样的游击队，才能真正坚持当地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也才能使基本的游击战有力量；另一方面要求我们有强大的正规军，把正规军充实起来，加强其整训，以便遂行有利的运动战。把正规军分散一部遂行小游击队任务的办法，只能是一时的。这些为四年抗战所获得而为今后斗争所必需的经验，应为全体同志所了解。武装斗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进行，最近已获得初步的成效，但地方游击队的发展还没有收到应有成绩，因而正规军还不能不分散一部游击，这种现象应该克服。特别是我们的同志对于对敌斗争以政治进攻为主的原则还认识不够，更要纠正。我们必须加强敌占区、接敌区的工作，加强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原则下去进行组织敌占区、接敌区人民对敌的工作，加强文化宣传工作，要把这些工作建筑在长期

打算、建设巩固基础的要求上，而不为一时的小胜利小成就所迷惑，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以致轻易一试，遭到挫败。我们必须加强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进行强有力的反对敌人特务的斗争，晋冀豫边区更应为中共北方局提出的十五项主张^[11]的全部实现而努力。我们的武装斗争必须环绕于全面的政治进攻而更加强化起来。只有当着我们的政治进攻收到显著成效时，才能说我们的根据地和敌占区、敌占区的斗争有了坚强的依靠，也才有了对敌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基础。最近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12]的召开，象征着我们的团结，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坚强与巩固。我们必须在正确政策之下，团结一切力量，打下长期斗争的坚固基础。我们必须这样进行对敌斗争，我们能够这样进行对敌斗争。因此我们有把握说：华北的军民必须发扬四年坚持敌后抗战的光荣事业，继续坚持下去，发扬下去，成为全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有力因素，并从长期斗争中，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

苏联人民和红军在斯大林同志的英勇领导下，一定能够完成其保卫祖国，打倒法西斯侵略者的任务，胜利一定是属于苏联的。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一定能够不断克服困难，走向胜利的道路。

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一块，与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士一块，正在进行着艰苦的胜利的战斗，国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流正在汇合起来，最后葬送希特勒、墨索里尼^[13]和日本军阀匪徒们的命运。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抗日战

场》第二十七期。

[2] 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3] “东亚新秩序”，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4] “东方慕尼黑”，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美国、英国帝国主义曾多次酝酿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个阴谋同一九三八年英国、法国两国通过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的阴谋相类似，所以称之为“东方慕尼黑”。

[5] 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和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两国间和平和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如缔约一方同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将保持中立。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苏联政府声明废除该条约。

[6] 德苏战争，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而引发的战争。苏联人民在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卫国战争，至一九四三年二月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

[7] 三国盟约，指《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签订，是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法西斯国家为扩大侵略战争而缔结的公开的侵略性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三国在战争中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侵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8] 丘吉尔，英国保守党领袖。在德国纳粹党执政后，提出联苏制德的主张，反对绥靖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海军大臣。一九四〇年组织战时联合内阁，任首相，领导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9] 百团大战，指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发动了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

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10] “总力战”，指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以控制占领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1] 十五项主张，指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华北抗战，誓死与晋冀豫边区人民共存亡；与一切抗日党派亲密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底；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加强扩大武装力量，实行全民族武装自卫；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逐步实现民选各级政府；坚决镇压死心踏地的汉奸，贯彻保障人权；确切保障一切抗日人民财产所有权；调节劳资双方利益，增加工业生产；加强农村阶级团结，增加农业生产；逐渐确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对敌实行统制贸易，根据地内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文化教育运动，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保障女权，实行男女平等；面向敌占区，缩小敌占区；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等。

[12] 边区临时参议会，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议，邀请党政军民各界组织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在管辖范围内进行选举参议员的活动。同年七月七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开幕，参加会议的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四个地区的参议员。七月九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它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

[13] 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首领。一九二一年组织法西斯党。一九二二年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一九三九年同德国缔结政治、军事同盟，次年追随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三年七月，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他的独裁政权垮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处死。

中日人民革命事业是一致的^[1]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

一、觉联^[2]支部一年来的工作估计。

觉联是日本进步的革命团体，今日适逢支部周年纪念，我代表一二九师的共产党向这个国际的革命团体致革命的敬礼。觉联支部一年来为一二九师做了很多工作，我代表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向诸位同志致真诚的谢意。

这一年来的工作表现在：全体同志都帮助我师敌军工作质量的提高；高木同志和我们并肩在正太线^[3]英勇作战；拾井、中根、森冈诸同志深入敌占区宣传；及川、户村等同志，教育部队刺枪、掷弹筒。这些工作固然是对我军的帮助，但同时也是诸位同志自己的工作，也就是为了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事业。

二、中日人民革命运动的联系性。

八路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同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此他久历苦难而不垮，他无坚而不摧；他的目标是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并且还要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日本人民要求得自己的解放，必须要站在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因为日本共产党的目的是解放日本人民，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中日人民革命的目的与利益相一致，因此在八路军中的日本同志和我们精神感情相融洽，同样的其他国际革命友人如美国、法国同志，也都由于世界革命利

益相一致，能和我们一起斗争。特别由于日本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对日本人民革命压迫凶恶，因此日本人民要自由、独立，更需要中国革命的配合和协助。

三、我们有正确的目标，同时我们有胜利的条件，我们更有充分的胜利信心。

从国际看，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疯狂战争，互相削弱，以苏联为堡垒之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日益高涨扩大。

从日本看，从几个现象来看，日本也要失败。大汉奸周作人^[4]等赴日参观时，日本不让他看真实情形，但他偷看到日本国内街上只有老年妇女，很少年青人。他说东京吃到的东西，不值北平好而多，回来后悲观失望。同样有许多汉奸，都在另找出路。日本在华侨民，自认没有前途，大刮中国人的钱，预备刮饱钱，早日逃回国；或和中国人订条约，说现在我保护你，将来你掩护我；或讨中国老婆，预备将来失败后装中国人。

从本质上来观察，日本也必然失败。日本外交政策孤立，亲德意、亲英美都动摇不定。两面交结，两面失败。日本人口大量死亡，战死、病疫死。现虽提出“生产啊！生殖啊”的口号，但战争病苦下，人口是无从增多的。经济上现余早用完，失业增多，贸易停滞，物价高涨。日本士兵厌战反战增多，这正是日本人民觉悟提高的表现。

四、在胜利的条件和胜利的信心下，要更加一致地努力，要以中日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为核心，团结起来，争取革命胜利的到来。

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教育，教育了中国人民为求自己解放必须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日本的党同样地也教育着日本人民，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最怕这一着。日本华北最高司令官多田

骏说：“防止日本人民的赤化，比防止中国人民的革命更为重要。”但日本帝国主义是狡猾凶暴的，它对革命还要最后挣扎，因此革命还是艰苦的斗争过程，中日革命力量还须大大发展。

觉联是日本的革命组织，这对中日人民的解放和世界革命的贡献与意义都是很大的。虽然今天还是不大的力量，但我们“不应该依据不再向前发展的（虽然现在还是占优势的）社会阶层，而应该依据正在发展着的有其将来的阶层，尽管这些阶层在目前尚不是占优势的力量”^[5]，为此，觉联诸同志应加紧工作，加紧思想上准备，加紧革命的锻炼，则其力量是将会增大的。中国与苏联有句俚谚，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前途就是这样，同时我们又好像是各个不同的革命川流，将会汇集到一条革命的巨河里去。这条巨河的革命浪潮会把日本帝国主义淹死的。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周年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要，刊载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的《抗日战场》第二十八期。

[2] 觉联，即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是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之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成立。在华北各根据地均设有支部。一九四二年八月和华北各根据地的其他日本人反战组织合并成立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3] 正太线，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

[4] 周作人，当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

[5] 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430页）。原文是“这就是说，不要指靠已经不再发展的社会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要指靠正在发展的、有前途的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在一二九师参谋长会议 上的讲话^[1]

（一九四一年七月）

我们进入华北抗战已经四年了，召开全师参谋长会议还是第一次。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将总结过去作战与建军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今后参谋工作的新方针。

我首先说说我军所处的环境。抗战整整四年了，我们一二九师在党的领导下进入华北敌后，依靠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创造了晋冀豫抗日民主根据地，并在几年的艰苦局面下坚持了根据地。现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已逐渐走向深入，但我们的斗争也更加尖锐与艰苦了，同时我们也更接近了胜利。今天我们的斗争已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有了不少的成绩。

从地方工作来看，首先，在政权工作方面，今年“七七”召开了边区临时参议会^[2]，这不仅是在形式上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个抗日根据地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也是几年敌后抗战的成绩和根据地各种建设的成绩的具体表现。临参会的召集及三三制^[3]政权的建立，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标志更加明显了。在群众工作方面也有了新的开展，群众组织逐渐加强。在冀南群众积极参加对敌交通斗争，民兵在各个地区都同样有了新的活跃，都表现了群众工作的成绩。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努力已使抗日根据地更加坚强与巩固了。

从军事工作来看，首先，在军事建设方面我们有了很多的成绩。我们决不能像个别同志只看到部队人员的不够充实，以致影响自己的工作情绪。我们必须看到，在军事建设上我们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百团大战^[4]就是我军的总检阅，证明了我们过去建军的成绩，百团大战以后的整训工作更有了很多新的收获。

其次，在政治工作方面，我们也有了一些进步。这里只说一个问题，我们在部队中适当地发扬了民主。曾有个别同志不了解民主的重要，不了解我们是革命的队伍，需要适当的民主，反而害怕民主。我们批驳了。我们必须适当发扬民主，提高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发动大家来关心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地巩固与发展。我们革命军队的最高原则是要求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但必须有适当的民主才能实现高度的集中性。政治工作的任务是要巩固指挥员的威信，而适当的民主正可以提高指挥员的威信。过去我们没有一天不讲民主问题，总是遇到反抗和阻碍。有些人总是把反对极端民主化提到最高峰，实际上取消了应有的民主的极端民主化是要反对的，但适当的民主正可以克服极端民主化。今天在我们提出发扬适当的民主之下，可能有些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发生，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这是容易克服的，这样的例子已经不少。

再次，我们在战术技术的训练上，经过几个月的整训显然提高了。即以技术而论，最近射击、刺杀各种训练班的开办都收到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提高了研究技术的兴趣，纠正了顽固守旧、不愿学习的缺点，因此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与顽强性。师长^[5]曾经指出在军事干部中还要消灭“武盲”，这必须引起我们全体干部的注意，加紧学习战术，提高指挥能力，克服“一冲就了事”的观点。

后勤工作，在总司令部的帮助之下，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建立与执行了供给制度，但供给工作中还存在着不检查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卫生工作方面新的建树很少，进步得还很不够，尤其在医药的供给上使部队经常感觉困难，不够需要。今后各兵团参谋长必须深入地检查这一问题。

总的说来，我们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多成就，但离我们的要求还很远。这是由于我们的斗争环境更艰苦、复杂、恶劣了，对敌斗争虽已开始好转，但局面还是很严重的。我们决不能单纯地埋怨地方工作不坚强，配合得不好，这样结果正是麻痹了自己。我们必须站在军事工作的岗位上，首先检讨军队本身的工作，承认自己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我们要知道敌人的手段更加巧妙了，可是我们研究敌人是很差的。敌人虽然是帝国主义，而在军事上边一点不顽固，它善于学习我们的战术，吸收与研究经验教训。现在如果撇开政治条件不讲，敌人的游击战术在某些方面已超过了我们。在军事上，我们曾遭受敌人许多次的袭击，如整个二分区只有一个县政府没有受过敌人袭击，这是我们的耻辱。敌人的政治阴谋更加毒辣，挑拨离间、欺骗造谣、威胁利诱、组织会门^[6]、苦肉计等等，用各色各样的手段来破坏我们，尤其它的特务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然而我们个别的部队中存在着严重的麻木现象，没有把警惕性提到应有的高度，因而受到了相当的损失。我们今后必须注意这一点。保守军事秘密，特别是掌握军事秘密的司令机关，更应该提高警惕性。

同时，我们许多同志对全力战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必须清楚地指出，我们的对敌斗争应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而以武装斗争为骨干的全面斗争，武装斗争必须放在正确的政治任务上才能收效。百团大战重要的教训之一是，我们军事上的胜利是

伟大的，但在政治动员上是不够令人满意的，大军一走，正太线⁽⁷⁾的工作还是原封不动。以后我们任何军事行动，即是一个小游击队的破击，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讲求如何去进行敌占区工作，如何争取伪军伪组织、土匪、会门，如何去团结敌占区同胞等等。这些应是一切武装部队自己的责任，同地方党政群众团体一块去做。把这些政治工作的责任完全归之地方同志，好教军人只管打仗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过去对某些政策掌握不紧，如对地方武装的“放任主义”与“吞并主义”，还有军队与地方关系与人民关系不够密切等等，都是我们今后要努力克服的。

至于说到司令部工作，我觉得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部队上，而仅局限于直属队的狭小范围。我们必须了解司令部是为部队而设立的，是部队的头脑，必须面向部队，深入下层，及时了解部队的困难，设法帮助下级解决困难。此外，司令部的工作还缺乏细密的组织工作，没有克服粗枝大叶的工作方式，今后必须彻底转变，进入有计划的细密的组织工作。如在作战的组织工作上，要求把正规军与地方武装密切地配合起来运用，开展全面的全力对敌斗争。要细心地研究敌人，筹划对策，着眼在长期打算上建设我们的武装，等等。

最后说一说参谋人员的修养。

第一，要在政治上加强自己，不仅从意识上加强锻炼，而且要忠于职守，完成任务。在今天的工作中不了解政治，仅知道军事，是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的。革命战术的特点，就是处处估计到政治情况，要了解各项政策，才能使军事与政治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二，要提高参谋工作者的能力。做参谋工作的有两种成分，一种是工农干部，一种是知识分子，各有其优缺点。要克

服弱点，提高自己。工农干部要努力于文化的学习，知识分子要注意实际的锻炼，加强职务技能的学习，提高工作效能。今天我们参谋工作者的来源，大部分还是土地革命出来的工农干部，所以我们重点还是要提高这些干部的文化知识，使之变为知识分子，使之成为合格的参谋人才。为达到这个目的，也必须吸引一批合格的知识分子加入参谋工作。这样，才能提高参谋工作，也才能提高原有的参谋工作者。

第三，要认识参谋工作的重要性，反对不安心、轻视参谋工作的观点。必须努力提高自己，担负起党所给予的任务。

第四，要一切为着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减少部队的困难，这是非常重要的。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出版的《抗日战场》第三十一期。

[2] 边区临时参议会，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议，邀请党政军民各界组织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在管辖范围内进行选举参议员的活动。同年七月七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开幕，参加会议的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四个地区的参议员。七月九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它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

[3] 三三制，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4] 百团大战，指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了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5] 师长，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6] 会门，指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7] 正太线，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

巩固与扩大中条地区 抗日根据地^[1]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

一、中条地区广大，但现在我掌握者仅阳城、沁水南部及翼、绛、曲、晋、济^[2]各一小部。这些区域，中条战役^[3]后，全部被敌维持，人民生活恶化，溃兵土匪到处蜂起。豫北地区已全部伪化，条西大部为敌控制，现仅一隅有我之游击队及中央军一部活动。晋南地区有九十军李文^[4]及阎^[5]系三十四军活动。我控制中条地区仅人口二十万，而我基本地区仅五万人。我军南下后，确系救民于水火，特别在我宽大政策争取影响之下，群众对我印象极佳，开始有了生活兴趣。

二、根据目前我军影响和中央军尚未大举北渡的情况，确定确实巩固和掌握中条现有地区的力量为抗日根据地，积极组织力量，使我在各方面争取优势；确定豫北、条西长期隐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一切力量对伪军伪组织进行长期工作，但我们允许集中力量到豫北或条西逛一逛，进行宣传，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我们应基本上认识目前尚无力量到豫北、条西长期立脚，以建设根据地。目前主要任务是打通岳南、中条之联系，确定六旅以一个团，置于端氏^[6]附近地区，维持中条、岳南联系。我们所以如此，主要是依据不过于刺激敌人，致敌集中力量对我，放手让中央军北渡，而增加我工作上之困难。

三、中条工作的缺点。

(一)五月中条会议时，我即提出，对发展力量无足够认识应引起注意。二月指示及最近中条本身工作之决定均未指出发展力量。在历次工作指示、决定中，也未指出一个区域的发展主要是发展武装与掌握政策。我们有些同志将统战工作与发展力量对立起来。我们开始南下之时，因情况不了解，工作上“左”或右一点都无大关系，但当我情况明了之后，就应有正确的方针。我们直到现在的宽大政策，虽然基本上是对的，但在运用上还有些不适合。

(二)缺乏政权观念。在政权上未能给群众以新的印象，不是执行三三制⁽⁷⁾，而是争取某些旧政权整套机构，如垣曲为了争取旧政权，迟延至今未建立我政权，沁水仍为旧形式的一套。我们的政权必须是三三制的，其领导必须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最低限度亦应以有正义感的人去领导，绝对不允许让顽固分子来掌握。我们错误了解了宽大政策，企图争取国民党少数分子，而忽视了广大群众的力量，对某些坏分子未能给以必要的镇压，死心汉奸未杀一个，政权软弱，使群众日渐脱离我们。对财经问题也未提及，部队食盐困难，并未设法积极解决，正式税收不去征收。

(三)武装政策上，束缚野战军发展。区基干队机械规定三十人，我所掌握武装、枪支不及半数，未能积极设法收买。我军南下后，不但未扩补野战军，实质上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收集资材办法少，未引起党政军民之全体注意，未发动成为群众运动。近来如规定之交款可以子弹代替是对的，我们还应多方设法，太岳如能运送一部分盐去更好。

(四)群众工作上，我们的工作束缚得很紧，局面未打开。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缺点。我军政治力量虽有发

展，但对组织群众工作尚未开始，不会利用旧形式，加强其内部工作，使其变质，改造成为我们的力量，如对民团等。发展力量掌握得不够。因此目前中条仍需采取大刀阔斧的办法，如大量组织青年训练，组织工、农、妇、救亡团体干部训练班等。这是目前急需进行的工作。

（五）党的工作，组织恢复过迟。在我基本区四个月内仅恢复九十名党员。所以，目前我应迅速恢复党的组织，加强训练，好好进行教育。

在晋豫工作的同志，缺乏创造根据地的经验，亦缺乏根据地之观念，过高估计了晋豫工作的成绩及其他根据地之缺点。因此，客观上形成拒绝接受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经验，而着重在秘密工作。对财经建设毫无建树。这种现象，在晋豫区干部中普遍地存在着。党政群众干部均缺乏，就是有干部的，使用上亦有些不适当。

四、今后工作。

（一）应大量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中包括争取中间势力及较进步者。凡是估计我党将来不能隐蔽的干部，都可出来公开组织武装与进行公安系统的工作。在群众中有威望之党员，均应组织武装，即是编村村长，只要是我党党员，亦可组织游击小组性的武装。但注意不应过早改编游击队，防止性急，应进行长期工作。

（二）收集资材，应成为群众运动。我们基本上应依靠群众收集，多方设法，如召开座谈会等。如确知有资材处，必要时给看守者一部分钱而收买之。

（三）财经，应进行税收，财经粮食制大体与岳北同。

（四）中条政权，本身游击性大，除在一定位置，以少数人员工作外，应尽量到下面进行工作，召开群众大会，普遍开

办训练班，利用群众中现有武装，如民团，加强其训练。妇、农、工、救等群众团体，应用各种名义出现，恢复其工作。

（五）军队本身战斗手段，多采用伏击，多打小胜仗，目前主要任务是保护夏收。

（六）豫北、条西应动员大部力量，打入伪军伪组织中进行工作。这点我们做得远不及国民党。国民党的工作，在敌占区及我根据地内，较其统治区为好。有政权的党容易腐化、骄傲，排外性最厉害，这点应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与注意。

（七）干部问题。供给卫生干部缺乏，最近应将各团卫生员配齐；支队应物色一个参谋；五七团配齐政治干部。岳北应尽量输送一批党政干部去，派几个县长更好。尽量经过岳南送一部分食盐以解决困难，应组织运输队将收集之资材经常地运送给纵队，并应节约合作社干部，送往中条做税收及供给工作。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条山召集中共晋冀豫区党委、豫晋联防区、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联合办事处的领导座谈时讲话的一部分。一九四二年一月，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二九师派部队南下，创建中条山抗日根据地。至四月，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邓小平于五月前往中条山检查工作。

[2] 冀、绛、曲、晋、济，指山西翼城、绛县、曲沃、晋城和河南济源。

[3] 中条战役，即中条山战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在山西西南部中条山地区发动进攻。六月，国民党军溃退，日军随即占领中条山地区。

[4] 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军军长。

[5]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6] 端氏，镇名，位于山西省沁水县东南。

[7] 三三制，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政治攻势与敌占区同胞的关系^[1]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

确实掌握华北，使华北成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利用伪军伪组织做统治的工具，这是敌人今天对华北的最主要的阴谋。在这个阴谋之下，目前敌人在平汉路^[2]东某地，正实行大乡制^[3]，企图增强它在占领地的统治。同时，在平汉线上，越是靠近敌人据点的所谓治安区^[4]，“配给”的必需品越少，越是当“顺民”的村庄，敌人的压迫越不堪忍受，尤以征兵制、轮流训练、拉壮丁、编伪军，使人民感到很大的痛苦。

敌占区同胞的灾难愈深，他们对祖国的怀念将愈切。目前我们所发动的政治攻势，就是要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反对敌人的掠夺，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也就是保护国家的力量，以为将来配合反攻的准备。这里，敌占区同胞应该认清，政治攻势不仅是抗日军、抗日党派的事，更应是敌占区人民自己的工作，是伪军伪组织内中国同胞的工作。如真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就应做抗日准备工作，欺骗敌人，反对强编，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现在，保存一分抗战力量，就是增加一分反攻力量。

在敌人压迫之下的壮丁、伪政府人员，假若不能生存，可以到根据地来。我们一定要为之介绍工作，使之安家立业。不要相信敌人到根据地就得当兵的鬼话。伪军兄弟，如果不能生存，也可以过来，对你们绝对原谅，不咎既往，像抗日军一样

看待，绝对遵守朱、彭总副司令^[5]早已宣布的三大条令：不缴枪，不编散，帮助扩大抗日武装。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法西斯。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都应该一致起来，反对接近死亡的敌人。

八路军是华北人民的子弟兵。它不仅是属于根据地人民的，同样也是属于敌占区人民的。过去五年来，八路军为华北人民争取解放，艰苦奋斗，浴血抗战，已为根据地人民所共晓，但敌占区同胞对这一点认识尚不够充分。而今抗战道路更加艰苦，但胜利曙光已经在望，希望敌占区同胞与根据地人民密切结合，形成一个巨大的斗争力量，迎接行将到来的光辉灿烂的明天。

全区政治攻势开始后，已收到了初步成效，它虽有一定时间，但期满之后，应成为经常工作。希望出发到前方的部队，按照这个宗旨，团结敌占区同胞，耐心工作，严格遵守纪律。虽然任务比较艰苦，但只要鼓起劲儿，一定可以完成北方局、野政^[6]对我们的热烈号召。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为推动晋冀鲁豫全区展开对敌政治攻势发表的谈话，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曾联合发布《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指令》。

[2]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的一段。

[3] 大乡制，是日本侵略军为加强对华北占领区人民的统治而采取的户籍制度。即若干户为一甲，若干甲为一保，设保、甲长，若干保组成大编乡。

[4] 治安区，即敌占区，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时划分的区域。它们在治安区内，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推行连坐法，建立治安军、警备队、保安队等伪组织，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实施怀柔政策，进行各种欺骗宣传，以图掌握民心，巩固统治。

[5] 朱、彭总副司令，指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

[6] 野政，指八路军野战政治部。

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1]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2]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他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努力，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3]。后来都参加了长征^[4]。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5]、抗战建国纲领^[6]和党的政策，未尝逾越一步。他对于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到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导同志的口语。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水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便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他同同志谈话的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了一个错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千万。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他不特重视理论的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向下层向群众去学习，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

是不可能短文中一一加以介绍的。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这真是他的缺点吗？这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的健康的关怀罢了。

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祝福他健康，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特刊》，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2] 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

[3]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

[4] 长征，这里指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南部的瑞金等地出发的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余里，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5]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

[6]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

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后来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让步没有兑现。

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 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1]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一部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

我们没有可能对于过去五年多的对敌斗争作出详细的总结，只能就现有材料作出概略的研究。

抗战以来，敌我在华北的斗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抗战开始到武汉陷落（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这是敌人进攻作战阶段。第二阶段，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2]（一九四〇年底），这是敌人“治安肃正”^[3]阶段，也可说是其“总力战”^[4]的实施阶段。第三阶段，一九四一年到现在，这是敌人“治安强化”^[5]阶段，也可说是其“总力战”的强化阶段。

三个阶段的敌我斗争，各有其不同特点，兹分述如次：

一、敌人对我们的进攻。

第一阶段，敌人的重点是放在正面进攻，进行徐州、武汉诸会战^[6]。其对华北方针是巩固占领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企图以较小兵力，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其在本战略区周围兵力不过五万人。

此期敌人提出的总口号是“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其在本区之表现为：在军事上，开始采取“突贯攻击”，继之转变

为“分进合击”的战术，进行了三次大的“扫荡”，在“扫荡”中烧杀甚惨。在政治上，着重于恢复“治安”，首先建立治安维持会^[7]，招回流亡人民，实施小恩小惠，欺骗人民回家，大肆收编土匪散兵及封建武装，建立皇协军^[8]，开始组织爱护村，提出“一人护路万人享福”的口号。在经济上，掌握与没收占领地带之工厂、矿山，实行军事管理，一九三八年春成立伪联合准备银行，大发伪钞，吸收法币^[9]，并开始强征壮丁，一九三八年全年出关壮丁五十万人以上。

第二阶段，敌占武汉后回师华北，于一九三九年春由华北方面军提出“治安肃正计划”，同时在日本国内颁发“告总力战国民书”，于是开始其“总力战”。

此期敌人强化了巩固与掌握华北的斗争，其在本区之表现为：

在军事上，兵力大增，本区最多时约为八万人。一九三九年冬调走一部，尔后经常保持四万人左右，对根据地进行了十次大“扫荡”和进攻。一九三九年占领了长治、沁州^[10]、潞城、辽县^[11]等城镇，打通邯长公路^[12]，修筑白晋铁路^[13]，占领冀南所有城市，其战术指导则为“分区扫荡、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一九四〇年的军事特点则为展开大规模的交通战，实施“囚笼政策”^[14]，继续修筑白晋铁路，建成德石铁路^[15]，兴筑邯济路^[16]。在冀南大量修筑公路，密如蛛网，拟将根据地分划为井字、王字、田字诸形状，并开始铁路、公路线两侧挖掘护路沟。

在政治上，扩张与改进伪政权，强行发展维持，逐渐改维持会为县公署，利用与收买投降地主及较有声望人士，洗刷初期使用之流氓地痞；提出“与匪团比赛忍耐之斗争”、“要以五十年至百年掌握民心”等纲领，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剿共灭党”的口号，挑拨国共关系，配合反共顽固派向我进攻；加强宣抚工作，扩大特务活动，采用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加强伪军组织，改皇协军为“剿共军”，建立治安军、伪县警备队、警察、保甲自卫团及爱护村民的连坐法等；组织民众团体，掌握封建迷信组织，建立新民少年团、护路队、妇女队等，设立佛教会。在本区，一心堂、长毛道、六离会^[17]等曾猖獗一时。

在经济上，封锁根据地物资，隔断我平原与山地物资交流；大量发行伪钞，破坏法币；开发资源，整理煤矿，设立工厂，大量掠夺粮食、棉花，强迫种棉；成立合作社，举办随营商店，日人商店增加很多；大量倾销毒品，设立妓院、赌场，武安、榆太等县受毒尤深。

在文化上，实行“文化提携”，道以上均设报馆，改修县志，改编学校教材，普设日语课，组织留日学生和组织赴日参观。

总之，敌人强调了“军政会民一体”，开始了各方面的“总力战”。

第三阶段，其特点则为：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很大的震荡，使敌人重新考虑了问题，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了“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专致力于“剿共”。所谓“治安强化”，就是“治安肃正”计划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总力战”的进一步实施，也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更进一步的运用。在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两年内，敌人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次比一次毒辣，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18]爆发后，敌人更提出了“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所以在一九四二年的第四第五两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斗争特别尖锐。

前后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说。

一、二、三次是在一九四一年实施的。第一次口号是“育成强化乡村自卫力”；第二次口号是“乡村自卫力与军警协力以实践剿共”；第三次口号是“强化剿共工作，对敌匪地区实行经济封锁”。其在本区之表现为：

在军事上，较大“扫荡”共有九次，除太岳两次外，每次兵力都不很大，而小的“扫荡”和袭扰则甚为频繁，共有二百五十三次之多。此期的特点则在于敌人更多地着眼于政治进攻。鉴于百团大战的威胁，强调了敌占区的“乡村自卫力”之强化，开始肃清点线内之不稳分子，建立情报网和保甲制度，加强各组织之训练工作，有计划地整训与扩大伪军和警备队，组织与训练灭共自卫队、保甲自卫团或防共自卫团，身份证改为居住证，扩大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宣传，加强敌占区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奴化运动。

在经济上，一方面着眼于绝对统制物资，进一步达其封锁根据地的目的，同时进行了严重的货币斗争，打击我们的冀钞^[19]；另一方面则是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蚕食政策。多采用反复连续奇袭、奔袭的战术，学习并发挥了游击战术，加紧特务工作，在根据地内组织秘密维持会，大肆发展会门^[20]、青红帮^[21]，策动黎城离卦道暴动^[22]和准备沙河柴关暴动^[23]，实行自首政策，收买叛徒，派遣大批汉奸深入根据地活动。同时在“扫荡”时，采取“铁环合围阵”、“驻剿”、“清剿”的战术，实行“三光政策”^[24]，制造无人区，制造失败情绪，一切军事动作，都是配合政治特务进攻，达其逐渐蚕食根据地的目的。

其最严重的为冀南、太行二分区和沿平汉线^[25]，公路据点、封锁沟墙大大增加，平汉西侧向根据地发展了第二道封锁

线，碉堡平均每八百公尺一个，冀南与太行的交通被割断。这里还应注意的是一九三九年的较大“扫荡”一般在下半年，主要在冬季。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在敌占区的“治安强化”与对根据地的蚕食和经济封锁，都是为着缩小根据地，割裂根据地，以便于进行大的“扫荡”和企图摧毁根据地的目的。一九四一年的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准备了一九四二年对根据地的大进攻。

四、五两次“治安强化”运动是在一九四二年实施的，中间实行了一个夏防计划。第四次的口号是“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第五次的口号是“我们要建设华北完成东亚战争”、“我们要剿灭共匪”、“我们要确保农产减低物价”、“我们要革新生活安定民生”。其在本区之表现为：

在军事上，实行了十次大“扫荡”，每次兵力都比过去为多，“扫荡”时间更长，情况也更为严重。小“扫荡”及袭扰次数更为增加，共有二百六十二次之多。其在战术上的特点则为“铁环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等。结果，冀南根据地变为游击根据地，据点大增，平汉西侧构成第三道封锁线。太行占领榆社，太岳占领沁源并企图打通临屯公路线^[26]。上半年的蚕食曾引起根据地的严重形势。

在政治上，则继续加强以往的一套，强调了伪军的发展，实际上也有很大发展；强化敌占区的统治，切实实行保甲，编成大编乡^[27]，在伪组织内部实行“清政”，肃清不稳分子，注意健全下层机构，提倡深入下层；大肆掠夺壮丁，平乡一县即抓去四千人之多，特别提出“阵头主义”，要求各级官员亲立前线，将汉奸列在阵头，以便利统治民众，同时强调“中日军的协力”与军政会民的一元化。

在经济上，经济掠夺成了两次“治安强化”运动始终贯彻

的中心。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重点，完全放在粮食的掠夺上，其当时向根据地的“扫荡”，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敌人掠夺下，冀南吃亏最大。很明显的，一九四二年敌人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剿共”（“扫荡”和蚕食）、经济掠夺之上，以遂行其“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

以上就是五年来敌人对我们进攻的概述。

二、我们的对敌斗争。

五年来，我们同敌人在华北进行一天比一天尖锐、严重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人前进，实行正面进攻，在华北兵力较少，经验缺乏，更对我党我军估计不足，给了我们从对敌斗争中创立抗日根据地以非常优良的条件。此期我们充分利用了敌人的弱点，打开了局面。当华北中央大军南撤的时候，我党我军即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确定了坚持敌后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是环绕在打开局面，创造根据地与求得大发展的任务之上。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一九三七年我们先以一部在同蒲路北段作战，如在阳明堡火烧飞机^[28]，随即全部沿正太线^[29]作战，如七亘村、黄崖底、广阳战斗^[30]，都是在敌侧背配合正面友军防御作战；只有在太原失守之后，才是本师单独作战，如在正太路粉碎敌人六路围攻^[31]。一九三八年进行了三次反“扫荡”作战，其中尤以敌人调兵会攻徐州之前九路围攻^[32]晋东南之被粉碎为最激烈，我大部分力量使用于部长大道的伏击作战^[33]，打退了黎涉沿线敌人，光复了长治地区，伸向道清路^[34]活动，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同时于一九

三七年末，即对冀南派出东进小支队，作侦察式的活动，一九三八年春夏正式进入冀南，形成了冀南根据地的局面；当徐州、武汉会战之际，我们组织了平汉线津浦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余次大破击，给了正面的国军以很大的助力。

在政治上，我们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打击了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爪牙，打坍了晋东南、冀南广大地区的维持会及为敌利用的封建组织，如会门、自卫团、联庄会^[35]等，建立了广大地区的抗日政府；消灭了六七万皇协军及伪化了的土匪会门等封建武装，普遍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发展了正规军数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和民族教育，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打击了敌人“招回流亡，恢复治安”的欺骗人民的诡计；游击队不断地在铁路两侧的活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敌人的护路计划。

在经济上，我们尚无何种设施，亦未引起注意；敌人则有相当成就，但在广大乡村被我控制的条件之下，敌人未能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我们军事政治斗争的结果，把敌人束缚于点线之内。这是我们的大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敌人回师华北，实行“治安肃正”计划，华北斗争局面开始严重。此期我们的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36]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十次反“扫荡”作战。一九三九年在太行区进行了敌人打通部长公路及我们收复部长大道的斗争；一九四〇年则由我们主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交通线斗争，以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其最大者为冀南全年的破击交通线斗争，五月白晋战役^[37]，特别是由八月二十日开始直

至年底的百团大战，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计划。一九四一年全年之激烈战争的结果，敌我双方均有相当的削弱，敌人伤亡较我更大（九与七之比）。

在政治上，根据地日趋巩固。一九三九年我党我军仍有相当发展，群众有相当发动，抗日政权初具规模。而一九四一年夏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38]的成立，在统一本战略区强化根据地建设上，特别在对敌斗争上，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阶段，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处在寇奸夹击的困难局面当中，一方面顽固派进行蛮横的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另一方面敌人则抓住机会挑拨国共关系，积极配合顽固派向我们进攻。一九三九年冀南、太行、太岳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直至一九四一年初，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怀英明的直接领导，人民的拥护，以及军事斗争的胜利，才打开了局面，既巩固了根据地，又巩固了国内的团结，打击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

在经济上，一九三九年我们仍然是忽视的，民生凋敝，军队供给极端困难，在敌占区只有需索而无工作，故征集资财亦无成绩，这是我们（主要是太行区）最穷困时期。一九四一年我们才开始注意经济问题，在根据地注意生产和节约民力，在敌占区反对“把敌占区变为殖民地”的观点（结果又形成了完全不到敌占区工作的偏向），根据地民众才缓过气来。同时，一九三九年发行了冀南钞票，加强了经济斗争力量，军需才有了保障。但在此期间对敌经济斗争的成效，则甚为微弱。

在反特务斗争上，我们只作了些防御工作，故敌人的特务政策仍有相当成就。

此一阶段，在巩固根据地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成绩，但忽视了敌占区工作，虽曾屡次提出纠正，转变很少。一九三九年

在敌占区的需索政策，给了敌占区人民以很坏的影响，大大损害了我们的政治声望；一九四一年的不到敌占区，没有挽救这个损失，这恰恰给了敌人以巩固占领区、扩大占领区的很大便利。而一九四一年讨逆战争^[39]后的冀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40]前后的晋东南，都产生了政策上“左”的错误，既损害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又帮助了敌人扩大其社会基础。一九四一年四月黎城会议^[41]，克服了混乱，强调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有其明显的成绩，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确的。但在部分问题上亦有其片面性的缺点和错误，如对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及敌占区工作重视不够，对游击战争的分量估计不够，过分强调了正规军，编并地方武装，结果更便利了敌人的前进和造成了我们的退缩。这一阶段斗争的结果，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开始建设根据地。但敌人亦有其相当的成就，这是与我们忽视了敌占区的政治工作和一些政策错误有关的。

第三阶段，敌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我们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双方都走向深入，斗争进入空前尖锐化的阶段。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十九次大的反“扫荡”作战和五百一十五次反小“扫荡”与袭扰，两年作战达七千九百七十六次之多；我们于一九四一年初即强调了军区建设工作，纠正了对地方武装的编并与放任的错误，县区基干队建立与逐渐健全了，不少正规兵团地方化了。人民武装主要是民兵的建设，打下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基础，两年来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能力，开始起了很大的作用。游击集团的组成上亦有进步。这些都大大地增强了保护根据地的力量。一九四一年开始注意向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但各地对此了解较差，收效不大。一九四

二年成立武装工作队，认真地注意了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提出与加强格子网^[42]内的斗争，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43]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抗日政府的负担面在太行区有了相当的扩大；冀南则在根据地变质^[44]的条件下，顺利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太岳亦有不少成绩，并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山的局面。惟在某些区域，向敌占区发展的注意力仍嫌不够。

在政治上，一九四〇年底北方局指示了一套明确的政策，一九四一年成立了临时参议会^[45]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46]，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有了显著的进步；惟一九四一年对于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仍在忽视之列，所以民主建设等工作，还是架在云端之上而无确实的成就。对敌占区和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北方局提出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开始某些地区不懂得这个政策的进攻性，反变成了主动的退缩，帮助了敌人的蚕食，纠正后获得了不少的成功，冀南对伪军的工作成绩尤大。在反对敌人的蚕食斗争，反对敌人的特务政策，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等方面，一九四一年没有多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则各地都有大的进步。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无论太行、太岳和冀南，在这方面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在经济上，我们在一九四一年即已提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因在摸索之中，未获多少成就，冀钞对伪钞比值甚低，物价高涨即其一例。一九四二年则一改旧观，太行区不仅在根据地建设上有不少成绩，而且在对敌占区经济斗争上，也创造出一些经验，获得了初步的较大的胜利。不过冀南、太岳在经济斗争上仍然无力，敌人收获亦大，应加注意。此问题将有专门

报告，勿庸多述。

在反特务斗争上，一九四一年前，对敌人破坏根据地千奇百怪的特务活动警惕不够，直至黎城离卦道暴动、柴关暴动的惊人事件发生后，才略有注意，但对敌人之毒辣性一般均认识不够深刻，虽群众运动发展之后有些进步，但至今仍是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的事情。

在文化宣传上，我们曾于一九四一年进行了对敌三次政治攻势，在敌占区作了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在打击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振奋人民抗日情绪上，起了不小作用。一九四二年继续进行了三次政治攻势，配合以游击活动，在某些地方曾结合敌占区民众反对捕壮丁、反对配给的斗争，而以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一次为最成功。这是因为过去几次政治攻势，一般只作了一些宣传工作，而反第五次“治安强化”的攻势则主动地抓住了反对敌人抢夺粮食斗争这个中心，组织了真正的一元化斗争，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再配合以恰当的反汉奸、反维持、反特务的斗争和宣传鼓动工作，故成绩甚大。但必须指出：过去的政治攻势，也可以说五年来，我们都一般地忽视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照目前情形看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经过了几次政治攻势和一九四二年的敌占区工作的前进，敌占区的状况与过去大大不同了，我们的政治影响大大地扩大了，人民都认识日本必败了，这就打下了我们在敌占区进行组织工作的基础。可是过去我们是不可容许地忽视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今后则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总起来看，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

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以上就是我们对敌斗争的概述。

三、从变化中来看敌我斗争。

(一) 先从敌人和敌占区方面来看：

1. 敌军。敌军在华北的兵力，一九三八年夏共有十五个师团，在本区周围共四个师团及两个混成旅团的番号，人数约五万人。一九三九年夏敌人回师华北，兵力大增，总计有二十个半师团，在本区者约八万人，为全盛时代。一九三九年冬调走约五个师团，此后直到现在，经常保持十五到十六个师团。本区经常保持将近四个师团兵力，现有约四万一千八百人，计太行一万七千一百人，太岳一万三千三百人，冀南一万一千四百人。一九三九年冬以后，数量虽无多大变化，但质的变化颇大。本区现役师团全部调走，预备师团仅留一个（一一〇师团主要不在本区），现有者为四个乙种师团，两个丙种师团及五个混成旅团番号，而兵员亦多不充实，缺额甚多，如四混成旅团定额九千实不到五千人，同时据点增多，守备地区扩大。以四混成旅团来说，一九三九年守备四个县，现兵员减少三分之一，反而守备十个县，因此，形成了敌人兵力不足、兵力更加分散、机动兵力减少的弱点。但是，必须注意一点：敌人的正规师团强于作战，混成旅团强于政治，且久驻一地，情况熟悉。本区混成旅团及以混成旅团为基础编成之师团较多，照过去经验，凡混成旅团控制区域，斗争比较复杂，此一特点，深堪重视。所以，我们不能只以战斗力强弱去估计敌人，还应从政治上的强弱去估量敌人。

很明显的，今天华北敌人战斗力，只有在现有兵团的正规作战性能上看，才能认为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弱，但在其机动能力与善于游击动作来看，则还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对我战术有

很大发展，特别在政治上是加强了。我们不能忽略其政治的一面，而对敌人的“总力战”茫然无知，不加警惕。同时，我们也不能只就敌人现有守备兵团去估量敌人的强弱。当敌人进行一个区域的“扫荡”时，可以从其他战略区抽调兵力，甚至还可以从华北以外抽调兵力（敌仍保有强大的预备队）来加重我们的负担。此点尤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而懂得从最困难的局面着想，去准备今后坚持华北的斗争。

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敌人亦有其基本弱点。敌人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争，其加重华北兵力虽有可能，但亦有限度，故不能改变其兵力不足、兵力分散的弱点。今后全区性的“扫荡”必然增加，但敌人不能在全华北所有区域同时进行大“扫荡”，有时对于一个区域也不能进行全面的“扫荡”，这就造成了此起彼落、此落彼起的形势，这就告诉我们要善于抓住空隙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同时，还要看到敌人内部特别是士兵、下士官的政治情绪日益下降。第一阶段异常顽强，第二阶段开始对战争表示厌倦，第三阶段军队中厌战情绪一般化，士气日渐低落。而且由于敌人分散守备，内部并不完全一致，两个系统、两个据点之间的敌人，因为地域关系、掠夺赃物等问题也有磨擦，故有某种程度的缝隙为我利用（已有这样经验）。这些说明我们对日军工作的可能比前增加，今后应该增加它的比重。

2. 伪军。伪军人数，在抗战初期，为数很多，但素质极弱，经我大量消灭，所余无几；第二阶段，敌又重新建立，逐渐改变成分，加强质量，有相当发展；第三阶段，则有很大发展，士兵成分多为强征的壮丁。伪军大发展时期为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仍有发展，较一九四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现全区计有伪军六万零二百四十人，内太行一万

五千一百一十五人、太岳一万二千八百人，冀南三万二千三百二十五人。敌伪比例：山地一般为五比四，平原则为一比三。由此可以看到，冀南局面的日益严重与伪军的日益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这也可以看到，敌人采取了强化伪军的方针，以弥补其兵力不足、兵力分散的弱点。

伪军大量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敌人的重视，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的弱点，特别是政策运用上还有毛病。首先，与我们过去长期忽视敌占区工作有关。伪军大发展时期（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恰恰就是我们向后退缩的时期。第一阶段我们在敌占区的“抓一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初期不到敌占区，都给了敌人发展伪军以便利。其次，对伪军工作本身，我们不仅忽视了打入工作，至今一般只有外部的关系，而无内部的组织基础，而且在政策运用上也有偏向。我们对伪军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瓦解，瓦解的方式有打击，有争取，是争取与打击的灵活运用，主要是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争取正是为了瓦解的目的。自然，我们瓦解的方针，并不等于急求反正，更不等于零星逃跑，而要以是否适合于抗日斗争乃至反攻的需要，来决定其反正、削弱或埋伏。过去我们强调了争取，而又忽视了打入的组织工作；强调了现有伪军的争取，而忽视了阻止伪军发展的工作；强调了政治争取，也作了一些必要的军事打击，而忽视了政治上打击伪军伪组织的工作。过去我们提出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口号，如用之于已经当了伪军和汉奸的人，则是适当的，但是把它变成敌占区的口号则是错误的，而且对伪军、汉奸也不能只是这个口号或以之为中心口号。更主要的还应强调反汉奸、反伪军伪组织的宣传，指出当伪军当汉奸是可耻的，只有使他们懂得自己失足的可耻，才更便于我们的争取，也才会做到

“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些都是今后应该注意的。

再从伪军内部政治情绪来看：第二阶段是依靠敌人的情况发展，可说是比较稳定的时期。第三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都考虑到战后靠山的问题，加上成分的变化，敌伪矛盾大大发展，给了我们争取的便利条件。我们在利用敌伪矛盾，经过社会关系，争取伪军家属去打通伪军关系，发展两面派等方面，曾获得不少成绩，创造了不少经验。但是必须指出，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注意了伪军工作，在其中建立了相当基础。直到今天，在伪军中，国民党力量仍大于我。经验证明：凡国民党有基础的伪军，我们较难进行工作，这是值得非常警觉的。

3. 伪组织。与伪军的变化差不多，不必赘说。这里只提出一个问题，即摧毁与掌握伪组织的问题。经验证明：要摧毁那些最坏的伪组织，才便于我们争取更多的两面派和建立革命两面派，故不能一般地作普遍的摧毁。但在一定时机，环绕一个中心任务，应坚决打烂敌人的统治机构，以达成破坏敌人的企图，完成我们的任务，仍是必要的。最好的例子是在太行、太岳反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我们为了打破敌人的灌仓计划^[47]，普遍打烂了维持会，虽然也打断了一些我们的关系，但在打击敌人、保护敌占区人民利益，及完成我们一定任务上是成功的。所以打断与否，要看当地当时的情况和我们的中心目的来决定。

4. 敌占区人民。第一阶段，敌人前进，只控制了点线，敌占区范围很小。由于我坚持华北抗战，得到敌占区人民的热烈拥护，此时我只做了一些宣传工作，群众对我一般尚好，但我游击队的纪律不好，也种下些不好的影响。

第二阶段，敌占区扩大，游击区亦扩大，我们发生了严重

的向敌占区游击区需索的错误，加上敌人的欺骗和镇压，人民抗日情绪低落，对我观感很坏，游击区变成的敌占区亦然。一九三九年末，我提出了“反对把敌占区变为殖民地”的观念，又发生了不到敌占区和不敢到敌占区的现象。有些部队到了敌占区，也只是游一游。在政治上，我们并未真正结合敌占区人民，为他们着想，帮助人民解决困难，告诉他们如何去同敌人作斗争的具体办法，就是说没有一套敌占区政策。就是百团大战的军事胜利也由于在敌占区没有政治工作，没有把握政策，巩固胜利，以致退缩。一般说来这一阶段敌占区人民对我始终隔膜，过去的不好影响尚未得到纠正。而讨逆后根据地的“左”的错误，逼跑了一些人到敌占区，加上敌人顽固派利用我之弱点，大肆造谣宣传，在敌占区影响甚大。

第三阶段，一九四〇年九月北方局高干会议及十二月的县干会议，提出了敌占区政策，特别是革命两面政策的提出，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在执行初期，也曾发生了一些偏向。这些偏向帮助了敌人的蚕食，这在以后还要说到。五月在太行区提出了反对关起门来建设的倾向，尔后才开始了对敌占区工作的注意。同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敌人的高度掠夺与压迫，提高了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加之根据地建设进步，引起了敌占区人民的羡慕，我又不断进行政治攻势，才改变了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但是这一阶段，我们仍仅有宣传工作，而缺乏对组织工作的注意，故虽打开了门路，仍说不上有多大基础。这说明敌占区人民的动向，主要决定于我们的政策，不仅是对敌占区的政策，而且是对根据地的政策。我们发生错误，就会便利敌人和顽固反共派发展其在敌占区的基础。

5. 游击区。游击区是敌我争夺的焦点，人民生活也最痛苦，对敌负担较敌占区为重，还要对我负担。我们过去长期忽

视了这个特点，对游击区一般只有财粮任务，而无明确的政策，游击部队纪律不好，游击区人民遭到敌我两面的夹攻，于是敌人抓住这个弱点，一面镇压，一面欺骗，斗争结果，游击区多被敌人蚕食变为敌占区，一部分变为无人区。我们是失败的。第三阶段才开始转变，特别是一九四二年获得一些成绩，如太行二分区就做得不错，一方面正确执行革命两面政策，一方面加强了游击区的军事政治指导，曾把游击区的一线定为斗争“胶着点”，于是阻止了敌人的前进，把一部分游击区变为根据地，还将不小的敌占区变成了游击区。这说明小游击队深入敌后配合党的地下工作，执行党的正确政策，作用很大。这种经验各地都有一些，值得研究与仿效。

一九四二年斗争的特点是，敌人前进，我亦前进，游击区大大增加。这种现象将来更要发展，这引起我们对游击区斗争的严重注意。要有一套游击区的做法，今天这个问题还未完全解决，而游击区人民负担太重，人民生活太苦，更应从我们这方面加以关注。

（二）从我们这方面来看：

1. 武装。抗日武装是对敌斗争的骨干，是坚持抗日根据地的主力。我们武装政策和军事指导原则是否正确，关系特别重大。我们的武装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前半期有了很大发展，一九四〇年达到了最高峰，一九四〇年以后即有逐渐的部分的削弱，但在素质上则有很大的提高。我们的武装政策，从整个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一九三九年以前我们掌握了发展，以后则注意了巩固和提高战斗力。从战斗来看，五年半共作战一万三千一百一十五次，敌伪伤亡十一万四千一百五十四人，我军伤亡四万四千一百三十五人，敌我伤亡为八比三。战斗次数每年增加，敌我伤亡则均逐年减少，如抗战第二年战斗一千

三百六十三次，敌人伤亡四万一千四百四十四人，我军伤亡七千八百二十四人；第五年战斗增到四千八百七十三次，而伤亡则减至敌人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二人，我军九千人；一九四二年后半年战斗增至三千一百零三次，敌我伤亡则为敌八千一百九十四人，我二千六百一十七人。这是游击性增加和我战术上进步的证明。若以野战军与地方军相比较，以野战军每年为一百，则地方军（包括游击队）一九三八年为二九强，一九三九年七十强，一九四〇年五十强，一九四一年七七强，一九四二年约为二百弱。一九四〇年地方武装削弱是由于编并错误的结果。一九四一年以后地方军比例大增，是由于又把许多野战军变为地方军，同时注意建立地方武装的结果，也是游击性增大的表现。这证明我们在武装建设上是走了弯路的。从武装政策对敌斗争的影响来看，一九四〇年编并地方武装的结果，影响到了游击区的坚持，是形成一个时期内严重退缩的主要原因之一。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引起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说明我们武装政策的重要，也说明对敌斗争应隐蔽力量不可过于刺激敌人的重要。

武装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武装特别是民兵的建设问题。这是群众游击战争与坚持根据地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人民武装建设是从一九四〇年开始的，到一九四二年已开始培养出了相当的战斗能力，已经在保卫根据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现有人数还少，冀南则多随根据地变质而坍台，且各区发展仍不平衡，脱离群众现象仍很严重，教育仍很缺乏，军事训练多学正规战术，政治训练与群众生活联系少，故不能以现有成绩为满意。估计到今后的斗争环境，特别顾及到人民负担的可能程度，脱离生产的武装，还有在精兵主义的原则下继

续减少的可能，所以今后必须更加强调民兵的建设包括数量的发展，军事政治质量的提高，及武器主要是地雷、手榴弹和民间旧式武器的解决。

2. 根据地。我们过去和今后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堡垒，没有根据地，就不能设想过去五年多的胜利，更不能设想能够坚持今后更困难的斗争。关于根据地问题，彭德怀同志在去年十二月中旬的报告中^[48]指示得很清楚，不必再费篇幅。这里只说我们根据地几年来大概的变化。

本区根据地在一九三七年冬或一九三八年初即已形成，经过几年的反“扫荡”反蚕食及一度反顽斗争中，才逐渐巩固与坚强起来。冀南则在敌人严重进攻下，业已变为游击根据地，其所以仍能坚持游击战争，也在于过去有了根据地建设（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党的建设）的相当成绩，并从纠正“左”右偏向中，基本上巩固了统一战线。太行、太岳的根据地逐年都有一些缩小。这是由于敌人进攻的结果，也是我们发生了某些错误的结果，前面已经说到这点。但总的方面来看，根据地是日益巩固的。

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与对敌斗争是不能分离的，要击退敌人的“扫荡”和蚕食，才能保卫根据地；要打击敌人的经济进攻，才能建设起根据地的经济，以保障军需民生；要打破敌人挑拨离间特务阴谋，才能巩固根据地的团结。过去的经验证明，关起门来建设是要失败的。

根据地的建设与开展敌占区工作是不能分开的。根据地巩固与建设的成绩，给了人民以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光明的希望，反之，如果根据地不巩固或发生错误，也可增加敌占区人民的离心倾向和失望情绪，便利了敌人的统治。这也是几年的经验

所证明了的。

今天，平原已经变为游击根据地，今后山地还有可能缩小或被敌分割，游击性必大大增加。我们必须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和开展敌占区工作，来迎接最困难的斗争局面。我们有足够信心，依靠过去几年的成绩，丰富的经验，和开展敌占区工作的方针，一定能够坚持根据地到抗战的胜利，并为战后打下和平建国的基础。

3. 根据地人民。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敌占区人民的变化已如上述，根据地人民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抗战初期，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有了相当发动，其后由于敌人的摧残，战争的影响，和根据地建设极差，民力的浪费等等原因，形成了一九三九年民生凋敝、情绪低落的严重现象。一九四〇年后我们开始根据地建设，强调爱护民力，组织生产，民生始甦，根据地日渐繁荣，人民抗日情绪大大提高，特别在敌人不断“扫荡”下，坚强地锻炼了人民的斗争意志。但是，过去我们长期忽视了深入减租减息、合理负担^[49]等改善民生的工作，广大的基本群众尚未发挥其应有的抗日积极性，这样是经不起更严重的风波的。一九四二年执行中央指示^[50]后，这方面已经引起注意。今后则应坚持发动群众工作，注意爱护民力，实行精兵简政^[51]，提高人民生产热忱。而发动群众中，尤应注意于农村统一战线的巩固。有了这样的条件，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这就是五年来敌我斗争中的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敌人力量开始向下，敌占区已经开始了巨大的变化而有利于我。但敌人今天仍保有强大的优势，其“治安肃正”与“治安强化”工作，亦有不少成就，经验亦很丰富。在其变

华北为大东亚兵站基地的方针下，敌人必将加紧“总力战”，特别在其愈接近死亡的时候，对我们的进攻，必愈残酷、愈毒辣。这决定了今后斗争的空前残酷性。历史上的经验证明，我们愈接近胜利的斗争，将愈是残酷的。

说明了我们的力量是在不断增强着。我们已经打下争取抗战胜利的基础，但今天我们仍居劣势，故应百倍地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不仅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更主要是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和敌占区的工作。有了坚强的信心和坚强的实际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走向胜利。

四、小 结。

在五年来敌我斗争及其所引起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

（一）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今天敌我双方都进入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阶段，这说明了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我们在此复杂斗争中，下层干部能力甚嫌不够，今后应切实注意加强下层，提高下级对敌斗争的能力。

（二）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过去我们对此原则认识不够，常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每次暴露的结果，都遭到敌人的报复或破坏，吃亏很大。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惟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敌人也

很注意隐蔽问题，如敌一一〇师团的文件即曾提出“不震荡敌人，不刺激敌人，突然的跃进”的策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而收到了效果（如每次“扫荡”、蚕食前的准备），故我们一方面要隐蔽自己，一方面也要善于发现敌人。

（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人民即使反对敌人而对我中立，也只是便利了敌人。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政策，不仅根据地的政策要正确，尤应在敌占区、游击区要有一套明确的政策，否则发生错误，易为敌所乘，而敌人则恰恰善于利用我们的弱点以弥补其在中日矛盾中的基本弱点。经验证明：过去有一时期因为我们政策错误，敌占区人民对我采取中立乃至反对态度，给了敌人以很大发展。经验又证明：敌占区工作不开展，根据地也要退缩；游击区不能坚持，不仅根据地要退缩，而且失却了向敌占区前进的有利阵地。经验还证明：在敌占区、游击区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是必然失败的，而必须照顾那里的环境，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

（四）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这正打到敌人的痛处。现在敌占区开始起了有利于我的巨大变化，其基本表现就是人民抗日情绪大大增长，敌伪矛盾发展。我们应好好抓住这个基本特点去发展工作，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经验证明：在敌占区不应该去扩大中国人自己的阶级矛盾，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能如此我们便能开展敌占区工作，

反之我们便不能在敌占区立足。经验又证明：团结中国人对敌，也包含有斗争。斗争的内容，主要是反对那些不明大义、破坏团结、帮助敌人、自私自利的个别分子，而斗争方式也应是和平的、政治的。只有对于那种死心事故、为人民所痛恨的汉奸、特务分子，才采取坚决打击的方式。在根据地亦应切实注意巩固团结问题，比如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法令的执行，是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打下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发挥其更伟大的抗日力量，这是完全必需的；但是在发动群众中，必须把它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这仍是今后应该注意的。坚持根据地，需要广大的基本群众的发动，同样地也需要各阶层的团结，忽视了任何一面，都将发生错误而有利于敌人。

（五）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性。经验证明：没有根据地，就不能坚持对敌斗争；没有对敌斗争，企图关门建设根据地，也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存在。今后要更加加强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努力建设根据地，进行顽强的保护根据地的斗争；同样要在敌占区组织强有力的斗争，以保护根据地。

（六）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敌进我进”的斗争，也表现于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

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总之，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应是今后非常注意的问题。

（七）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由于我们过去对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期间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影响对敌斗争甚大。这也是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敌强我弱的特点了解不够所致。今后（在反攻之前）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方面一九四二年已获相当成绩，此后还应加强其指导。对于武装的爱护和党员干部的军事化，亦应切实注意。

（八）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了“一元化”的斗争。过去经验证明：一元化实行得好的地方，对敌斗争才有力量；如果内部磨擦，互相埋怨，结果只会放松或放任对敌斗争，遭受很大的损失。今后应根据中央对敌后根据地统一组织机构的决定^[52]，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

（九）过去我们同志一般有坚持敌后抗战与取得胜利的明确观念，而尚未树立起巩固战后在华北阵地的明确观念。这从几年来忽视敌占区工作，可以证明。而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着眼到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准备战后的问题，故先我取得先机，已有不小成就；我们则在战略上大大失算，需要从今后的努力来补救。我们同志对于我们在敌后斗争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全国这种政治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往往缺乏全局观念，在言论行动上，政策决定上，都还有不慎重的地方，对中央的方

针，还缺乏深刻的了解。这些就是中央指摘的闹独立性、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这个观念应在于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来。

（十）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方局和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对于敌后坚持的原则，历来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指示。我们基本上执行了这些方针和指示，所以我们有几年来的成绩。但一到我们对中央和上级指示了解不够的时候，就要发生错误，如对游击战争的认识不够，对敌占区工作的忽视，影响很大，损失不小。这教训我们：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第二部分 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

一九四二年恶斗的结果，世界战争的主动权业已转入同盟国^[53]的手中。苏联战场，苏联于斯大林格勒解围^[54]之后，旋即进行中路、南路的反攻。现已前进至距斯摩棱斯克二十余英里，距罗斯多夫六十英里的地方，德寇正在不断败退中。十二月英美在北非的登陆与胜利，给开辟欧陆第二战场架上了宽广的跳板，同时欧洲被法西斯蹂躏的各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游击战争所构成的第三战场在日益开展中。这些说明希特勒^[55]正处在溃败的过程中，其最后败亡之期已在不远。在东方，经过日本在所罗门群岛海空战^[56]失利之后，战争的主动权，亦已

落在同盟国手中。日寇在中国战场，虽曾发动了若干次的正面进攻与敌后的频繁“扫荡”，然并无多少成就。从总的方面看，日寇虽不似德国已经走向崩溃之途，而尚保有强大的后备力量，但其下降的趋势则是很明显的。在不久的将来，德寇败亡之后，日寇的崩溃时间便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必须看到，日寇实力虽在下降仍甚强大，仍有作困兽之斗的力量，甚至在今年内还可取得一些战术上乃至战役上的重大胜利。这种胜利虽不能改变其战略上业已肯定的败局，但亦可欺骗人民于一时，引起若干的思想混乱。尤其重要的是，日寇愈感其局势危险的时候，愈要强化其大陆政策^[57]，企图控制大陆作为长期战争的根基，以作困兽之斗。敌酋今年元旦强调解决中国事件，强调“消灭渝共”，今年一月九日汪逆对英美宣战^[58]的丑剧，便可证明其战略布局，将于今后对我国加强其“正面进攻”和“敌后扫荡”。

敌人对于华北从未放松，以其一半兵力对付敌后，便是明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了“把华北变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方针，两年来的敌我斗争更形尖锐。而我们则从五年多斗争中，坚持了华北抗战，根据地日趋巩固，粉碎了敌人“掌握华北”的计划，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各根据地已大致被敌分割，平原变为游击根据地，山地游击性增强，敌人今后对我们的压力必将加重。最近敌人正实施新国民运动^[59]，王逆揖唐^[60]强调以“确立治安”、“增强农产粮食”、“开发国防资源”为今后三大目标，深堪重视。这些都显示了我们今后坚持敌后任务之繁重和斗争的艰苦性。今后的艰苦，将可能表现出如下的特点：

敌人在华北的兵力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敌人“清剿”式的“扫荡”更加频繁，蚕食更加猛烈，“三光政策”更加残

酷，我们将进行严重的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

在平原，敌人将增加据点、碉堡和封锁线，将完成大乡制^[61]，将实行猛烈的抉剔地下组织的“清剿”，将可能无村不资敌；山地某些重要城镇可能被敌占领，某些大道可能被敌打通，根据地将被敌更加割裂，游击性增加。我们将在更困难的条件下，采用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与敌人斗争，坚持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

敌人向根据地前进，我们向敌占区前进，敌人掌握敌占区，我们开展敌占区工作，将形成错综复杂、互相插花的斗争局面。我们将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和灵活运用的政策去与敌人斗争。

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不能在各个地区同时进行，我一区受到摧残，他区可利用时机发展，这将形成此起彼落、此落彼起的斗争局面；我们将利用这个特点来进行恢复或发展的工作，达到坚持的目的。

敌人对我们将强化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的“总力战”的进攻，我们也实行一元化的斗争去反对敌人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并向敌人进攻。敌人的进攻和破坏，还会引起我们财政经济的困难，我们不应自满于现有成绩，而必须作进一步的打算。

直至反攻前，我们的斗争环境将是逐渐严重的。如果不认识这些困难，疏于警惕，而致忽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那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这些困难我们都是能够克服的。克服的条件是：国际国内条件于我有利，同盟国争取了主动权，法西斯正在下降，国内团结更趋巩固，胜利到来的时间不远，我们在敌后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根据地日益巩固，各方面建设均有不断的进步，已成为坚持抗战的坚强堡垒；敌占区已经开始了

巨大的变化，中日矛盾大大发展，人民确信日寇必败，我之政治影响扩大，打下了建立组织工作的基础；我有了五年半坚持华北的丰富经验，党中央、北方局和朱彭总副司令^[62]领导的正确，党政军民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一致努力，给了胜利以保障。有了这些条件，只要我们在工作中不犯严重错误，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达到胜利。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今后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根据地，从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各方面去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

实现这个方针的具体任务应该是：

第一，在根据地，必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各阶层的团结，大大发挥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准备足够力量，以反对敌人的蚕食、“扫荡”和来自各方面的进攻。

为此目的，必须加强根据地的民主精神、民主教育和民主政治的建设，以巩固各阶层的团结，并为战后建国打定基础，以示范于全国；必须认真地彻底地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改善人民生活，以进一步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应切实保障农村统一战线进一步的巩固，在平原，则应从进一步发动各阶层人民团结对敌中，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必须加强抗日武装的建设，而着重于地方武装的巩固及人民武装（民兵）的发展和战斗力的培养，提高正规军的质量和游击战术的修养，一切为了发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进行胜利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保卫根据地；必须加紧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着重于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以保障军需民生，并打定自给自足的基础；必须加强游击区的斗争，这是保卫根据地，开展敌占区的重要环节之一。

第二，在敌占区，必须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小型的隐蔽游击根据地，加强敌占区人民中、伪军伪组织中的组织工作，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并配合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为此目的，必须在敌占区强化政治攻势，并把政治攻势经常化；必须认真地实行打入工作，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建立组织基础，在敌占区建立与发展革命力量；必须以保护人民利益，减少人民对敌负担，保存民族力量为出发点，去团结敌占区各阶层对敌斗争；必须在敌占区实行革命两面政策，对敌进行巧妙的隐蔽的斗争。

第三，为着胜利地进行今后的艰苦斗争，必须执行中央指示，加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认真进行整风工作，并实行精兵简政，改善组织形式，缩小上层机关，加强下层力量，以适应于今后的斗争环境。

这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三部分 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

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打入”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是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发展革命工作，是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

没有组织工作，就不能在敌占区、伪军伪组织的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我们的组织基础。过去，党曾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上，我们不但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严格说来，简直还没有真正开始。

过去，我们某些部门也曾做了一些尝试，个别的是收到效果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我们曾抽调一部分干部派到敌占

区，企图打入伪军伪组织中去，但因为派出的干部多与当地的工作对象缺乏一定的联系，始终得不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般不善于从广大的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内部去物色打入人才，不善于争取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开明进步人士去实现打入工作，不善于争取伪军伪组织内部的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变为我们的打入干部，不了解只有他们才与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他们才具备打入工作的现实条件。实际上这样的机会过去是不少的，问题是我们轻易地放过了。在伪军伪组织中，有一些是可以争取成为革命两面派的，个别的已经成为革命两面派。试问，我们除了对他们作些宣传，发生联系，取得情报之外，又做了多少工作，使其进步，成为打入生根的组织力量呢？甚至有某些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们自己工作的混乱，不守秘密，而遭受敌人的破坏，这更是痛心的事。由于主观主义的做法、关门主义的狭隘作风和相当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使我们的敌占区工作始终停留在宣传阶段，所谓组织工作至今还只是口号。反观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它就着眼于在敌占区积蓄力量，着眼于战后优势，努力争取伪军伪组织，派人打入、长期埋伏，在敌占区建立它的党和特务组织，依靠封建势力为基础，以掌握各种封建组织乃至帮会、土匪，其成绩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对此，能不警惕！

时间不容许我们再稽延了。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要求我们加紧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以紧张的缜密的工作，打下反攻和战后的基础。

今天我们在敌占区虽仍处于劣势，但是敌占区一年来的变化具备着空前有利于我们进行组织工作的条件：敌占区人民同日寇的矛盾空前增长，今后还会日益加剧，人民抗日情绪增长，大大地扩大了我們进行组织工作的社会基础；我党我军及

抗日民主政府在敌占区的威信大大提高，而且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有不少的进行组织工作的线索；伪军伪组织人员一般是华北人，有身家顾虑，且已逐渐相信华北是与八路军共产党不能分离的；国民党威信在逐渐下降（这是它的特务政策和在敌后破坏抗日工作的结果），其组织基础也有了部分削弱。

但是我们也有困难：敌人的特务方法高明，对伪军伪组织的掌握将会特别加强，对敌占区的控制政策将会加紧；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借刀杀人政策，必将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障碍；我们本身缺乏在敌占区进行组织工作的经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狭隘作风影响到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干部掌握政策的能力还差，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和常识。

我们要利用有利的环境，尤其要注意克服困难，主要是克服自己方面的困难，并从工作中创造许多宝贵的经验。

现在说几个具体问题。

一、打入工作。

打入工作是组织工作的第一个问题，是开门见山的问题，不能打入就谈不到一切。

打入的对象是很广泛的，打入到敌占区群众中去，打入到敌占城市中去，打入到伪军伪组织中去，打入到黑团、帮会、土匪中去，打入到一切组织中去，而伪军应该是目前打入的主要对象。

打入工作的任务是：长期埋伏，进行隐蔽的、巧妙的、谨慎的宣传组织工作，积蓄力量，提高自己和革命者、抗日分子的地位，以待时机，配合反攻，适应革命的需要。因此必须善于掌握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善于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至于供给情报，应该是次要的，只能在不妨碍其基本任务与秘密条件下才可以去做，或只供给带紧急性的特殊重要性

的情报。尤其不可要求他们购买物资或向他们需索，以免易于暴露。

打入者的人选应是多方面的，或由根据地物色派去；或由敌占区物色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士绅名流；或由现有伪军伪组织的关系中争取转变为革命两面派分子，而以后两者为主。打入的干部应多，尤要注意派精干人选透入其内部去发展组织。只要我们能够从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去找干部，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根据地找出一批干部来派到敌占区去工作也是必要的，但派出者必须是与敌占区有关系有打入条件的同志，否则作用不大。同时，我们必须抽调一些有敌占区工作经验或条件的同志加强敌占区工作部门，担负训练联络等工作。

对打入人员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训练时间要短，内容要简单，任务要明确而不复杂。训练要采取座谈讨论的方法，启发他们尽量提出问题，然后给以明确的解答，切忌党八股^[63]的灌输的方式，有的则只能采取个别谈话的方法。

派出之后，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但不是随便来往），帮助其解决打入的困难，如活动费的可能帮助，方法上的指导等，此时要预防其遇难而退的心理，鼓励其打入的决心。打入之后，尤要加强政治联络工作，随时帮助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使其了解政治形势，勿使迷失方向而趋堕落腐化。

打入工作是一个巨大的耐心的组织工作，过去经验是很少的，必须在今后努力中，创造经验，积累经验，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二、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

革命两面政策的问题，一九四一年初北方局就提出了，两年来收到不少成果，但在开始运用时，也曾发生一些偏向，有

的犯了自动退却的错误，结果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扩大了敌人的控制面；有的一度取消了人民武装与游击战争，招致了人民的不满和失败情绪的增长，引起了一些混乱。其原因是了解革命两面政策的本质是向敌占区的进攻。把革命两面政策误解为退却方针，当然要发生错误。因此首先要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属于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范畴的政策，是一种进攻政策。

在敌我交锋的斗争中，经常要发生区域的变化，敌占区可能变为游击区乃至游击根据地，根据地也可能变为游击区乃至敌占区，所以我们在指导上，不仅要着眼于有利时的进攻，而且要着眼于不利时的退却，但是无论进攻或退却，都应该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这样才能巩固与坚持阵地，否则必然引起混乱。

其次，我们有不少地区、不少同志，对革命两面政策内容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以建立一些普通关系或者能从两面派手上得到一些情报为满足，甚至对敌人的汉奸两面政策丧失警觉，这也是不正确的。因此必须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深入到敌人（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进攻政策，它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着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两面派的争取，一切可能力量的利用，而其主要目标则是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与发展，以便依靠他们去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在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

第三，革命两面政策不仅有革命的抗日的这主要的一面，还必须有不得已而应付敌人的一面，而其应付敌人的一面，正是为了掩护其革命的抗日的一面。没有抗日革命的一面，就不能称为革命两面政策，同样，忽视了应付敌人的一面，也无法

实现革命两面政策。这里区别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是很重要的。两面派的特点是应付敌人又应付我们，而革命两面派的特点则是一切努力为着积蓄力量，保护人民利益，准备反攻，即使不得已而应付敌人，也是为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应以这样的标准去判别谁是革命两面派，谁是两面派，以及如何去建立与发展革命两面派。我们许多同志不懂得这种区别，所以以利用两面派为满足，而忽视了革命两面派的建立。因此必须确定，革命两面政策以及革命两面派的两面性，与两面派的两面性有区别。革命两面政策是以非法的对敌斗争为主，但又必须善于充分地运用合法形式、合法地位来掩护配合非法斗争，善于利用公开工作来掩护秘密工作，否则，便谈不上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或者陷于盲动而遭失败。

以上三项是谈革命两面政策的性质问题，下面谈它的运用问题。在运用上又要分别两种不同的范围：一是在伪军或上层伪组织内的运用；一是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的运用。前者是带革命两面派活动的性质，后者是带群众活动的性质。

先说革命两面政策在伪军、上层伪政权中及半伪化的封建组织封建武装中的运用：

第一，充分利用与掌握日伪矛盾及伪军伪组织内部的矛盾，是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应主动地扩大日伪矛盾，抓住每一个矛盾的缝隙，乘机发展自己的工作。

第二，广泛开展交朋友工作，取得同事、下级特别是上级的信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活动条件。但在交朋友中要注意适合自己的身份，不可因此引起他人的嫉妒和猜疑。

第三，利用自己的地位，以非常隐蔽和巧妙的方法，进行

宣传组织工作，但不可操之过急。组织形式应是多种多样不拘名义的，最好是用灰色的或敌人不注意的名称，组织不宜大，以众多的独立的小组为适宜。

第四，采用各种方法，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同事、下级特别是上级成为两面派，乃至革命两面派。

第五，随时注意在隐蔽的方式下，照顾中国人特别是革命抗日分子的利益。

第六，对死心踏地的汉奸及借刀杀人分子，应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消灭。对特务分子，在其没有危害我们时，应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各地经验证明，我们对此问题处理不郑重是要吃亏的。

第七，只作紧急关头的或重要的情报供给。

第八，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秘密工作，善于隐蔽自己的面目。在环境于己不利时，或能够增强自己地位时，甚至把革命的一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也是允许的。总之，一切要从长期隐蔽、以待时机的利益着想。

第九，活动的重点应该放在伪军方面。在其他方面的活动，也应力求逐渐发展到伪军方面。

第十，革命两面派的活动，是一个残酷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复杂的，既要防备敌特的耳目，又要防备国特^[64]的破坏，所以我们的活动应该是大胆的而又非常谨慎的。一切不夸张、不蛮干、不暴露，脚踏实地去做，就一定能够收到效果。

再说革命两面政策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的运用。这样的地区的乡村，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它必须是全乡全村一致对敌的。为此，必须有很好的统战工作以团结各阶层；尤其必须坚决肃清死心踏地的汉

奸。团结全村一致对敌的工作，不能认为是简单的问题，而是要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的。这里，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第二，它必须有武装斗争的配合。不仅应有外面的公开的武装的配合，而且还应有本村的小型隐蔽的武装的配合。没有外面武装斗争的配合，就不容易欺骗敌人；没有本村的武装，常使配合不及时，而且这也正是发展广泛群众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各地经验证明，游击战争成了实行革命两面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武装的掌握是争取村中优势的重大问题，要力求掌握在我们和革命分子的手中。这种武装的组织必须是短小精悍的，绝对秘密的，其活动一般只应限于夜间，使敌人认为这是八路军游击队干的。

第三，它的各种组织形式，表面上不能不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其实质则必须是抗日的。在政权方面，应建立统一战线的类似民主政权的村民代表会，一切实权不操于村长而操于代表会。必须认识，惟有这样的政权，才能保证村民一致对敌，才不致为敌利用，才能照顾与保护人民的利益。不能设想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能够实行革命两面政策，最多只能是应付敌人又应付我们的两面派（当然程度上各有不同），更说不上保护人民的利益。至于群众团体，除了原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还可保持其原有组织形式外，一般应力求单纯，组织统一的抗日救国会。

第四，它必须由一村的一致发展到几村乃至一个区域的一致，才更便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否则，少数村庄过于突出，易遭破坏。

具备了这些条件，才配称为实行革命两面政策的村庄，它

不仅可以顺利地进行对敌斗争，而且可以真正地保持我们的优势。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的范围，包括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对两面派的争取，乃至对一切可能用的人的利用，但必须以发展革命两面派为目标。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放松对两面派的工作，过去许多两面派对抗日作了不少的帮助，而且两面派是最广泛的，也是争取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基础。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它主要是发展非法的秘密的一面，但必须有合法公开一面的掩护。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必须依靠精细的组织工作，耐烦地脚踏实地地一点一滴地去做，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盲动、乱干、急躁或粗枝大叶，都必然招致失败。

三、发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与创造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

敌占区（当我武装能进入作经常活动时，则已变为游击区）应以非法斗争为主。非法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是游击战争的开展。

敌占区中日矛盾的发展，有利于两面派的争取和革命两面派的建立，更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甚至隐蔽的小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造。今后我们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开辟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这不仅从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着眼，而且是坚持山地根据地和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环节之一，是熬时间争取胜利的重要手段。

尽管敌占区存在着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条件，但在敌占区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创造，如果以为随便

可以干起来那只是一种幻想。有的地区的经验认为，要达到建立隐蔽根据地的目的，应该是稳扎稳打，应该经过政治攻势首先从政治上创造成熟的条件，是很有理由的。开始时，应切实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派遣小的游击部队伸入作跳跃式的进出游击，并物色与当地有联系的干部进入或随游击部队工作，进行群众的和社会的准备，以模范的纪律和明确的政策去扩大影响，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两面派和建立革命两面派，利用中日矛盾去提高各阶层对敌斗争的热情与勇气，利用一切可能建立本地的隐蔽武装。完成了这样的准备工作，我们便有可能派出或由本地生长出小型游击队，坚持当地的经常的游击战争。

敌占区游击战争的坚持，必须由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队（不管是派出的或是由本身生长的）与当地群众小型武装相结合，缺乏哪一方面都会显得没有力量。没有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武装，就不能起欺骗敌人、迷惑敌人的作用，没有本地的群众武装，也会使基干游击队“裸体跳舞”而终于不能存在。

在敌占区坚持活动的武装，不管是基干的或群众的，它的活动都必须采取隐蔽的方式。基干部分采取时隐时现的方式最为有利，而群众部分则应完全是夜间活动，且须假借八路军的名义出现。

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利益，减轻人民（特别是本区本村人民）对敌的经济和劳役负担，特别是保护壮丁粮食不被敌人捉去抢去，打乱敌人的统治秩序，阻止敌伪对人民的摧残，维系人心，打击敌伪的特务奸细活动，并在十分有把握不暴露自己的条件下，打击小股敌伪，以达成在敌占区坚持斗争和积蓄力量的目的。敌占区游击战争必须与革命两面政策相结合，而成为执行革命两面政策的主要依靠。游击武

装在活动中要考虑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照顾人民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凡是可以招致敌人摧残人民的事，都应谨慎从事。第二是处处力求隐蔽，不夸张、不暴露、不大吹大擂，使敌人捉摸不住而麻痹起来。

敌占区隐蔽游击根据地的存在与坚持，不只是发动群众与坚持游击战争，而且必须与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争取封建武装（自卫团、会门、土匪等）的工作相配合，在中国人一致团结对敌的方针下去进行这些工作。对于敌人不可过于刺激，一切从长期坚持着眼，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是非常不利的。总之，那里必须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切不可忽视合法的一面而走人盲动，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的蛮干行为。

此外，不仅在我们的周围，而且要在附近的敌占区灾荒区域，开始组织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这是从战略着眼的重要步骤。

四、尽一切努力保护中国人的利益。

我们的游击队武工队工作人员在敌占区的活动，必须以保护中国人利益为前提，这是保存国力与积蓄力量的问题，是在敌占区发展革命工作的起点。如果我们在敌占区的活动不能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那末我们不仅不能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和发展革命两面派，而且将没有我们立脚的余地。革命两面政策的实质，就是建筑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去发展革命抗日力量的。

在敌占区保护人民利益，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团结各阶层对敌，减轻人民对敌的负担；一是在对敌负担和日常生活中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后者应约束于共同对敌的范围之内。

在敌占区及敌占优势的游击区，不可能避免对敌负担，而只能是减少对敌负担。对敌负担是多方面的，如人力物力的被

掠夺，敌伪人员的敲诈，村款的大量负担与严重的贪污浪费等等，所以要从各方面去减少人民的负担。

减少对敌负担是一个复杂的斗争，有非法斗争，也有合法斗争，这是革命两面政策的具体运用。采用武装斗争的配合，伪装八路军劫回民夫、壮丁和被敌伪掠夺的金钱资材等方法，过去收效很大。其最显著者为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粮食斗争，这次斗争完全粉碎了敌人的灌仓计划。我们的武装活动给了人民以很好的借口去欺骗敌人保护自己，至少也达到延缓时间或少负担的目的。这是属于非法的斗争。

合法斗争方式也是必须采用的。虽然在敌人的统治下合法斗争的范围是很小的，但只要它能够多少于人民有利，也就必须充分利用。即使采用合法方式毫无结果，也可暴露敌人的凶恶面貌，给人民以政治经验，逐渐走入非法斗争乃至武装斗争的阶段。经验证明，合法斗争的巧妙运用，也可以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必须指出，过去在保护敌占区人民利益方面，我们做的工作还非常之少，甚至某些地方还存在着只要同时对我负担就以为满足的观点，这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保护壮丁的斗争，显得非常无力与办法很少，应引起今后的严重注意。

在对敌负担和日常生活中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除了敌人完全统治的我们毫无工作基础的地区（这样的区域正在缩小），凡是我们的游击战争特别是政权力量能够经常达到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正在扩大），都应该提出与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不同区域不同工作基础的条件下，要有程度上的差别和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善于从当地群众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寻求机会解决问题。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的方法很多，比如，在对敌负担中坚持合理负担原则；利用人民拥护抗日政府

的热情，宣传政府法令，鼓励实行法令；村游击小组保护全村的利益，提出减租减息；不放松对每一个租佃关系、债务关系和主雇关系乃至一般的民事案件加以调解等等。又比如，当敌占区人民向抗日政府提起民事诉讼时，应乐于接受，秉公办理，以调解方式为主，而适当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秉公办理的实质，就于基本群众有利。农村中这类问题是很多的，我们很可以按照实际情形，帮助基本群众解除很多痛苦。当然，在要求上不宜太高。不能一区一村地去做，可以一家一家地去做。减租减息，不能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可以少减一些。只要于基本群众有一点利益，都要积极地去做。同时，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必须与团结对敌的利益求得一致。

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无论对敌斗争或解决阶级关系问题，都必须着眼于当地群众的发动，使每一个要求都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而给以应有的配合和援助，并且要随时注意组织群众、建立秘密党的工作。惟有这样，才能锻炼群众，发挥伟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注意群众的教育，特别是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我们主张的正确。任何脱离群众、不问群众态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败的。

五、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

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应求恰当。我们不仅要防止乱干的复活，始终反对乱杀暗杀造成社会混乱的行为，而且应防止另一偏向，即放纵与听任汉奸破坏分子的活跃。

我们镇压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和对抗战危害很大而为群众最痛恨的破坏分子、借刀杀人分子和坚决反动的叛徒。对于那些胁从分子、次要分子，应采取争取的方针，给以回头的机会。经验都证明，只有真正痛击那些坚决反动的敌人的爪牙，才能争取那些动摇的分子。有些地方对于应

该杀的汉奸破坏分子不敢杀，是不正确的。我们只是反对乱杀暗杀，而不是应该杀的也不杀，这是要弄清楚的。

对于伪军伪组织，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反对的立场，至于对具体的对象，要分别情况采取打击或争取的方针，而以瓦解其组织，减弱其反动性，以孤立日寇，利于革命抗日工作为目的。

六、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与联系。

这也是一个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与联系问题，是在敌占区、游击区和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什么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什么是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所谓合法与非法，都是对敌人来讲的。合法斗争就是敌人允许的斗争，非法斗争就是敌人不允许的斗争；合法形式就是敌人允许的形式，非法形式就是敌人不允许的形式。合法斗争与合法形式是相关联的，没有合法的形式就没有合法的斗争。敌人并不允许我们有什么斗争，只是这种斗争是用合法形式表现，而为合法形式所隐蔽，才得到了敌人一定程度的许可。非法斗争则是用非法形式出现的，是敌人不许可的。合法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如请愿、告状、利用伪组织活动等等，都是敌人今天一般还许可的。非法斗争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如示威游行、抗缴粮款、拒绝维持、组织革命团体，乃至暴动、反正、武装斗争等等，而以武装斗争为非法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些都是敌人不许可的。

在敌人统治下，有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能呢？事实回答是有一定限度的可能的，各地群众曾进行了不少这样的斗争。群众有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勇气呢？事实回答是有的。在新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由于敌人为使人民就范开始采取高压政策，

而人民又没有在敌人统治条件下对付敌人的经验，所以一般表现不出什么合法斗争。但是经过了一些时间，群众往往摸索出一些对付敌人的办法，因此便产生了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和敌伪斗争的经验和心理。

既然在敌人统治下合法斗争的可能是很小的，而且效果不会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必须以非法斗争为主。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抛弃任何一点合法斗争的可能，因为它不仅多少可以使人民少受一些损失，而且可以帮助非法斗争的发展。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应该是密切配合的，合法斗争可以掩护非法斗争，非法斗争也可以帮助合法斗争，而且必须注意以非法斗争去掩护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不能暴露合法斗争。所以我们不是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问题，而是讲求两者如何配合与联系的问题。

如何配合与联系呢？

首先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这两者都是可以独立进行的，如过去敌占区往往没有任何非法形式的斗争，也可以独立地进行一些合法的斗争，但是惟有互相配合，才能收到大的效果。

其次谈合法组织与非法组织。这是组织形式问题，是充分利用合法形式来掩护非法组织的建立、存在与发展的问題。我们的革命两面政策，就是利用合法形式来达到建立、发展非法的抗日革命组织与进行非法斗争的目的。我们打入到伪军上层伪组织中，就是要利用敌人的组织形式和敌人给予的地位来发展革命工作和革命组织，并且还可以从了解敌人中，来保护革命组织。所以用各种方法钻进敌人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打入的革命分子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我党、我军和抗日政府的行动和主张，抓住机会进行革命工作。如我们发布了对敌军

的主张，就应该运用巧妙的和不暴露的方式透露给工作的对象；如我们打了胜仗，就可以乘机散布失败情绪，甚至为对方着想，提出“还是要与人家勾搭一下才行”，以达到建立两面派和发展革命两面派的目的。

再次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公开工作的目的，是为着建立秘密工作。没有公开工作的掩护，秘密工作是很难建立的，有了公开工作的掩护，才更保护了我们工作的秘密性。

再次谈公开武装与隐蔽武装。它们也是互相帮助互相配合的，有了公开武装才能掩护隐蔽武装的存在，有了隐蔽武装才能掩护公开武装的活动与坚持。

以上这些，都说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密切联系着、配合着、互相帮助着的。因此，当我们布置合法斗争时，一定要想到非法斗争的配合，布置非法斗争时，也要想到合法斗争的配合。所谓联系与配合，不是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混淆起来，或由一个人去兼任两种工作，这样的结果没有不暴露而遭失败的。必须着重指出，我们虽然不允许抛弃合法与公开的一面，甚至有一点公开合法的可能都要尽量利用，但是我们的目的，却是发展非法与秘密的一面，这才合乎我们积蓄革命力量、削弱敌人力量的要求，忽视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合法主义的错误。同时，在进行合法斗争时，我们一方面要领导群众争取斗争的胜利，一方面必须充分暴露敌人的狰狞面貌。在斗争胜利后要指出这种胜利是有限度的，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斗争的结果，是抗日军队政权帮助的结果，以免在群众中增加对敌的幻想。如果合法斗争失败了，更应抓紧机会鼓励群众对敌斗争的情绪。在合法斗争中，我们还应充分了解敌人，掌握敌人内部的矛盾。过去有些同志把敌人看成非常一致的整体，完全是主观的错误想法。

估计到敌后斗争的犬牙交错此起彼落的特点，决定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尽管我们主观上要扩大非法的一面，但客观条件常常与我们的愿望相反。有时某些地区变成了我们的隐蔽根据地，于是扩大了非法斗争的一面；有时则因为敌人的摧残，又大大缩小了非法斗争的可能。这样的变动性，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采取稳重的方针，不暴露自己，不过于刺激敌人，随时都有坚强的秘密工作的准备。这样，即使环境恶劣，我们也能作有秩序的退却，而不致吃大亏。

七、把政治攻势经常化。

所谓政治攻势经常化，就是除了大的重要事件和带全局性的问题之外，一般不进行带全区性的政治攻势，而是根据各分区特别是各县的具体要求，去经常地布置一个分区、一个县乃至一个小的区域的政治攻势。惟有这样的政治攻势，才更能抓住中心，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斗争要求相结合，也才能真正地打到敌人的痛处，并与人民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一致。

过去政治攻势积累了许多经验，都应很好采用。同时应指出，过去政治攻势更多的是作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对于敌占区的组织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过去在敌占区宣传鼓动，给今后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是重大成绩，今后的政治攻势，不仅仍应强化宣传鼓动，而且必须提高到组织阶段，成为敌占区组织工作的重要武器。

为此，我们在政治攻势中，必须有计划地去团结敌占区开明进步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形成抗日组织，或动员他们秘密地到根据地参观；必须注意秘密党的建立，谨慎地发展党员；必须加强争取两面派及帮助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必须注意帮助当地人民对敌进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

保护人民的利益，从斗争中锻炼群众的抗日勇气；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必须建立群众的隐蔽的游击小组或其他形式的抗日武装，建立隐蔽的小型游击根据地，这正是我们今后政治攻势的重要目标。

武工队仍然是今后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骨干，必须加强其力量，在组成中应有与当地人民息息相关的队员，这样才能使政治攻势经常化。因此必须提高边地游击队（县区基干队）的军事政治质量，使之成为能够担负进行政治攻势的力量。同时为了加强组织工作，必须在政治攻势一元化的斗争中，加强党特别是抗日民主政府在敌占区活动的比重。

八、在敌占区建立党。

这里只提出这个任务，而不谈如何建立的方法，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许多同志是很丰富的。几年来我们完全忽视了这个基本的工作，现在不能再马虎下去了。

敌占区秘密党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去隐蔽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组织上要力求隐蔽精干，在活动范围上要力求广泛。我们的党员要钻进一切敌伪组织和地方封建团体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纠正过去闭门训练、自视清高等关门主义（实际是一种等待主义）的倾向。

第四部分 反“扫荡”与反蚕食

坚持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反对敌人的“扫荡”与蚕食。过去我们对于敌人的“扫荡”，有很高的警惕与重视，但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于敌人蚕食政策的毒辣性警觉不够，吃了很大的亏。几年来根据地的缩小，大半是由于敌人蚕食的结果。经过北方局军分会五月四日反对敌人蚕食政策

的指示^[65]之后，才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去年太行反蚕食的斗争，获得了相当的成果。

反“扫荡”反蚕食的共同特点有两个：

一是群众性的武装斗争问题。反“扫荡”或反蚕食是以武装为斗争的骨干，但绝不能只认为它是一个军事斗争问题。它牵涉到人民的生活和动向问题，是军事与政治、武装与人民密切结合的问题。只有当不仅军队而且人民把争取反“扫荡”与反蚕食的胜利，认为是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只有当军事行动与人民利益结合一致的时候，我们才能取得完满的胜利，我们自己的损失才会小，给予敌人的打击也才会大。以太行区而论，过去反“扫荡”的发展过程大约是这样的：在初期反“扫荡”时，以反对敌人九路围攻为代表，只有军队作战，群众一般是怕战争，无组织状态，以家庭为单位逃跑或不逃跑，不相信空室清野。在没有军队活动的地方，敌人横冲直闯，大烧大杀，人民损失很大，战后悲观失望。在百团大战后期三次反“扫荡”时，仍是军队作战，有了人民参战。群众有了依靠军队打击敌人的观念，开始相信空室清野，开始有组织地分散逃难。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战后群众埋怨军队。在去年二月、五月“扫荡”时，敌人重点在我腹心地区，大部为工作薄弱区，群众战斗经验很差，“扫荡”亦很严重。群众的心理是害怕敌人，不相信军队和民兵力量。国特大肆活动，挑拨军民关系。在工作稍好的地方，群众是无组织的混乱状态，大量分散逃避；在工作不好的地方维持敌人；而我工作好的区域，“扫荡”并不严重，群众能有组织地行动，相信空室清野，民兵亦比较活跃。这些说明，经过战争锻炼的区域和未经过锻炼的区域，工作好的区域与不好的区域，有很大的差别。在去年十月“扫荡”时，工作好的或经过战争锻炼的区域，军队分散与民兵结

合斗争，胜利很大，损失很小。群众相信军队和民兵力量，逃难逐步组织化，空室清野逐渐彻底化、经常化。战后民兵虽伤亡百余，人民情绪很高。以上说明群众问题在反“扫荡”中的重要。群众有了积极性，民兵有了力量，并与正规军游击队相结合，才会有真正的群众游击战争，也才能使军事上容易求得胜利；群众有了战时的组织性和很好的空室清野，才可以少受敌人的摧残。军队的孤军作战，在过去“扫荡”不严重的情况下，还可勉强支持，像去年五月那样的“扫荡”就不行了，今后更不行。同时还应指出：过去人民不相信军队，这是与地方干部和人民不了解游击战争有关，也与军队在反“扫荡”中把自己的行动与人民利益结合不够有关。

二是腹地坚持和外线出击相配合的问题。敌人的方针是：治安区（敌占区）清乡；准治安区（游击区）蚕食；非治安区〔66〕（根据地）摧毁。三者的运用是互相联系着的，有时为了蚕食而进行“扫荡”，有时为了清乡而进行“扫荡”，有时三者并行。同时敌人在“扫荡”时，对于其交通补给线是极为重视的。所以我们也必须把反“扫荡”反蚕食和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三种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过去经验证明：我们组织得最有力的反“扫荡”斗争，是以一部军队分散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以与人民利益相结合的群众游击战争形式，坚持腹地的斗争；另以有力部队，有时甚至主力，转到敌后去打断敌人的补给线，破坏敌人的交通，打烂敌人在敌占区的政治机构，粉碎敌人的清乡和蚕食计划。这样就能争取主动破坏敌人的部署，引起敌人的混乱，而起着引退敌人的作用。所以腹地坚持与外线出击的配合，应成为今后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以下再分别来说反“扫荡”与反蚕食中诸问题。

一、反“扫荡”。

(一)反“扫荡”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腹地游击战争的有力坚持与外线游击战争的有力配合。所谓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就是军队与广大人民武装（民兵）相结合的斗争，就是军队行动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斗争，就是人民有组织地进行反“扫荡”的斗争。惟有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才能发挥根据地最大的威力，才能打击敌人的“驻剿”和“清剿”，保护根据地的人力和物力，才能打击汉奸、特务的活动，也才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而自己损伤较小。去年十月太行二、三分区的反“扫荡”经验，太岳沁源反“扫荡”经验，都证明了这点。

(二)反“扫荡”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必须在平时准备好。估计到今后敌人的“扫荡”将带更多的突然性，敌人对于“扫荡”的准备是切实注意隐蔽的，其遂行“扫荡”兵力的集结地点，不一定在被“扫荡”区域的周围，所以常常不易从周围敌人的动态判明“扫荡”的征候。去年五月“扫荡”，我们对此估计不足，是吃了亏的。因此今后反“扫荡”的准备主要靠平时，而不是判明“扫荡”征候后临时动员（当然这是必要的）。准备反“扫荡”的主要工作是：第一，民兵的发展，尤其是军事政治的训练，地雷、手榴弹、宣传品等的经常准备；第二，县、区、村指挥部和情报网的建立与健全，并在平时就要养成其指挥的习惯；第三，人民的思想准备和战时人民撤退的组织准备，并假设各种情况实际演习，要估计今后“扫荡”时间可能拖长，敌人的抉剔清剿战术还要发挥，“三光政策”将要厉行，故思想和组织准备都要充分；第四，空室清野的经常准备；第五，机关的大量紧缩等等。有了这些经常准备，就可以随时应付敌人的突然“扫荡”和“清剿”，不致引起慌乱。

（三）以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方式遂行胜利反“扫荡”作战，就必须加强正规军的游击战术的教育和战时分遣结合人民斗争的政治工作；就必须加强游击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就必须加强民兵的组织与军政训练，尤以游击队民兵两者为重要。我们的游击队已有相当发展，但战斗力仍薄弱，政治质量仍差，不巩固的程度仍然严重，与人民的结合非常不够。今后军区、军分区的指导重点，应放在游击队的加强上面，同时要以最大努力，指导与帮助武委会^[67]进一步地建设人民武装，特别是民兵的建设。民兵工作在太行、太岳都已初具基础，但发展极不平衡，锻炼亦极不一致，过去训练多犯形式主义的毛病，使用旧式武器提倡不够，地雷战极不熟练，这些都是今后应加以纠正的。特别要指出：“扫荡”的中心常常在根据地的腹地最为残酷，而我们在腹地不可能建立大量的脱离生产的武装，故民兵建设尤为重要。可是腹地的民兵工作恰恰是薄弱的，战斗锻炼恰恰是差的，亟应加以补救。

（四）敌人“扫荡”的目的，或为摧毁根据地，包围袭击我之机关，消灭我军有生力量；或为建立据点、交通线，割裂根据地；或者以伸入“扫荡”掩护其边地蚕食或敌占区清乡。所以我们的反“扫荡”，必须判明敌人的企图，进行积极的斗争。在腹地，我们一切斗争是为了打击敌人的“三光政策”，切实保护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如果判明敌人打通据点或打交通线企图时，也必须组织顽强的斗争，以打破敌人的企图。认为敌人计划无法破坏的观点，只能是机会主义者的观点。要知道敌人的“扫荡”、蚕食计划能否实现，主要决定于敌我斗争的结果，我们斗争胜利了，是会逼使敌人放弃或暂时停止其计划的。过去许多事实证明了这点。最近敌人企图打通临屯公路，在我积极斗争下破坏了，更是明显的例证。不少经验证明，即

使明知不能不走到维持敌人的道路，也必须采取坚决斗争之后再有计划地实行维持，因为这样既可教育人民，又可争取时间准备新的对敌斗争，以便为将来寻求有利时机打退敌人，取消维持的斗争打下基础。今后这类性质的斗争将会增多，值得大家很好地考虑。

（五）每次“扫荡”之先，敌人必派大批汉奸爪牙到根据地刺探军情，准备“扫荡”时发动维持。所以我们要在平时，在“扫荡”前及“扫荡”中，注意锄奸防谍工作，在“扫荡”中防止维持敌人，并进行反维持斗争。这基本是一个群众问题，故应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教育和动员。

（六）军队在反“扫荡”中，要与各级战时指挥部取得密切联系，关切人民的生命财产，及时供给人民情报。这样的军队才配称为人民子弟兵。军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七）为了准备应付最困难的反“扫荡”斗争，同时从长期打算，减轻人民的负担，必须进一步地实行精兵简政，彻底地紧缩上层机关，加强下层的工作力量。

这是过去反“扫荡”中得出的重要经验。

二、反蚕食。

（一）游击区的坚持与根据地边沿地区工作的加强，成为打击敌人蚕食政策的重要环节。敌人的蚕食与“扫荡”不同，一般是兵力不大，采取利用我工作薄弱、政策发生错误的弱点，事先布置特务，发动秘密维持，时机成熟，即突然跃进，乘虚而入，组织维持，构成据点和封锁线的方式和步骤；或者采取突然跃进一线，用点线圈出一块区域实行蚕食。故反蚕食不只是军事问题，更主要是政治问题、群众问题。如果我们在游击区、边沿区的阵地巩固，敌人无隙可乘，就很难施行其蚕

食计划。所以加强游击区、边沿区，特别是工作薄弱的区域，更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游击区和边沿区，恰恰一般是我们的薄弱点。边沿区是一般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这里只谈游击区问题。

过去在许多游击区，由于敌人的摧残厉害，负担很重，敌特、顽特横行，特别是我们对游击区人民照顾不够，游击战争仍嫌不力，游击队纪律不好，所以人民抗日情绪不高，多采取中立态度，或无条件地维持敌人，也对抗日政府负担，或向根据地、敌占区逃避，变为无人区。这种情况，大有利于敌人的蚕食政策。今后必须加强对游击区的注意与指导。

游击区的中心问题，我想有三个：

一是要使坚持游击区抗日斗争变成游击区人民自己的事情。因此，必须处处照顾群众，为群众的困难设想，帮助他们想办法和敌人斗争，这样来改变某些游击区人民对我的中立态度，走上积极的抗日斗争。只有把对敌斗争与人民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个要求。

二是游击区的对敌斗争必须有一套灵活的政策。由于那里是敌我经常进出的区域，没有巧妙的斗争方式是不能坚持的。具体说来，就是革命两面政策的灵活运用问题，不仅在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即我占优势的游击区，也应允许一定程度地采用应付敌人的方式，其不同处就是我占优势区的应付敌人，只是一时的手段，敌人一去我又打断，如此既可避免敌人过大的摧残，保护人民的利益，又可巩固我们的阵地，加深各方面的基础。不管哪种游击区，在今后犬牙交错、互相插花的复杂斗争中，伸缩性都是极大的，时而我占优势，时而又变为敌人占优势。我们在指导上要善于掌握情况，决定办法，一切以打击敌人蚕食政策，保护人民利益，引导人民进入积极的抗日斗争，

以巩固我们在游击区的阵地为出发点。

三是从斗争中建立游击区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游击队和民兵）。惟有这样的武装，更能坚持游击区的斗争。一切在游击区活动的游击队，必须加强政治质量，保证有严格的群众纪律，做到与人民一致。

（二）切实了解敌人，发现敌人的蚕食计划时，就应一面坚决肃清敌人的特务爪牙，一面主动地向敌占区出动，把斗争的焦点引导到敌占区去，以破坏敌之计划。

（三）当敌人实行蚕食时，我应采取“正面坚持与后面配合”相结合的斗争方式。正面不坚持，放纵敌人无阻碍地前进，是不对的。但只有正面坚持更是不能成功的，还必须伸到敌占区活动，打烂敌人的计划以引退敌人，甚至有时置重点于后面，都是可以的，这也是过去经验所证明了的。敌人对各地的蚕食，常常采取不同的办法，我们应依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反蚕食斗争。

（四）在我打退了敌人的蚕食之后，敌人不会甘心，常采取报复手段进行反攻。故我不可因胜利而麻痹，应及时动员群众准备打击敌人的反攻。只有打退了敌人的反攻，反蚕食斗争才获得了坚固的胜利。

这是过去反蚕食斗争中获得的重要经验。

三、平原的反“扫荡”。

平原今天是反“扫荡”的问题。今天冀南的特点是：敌人分割计划已经完成，据点公路密如蛛网，我大兵团活动困难，已采取分散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敌人则采取小兵力的频繁“扫荡”，以求打击和消耗我军，抉剔地下组织，镇压人民抗日情绪，发展伪军伪组织，大量掠夺人力物力，达到其逐渐控制平原的目的。

这不是说平原已无大“扫荡”的可能，这样设想是危险的。固然敌人的大“扫荡”主要是为着摧毁我之“集团战力”，但不能说敌人已认为我们在冀南没有了“集团战力”。固然敌人在过去一般是集中兵力对一个区域“扫荡”。但不能说今后敌人不会像冀中那样采取对冀南全面的“扫荡”。固然我们的分散状态，使敌人大“扫荡”发生困难，不易捉摸，但不能说敌人不可以进行以无数小支队组成全面的“扫荡”和“清剿”。事实上敌人不需要加重很多兵力，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扫荡”。所以在思想上组织上我们都必须有足以应付这样“扫荡”和“清剿”的准备。总之，从最困难处去设想，是不会吃亏的。

平原的反“扫荡”有其特殊的规律。冀南已经创造出许多宝贵经验，无法一一介绍。其基本特点是更带群众性，更与我们的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冀南今天的最大弱点是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还非常薄弱，如不克服，将在最严重的环境中发生困难，应加以特别的注意。而在极度分散的情况下，保持我们部队和一切干部的政治纯洁性也很重要。

第五部分 一元化的斗争

坚持敌后抗日战争，与敌人进行一元化的斗争，从各方面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决定于党的领导。中央去年九月一日《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就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进行统一的斗争，以取得胜利。

中央决定的主要精神，是建立一元化的党的领导机关，以统一和加强斗争的领导。过去在本区，我们军队党和地方党的系统，虽然都在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之下，基本上是统一的、

一致的，但“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这些不协调现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些毛病在本区都是存在过的，虽经不断纠正而有不少克服，但并未完全肃清。所以中央指示我们：“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执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加以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点的增加，上下级联系的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军区、分区）活动的独立性，以及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地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对敌斗争的经验证明：我们不统一，就可以给敌人以利用的间隙，如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之间的退缩现象，就是军队与地方互不配合、互相埋怨的结果。而反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政治攻势之胜利，也就是党的统一领导的结果。冀南在统一党的领导之后，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今天，各地在组织上都采取了一些步骤，以实现中央决定中的规定，但是否没有问题了呢？我以为还是有的。

中央指出：“党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试问本区过去对于一九四一年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大城市工作指示做了些什么成绩呢？对于北方局加强敌占区工作的指示又做了些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在太行，某地区对于中央土地政策的指示及区党委执

行这一指示的决定，搁置一边，认为这不是本区的“中心”，经区党委严格批评，才得到纠正；又如分局因为两个村的问题，提议区党委加以检查，并责成辽县、黎城两县委向区党委和分局作正式报告，至今半年，经屡次催索，两县委完全采取不理态度。试问党纪何在，这不是闹独立性是什么呢？太岳过去对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很少讨论，冀南专署级的农救会主任，还未看到中央土地政策的指示，难道这些不是很严重而需要纠正的现象吗？很明显的，不克服这些现象，党的统一领导是无法实现的。

中央指出：“为统一根据地的领导，为改进党政军民关系，必须在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三风^[68]，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教育干部识大体，顾全局，号召干部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干部懂得全局，不陷于局部和本位的偏向。”难道这些现象不是还在部分同志中存在着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到处可以发现吗？把干部私有，把资财私有，着重局部利益，不顾全大局等现象，不是还在许多问题上可以发现吗？这也是我们要从加强整风中加以纠正和克服的。

中央指出：“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细心研究敌人，研究对敌斗争的政策乃至方式方法，正确地灵活地把上级对敌斗争指示运用于自己的实际中。这在今后敌我残酷斗争中尤应切实注意。

中央在去年十二月《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中指出：“敌后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缺乏领导中心，许多人谁不服谁，而不能承认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同志

为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环境完全矛盾着，如果再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我们这个区域，虽曾执行过精兵简政工作，但仍是不痛快、不彻底的，中央指出现象，同样与本区今天的状态完全符合。这就要求我们注意配备与培养各级党的领导中心，坚决来一次痛痛快快的精兵简政，把上层机关缩小到最低限度，把干部加强到下层去，合并同性质的部门。所谓培养党的领导中心，并不等于书记包办一切，是与集体领导的原则相一致的。在精兵简政中，必须坚决克服本位主义，不顾全大局的观念，才能保证其彻底地实施。在精兵简政中，必须注意动员所有适合于敌占区工作的干部到敌占区、敌伪内部去工作，以实现我们在敌占区与敌人斗争和积蓄力量的任务。

在统一党的领导和精兵简政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加强敌占区工作部门的领导，主要不在人多，而在质量强，更多的敌工干部应派到敌占区去。我们的敌工部门系统还太多，组织还太复杂，步调极不一致。对同一对象，这部门要打击，那部门要争取，影响甚大，故应考虑作适当的改变，使之更便于统一对敌斗争的领导。我们要求一切党政军民系统下的各部门，今后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以最大的注意力，加强对敌斗争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开展敌占区工作。

在今年和明年一个时期内，在反攻以前，我们的斗争都很艰苦，我们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我们要以高度的警觉性，紧张的工作，细心研究敌人，特别是正确执行中央、北方局的一切指示和正确地掌握政策。只要我们不犯大的错误，我们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战胜敌人的阴谋诡计，迎接胜利的到来。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我们必须克服可能发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蛮干乱干、在敌人面前轻易暴露自己致遭损失的错误。

只有同这些“左”的和右的倾向作不断的斗争，我们才能与奸猾的日寇进行胜利的斗争。

我们坚信，在新的有利条件下，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在北方局和朱彭总副司令的就近指导下，依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十五期。该文第一部分的二、四两节和第三部分分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标题分别为《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和《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河南涉县（今属河北）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五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对敌斗争方针。邓小平从一九四二年九月起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

[2] 百团大战，指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了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3] “治安肃正”，指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〇年三月为强化对华北的占领而实行的残暴行动。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军事进攻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伪组织、培植亲日武装团体，实行所谓“自卫”与“自治”控制民众，施以怀柔政策欺骗民心等。

[4] “总力战”，指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以控制占领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5] “治安强化”，是日本侵略者在“治安肃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力战的措施。它们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在治安区内，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推行连坐法，建立治安军、警备队、保安队等伪组织，以禁绝抗日活动；在准治安区内，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并用，一方面加紧欺骗宣传，一方面强行修筑封锁沟、封锁墙与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在非治安区

内，则以大部队“扫荡”为主，灭绝人性地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从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二年冬，日军在华北共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6] 徐州会战，指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武汉会战，指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徐州会战后，日军调集南北战场的兵力，自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起开始会攻武汉。八月，日军沿长江两岸从东、北、东南三面进逼武汉，先后投入兵力共三十五万人。中国军队先后投入兵力共一百一十万人，并在武汉外围的若干战略要地，对日军的进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住日军前进，武汉被日军包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二十七日，武汉失陷。

[7] 维持会，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指使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组织。

[8] 皇协军，指日本侵略军为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收编的部分降日国民党军和土匪武装。其任务是协助日军守备交通线和据点，配合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9] 法币，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后所发行的纸币。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因物价暴涨而业已崩溃的法币。

[10] 沁州，旧地名，今山西沁县。

[11] 辽县，旧县名，今山西左权县。

[12] 邯长公路，指邯郸至长治的公路。

[13] 白晋铁路，指日本侵略军为分割太行和太岳抗日根据地而修筑的自白圭到晋城的铁路，日军称为东潞线。实际上在根据地军民不断破袭下，只铺轨到夏店镇。

[14] “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

[15] 德石铁路，指德州至石家庄的铁路。

[16] 邯济路，指邯郸至济南的铁路。

[17] 一心堂、长毛道、六离会，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

有武装。抗日战争时期，这类组织由于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容易被日本侵略者利用。

[18] 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同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

[19] 冀钞，又称冀南钞票，指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停止发行和流通。

[20] 会门，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

[21] 青红帮，指青帮与红帮两个中国民间秘密结社。青帮源于明朝罗祖教支流，成员为江浙等地的无业游民和浪荡江湖者。红帮最早为明朝天地会代称，其支派有哥老会、小刀会、红钱会等，由福建、台湾发展至两广及长江流域。民国成立后，有些组织渐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沦为以流氓匪特为主体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青红帮部分成员沦为汉奸。

[22] 黎城离卦道暴动，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山西黎城封建迷信组织离卦道的数百名道徒，在汉奸、特务的操纵、控制下，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占领县城，推翻抗日政府，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侵略者。中共黎城县委、黎城县政府当即领导抗日军民平定了这一叛乱。

[23] 沙河柴关暴动，一九四二年春，平汉铁路线上的日本侵略军策划对冀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破坏当地的春耕生产。为了配合日本侵略军的行动，少数潜入根据地的汉奸、特务暗中活动，预谋于四月十一日在沙河县柴关村集合，并裹挟受骗群众发动武装暴动。当地的抗日政府迅速破获此案，将首犯就地正法，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残抗日根据地的阴谋。

[24] “三光政策”，指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解放区实施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

策。

〔25〕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的一段。

〔26〕临屯公路线，指山西临汾至屯留的公路。

〔27〕大编乡，是日本侵略军为加强对华北占领区人民的统治而采取的户籍制度。即若干户为一甲，若干甲为一保，设保、甲长，若干保组成大编乡。

〔28〕阳明堡火烧飞机，指八路军在山西代县阳明堡袭击日本侵略军机场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夜，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第三营，在第一、第二营的配合和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秘密渡过滹沱河进入山西代县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激战，焚毁敌机二十四架，歼灭日军百余人。

〔29〕正太线，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

〔30〕七亘村、黄崖底、广阳战斗，指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先后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黄崖底、广阳地区伏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日军的两个师团沿正太路西进，企图与同蒲路的日军会攻太原。第三八六旅一部于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两次在七亘村设伏，袭击日军第二十师团的辐重部队，歼敌四百余人；随后于十一月二日在黄崖底伏击日军第一〇九师团的一个大队，歼敌三百余人；十一月七日，第三八六旅在第七六九团配合下，继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广阳地区伏击歼灭日军近千人后，再次在广阳以东地区设伏，歼敌二百五十余人。

〔31〕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山西省太行地区反击日本侵略军围攻的作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军为保障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调集步骑兵五千余人，由山西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出动，分六路围攻在寿阳东南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在内线与敌周旋，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等部在外线袭击敌人。在八路军内、外线部队的打击下，日军被迫于二十六日撤退。此役毙伤敌七百余人，为建立晋冀豫边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32〕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一部与在山西省东南部地区的山西新军以及国民党军反击日本侵略军大规模围攻的作战。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日军为解除其后方的威胁，集中三万余人的兵力，自同蒲铁路线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铁路线上的邢台，正太铁路线上的平定，邯长大道上的涉县、长治和临屯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及其他抗日武装进行围攻。八路军总指挥部决定采取集中主要兵力击破日军一路，以一部兵力钳制其他各路日军的作战方针。经过十几天的战斗，除三路日军深入晋东南根据地外，其余各路均被阻止。四月十六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抓住战机，转入内线，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歼灭日军二千二百余人，各路日军闻讯后纷纷回撤。至四月二十七日，八路军彻底粉碎了

日军围攻，共歼敌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33] 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日本侵略军第一八师团沿邯（郸）长（治）公路西犯，企图配合沿同蒲路南下之第二十师团消灭退至晋南的国民党军。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奉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进至山西襄垣东南地区，伺机破袭邯长路，打击西犯之敌。十六日，先以一部袭击敌重要兵站基地黎城，吸引山西潞城之敌来援，然后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地区伏击援敌，共歼日军一千五百余人。三十一日，又在涉县西南的响堂铺伏击日军辎重车队，歼灭日军四百余人，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邯长大道上的这两次伏击战的胜利，有力打击和钳制了日军，支援了晋西、晋南地区的国民党军。

[34] 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

[35] 自卫团、联庄会，这里指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维持占领区的“治安”在各乡镇组织的武装，有的地区称民团。

[36] 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37] 白晋战役，指一九四一年五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根据地人民群众配合下对日本侵略军抢修的白（圭）晋（城）铁路实施的破击战。此役破坏铁路五十余公里，摧毁大小桥梁五十余座，歼敌三百五十余人，打破了敌人的修路计划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图。

[38] 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成立，是当时晋冀鲁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并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联合办事处撤销。

[39] 一九四一年讨逆战争，指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八路军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而实行的自卫反击作战。从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一年春，八路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鹿钟麟、朱怀冰等部对冀南、太行等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40] 十二月政变，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日，山西军阀阎锡山调集四个军又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围攻驻守在晋西地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及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惨杀隰县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十二月八日至二十六日，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蒋介石的中央军向活动在晋东南的抗日决死队第一、三纵队发动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五百余人，逮捕千余人，并策动决死三纵队部分反动军官叛乱。这些反共事件统称为十二月事变。

[41] 黎城会议，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

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42] 格子网，指日本侵略者向抗日根据地实施的网状“囚笼”。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摧毁、缩小抗日根据地，大量修筑据点、碉堡、公路、沟墙等，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切断联系，严加封锁。这些公路、沟墙等纵横交错形如网状，被称作格子网。

[43] 军分会，指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

[44] 根据地变质，指根据地在日本侵略军大规模“扫荡”中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日军第十二军集中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一万二千余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大部分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

[45] 临时参议会，指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一九四一年三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议，邀请党政军民各界组织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在管辖范围内进行选举参议员的活动。同年七月七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开幕，参加会议的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四个地区的参议员。七月九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它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

[46]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见本篇注〔38〕。

[47] 灌仓计划，指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的一种抢粮计划。所谓“灌仓”，即打着代为保管的幌子，强迫占领区和游击区的群众将自己收获的粮食放进设置在日军据点附近的仓库里。其目的是解决侵华日军的粮食需求和防止粮食流入抗日根据地。

[48] 指彭德怀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太行区军队营级、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题为《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党的生活》。

[49]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50] 指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及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特殊土地处理问题等三个附件。

[51] 精兵简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52]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发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各级委员会成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取消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强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注意纠正和防止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

[53]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国、意大利、日本轴心国作战的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国。

[54] 斯大林格勒解围，一九四二年五月，希特勒下令集中主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击。苏联军队经过五个月一系列防御作战，大量消耗德军的力量后，于十一月转入反攻，包围并重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从而解除了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

[55] 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56] 一九四二年八月至十一月，美国、日本两国舰队为争夺制海权，掩护陆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先后在萨沃岛、瓜岛、圣克鲁斯岛等所罗门群岛所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大小三十余次海战，其中大规模海战共六次。美军从此掌握了制海、制空权。

[57] 大陆政策，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企图用武力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大陆，进而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政策。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侵略中国的《对华政策纲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不久向日本天皇呈送秘密奏折，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58]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下，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发布《宣战布告》，宣布自即日起，对英国、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同日，日本政府、伪满洲国政府发表声明，对汪伪政府与英国、美国宣战表示支持。

[59] 新国民运动，指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汪伪政府在敌占区进行的奴化教育运动。

[60] 王逆揖唐，即王揖唐，当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61] 大乡制，即大编乡，参见本篇注 [27]。

[62] 朱彭总副司令，指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司令彭德怀。

[63] 党八股，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八股是指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

[64] 国特，指国民党特务。

[65]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发布《关于反对日军蚕食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其危害较以前的“扫荡”和“清剿”有过之无不及，因此，反蚕食斗争成为目前华北全党、全军的一个紧要任务；反蚕食斗争的基本方针，是组织全部力量来停止敌占区的继续扩大；在反蚕食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武装斗争和合法斗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关系。

[66] 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参见本篇注 [5]。

[67] 武委会，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的简称。

[68] 三风，指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要整顿的学风、党风和文风。

新形势下的工作任务^[1]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空前有利于我们坚持敌后斗争，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有着充分的胜利条件，也有着需要渡过难关的严重困难。我以为，我们应该教育党和人民充分建立胜利信心，而且应从一些根本问题上去坚定人民的信心，才不致在局部的严重事件下，如日寇可能取得的战役胜利，“扫荡”中的摧残等等，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以为，尤应使党和人民深刻认识接近胜利的困难，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需要我们党政军民一致努力才能克服。这些困难是否我们认识够了呢？没有。我们存在许多贪污浪费现象，我们反“扫荡”、反蚕食的经常准备还差，我们的人民武装建设还有许多缺点，我们发动群众工作还不够普遍与深入，我们在发动群众中还有一些地方照顾统战不够，我们的精兵简政^[2]工作还非常不够痛快与彻底，等等，都证明了这点。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来迎接困难，渡过难关，以争取胜利。

同时，我们要懂得，在法西斯被打倒之后，国际国内会发生基本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人民。我党不仅在今天领导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而且要在抗战胜利之后，在实现和平建国、民主自由的任务中，去巩固我们的阵地，去团结中国人民。我们在华北不仅要争取敌后坚持的胜利，而且要打下基础，以巩

固我党战后在华北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的努力，不仅是为了抗战的胜利，而且是为了战后的建国。严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任务当然是繁重的，可是我们必须肩负着这样的繁重任务前进。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以及三个报告^[3]都贯穿着今天和明天的精神，应引起全体同志的注意。

必须指出，没有今天就没有明天，不渡过今天的难关，争取抗战的胜利，明天是不会到来的。在讨论中，对于今天如何克服困难这一点发挥不够，这是一个缺陷。自然，只看到今天，看不到明天也要发生错误，使我们丧失明显的目标，影响到我们的将来。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着眼于今天，同时也为了明天。譬如我们加强敌占区工作，既为了配合今天坚持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也解决了为明天积蓄力量的任务。

在新形势下，我们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今后的方针是什么呢？北方局已经给我们明白确定了：“华北党的基本任务，在于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替反攻及战后做准备，以便准备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

实现这个基本方针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呢？应该是：

第一，贯彻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依据于巩固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提出的严重政治任务，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一环，也是贯穿于一切工作和党政民组织中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惟有民主政治，才能进一步地巩固各阶层团结，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也才能示范全国，争取人心向我。而统一战线的巩固不仅对于今天非常重要，而且对于准备战后也非常重要。巩固统战本身，就是巩固战后阵地的基本内容之一。不能设想，今天统战不巩固，能够争取抗战胜利；也不能设想，战后统战不巩固，能有我们的坚固阵地。

惟有发扬民主精神和实质，才能达到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才能实现群众自觉自动起来为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目的，也才能巩固群众的发动和群众的组织。不能设想，没有民主的干部包办，能够启发群众的自觉性，能够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不能设想，当群众既经发动之后，不把群众提高到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阶段，而能够使群众形成一个独立的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的联合与斗争，以巩固统一战线和已得的经济政治利益。所以北方局指示^[4]指出要“把民主斗争与民生斗争联系起来，把减租减息^[5]，增加工资，反贪污浪费等等群众的经济斗争，逐渐提高到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摧毁残余的封建统治，以巩固党在斗争中既得的阵地”。

北方局指示指出：“在党政民系统中更加发扬民主精神，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在干部中应进行普遍的民主教育，肃清干部思想上违反民主的残余封建影响。”不能设想，在党政民系统中，在干部中没有民主思想、民主精神，能够发扬人民的民主精神，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不能设想，干部中没有平等民主的精神，能够发挥干部的高度的工作热忱。所以，北方局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深刻了解民主自由不仅是基本群众的要求，而且也是团结各阶层的旗帜，不仅是大多数人民今日的愿望，而且是战后全国人民的政治动向，党必须负责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胜利完成历史任务。”这正是把民主问题提为第一位任务的出发点。

北方局指示指出，为了贯彻民主政治，必须“有步骤地改选各级政权机关，特别是着重改选区村两级政权机关，吸收广大人民直接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真正自上而下地实行民主，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示范于全国，使之与敌伪顽占区

有基本上的区别”。改选政权机构，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去进行，在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等斗争中密切联系村政权的真正改造。在一个县大致实现减租减息之后，即可实行县选，其他县份则可以年底前成立推选式的临时县议会，边区大选可在多数县份完成县选之后举行。各县村选举或推选不必同时举行。

民主教育的实施，必须采取一些具体办法。民主教育本身就带有削弱封建统治的革命意义，这种意义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6]中说得很清楚。今天的民主教育，应贯穿于一切日常工作、日常斗争中，党、政府、群众团结都应加以特别的重视，要研究出具体办法，编定教材，加以实施。

第二，依据各地区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继续发动与深入群众运动。在群众尚未发动的区域，迅即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7]等法令，发动群众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斗争，从斗争中大量发展群众组织，不应畏首畏尾，延误时机。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的区域，应继续充分发动，深入检查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等等的执行程度，制止封建残余势力的任何翻案复辟的企图，同时加紧巩固群众组织，健全各个群众组织的内部生活。在群众工作已深入的地区，应特别着重民主建设、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人民武装建设，使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提高一步。

在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则应以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一致对敌，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存民族力量，为一切工作的主要出发点。减租减息、雇工增资^[8]仍有其一定程度的可能，但应采取一点一滴的方式和说服调解的方法去实行，以不损害团结地主阶级对敌为原则。在冀南的少数基本区，则应抓住此宝贵时机，实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法令，但不能像山地那样采取较硬性的方式，而应以说服调解为主，只有对个别过于顽

固的分子才采取斗争方式。在封建势力（土匪、民团、局子^[9]）统治的区域，目前不是在那些地方发动减租减息斗争，而应以扩大中日矛盾，扩大统一战线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们应采取有效办法去争取上层分子，团结士绅名流和知识分子，开始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树立我们的工作基础，这应是一个相当时期内的任务。要知道今天引起了这些地方实力派的疑惧，对我们是没有丝毫好处的。

这就是不同地区不同的群众工作任务。

在各地发动群众工作中，必须贯彻统一战线的精神。今天我们处在敌后斗争非常艰苦的环境，有些区域已经相当地发动了群众，个别地区在群众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根据这些条件，在本区内不应机械笼统地都提出打的阶段或拉的阶段，而应根据不同的县区去确定打的阶段还是拉的阶段。在打的阶段中，要善于运用打中有拉的策略指导原则；在拉的阶段中，要善于运用拉中有打的策略指导原则。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过去个别区域随便乱斗，打得过分，把削弱封建变成消灭封建地主的经济地位，是应适当纠正的，甚至说服群众自动退还一些过去曾经做得太损害地主利益的东西，也都是必要的。这些就是把群众运动约束于统战范围之内的道理。在群众运动中，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巩固统一战线，这正是党的领导的责任。

在各地群众运动中，还应贯彻运动本身的民主精神，培养群众领袖，克服干部包办的现象。同时在群众运动中联系到人民武装建设，要逐渐诱导群众进入武装斗争，发挥其生产热忱，实现民主政治，并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道理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和大章^[10]同志的报告中都已说得很清楚，惟有这样才能巩固群众运动的胜利。

最后，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巩固群众组织，必须加强群众团体的干部，调动在群众中有威信干部去主持群众团体的工作。

第三，强化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尤其是民兵建设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及群众组织中的贫苦积极分子加入民兵，扩大民兵数量，提高民兵政治质量，保障民兵在党的领导之下，武器掌握在可靠分子手中。太行三、五分区某些地区夺取民兵武装，以及昔阳、和顺敌人夺取民兵武装的现象，应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因此建议各县区党部及军区武委会^[11]，应切实检查民兵的成分和支部的领导。对于某些地方民兵脱离群众的行为，应耐心地加以纠正。彭德怀同志提出建设民兵的三个原则^[12]，应切实研究和执行。对于民兵的军事教育，应着重于现有新旧武器的使用和适合于现实战术的实地演习，反对形式主义。同时，在人民武装的政治教育上发扬尚武善战、保家卫国的风气。这是武装力量的准备与积蓄，现在将来都很重要。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应动员群众积极地完成各个时期的参战任务，要使群众懂得参战任务是与他们自己的利益不可分离的。要动员群众进行经常的备战工作，以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扫荡”和“清剿”。

巩固现有的游击队，加强其军事政治教育，派好干部到游击队中去，以加强其领导，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一方面能独立担负战斗任务，另一方面成为民兵的模范，领导民兵作战。县区长和党委书记兼任游击队长和政委，必须做到兼职又兼工作，纠正某些同志只挂名不去实际领导武装的现象。这对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有极大的意义。

提高正规军的质量。加强正规军中游击战的教育，尤应提

高干部军事政治的素养，改善教育方式，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加强各种具体政策教育，至如文化教育在基本根据地亦须大力进行。同时要采取更有效的办法，密切军队与人民的联系，真正符合于人民子弟兵的称号。

第四，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大大提高群众的生产热忱。党指导群众运动的每一步骤，都应诱导群众走向生产战线，因为发展生产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

关于根据地的财经建设，必须着重指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应是财经建设的基本环节。在今天严重的灾荒，敌人残酷的粮食掠夺，敌人的封锁，社会积蓄很少的条件下，其意义尤为重大。要估计到敌人的封锁与对敌占区的掠夺还会加强。如果不从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着眼，必将遇到严重的困难。过去在贸易政策上，太行区是有不少成绩的，我们应该继续将这些经验用之于其他各地。但应密切注意由于敌人的警惕，必将采取新的步骤来对付我们，我们则必须新的情况下，采取新的办法去与敌人作经济斗争。要切实了解敌人，善于钻敌人的空子，才能得到新的成就。今年赋予经济部门的财政任务是很大的，如果不注意这点，将可能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就，而应足够估计到今后的变化，采取新的办法来完成任务。譬如掌握粮食问题是过去获得成绩的重要一环，今后还有没有这样顺利的条件呢？我以为不会如过去那样顺利了。所以，我们应注意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的生产，掌握住根据地的余粮，去同敌人斗争。特别要善于潜藏与保护粮食不被敌人挖去以保障军需民食，同时必须加强农村中手工业的生产。手工业生产主要解决根据地人民自身的需要，但同时应注意输出品的生产，去以有易无。我们

所谓自给自足的涵义，一方面是根据地人民需用的东西主要由根据地人民生产，一方面是逐渐争取输出与输入的平衡乃至相当的出超。不逐渐解决出入平衡问题，同样不能解决自给自足的问题。

农业生产的标准，应是逐渐恢复战前的产量。为此，不仅要大大发挥人民的生产热忱，把生产的领导贯穿于全年的生产过程中去，而且还应在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实现之后，求得农村阶级关系相当稳定，就在发动群众中也应切实照顾这点，否则也要影响到生产。今年特别在灾荒区域应注意解决春耕中的各种困难问题，切实检查分局去年对春耕准备指示的执行程度，这是渡过难关的重大问题。军队和机关的生产方向，主要是农业生产。手工业的发展，也是与群众运动不可分离的。要发动群众组织与加入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社，或生产、贸易、运输、信用几种作用混合的合作社，同时必须注意吸收地主富农的资金投入生产和存储银行，这对于根据地建设有很大的好处。

为了建立巩固的财政基础，今年应在太行区实行统一累进税^[13]，在太岳区认真实行合理负担，准备明年实行统一累进税。统一累进税与合理负担的实施，只有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所以它是群众运动的内容之一。

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应引起很大注意。那些恶棍如不加以反对和制裁，会使根据地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党政军民机关和干部，应切实遵守财经政策，反对本位主义。

第五，开展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工作。为了保卫根据地，为了积蓄力量，替反攻和战后做准备，都必须加强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在敌占区、游击区，应以团结中国人对敌，减轻人

民负担，保存民族力量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进行敌占区、游击区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伪军中、人民中的组织工作。没有组织工作，就不能积蓄力量。对于敌占城市和交通线上的工作，应采取有效办法认真地开始。切实运用革命两面派政策，正确掌握与运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联系和配合，而以非法斗争和秘密工作为主，把政治攻势经常化，要求政治攻势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对敌斗争要求密切联系，经常地进行。提高日军工作的比重，掌握各地日本反战同盟^[14]的活动。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结论的第二部分。全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十九期。

[2] 精兵简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3] 指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邓小平所作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太行分局副书记李大章所作的《过去群众工作的简单回顾与今后的工作方针》的报告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所作的《进一步加强财经建设，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报告。

[4] 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布的《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提出：一九四三年华北党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做准备。为实现这一任务，必须彻底实现政治民主；继续发动与深入群众运动，强化普遍的群众性游击战争；认真加强民众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对敌政治攻势。

[5]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

过减租减息政策。

[6] 指彭德怀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太行区军队营级、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题为《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党的生活》。

[7]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8]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发展战时生产、提高劳动热情、保护工人与增进劳资双方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颁发过有关雇工增资内容的法令。其中规定：雇工的工资依照各地生活状况，一般以除工人本身外再供一个人至一个半人的最低生活费用为标准。延长工时必须按钟点增发工资；假日继续工作，除发原工资外，应按标准增发工资。

[9] 局子，俚语，指团伙。

[10] 大章，即李大章，当时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

[11] 武委会，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的简称。

[12] 建设民兵的三个原则，指生产与战斗结合，反对游荡、脱离生产；一定在支部领导下；加强政治、军事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

[13] 统一累进税，指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府实行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把对农村同时征收的几种资产税与收入税统一于一种税中。税率按纳税富力分等累进。这里的“统一累进税”办法指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颁布《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

[14] 日本反战同盟，指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的反战组织。一九三九年，由鹿地亘等人在重庆建立总部。一九四〇年六月延安支部成立，后在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设有支部。一九四二年八月，该同盟与“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合并成立“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

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1〕}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一、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在讨论中有同志提到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2〕}中已经回答了。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彭德怀同志说：“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这四种力量又是互相配合的，任何一部分不得力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互相配合不好也会使根据地受到损害。

有人会问：根据地的创立是先有武装还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呢？这是一种机械的提法。实际上，有的地方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实行农民暴动，自己创造武装和政权，形成根据地，然后又用这个武装和政权的去扩大根据地，创造新的根据地。有的地方则是先有了革命武装，以武装力量打开局面，建立党、政权和群众组织，形成根据地。但是，不管哪个在先，只有在上述四种革命力量形成起来的时候，才有革命根据地。

有人会问：这四种革命力量哪种更重要，哪种是中心环节呢？我以为这同样是机械的提法。实际上，这四种力量既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是同等重要的。假设一定要定个先后的话，

则应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战争的特点，将武装放在第一位。但必须懂得，只有武装，没有党、政权和群众力量，武装斗争便不能支持而会走向失败，历史上有些区域由于单纯军事观点而失败的例子，证明了这点。只有群众运动或坚强的政权工作，而没有坚强的足够的武装，或军事路线发生错误，也会使根据地失败，党政工作群众工作垮台，第五次反“围剿”^[3]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4]的例子，证明了这点。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锄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太行区一九三九年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最后，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基础，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所以说，哪种力量最重要最中心的提法是不对的。但是，是否我们应该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同等地去注意这些工作呢？不是的。党的指导要依据于当时当地的情形，提出当时注意的中心。如政权工作薄弱就加强政权工作，群众工作薄弱就加强群众工作。当然，在加强这一工作时，要有其他几种力量的配合。例如，在华北的开辟阶段，与历史上的前例又有其不同特点，首先抓住以强大的八路军的力量打开局面为中心，接着把中心放在建立政权，自上而下地建立、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建设财政经济，建立社会秩序。这样就抓住了规律性，因而获得了伟大成绩。又如在巩固阶段，我们应以执行土地政策、发动群众为中心，并建设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执行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不够，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注意群众工作不够。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有人会问：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如何联系与配合呢？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根据地的党的责任是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在解决这一中心工作时要求得其他工作的配合。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就是这几种力量的配合与联系。有了武装就有了一切，或有了群众就有了一切的说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否则是有毛病的。

还要着重说到的是，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还要看统一战线巩固的程度，这也是一个决定条件，也应引起我们注意。

以上就是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有人还会问：我们过去是否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呢？肯定地回答，一般是掌握住的，所以才有这几年坚持与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成绩。否认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坚持，根据地能日趋巩固。但是，我们有无缺点和错误呢？我们的回答是，有的，如一个时间内武装政策中的偏向，相当一个

时期内对群众工作的忽视，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还很不够。假如没有这些偏向，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根据地会更巩固些。有人说我们根据地还不巩固，当然是不正确的。

中央、北方局历来就有建设根据地的明确方针，我们的偏向或错误，就是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研究不够、执行不够的结果，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今后在残酷斗争中，我们必须正确掌握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提高根据地的巩固程度，并以最大努力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地，则抗日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乃至反攻将无所依托，切不要忘记历史上没有根据地时候的痛苦。

二、群众运动的规律。

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过去由于我们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执行不够，所以今天的群众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

什么是我们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应掌握的规律呢？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不懂得诱导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会使运动脱节，就不能逐步地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也就不能保卫其既得的利益。

有人说，过去我们应该划定一个阶段来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没有这样做是个损失，是个缺点。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但

是也有人说，过去没有划定一个阶段来发动群众，就是没有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和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应否划定一个阶段，是发动群众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规律性问题，不能设想任何地区任何时间都能划定一个阶段来做群众工作。例如中共六届六中全会^[5]提出巩固华北，以进一步深入群众工作为中心，但并未指出要划出一个阶段来做；又如华中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但一九四一年还未提出划出一个阶段问题，这不等于中央或华中局没有掌握住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而且认识是个发展的过程，只有在今天来看过去，才知道我们如果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两年划出一个阶段来做，是最好的办法，没有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特别要指出，过去我们对群众运动指导的主要错误，不是没有划出阶段的问题，而是没有在巩固阶段以执行减租减息^[6]、雇工增资^[7]等土地政策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

有人说，过去我们放过了相当的时机，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发动群众。我们不仅有抗战初期广大而深入的抗日发动，反磨擦斗争中热烈的群众运动，而且有今天冀南的中国人团结的群众运动，这些发展的政治意义是丝毫不可轻视的。就是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特别对去年下半年的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只是各地成绩大小不同，如太行比太岳、冀南要略好些。

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今天太行、太岳还可以划定一个时间来发动群众，但在冀南根据地变质^[8]后的广大游击根据地（除少数基本根据地），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冀南今天是密切结合对敌斗争

去适当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的问题，是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而不是以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了。就是在太行、太岳区也要注意到今天敌后残酷复杂的斗争的特点，对封建地主不能机械地去划分打的阶段和拉的阶段，而应是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正确运用，打的时间要求缩短，不宜过长。这是新条件对我们的要求。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是困难的，是需要时间的，不能要求过急。但认为“一年做不好有二年，二年做不好有三年”，也是不好的。太岳、太行区一般应在今年内克服不平衡，完成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冀南应大胆地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但主要是在对敌斗争中，而不是在执行土地政策中去发动组织群众。土地问题在冀南无疑是应居于次要地位的，就是在太行、太岳，也要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所以在冀南单独提出削弱封建的口号，是值得考虑的。

冀南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以为：第一，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对敌斗争，不仅先进部分，而且落后部分都参加了斗争；第二，在对敌斗争中，基本群众参加了人民武装（公开或隐蔽的），并掌握了这些武装；第三，在村政权中，基本群众自觉地参加，真正实现了三三制^[9]；第四，在对敌斗争中适当争得基本群众自身的利益，并巩固了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第五，有了群众自己的组织，或在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取得了基本群众的优势；第六，群众相信党和八路军，懂得只有跟着我党我军走，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有人说，似乎这样的标准要求冀南不成问题了。这是空洞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没有艰苦严密而有贯彻力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这样的要求是不能

完全达到的。

三、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

这是一个如何把群众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的问题，是照顾到既能发动群众又能巩固各阶层团结的问题。这里只说几点认识上的问题。

（一）把打的阶段与拉的阶段结合起来，实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当然在各个县、区还有划分打与拉的阶段的必要，但打的阶段不宜过于拖长。在打的时候，应更多采取说理方式，争取开明分子来影响其他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即使他们假开明，也有好处，也应鼓励；只有对个别顽固分子，才经过一番孤立工作之后，实行斗争的方式。在拉的时候，要防止地主的反攻，特别要教育群众自动地去团结地主。

（二）削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过去有个别地方执行减租清债等法令时，有些过分的地方，应该纠正。政府的法令是一般的原则，在执行中必须依据上述方针，加以恰当的执行，尤应纠正算很久以前的老账的办法。

（三）削弱封建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在政治上打垮地主阶级的统治，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其本身就是削弱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但绝不能解释为消灭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地主阶级只要它是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它就有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提倡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如打人、唾口水等。尤其在党的领导上，应防止这些现象成为风气，因为这些做法，会失掉社会同情，有碍

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卷入斗争。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去的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减租减息他们还比较容易接受些，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就要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所以没有群众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要想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四）团结地主抗日，只靠方式上的讲究是非常不够的，主要应使之能够生活，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财权，否则即使我们态度很好，即使选他当了代表和参议员，都会无济于事。这点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应加以注意。

（五）群众“左”可怕不可怕的问题。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左”的现象时，“左”才是不可怕的，如果让“左”的东西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就是值得可怕的。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这就说明了党的指导的作用。

（六）对富农应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在政策法规上要照顾这两个方面。同时在斗争中，不能把富农与地主一样看待。过去斗争的对象，富农占的比例不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今天各地已经发生了某些过分的现象，应注意作适当的纠正。

（七）群众运动要求深入，但亦应注意其规模。例如，应该讲究这一区域对另一区域斗争的声援，这一群众团体对另一群众团体斗争的声援，召开必需的一定范围的群众会、群众干部会、代表大会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这样，既可以使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普及，可以影响落后区，争取运动的平衡，又可

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自信心，还可以培养群众的领袖。

四、党与群众团体。

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在政治上必须保障其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党团^[10]去实现。过去各地对群众团体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般是包办与放松政治领导两个毛病都有的，今后应加纠正。同时，在提出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时，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的闹独立性的倾向。

今后的群众运动，应做到由群众团体特别是农会去出面领导，党务工作干部、军事工作干部去从事群众运动时，可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身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

同时，党对群众运动的指导必须加强，要派遣很好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到群众团体去作负责工作，特别要注意提高下层群众团体的工作能力。对于各种群众团体，不可能加以平均的注意，今天应特别加强党对农会工作的领导，首先健全农会的组织和生活。

各救国会组织在区以上仍采取救国联合会的形式，不必变动，但在村一般应分开组织。上级救联人数尽量减少，把干部充实到下层去。

群众团体的经费，应逐渐做到自给，政府给以足够的津贴。今后群众团体的经济开支，可以自己负责，不必由政府审核。

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要知道群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

五、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

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但是群众运动应该是群众自觉自动的运动，所以政府也不要采取干涉或代替包办的态度。

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在我党政治领导之下的政权，它的施政纲领和法令，是符合于党的政策的，是既照顾了工人、农民又照顾了地主、资本家的，所以是有利于基本群众的。我们在群众运动中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1〕}等有利于基本群众的事情，就是在执行政府的法令；而政府在公布了这些法令之后，还必须保障其实现，所以把群众运动和政府态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党和群众团体在指导群众运动中，政府在扶植群众运动中，都是保证这些法令的实现，都是要把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之内，亦即是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所以群众团体和政府对于群众运动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

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

（一）当某一地区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时，应派人下乡解释政府法令，督促实行，并坚决表示不准不实行的态度。

（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时，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这种干预、包办的方法在表面上可以使群众容易得到利益，但是妨害了群

众的自觉性，使群众不会相信自己的伟大力量，更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达到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是有害的方式。

（三）在群众斗争中，政府人员的工作是加强政府法令的解释工作，这实际上就帮助了群众运动。

（四）当群众与地主发生争执时，政府采取坚持法令秉公办理的态度，这也实际上帮助了基本群众。

（五）当群众运动中发生过左行动时，政府人员首先应通知党或群众团体加以说服纠正，或商定互相配合加以纠正，切忌简单地采取行政方式处理。但当这种“左”的行动影响太大，特别是为反动派利用，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时，政府就应出面干涉制止，制止后仍须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说工作。

（六）在群众运动中，政府人员应对地主士绅进行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法令，劝说他们遵行。不能在地主面前去打击或批评群众团体及其干部，以致增高地主气焰。如群众团体或干部有失理处，可以加以解释，同时指出地主的不合理。

（七）政府人员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同时，党及群众团体在群众运动中，亦应提高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如在群众中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是非常有害的。

军队参加群众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过去取消民运部门，是因为当时对地方工作成绩估计过高，加上军队干部有些工作方式生硬，影响到有些地区要求军队不要打乱了地方工作的步调，今天看来这是不妥当的。今后军队不仅要派干部以群众团体（主要是农会）的面目，或由群众团体介绍，去参加地方工作，而且军队还应参加群众斗争。这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运动，更主要的对军队本身是很好的活的教育。当然在参加时，不一定要抬着机关枪和大炮。军队派到乡村工作的干部，必须统一

于当地党的领导之下，在当地群众团体的工作计划之下步调一致地工作。

六、村级工作。

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村，我们必须注意村级工作的领导。关于村级工作的一般原则，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都提出了。村级工作是很复杂的，各级党必须继续研究与解决村的工作问题。

我们在简政中，把行政村扩大，固然增加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但不如此会增加人民很多负担，所以不必改变，而要注意于讲究在大村条件下，如何进行领导工作的方式。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结论第三部分的第一节。全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十九期。本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2] 指彭德怀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太行区军队营级、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题为《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党的生活》。

[3] 第五次反“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结果，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4]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

[5]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

责任。全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评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6]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7]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发展战时生产、提高劳动热情、保护工人与增进劳资双方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颁发过有关雇工增资内容的法令。其中规定：雇工的工资依照各地生活状况，一般以除工人本身外再供一个人至一个半人的最低生活费用为标准。延长工时必须按钟点增发工资；假日继续工作，除发原工资外，应按标准增发工资。

[8]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日本侵略军第十二军集中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一万二千余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大部分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这里说的冀南根据地变质，即指此。

[9] 三三制，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10] 党团，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和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

[1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对敌斗争问题^[1]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一、几种地区的界说。

第一，敌占区。敌占城镇点线及其附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而我武装不能或不能经常进入游击的区域，称为敌占区。在敌占区积蓄力量，是以秘密的非法工作为主，但为了很好地掩护我们的非法秘密工作，必须充分地利用合法形式（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正因为它是最少可能的，所以更是可贵的。在敌占区，党和革命抗日群众组织，应采取隐蔽精干政策，打入伪军伪组织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积蓄力量是那里的重要任务。

在敌占点线附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区域，经过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的武装能进入作经常的游击活动时，它就变成了游击区，乃至逐渐发展成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我们应争取这种变化。

第二，游击区。我们的工作薄弱，敌人仍有相当大的控制力，或敌占优势，或敌我均势，但我武装能经常进出游击活动并开展工作的区域，称为游击区。在游击区应以非法斗争，首先是武装斗争为主，但因为敌人仍有相当大的控制力，人民也有合法斗争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敌人可能允许的很小限度的合法斗争，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正确地配合起来，以保护人民利益，并从对敌斗争中，在各面积蓄力量。当我

们工作基础打定时，这种游击区就可变为游击根据地。我们应争取这种变化。决定这种变化的条件为：是否这种区域已经形成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区域。

第三，游击根据地。这是我占优势的游击区，即使它不能不资敌，不能不在形式上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在人民中存在的仍是抗日秩序，实际上仍是抗日的组织，能顺利实行革命两面政策。这些区域，还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抗日建设工作，并成为武装政权的依托。这种区域称为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一般是资敌区。冀南现有少数不资敌区，因为它的比重很小，也是在敌人的格子网^[2]内，所以也是游击根据地。所谓隐蔽游击根据地，也是游击根据地的一种，其不同处仅仅在它是广大的游击区建立起来的小块抗日堡垒，故应更隐蔽，即其做法应较大块游击根据地更带隐蔽性。

游击根据地（除少数基本区）是以非法斗争为主，并应建设一定的抗日秩序和进行公开的武装政权的的活动，要有较强的党的组织基础，成为武装政权的依托。但亦应充分利用可能的合法斗争，尤其是隐蔽游击根据地更应注意及此，更要善于隐蔽自己，才能长期坚持，而不致遭到不应有的摧毁。游击根据地如果不巩固统一战线，不懂得以非法斗争为主而又善于利用可能的合法斗争，不善于隐蔽自己，特别是脱离了群众，也会在敌人摧残下，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这点应引起注意。

第四，根据地。即我抗日组织、抗日秩序公开存在，抗日建设能有计划进行的区域，而且是有相当范围的区域。我们的任务是不断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加强党政军民的各种建设工作，以坚持与保卫抗日根据地。由于敌人的蚕食和“扫荡”，根据地的游击性将逐渐增大，且有一部分根据地变为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的可能。但我们整个根据地是能够坚持且

不断巩固的。

在今后的残酷斗争中，区域的变化是很大的，主要是游击区增大。我们要随时掌握住这些变化，及时改变我们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

二、削弱敌人与保存自己。

我们的任务是削弱敌人并保存自己，这两者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联系的，忽视一面，都要发生片面性的错误。保存力量是积蓄力量的内容之一，不注意在斗争中保存力量，过分消耗自己，就会影响到斗争的坚持。削弱了自己就变动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也就是便利了敌人。我们不但着眼于为反攻和战后做准备，而且为今天的坚持都必须保存自己。但不削弱敌人也就不能保存自己，譬如我们的武装不积极活动，既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也会增高敌人的气焰，结果部队本身也不能巩固，并会在被动的情况下去应付敌人。又如我们在游击区、敌占区不善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结果是人民受损失，敌人得便宜。

保存自己是多方面的，包括武装力量、人民利益等各方面的保存，尤其是壮丁的保存。削弱敌人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军事上消耗、消灭、疲困敌人，政治上瓦解、削弱敌人。保存自己、削弱敌人的最好方式，是军事上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政治上的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的密切联系与配合。保存自己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要从积极的对敌斗争削弱敌人中才能达到。有些人误解保存自己，把它变为苟且偷安，不积极对敌斗争，其结果不仅不能保存自己，反而要削弱自己，这是非常错误的。同样，同敌熬时间积蓄力量的方针也是积极的，把熬时间解释为“苟延残喘”也是错误的。

三、积极活动与隐蔽力量。

积极活动与隐蔽力量不是冲突而是一致的。隐蔽力量，不
过于刺激敌人，善于麻痹敌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非常
重要，这是几年斗争的经验。但不积极活动也不能隐蔽力量，
更不能达到积蓄力量削弱敌人的目的。

在军事上，所谓不刺激敌人，是不作大规模的行动，甚至
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内不作军事行动，这要根据当时当地的
具体情况来决定。但不刺激敌人、隐蔽自己的意义与行动消极
没有丝毫相同之点。今天我们处在敌后残酷斗争的阶段，要想
求得敌我和平共居是不可能的。在某些区域，不刺激敌人，
以免引起敌人过大过多的报复、“扫荡”和“清剿”是对的，
如我们的隐蔽游击根据地就应如此。但一般应从积极行动中
来保存自己，只是我们的行动不是大规模的，给敌人过分威
胁的，而是采取广泛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游击区、游
击根据地，我们必须进行积极的游击战争，才能帮助、配合革
命两面政策的运用。这是各地经验都证明了的。就在隐蔽游
击根据地，也需要有公开武装的相当活动，才能掩护其坚持与
存在。在配合邻区反“扫荡”时，应采取积极活动的方针，应
把保卫根据地的整体观念树立起来。

在政治上，我们无论采取公开的或秘密的、合法的或非
法的对敌斗争，无论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党的组织或宣传工
作，都应是积极的，只是要注意不暴露不突出，善于隐蔽自
己。隐蔽力量本身也是积极的，把隐蔽力量的原则解释为消
极、不行动或少活动，都是错误的。今后斗争中，为了实现敌
进我进，熬时间积蓄力量的目的，我们还应选择适当时机，用
牺牲很小的方法，打下一些小的据点，争取空间时间，都是必
要的。

四、军事行动服从于政治任务。

武装是对敌斗争的骨干，但军事行动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实现一定的政治任务，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军事任务。当我们的军事胜利很大，但违反了党的政策要求时，它反而是失败的。今后对敌斗争中，军事与政治的结合更要密切，否则便不能胜利，尤应在指导军事斗争中加以注意。

如果把武装解释为附属物也是不对的。只是在完成总的政治任务上，军事是服从于政治的，而在斗争形式上，武装常常居于主要的地位。如敌占区、游击区以非法斗争为主，武装斗争就是非法斗争的主要形式。所以军事行动服从于政治任务，不能解释为可以放松武装斗争，或丝毫减轻武装斗争的意义。反之，必须深刻认识没有武装，或武装力量不够，都不能坚持敌后斗争，坚持根据地。所以我们党要学会熟练管理武装、教育武装、指挥武装作战。我们要切实做到“党员军事化”。不要忘记斯大林同志的话：“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3]

五、地方武装与正规军。

建设地方武装的重要性，大家是很注意了，但是对于正规军的意义，似乎又易为大家所忽视。过去我们强调了正规军，曾发生了偏向，现在强调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又要防止忽视正规军的偏向，特别在正规军地方化的实行中要加以防止。

今天强调地方武装是对的，正规军地方化也是对的，但正规军地方化不等于取消正规军或削弱它的作用。要知道地方武装有其地方的局限性，而正规军则有其战斗力强、能机动自如的长处。如果没有相当的正规军，敌人一个大队都可以在根据地到处横行，这是显然的道理。所以在正规军地方化之后，军区、军分区的指导，不仅应强调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的建设，

而且丝毫不可放松正规军的教育管理和军事政治质量的提高，使之成为现在游击战争的骨干和将来反攻军队的基干与干部的源泉。

在将来反攻时，需要大批的正规军。我们今天不仅要加强现有正规军的质量，而且到反攻时，我们还必须把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军。所以游击队升级为正规军的军队建设原则本身是正确的，在反攻时还要实行。过去的缺点则是在基本游击战的条件下，在需要广大地方武装的条件下，去编并地方武装，扩大正规军，所以是错误的。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结论第三部分的第三节。全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十九期。

[2] 格子网，指日本侵略者向抗日根据地实施的网状“囚笼”。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摧毁、缩小抗日根据地，大量修筑据点、碉堡、公路、沟墙等，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切断联系，严加封锁。这些公路、沟墙等纵横交错形如网状，被称作格子网。

[3]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487页）。原文是“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新形势下军队的新任务^{〔1〕}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

谈四个问题：新形势与新任务；军队如何执行这些任务；加强整风工作；一元化的领导与一元化的斗争。

一、新形势与新任务。

（一）新形势的特点。

国际战争的主动权已转入同盟国^{〔2〕}手中，希特勒^{〔3〕}在溃败中，苏联已获得主动权，正式开始反攻。同盟国的战略方针是先打败德国，而同盟国的主力是苏联。苏联有单独打败德国的力量。现在国际问题就是考虑战后问题，如英美并非不能拿下突尼斯，而是什么时候拿下的问题。第三战场，被德国压迫的许多弱小国家都展开了游击战争，如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第三战场还在发展，这个战场越成熟，对我们越有利。欧洲战场在西方战争中的局势是有利于人民的。

再看东方。太平洋上的战争主动权也转入同盟国手中，日本转入被动。在中国战场，日寇曾发动多次“扫荡”，但未解决问题，无任何成就，日本的力量也在下降。战后的东方也是有利的。日本已经转入被动但还没有溃败，我们不能过低地估计它。它还保持着一百万预备队，今年还可能取得某些战役上战术上的胜利，但这不能变更它一定要失败的局势。在敌后，日本越懂得它的危机，就越强化大陆（朝鲜、东北、华北）政策，企图以华北为依托。因此在反攻前，我们还可能有

一个较残酷的困难过程，看不见这点是要吃亏的。但我们是有一定信心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争取胜利的条件是：国际国内条件对我有利；根据地一天天巩固，各方面的建设都有进步；敌占区开始了很大的变化，人民抗战信心提高了，我党我军影响扩大了；我们有坚持五年敌后战争的丰富经验，及中共北方局、朱彭总副司令^[4]的正确领导。

国内团结进了一步，但进步还是不够的。敌后进入空前残酷、空前艰苦的阶段。

我们的困难是，敌人在华北的兵力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敌人在中国的兵力有三十一个师团，华北就有十五个师团。如果敌人强化大陆政策，那么华北的敌人就可能增加。敌人的“扫荡”、蚕食今后必然要加紧，“三光政策”^[5]更加残酷。斗争越到最后，我们快要胜利的时候越残酷。我们将要进行严重的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

在平原，敌人实行大乡制^[6]，要割裂根据地。我们的游击性要增加，困难更会增多。我们要根据这个环境，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斗争形式，在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坚持。敌人向根据地进攻，我们就可以向敌占区进攻，我们要采取各种方法斗争。敌人不可能同时进攻每个根据地，今后斗争是此起彼伏的。敌人以“总力战”^[7]向我们进攻，我们要以一元化斗争^[8]对付之。

（二）我们的新任务。

依据北方局的基本方针，华北党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迎接伟大时期的到来。不仅准备战前而且要准备战后，要巩固我们的阵地，要为我党我军打下基础。我们一切工

作既要着眼今天，也要着眼明天，重点要放在今天。

1. 贯彻实施民主政治。这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一环，是贯穿党政民一切工作的基本内容。一定要争取人心向我。战后的问题是什么？是“和平建国，民主自由”。这是全国人民的动向。民主建设也是为了巩固统一战线。民主是贯穿于群众运动的实质与精神，要把它变为群众运动的灵魂。

2. 根据各区域发展的具体情况，提出群众运动的具体任务。在群众运动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区域，应大胆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9]，大胆组织。在没有充分发动的区域，要深入发动，巩固群众组织。在已经发动的区域，要加强民主、生产、文化、武装的建设，使群众在各方面提高。在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要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力量，一致对敌斗争。如在封建土匪区，要照顾地主，要扩大中日矛盾，不是要减租减息，而是要强调团结。

在一切群众运动中，要强调统一战线，要贯彻民主的精神与实质。群众观念，就是使群众自己争得利益，使群众真正懂得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领袖。不是要他完全依靠外来帮助工作的人。干部的包办，不是真正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群众有了利益，有了组织，有了政治觉悟，就会跟着我们走。

3. 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重点是，农业、手工业、家庭副业。逐渐争取到出入平衡，一直到出超。

4. 强化普遍性的游击战争，加强地方武装、人民武装，使其成为游击战争的骨干。建设民兵的三大原则是，生产与战斗结合，反对游荡、脱离生产；一定在支部领导下；加强政治、军事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

5. 开辟游击区、敌占区的工作，准备反攻。

6. 认真贯彻整风工作，这是我党的思想革命。

7. 实行一元化的斗争，加强一元化的领导，使一切组织统一在党的领导下面，实行精兵简政^[10]。

二、军队如何执行这些任务。

（一）一切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根据地。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根据地就没有一切。武装斗争是保卫根据地的主要形式，因此在政治上，我们要足够坚定胜利的信心，克服困难，反对空洞乐观和悲观失望。为巩固根据地，反“扫荡”要经常化，加紧反蚕食斗争。我们过去对敌人蚕食的危害性估计不够。为了保卫根据地，要痛痛快快地精兵简政，掀起拥政爱民的运动，执行政府法令，严守群众纪律。

（二）巩固部队工作，提高部队质量。今天部队不是如何扩大，而是如何巩固的问题，质量如何提高的问题。要加强部队干部与战士的团结，改善管理教育，消灭逃亡现象。要把重点放在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建设上。为了巩固和加强部队，必须加强锄奸防谍的工作，深入教育，提高警惕性。

（三）加强敌占区敌伪军的工作，面向敌占区，敌进我进。我们要争取主动，使各方面的工作向敌占区前进，特别是组织工作。为了面向敌占区，必须把政治攻势经常化，以一个县、一个区来进行，而不是一般化的全区性的。政治攻势的力量不仅是武工队，还必须把边沿区的武装提高到武工队的地步。要切实掌握敌占区的政策，武装斗争是执行政治任务的，任何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任务。加强游击区工作。游击区是保卫根据地与对付敌人的主要环节，必须建立一套专门的政策。

（四）切实做到军民一致，提高群众观念，参加群众工作。出面最好以群众团体名义，如农会、妇会、青会。要做到军民一致，一切要从保护人民利益出发。北方局高干会结论说：

“一切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要同群众利益相结合。”

（五）为了对敌斗争，军队本身必须加强农业生产，参加经济建设。今年生产以农业为主，不是做生意。今后在生产中要严格遵守财经政策，反对本位主义。

三、加强整风工作。

（一）高干会将它列为今后中心工作任务之一。

我们目前整风的成绩是，工作慎重些了，上下级的关系好些了，对事对人的态度好些了。但一定要承认，成绩是微弱的，不大的，没有认识到，整风就是我们党的思想革命，是党的百年大计，就是建立无产阶级思想，消灭小资产阶级思想。过去是轻重倒置，光整下级，自己不能以身作则。

（二）我们过去没有拿整风的精神布置整风，而是主观主义的。在整风中缺乏思想领导，缺乏从学习中反省中帮助干部进步。今后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在领导整风中要起示范作用，同时在计划上应根据具体对象，分别不同程度的干部规定之。

（三）整风要注意思想领导，针对学习对象打通思想。脱离实际的整风，是主观的、教条的。

分区和地委以上的干部，要求把学风搞通。如果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只参加一段共产主义事业的党员，就可以马虎，不整风；但如果是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人，就一定要整风，改造思想。

四、一元化的领导与一元化的斗争。

为了一元化的斗争，必须强化一元化的领导。因此强调各级团结，一切组织，如军、政、党务、群众的团体，均统一在党委会的领导下面工作。军队本身要好好学习全面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

军队对政策法规要研究，要了解政权、地方、群众工作。我们团结的标准是团结在党的中央和领导机关下面。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晋冀鲁豫根据地传达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精神时所作的报告。

[2]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国、意大利、日本轴心国作战的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国。

[3] 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4] 朱彭总副司令，指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

[5] “三光政策”，指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解放区实施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

[6] 大乡制，是日本侵略军为加强对华北占领区人民的统治而采取的户籍制度。即若干户为一甲，若干甲为一保，设保、甲长，若干保组成大编乡。

[7] “总力战”，指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以控制占领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8] 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各抗日根据地的行动，使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的斗争原则。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各级委员会成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取消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同时注意纠正和防止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

[9]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

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10〕精兵简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内战危机面前的紧急动员^{〔1〕}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

国民党现在调动大军，积极部署进攻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在地，八路军、新四军惟一后方，全国惟一模范民主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了！内战危机近在面前了！这是一件全国性的大事，关系于民族命运的问题，全党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制止当前的内战危机，并准备应付万一事变，以便及时地支援陕甘宁边区。

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国民党是下了最大决心的，特务机关甚至认为亡国亦所不顾，所以这次的危险比之茂林事变^{〔2〕}还要大得多。但是争取时局好转的紧迫时机还未过去，我们还来得及努力。争取时局好转的条件是：国际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士一定会反对国民党挑动内战、破坏同盟国^{〔3〕}的胜利；全国同胞一定会痛恨国民党挑动内战、破坏我国快要胜利的抗战事业；我党坚持团结和坚决自卫的态度，也将促使国民党当局反省。历史上的事件，证明了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有能力克服危机，茂林事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国民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置民族生存于不顾，那我党我军只有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实行坚决的自卫，给这般混蛋们以痛痛快快的教训。惟有如此，才能使抗战事业继续下去，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才有希望。而且我们坚信，胜利的一定是我们而不是国民党。因为我们有道理，有力量，

也有决心，而国民党所干的，则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所痛恨的罪行。所以，不仅时局好转的可能仍然存在，正有待于我们去争取，即使内战爆发，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将领导我们取得胜利。

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第一件工作是百倍地加强舆论动员和党内党外的思想准备。我们固然要开大会发通电，向全国表明我们声援陕甘宁边区的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对干部、对党员、对人民进行反对内战的教育工作。

要告诉党员和干部，认识国民党当局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他们在历史上，在六年抗战的过程中，是历来不坚定的，是勇于对内而怯于对外的，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这更加证明了一个真理：我党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救星和团结人民的核心了，我党每个党员的责任更加重大了。没有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愈加要热爱党，保护党。假使有人要来侵犯我们的党，我们就要奋不顾身地保卫它，为了它随时可以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要告诉党员和干部，在中国革命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首先要求我们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我们党是团结的，极大多数党员是对党忠诚的。但是，假如我们懂得团结的主要标志是在于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则我们的缺点就很多了。至于党在团结人民的事业上，更是非常不够而应深自警惕的，一切脱离群众的现象都是应该努力纠正的。

要告诉人民，认识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区别。要严正地揭露国民党在敌后采取的特务政策，把国民党特务政策对于敌后抗战的损害和我党我军的努力对照起来，使人民懂得究竟谁是他们的领导

者。

要告诉人民，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不可分，我党我军与中国人民不可分，所以支援陕甘宁边区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有了这些深入的教育工作，我们就不仅可以应付今天局势的变化，而且可以大大巩固我们的思想阵地。所有干部都要懂得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地努力地去实行。

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持华北抗战到底，即使内战爆发，我们也必须同过去一样努力地坚持华北斗争，坚持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我们要防止由于内战危机所产生的不安情绪的生长。这种情绪可以妨害当前的实际工作，招致不应有的损失。

我们不要只看到国民党，同时更要看到日本强盗。严防敌人乘国民党进攻而夹击我们，加紧反对敌人的蚕食、抢粮和准备迎击随时可能到来的大“扫荡”。对于敌人的特务活动，也应引起最高的警惕。

我们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好支援，是把我们的敌后的每个阵地巩固好，把我们的根据地建设好，把我们的各种工作做好。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工作是继续贯彻减租减息^[4]的法令，发动群众起来努力生产，发动群众起来走进民兵，走进武装斗争。而在灾区，则是动员各阶层力量战胜严重的灾荒，这应是那里当前的惟一工作。

局势愈紧张，我们愈要镇定，愈要掌握住政策，愈要防止“左”、右的偏向发生。只有我们的正确政策，才能团结大多数人民在我党周围，去与国民党的逆流和日本强盗作斗争。

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都有坚强的胜利信心。因为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胜利接近了，日寇命运不久了，国民党宣扬的法

西斯主义是要失败的，人民是同我们一块来反对国内一切逆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还建筑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英明的舵师——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以明确的方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领导下，是一定要胜利的。

注 释

[1] 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战斗》第八十一期。

[2] 茂林事变，即皖南事变。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3]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国、意大利、日本轴心国作战的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国。

[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1〕}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抗战六年多了，就今天形势看来，胜利不但肯定了，而且不远了。目前情况，意大利已无条件投降，英美盟军不断前进，特别是苏联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只要同盟国^{〔2〕}继续努力，希特勒^{〔3〕}垮台就在明年春夏之间，日本在后年也要完蛋。

胜利已经接近，虽然时间不久，大约一年半到二年的时间，但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这个困难不仅表现在敌寇接近失败，对我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各方面进攻的加紧，也表现在经过六年战争的消耗、敌寇的摧残与灾荒的袭击，人民的积蓄差不多没有了，我们今后在财经方面是很困难的。所以胜利虽然接近了，我们还要经过相当困难的过程，从各方面努力渡过困难，迎接胜利，且为战后作准备，打下新中国建设的基础。

要完成这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加强团结，增加战斗力。主要是加强军民团结和军队党内团结，这就要通过整风，改造我们的思想与工作作风。第二，增加生产，一方面是发展人民的生产；一方面是军队和机关自己动手的问题，而且主要的是解决部队及机关的生产问题。部队机关积极生产，不但可以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可以刺激和影响人民的生产热情。

军队提出生产问题很久了，一九四〇年就成立生产部，说

明我们对生产问题的重视。几年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一年比一年好。假如机关部队没有进行生产，仅靠一毛二分钱的菜金来改善生活和维持体力，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过得去，并改善了生活，维持了体力，没有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不能说不是努力生产的结果。但是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其缺点是生产观念还没有普遍地树立起来，还未认识到生产是我们重大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战争、生产、教育为敌后三大任务，忽视一个都是不可以的。过去我们对生产问题提得不很够，不显著，生产问题一般处于附属地位。这个观念模糊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对战争的长期性认识不够，对坚持与巩固根据地认识不够，对战后问题也认识得不够，不从长期的战争消耗，为人民谋福利，坚持根据地来打算。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胜仗的。这次参加林南战役^[4]的部队深深地感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没有根据地就不能培养武力与加强战斗力。林南战役虽然胜利了，但是粮食还要我们送，以后更有大的胜利，可是没有饭吃，部队很快撤回来了。这就说明了根据地的重要性。不但今天根据地很重要，即在战后我们也要更大地发挥现有根据地的作用，使之成为民主建设、国民新经济建设的模范区。这个观念不深刻，对于爱护民力，减轻人民负担的重视是不会够的，不了解如果民力枯竭了，斗争是不易支持的。

减轻人民负担可以从四方面来进行：1. 减轻人民对敌负担，即打击敌寇对敌占区、游击区、边沿区的掠夺和对根据地的摧残。必须军民结合，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减少损失至最低限度。2. 减少基本群众对地主的负担。实行减租减息^[5]和交租交息政策，不但可以提高抗战积极性，增强阶级的团结，而且可以提高群众的生产热忱。3. 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这是人民为本身利益而负担的，但这个负担的数目也是相

当大的。就拿太行区来说，一百三十万人民屯到四十三万石，按当时价格来说二万万元，每人平均负担一百元以上，其他还有支差、做军鞋等负担。这两年人民的积蓄更少了，再加上灾荒的为害，人民是更加困难了。我们且不要看轻了抗日的负担，如果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不积极，人民的积蓄一天天枯竭下去，劳动力枯竭下去，军队也就不能存在。冀南就是具体的例子。同志们历来都说冀南很富足，但经过去年的旱灾和敌人的极度掠夺，加上本身的贪污浪费现象，某些区域人民枯竭了，军队也就存在不住。要坚持斗争与改善部队的生活，只有人民的生活向上才有可能。减轻人民对我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6]，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第二，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反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必须知道每一个贪污浪费都是增加人民的负担。

4. 加紧人民的生产工作，发挥人民最大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人民当中每一个生产的细小问题，包括各种政策问题，如负担政策、整个财经政策。政策正确就可以提高人民的生产热忱，发展国民经济。反之，就不能提高人民生产情绪，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除注意政策之外，对人民生产问题必须加以精细的组织和领导。

今后在反“扫荡”、反蚕食的战斗中保护人民的生产 and 利益是我们军队最重要的任务。减租减息，自去年开展群众运动以来已得到基本的解决，今天必须大力地解决如何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和加紧人民生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再进行精兵简政了，坚持斗争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没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即可能使根据地变成游击区。同样，政权、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再减就不足以维持工作。所以今后的问题，即是就现有力量如何提高战斗力和工作效率，而不是精兵简政。再说，再减到哪里去了呢？退伍在一年内也并不能减轻人民的负

担，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生产。

过去我们对种粮重视不够，只解决菜蔬，现在要自己动手解决部分粮食。不然，人民倾家荡产，不能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即会弄到既无饭吃又无群众，不能支持斗争。这半年来就有几次命令。第一次是节约半两及一两米救灾。第二次是减少粮食，规定野战军、分区分期减为一斤五两、一斤三两、一斤，县区游击队分期减为一斤三两、一斤一两、十五两，后方机关分期减为一斤二两、一斤、十五两，而以菜蔬来补不足，马料也减半。第三次决定菜金、办公、杂支等费用停发，要机关、部队从生产中去解决。今天如果采取无限制地向人民要，如庞炳勋^[7]及一切伪军的方针，那就要走上和他们一样死亡的道路。我们为坚持斗争，为战后作准备，为加强党政军民的团结，必须加紧生产节约。这告诉我们，胜利接近了，也更困难了；也告诉我们，要自己动手生产，才是出路。命令已经发下去了，机关、部队一定要解决三个月的粮食。除菜地外，每人要开二亩以上的荒地种山药蛋或种粮食，这完全是可能的。欧团^[8]今年每人即开荒二亩，他们一样有战斗任务，在战斗中还进行生产。延安的部队也一样有战斗与教育的任务，也一样进行生产。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了六七万亩荒地，包括耕种、锄草、收获只需要两个月时间。所以只要我们组织得好，时间是不成问题的。过去由于重视不够，没有做好，现在必须好好解决这一问题。人民只有感觉我们好，才能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如果感觉我们不好，就会脱离我们。如果我们再不从生产着手，人民就会起来反对我们。这是决不容忽视的。现在，既不能精兵简政，又不能加重人民的负担，只有自己动手生产，这不单是惟一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办法。至于如何动手，我讲几个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必须把生产的动员工作做好。各位代表必须将每一位战士、干部与杂务人员都动员起来，都深刻认识生产问题。军队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只要动员得好，组织得好，战斗与生产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必须树立我们是来自工农也要回到工农的生产劳动观念，不要忘记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要认识生产是严重的政治任务，要明确群众观念与长期坚持根据地的观念。在非灾荒区域的部队，必须树立根据地整体观念，更需要好好地动员，否则可能以种种借故来拖延生产工作。

二、必须解决生产中许多实际的问题，否则生产计划就会变成空话。领导必须周密，计划必须具体，检查必须严格。如土地问题，要求绝大多数由开荒或消灭熟荒来解决。只有人民耕种不了的地，才可以出租钱租来种，还要出负担。荒地只要细心去找，是可以找到的。至于游击队在边沿地区可以采取战斗姿态的飞行耕种办法，把保护人民生产与自己生产结合起来。又如农具、肥料等问题必须具体解决。延安的开荒有两大经验：一个是要吃饱饭，另一个是每人一件农具。我们现在决定开荒期间每人每天吃二斤小米，两个人一个镢头。过去生产借群众的工具，很多违反群众纪律，工具容易弄坏，坏了又不赔偿，今年工具问题必须具体解决。主要是自己购买、打造，如果来不及了，可以有计划有组织地向群众借用，用后加以修理或过炉一次，必须做到不损害群众的利益。

三、必须注意生产与战斗、教育的联系。几年以来，战斗一到来，生产就垮台了。以后生产季节，除特殊紧急情况外，要节省使用部队到最低限度，必须使用时，也要留足够人员进行生产。根据三五九旅的经验，每人种十亩地的全部生产时间只有两个月就够了，我们是完全可以分配出足够生产时间来的。各分区指挥机关在指挥部队之时，必须照顾到部队生产问

题。如果今年能够保证生产三个月的粮食，就等于打了许多大胜仗。时间的具体分配是，会议后全体部队即动员进行开荒，然后即加紧干部整风，部队训练，到明年春耕时，全体部队又集中力量进行春耕。一切不违农时，一切以做好整风和生产两大中心工作为出发点。

四、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一百元到二百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不高。这是由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工作做好。

五、要反贪污浪费，提倡节约。本伙食单位劳动所得，必须由本伙食单位经过军人大会或经济委员会处理，可以改善本单位生活。要反对不必要开支的浪费。过去粮食浪费很严重。今后一切损失一律不准报销。在反贪污中，主要防止干部包办伙食单位的开支，一切经济手续必须公开，经过军人大会及经济委员会。不解决此问题，部队生活就不能改善，干部也腐化了，群众与干部也愈隔离。环境愈困难，干部与战士的生活愈要密切联系，以后检查干部就要检查这一条。

六、部队政治工作要保障生产任务的完成，像保证战争、教育一样重要。如土地、农具、种子、肥料、技术的保证。要肃清主观主义的领导，反对贪污浪费。要知道军队政治工作不能保证生产，就是跛脚的政治工作。

总之，这一次会议，主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解决一切生产中的具体问题。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

会议上的讲话。

[2]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国、意大利、日本轴心国作战的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国。

[3] 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4]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为了巩固太行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太行、冀南军区主力各一部及冀中警备旅共约十三个团，在河南林县、滑县地区发起林南战役。这次战役歼灭日伪军七千余人，击落敌机一架，攻克据点八十余个。

[5]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6] 精兵简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7] 庞炳勋，当时任伪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8] 欧团，指欧致富任团长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

注意生产，讲求积蓄^[1]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

毛彭：

甲、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战争影响，普遍灾荒及我们自己的生产工作很差，除山东之胶东、滨海及冀鲁豫一部分地区外，经济上都已接近枯竭点。最近太行区因敌人封锁，山货不能出口，影响物价飞涨。明年军费概算依现在物价尽量节约，除粮食外，还需要一万万五千万（今年为七千万），如物价飞涨还不够。晋冀察经此次破坏亦非常困难。冀南今年旱灾之后，又遭水灾、雹灾，入秋普遍瘟疫，死人很多。今冬因水灾，种麦减少，特别估计到明年敌人的大破坏，灾荒的继续性，深值警惕。

乙、今冬太行展开了生产运动，部队正努力实现自给三个月粮食的任务，人民种麦比抗战前还多。今年秋季屯粮可余三五万担，估计明年财政可勉强解决。如明年麦收、秋收较好，不受敌人大破坏，秋后景况当较今年为好，但恢复元气是不容易的。

丙、敌占区物资空前枯竭，不但粮食困难，棉、盐、火柴等在敌占区亦极贵、极缺。这也是物价飞涨的原因。这种情况今后只有严重。

丁、我们各地过去对生产领导不够，没有注意积蓄问题，无论军民都经不住灾荒、敌人的严重打击，今后必须注意生

产，讲求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2]，军政方面也要切实注意粮食资财的积蓄。

戊、因此建议由中央指示华中和山东，注意积蓄物资或现金，给以具体任务，最好能逐渐转送一部到延安或华北，以备不时之需。否则，将来华北万一大军云集，困难很多。据朱瑞^[3]说，山东去年余粮三千万斤，今年更大积蓄是可能的，问题是没有注意。华中可能更多些。至于华北各地，当仍从生产、精兵简政^[4]求得自给，不能依靠他区帮助。

己、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考虑见示。

邓 小 平

十二月三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就华北战时经济情况给毛泽东和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毛泽东、彭德怀在十二月十六日给邓小平的复电中说：“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邓小平从一九四三年十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2] 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余一年粮食。《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中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号召农民积极生产，厉行节约，做到每家一年有四个月的余粮。

[3]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4] 精兵简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对晋冀鲁豫工作报告的意见^[1]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

伯承、树藩：

各种材料均未整理。太行的已要雪峰^[2]收集，太岳的可向安薄^[3]要。冀南材料很少。兹先将我的意见说一说。

一、总的意见，在发展阶段做得比较好，巩固阶段做得差，主要是三个环节没有弄对。

甲、对于中央一九三九年冬加强群众工作指示^[4]的精神了解不够，没有掌握住群众工作这个基本环节，这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一九三九年冬及黎城会议^[5]，我们强调了发扬民力，改善民生具体工作，规定改善支差办法，节约民力，发展人民生活，增加与恢复畜业，开荒救灾等，指出不能只问人民要，还要给人民以利益，这是对的。但我们忽视了减租减息^[6]的工作，忽视了基本群众的利益和组织，所以群众生产积极性并未发动起来，对我党我军是隔阂的，过去几年的春耕运动是形式主义的。

乙、对毛主席的持久战与游击战的方针认识不够。由于对持久战认识不够，所以从长期打算不够，表现于财政重于经济，经济建设的成绩不大，许多是形式主义的；经济政策多不符合于长期积蓄力量的方针（一般是少），实际工作凌乱无中心，照顾群众利益不够，以致在接连两年的灾荒中，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对基本游击战的方针认识不够，发生了一

些时期武装政策的错误。王明机会主义⁽⁷⁾的速决战和运动战对于我们这里是有影响的，同时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中也可以找到根源。

丙、统一战线中的右倾观点也是有的，主要表现于照顾基本群众利益不够及对根据地内国民党的限制不够，忽视对国民党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斗争，以致它能获得很大的发展（冀鲁豫区国民党估计在两万以上）等。对顽军的斗争，我们是胜利的，但对顽军内部的工作历来是很差的。

以上这些，我们在中央、北方局的帮助下和切身体验中，逐渐得到纠正。一九四一年克服了武装政策的错误；一九四二年注意减租减息；一九四三年开展了反特务斗争。虽然缺点和错误还有，工作做得还不够，但成绩是有的。经过这种纠正，根据地更巩固，我们与人民的团结密切了。

二、统一战线的状况，你们知之甚详，在农村中我们有的是弱点：

甲、长期未把基本群众发动起来，时事教育不深入，国民党反动思想长期统治人心，直到现在才有一些转变。而过分打击了地主，打击到富农（不只是削弱其封建部分）。

乙、没有采取限制国民党发展的方针，长期没有公开批评国民党在敌后的特务政策。

丙、对标准农村知识分子的工作，曾彻头彻尾地失败，开展农村坦白运动后，开始争取了一部分回头。

三、党的建设中的偏向是：

甲、大发展时期的滥发展，一直影响到以后的巩固。

乙、巩固时期的关门整党倾向，整党不与实际斗争结合。

丙、党内宗派主义，以为自己人总好些的错误观念，所以直到现在，党的战斗力都是比较弱的，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建党

方针，这类材料可向各地同志们收集。

四、政府工作，请与秀林^[8]讨论。我觉得成绩是不小的，在人民中是有信仰的，但最大弱点是：

甲、文牍主义与官僚主义还厉害。

乙、政治工作做得太少。

丙、三三制^[9]政策执行不够。

丁、财政重于经济。

五、群众工作自你们走了后，我们集中力量于组织生产，准备今年渡荒。秋冬生产晚，但成绩的纪录超过战前，冬季积蓄也比较热烈。估计今春灾荒仍极严重，不过准备较好，麦收有望，不致像去年那样困难。如果今年麦收较好，即可渡过难关。现正依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方针，进行减租减息，一般估计达到一半，不过冬季检查，有不少还是假的。今后要联系生产，加以贯彻。

六、人民武装无新材料。

七、敌人最近着重抢粮。去冬太行粮食斗争组织得不好，敌人有相当成效，对根据地经济封锁较前厉害。

八、整风审干工作，太行区做得较好（见北方局整风通报，向中央索阅），太岳开始效法。太行详情不知。冀南集中五百余干部在太行整风。

九、领导干部与一元化的材料，你们都知道，无新得。

十、今后方针，可参看北方局一九四四年方针指示^[10]。

十一、雪峰处材料，事后即送上，但估计时间来不及，主要还是从在延^[11]同志中搜集靠得住。

邓小平

一月十三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的复电。一九四四年一月七日，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刘伯承和蔡树藩为起草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总结致电邓小平，请他就根据地工作的各项方针问题提出意见与材料。

[2] 雪峰，即李雪峰，当时任中共太行区委书记、太行军区政治委员。

[3] 安，指安子文，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太岳军区政治委员。

[4] 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用全力研究并指导下级直至支部如何在当地进行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工作；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5] 黎城会议，指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6]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7] 王明机会主义，这里指抗日战争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观点：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

[8] 秀林，即杨秀峰，当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

[9] 三三制，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10] 指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团结全华北人民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是一九四四年华北的方针；强化阶级斗争，开展全军的大生产运动，贯彻完成整风，强化时事教育是要着重完成的中心任务。

[11] 延，指延安。

师直及太行两次精兵情形^{〔1〕}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伯承、树藩：

师直及太行两次精兵情形：

甲、第一次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开始，中经二月“扫荡”，四月底全部完成。

A 师直属有四十一个单位，减至十九个单位，共减少二百三十三人，军分区和旅共减少一百五十八个单位，六千二百一十四人。

B 精兵后，统率机关人员占有所有人员百分之二十五。

C 全军区共减少七千四百八十七人，以当时每人每年一千元计（粮食在外），全年节省开支七百五十万元。

乙、第二次精兵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开始，四月完成。

原有两个野战旅的统率机关及直属部队一律取消，加强了战斗部队及军分区的组织，同时充实连队，只留一个甲种团、两个乙种团，余均照缩为丙种团。

紧缩机关：

A 司令部的作战、训练、通信各科、股合并，队务管理合并，取消很多乘马。

B 军司令部由一百六十人再减至一百四十九人，政治部由二百五十人再减至一百七十九人，分区直属所属战斗部队人数最多的是七与一之比，最少的是十与一之比，团的非战斗员

也减少。

丙、编余人员的处理，第一次学习的一千五百五十人，送地方工作的三百二十人，退伍安家的三千六百六十一人，余皆充实连队。第二次送延安五百三十一人，送其安家一千四百一十人，清洗二千二百四十二人，均超过定额。

丁、冀南第一次精兵从一九四二年二月至六月完毕。共分三次进行，精兵后，军直共二百八十人（特务团在外），分区直约减至三百人，马匹减少百分之九十二。分区完全取消私人勤务，司号、电话员均取消，共节省干部一千零一十七人，清洗战士一千零八十四人。该区第二次精兵无报告。

戊、太岳可问陈薄^[2]。

己、地方简政工作比较彻底，数目字他们还未开来，精简优缺点你们可估计一般。

小 平

一月二十八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就太行军区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直属部队精兵情况致当时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的电报。

[2] 陈薄，指陈赓、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团结起来，坚持豫北抗战^{〔1〕}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根据这几年的状况，特别是中条战役^{〔2〕}失败后，国民党对豫北政策有一个变化，就是“曲线救国”^{〔3〕}论，有计划地打入敌伪。去年还有公开打国民党旗帜的，现在则全掩蔽于敌伪下面。该地伪军很多。敌人统治豫北力量不很大，历来都是用伪军。同时，那里大批民间武装基本上掌握在豪绅地主手中，以伪组织形式出现。由此可见，在那里要搞得好的，对伪军政策和对国民党政策要搞好。那里灾荒严重，许多地方是无人区，如果我们不能去安定民生，局面是打不开的。我们在该地一般是有影响的。抗战初我们去过，威望很高，修武、博爱、济源等县我们已有公开工作，有些地方还有党员，我们还可以从根据地找到一些豫北干部，因此开展豫北工作是有条件的。现在已发出预备号令，太行七、八分区已有了组织准备。

目前那里的情况是很混乱的。我们去的任务主要是开展游击战争，而且是长期游击战争。我们的方针是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控制该地区。我们建立武装后，主要是政策问题与八路军的模范作用问题。第一，要注意社会统战问题。社会统战与伪军政策是不可分离的。我们要在那里强调中国人团结起来打日本，极力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要指出洛阳失守不能说明日本必胜，只要国民党进步，敌后中国人团结起来，就有办法。要宣传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应当抓住一批地方士绅，进一步开展伪军工作。对国民党不过分刺激，我们的态度不是骂它，而是希望它进步，强调团结，坚持豫北抗战。第二，我们去了以后重点放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大量组织群众武装游击队，我党原有党员除已打入伪组织的外，一律动员出来组织游击队；二是宣传根据地社会政策、生产政策、照顾各阶层政策、三三制^[4]等。第三，谨慎地在可靠分子中发展党员。到我工作有相当基础时，找一些地方上真正公正的士绅，开始建立政权工作。第四，具体工作必须抓紧，必须做一些善政，要组织生产救灾，减轻人民负担，安定民生，向人民宣传我们与人民一块渡荒。第五，对敌伪一般不大吹大擂，不过分刺激，对道清路^[5]及某些重要据点，不必去动它，着重开展统战工作，求得立足。强调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反对资敌。要打垮一些伪组织。最后，我军去后，模范执行纪律是很重要的，不可大吃大喝，不可浪费。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讨论开辟豫北根据地问题时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和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太岳部队须向垣曲、博爱、孟县地区侦察，敌南犯后方空虚，应乘机开辟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成为开展豫西工作的基地。五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向华中局、北方局发出指示，提出向河南发展的方针。要求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分担发动与指导河南及皖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并指定北方局负责郑州以西地区的工作。

[2] 中条战役，即中条山战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本侵略军在山西西南部中条山地区发动进攻。六月，国民党军溃退，日军随即占领中条山地区。

[3] “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4] 三三制，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5] 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

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1]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

此次中原作战^[2]，国民党汤恩伯^[3]部惨败，丢枪十五万支，多被民众缴去。日军现占浉池、新安一线。豫西成为很大的敌后地区，我们应该去发展游击战争。该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国民党当然也不会放弃这个地方。中央军委叫我们负责开辟这个区域，太岳、冀鲁豫组织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前往开展工作。决定由徐子荣同志为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同志为司令员，郭林祥同志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部队去后受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和指挥。

开辟豫西的任务是很繁重，也是困难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意义是很大的。我若占有中原，将来发展前途很大，就现实意义说，它也是现有八路军、新四军地区的重要屏障。现在只能派去小队伍，容易立足。将来可能形成局面，发展成大队伍，还可能增派队伍去。

开辟新区是有困难的。一、客观上国民党在该地区搞了很多年，基础比较大。这次国民党军的败退，使它的政治威信受到很大损失，但它又采取更巧妙的办法企图恢复自己的威信。国民党已有“曲线救国”^[4]政策配合敌人搞我们。二、敌人有了华北的教训，会对我们警戒很严。部队去了以后可能遇到战争。三、当地人民对我如何，我们不清楚。人民对我是生疏的，我们对敌情、地形、社会情况也知道得很少。我们在那里

的基础是很薄弱的。估计到这些困难，我们去了才会兢兢业业地谨慎地进行工作，求得站稳脚跟。

有利条件是更多的。一、好的地形便于游击战争。二、人口多，民性强悍。三、物产方面吃用都有。四、国民党此次败退是受到很大损失的，双方比较，人民会跟我们走的。五、敌人还未站稳脚。六、有些地方地主武装不多，我们更易于立足。

我们领导者应当看到这些困难，在思想准备上要充分，去了以后谨慎地工作。所有同志都必须具有信心，因为还有几个区域同时派部队进去，你们不是孤立的。信心要建立在模范的纪律和正确的政策上。在纪律上，我们的干部、部队要很好准备，不是去抓一把，乱打汉奸乱没收，要认识到这是一个艰苦任务。进去以后，要拿行动来表现，要训练士兵，使每一个人成为宣传者，要普遍地做宣传工作、调查工作，要拜访士绅、老百姓，随时了解风俗人情。各方面都要很客气，买卖要公平。为了保证部队模范纪律，所有首长要经常到部队与战士见面，做讲评，着重鼓励。要经常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并告诉政治形势，就是环境顺利亦应这样做。党的工作、支部工作要健全，纠正形式主义。

我们的任务是要求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政策方面，发展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方针，发展自己的武装，创建三三制^[5]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改善群众生活，减租减息^[6]，为我党在那里建立根基。独立自主的精神不是横冲直闯，蛮干是不对的。要达到我们目的必须有正确的政策。

对敌伪政策。对敌人，为了兴奋群众，仗是要打的，主要是游击战争。应当先打一二个小仗，但又不要过于刺激敌人。对伪军，一般原则上开始不要过于刺激。对外来伪军，必要时

拔掉几个钉子，打它一下，对地方伪军要很慎重地研究情况，先礼而后兵，只有对那些最坏、坚决反对我们的，可以解决它。一般的不同我们作对的，我们可以麻痹它。对不同的具体的对象，适当处理，否则我们不易立足。不能乱打，要打就要打好。合乎政策有利我们在那里立足的就打，否则不能打。

对伪组织。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确定立足的地方是要把伪组织打垮的，对伪组织人员的处理要非常慎重。在我立足前一律宽大处理，不杀，不采取没收政策，捉到后可加以教育放回去，还可去劝别人。我立定脚跟之后是要摧毁伪军伪组织的，但俘虏处理都要宽大。

对国民党。国民党在那里可能留一部武装，对我破坏也一定有。在政治宣传方面，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不要一去就痛骂，要采取善意诚恳的批评态度，否则将大批树敌，不能达到争取大多数的目的。对国民党，我们始终表示愿意合作抗日，但要在他们开放党禁，实行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我们之来，为的是支持抗战。首先可以吸收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参加工作，对国民党可能利用这类人混进来，也不必太惊慌，但一般不能吸收入党。如果还有国民党地方政府，我们要去联络。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有武装做依靠，坚决同我们对立的，对这样的，我们要一面讲理，暴露他们，一面公开宣传我们需要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到一定时候要产生新政权。一种是没有武装依靠同我们联系的，我们要与它联络，采取积极步骤，提出某些主张，首先提出人民马上要求解决的问题，同时向人民宣布要他们实现，如他们不敢做，就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实质，孤立了他们。如有几个政权，相互间有矛盾，我们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不要到处树敌。

对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大兵团没有，小武装是会有

的，对其一律采取联合抗日的方针，但要注意不上当，一方面防止其袭击我们，一方面防止在合作当中把我们推上去同敌人对立，消耗我们。如果是愿意同我们联合的，我们也提出积极的建议，如开联欢会、参观，以达到争取的目的，当然我们要有戒备；如果是同我们尖锐对立的，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要暴露他们，但绝不进攻他们，如他来进攻我，坚决打击他，打胜以后，还可办交涉。

我之武装政策。除上面讲的以外，我们要扩大武装，主要是建立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对于本地干部的使用，有的以八路军名义带队伍，有的自己回去发展游击队。去后第一个问题，必须扶持与掌握游击队，有些游击队才能生根。枪枝问题，主要用游击队方式取得，有卖的，买一部分也可以，不能向老百姓要枪。地方人民武装起义，可以大胆收编逐渐改造，不要性急。对土匪我们不能要，同时对土匪、地方实力派也不要乱打。

政权。看进入以后的状况决定在什么时候提出来，需要建立立即要搞起来。这个政权要有三三制，要注意选择当地有威望的正派士绅、中间人士参加。政权成立后，首先就要做善政，组织武装。

经济文化。目前还提不到这个问题，但要宣传我们的纲领，可以陕甘宁施政纲领为中心，作为我党的主张宣布之。

宣传政策。大家要做宣传工作，介绍我根据地，宣传我党纲领。中心口号是保卫西北，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河南抗战，与河南人民共存亡，保卫河南，保卫家乡，团结，民主。

锄奸政策。就是宽大政策，军队不要杀人，对伪组织人员甚至国民党特务加以教育，或让他们在人民中悔过后放走。

干部政策。武装要由骨干来掌握，一定时候可以搞短期训

练班解决干部问题，培养些青年学生、知识分子。

准备工作。两个大工作，一个是过河的准备。渡河是一个秘密的问题，侦察渡河点，收买渡口，都应准备。一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思想上，在干部战士中分别教育，进行些调查。

到豫西后，只要我们能真正发动人民抗日，政策对，依靠人民，我们是可以立足的。

注 释

〔1〕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会议上的讲话。

〔2〕中原作战，指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阶段。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日军以十四万多兵力首先向河南发起进攻。河南国民党守军除少数部队作了抵抗外，其余均溃逃。日军只用三十八天即占领河南，国民党守军汤恩伯部损失二十多万人。

〔3〕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4〕“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5〕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6〕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进一步打开冀南局面^[1]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

黄敬、任穷并报毛朱彭：

今年华北各区都有不少发展，惟冀南原有六个分区较差。其原因不外：一、主力军很少，且过分分散；二、地方武装不够健全；三、严重灾荒须集中力量于救灾生产工作；四、大批干部整风，亦使工作发生困难。依目前情况，实有考虑如何利用当前空隙，进一步打开冀南局面，准备应付敌人回师对我之必要。

第一，军事力量的组织与配备务以能打击消灭伪军为要求。因此，充实现有几个团，加强县干队是必要的。团营大队的活动要善于灵活地分散与集中，集中以消灭较大股的伪军，分散以对付敌人的“扫荡”和打击敌伪的小股活动。据苏振华^[2]同志谈，你们已考虑及此是很好的，请坚决行之。但切忌恢复大机关、大后方的制度。

第二，冀南部队利用青纱帐^[3]期适当整训是必要的，但开展局面的时机亦不可失。我觉得目前应以开展为主，同时有计划地轮番抽出一部进行短期的整理与训练工作，在必要时冀鲁豫帮助一些力量也是需要的。

第三，这次冀南整风，干部可少抽一些。

以上请考虑。

邓

八月二十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给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黄敬和司令员宋任穷并报毛泽东和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

[2] 苏振华，当时任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

[3] 青纱帐，北方成片的高粱、玉米等农作物如同绿色帷帐，称为青纱帐。

对毛主席所询十项问题的答复^[1]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

关于所询十项问题，因雨交通阻隔，未能及时搜集材料。先就太行情形，答复如次。

（一）减租、减息、简政和反奸以来，对团结党外人士，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现在，政权中党外人士太少了。在反奸中，有些参议员坦白了，有些被罢免，还自杀了两个（邢台、偏城）。邢台李参议员自杀时留下一个遗嘱，里边说：“国民党放毒，共产党整风，国民党完了。”一般党外中间人士认为：反特务，就是反国民党。有些认为：减租是慢性共产。认为：三三制^[2]是利用党外人士，非党人士似是傀儡，实际还是一党专政。这与各地对参议员问题的不慎重、不严肃，与对非党干部不够尊重、宗派主义作风有关。可是，他们一般认为：上级比下级好。经过时事教育和整风，他们看到我们提倡自由思想与自我批评，加上中原战役^[3]及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际舆论的空气之下，比前好转，较进步的，想加入。这一现象，还不是个别的（有的是投机思想）。生产运动以来，开劳动英雄会，不开士绅会，有些人说：“咱们吃不开了”。但阶级关系，在生产运动中是比较稳定。太行对此问题，区党委拟定的调整办法是：

（子）开生产运动、生产劳动等会时，请参议员和一些经

营生产好的士绅参加。

（丑）对政权中党外人士整风的方法加以改善。加多时事教育，不要勉强，纠正生硬方式。

（寅）准备今冬改选参议员，召开参议会。届时，准备多吸收一些党外进步中间人士参加工作，宁肯工作人员多几个。

（卯）党内整风，克服宗派主义，讨论统一领导和三三制政策的运用。

（二）减租减息^[4]问题：太行区减租，抗战后有我工作的地方，做了一些，但极不深入。真正执行，是在中央土地政策指示^[5]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做得轰轰烈烈，基本群众大大发动起来了，根据地面貌完全改观。尔后，一切工作都好做了，一切任务完成都容易了，党政军与人民的关系密切了。如去秋公粮，人民自动缴纳，超过了计划。又如今年扩兵送延安，两次约二千人，每次回去就完成了。但在减租减息中，“左”、右偏向都是存在的。在大减租息运动中，“左”的现象表现在：

（甲）退租过多。有退五年的。榆社实际上变成了折地分青，不少地主破产。

（乙）不少地方，租额规定过低。一九四二年底，虽改为退租不超过两年，也显得太多。

（丙）有些地方，以反贪污、退贪污款代替了减租，没有减租，地主就坍了。所以，真正贫农得利益不多。

（丁）减息，也是发展到普遍的清债、算老账。利息超过二倍者，大部都退。不足二倍者，补足二倍退了。典地都无偿退还了。

这些“左”的现象，在一九四三年初，太行分局高干会议^[6]中，提出适当的纠正。当时，虽也提出了贯彻减租，克服

不平衡，但强调坚持到底不够，多少为“左”的现象所迷惑，丧失了贯彻力。加之从去年二三月起，就形成了严重的灾荒，一切力量集中于救灾、生产去了。而灾荒区，多是工作薄弱地区。灾荒中，又不可能进行继续减租。所以，太行区直到现在，减租工作还是不彻底的，不平衡的。去冬，因集中力量整风，虽也照中央指示作了一些检查，但不普遍，不深入。现在太行状况，大概是这样的：原六个分区，大约真正减了的，是十分之五，包括更好的县份（如武乡）在内。这些更好县份中，也还有百分之十没有减。新开辟的七、八两分区，为时已经一年，还未开始减租。我们曾经多次催促，据区党委说：两分区领导同志，思想上有毛病，认为两区问题复杂，恐怕影响团结，这也是右的观点。而在已减租区，又发生下列现象：

（甲）明减暗不减。先进区也有，落后区更多。其中有虽订约而无租额规定者，有在文据约定外另有口头约定者。

（乙）地主随便收地。因在法令上取消永佃权一条，地主则借口出典、出卖或收回自种，收佃户的地。农民恐怕收地，向地主屈服，形成明减暗不减。也还有怕变天而屈服的。但这种心理自庞、孙^[7]投敌后，大部消失了。

（丙）减租办法极不一致。有的地方存在着虚租（名义租额）、实租（实际租额）之分。虚租减了，实租未减。有些地方，死租变为活租，实际是抵抗减租（这现象，五、六分区还很普遍）。不少地区，因灾荒收成大减，所收粮食大部交租，甚至有全部交了租还不足的。

（丁）农民不了解政府法令，而被地主欺骗了的，也很不少。

以上是太行区状况。据我所知，太岳与太行情形差不多，深入程度，尚不及太行。因此，今冬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

运动，贯彻减租。工作中心，是在群众中进一步进行政策法规教育和保障佃权。依太行情况，未减租者，一九四三年的多交部分，应退还农民。至于新发展区，则应以减租发动群众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此外，还有一个赤贫户问题。太行区无地（不是佃户或佃得很少的地）的赤贫农，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减租减息，对他们均无利益。过去长期是终年劳苦，永不翻身的阶层，我们也长期忽视他们了。大生产运动，有小部分开了荒，加入了互助组，情况略有变更。但替他们想的办法还不多。这是今后必须特别照顾的问题。

（三）民兵问题：民兵工作，在太行有进步。一九四二年冬和一九四三年，曾作两次训练。太岳比较差些。近来，太行在数量上无大发展，质量上则有相当的提高。特别是边沿区，战斗力增强，组织严密，行动亦较积极，地雷战有发展。去年，全区制造石雷几万个，因未遭遇大“扫荡”，尚未见其效果。又发明了磁雷，据说，效果比石雷还大。总之，民兵对地雷信心是有的，问题是训练与使用。今天民兵的武器，最有效验的，还是地雷（铁、石、磁三种），应大大发挥。步枪，在太行有八九千支，太岳不足一二千支。过去经验证明，步枪杀不如地雷炸死之多。至于旧的武器，亦应提倡。惟除土炮外，其余效果不大，但比没有武器好得多。而在发挥尚武精神上，尤属必须。近日群众发明了一些小土炮、土迫击炮，不断的有创造。太行民兵现存缺点是：

（甲）洋枪主义未完全克服，不愿使用旧武器。

（乙）缺乏白刃搏斗的训练与锻炼。

（丙）宗派主义还很普遍，有些自高自大，不注意团结广大的自卫队。

关于民兵的发展，仍有可能。太岳则有大大发展可能。太

行现约五万余名。最好县份（武乡），占人口百分之七。中等县份，占百分之五。据过去研究，发展到百分之七，一般是达到了饱和点。所以，太行原有区还可发展约两万。如加上新区，将来可达到十万左右。区党委提出，今年发展百分之六，明年到百分之七。今年冬季，仍着重民兵训练。明年，则加强自卫队工作。至于生产与战斗结合，一般有了进步。在初期，民兵游民化的倾向是严重的。经过几年不断纠正，特别是今年大生产运动，把广大民兵卷进去了。边沿区民兵的生产与战斗结合，也有一些经验，如战斗与生产的变工互助形式，组织以民兵为骨干的互助组到边沿区、敌占区卖工，既保护了生产，又得利益。中心区的民兵，多参加一般互助组。也有民兵就自己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也有以民兵为骨干组织起来的。至于在战时如何结合，还是尚待研究的问题。看起来，战斗与生产的变工形式，会大大发展起来。

（四）沦陷区、接敌区的斗争问题：赤白对立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以前，曾在某些区发生过。一九四一年以后就没有了。过去形成的原因，是敌人挑拨甚至鼓动群众到根据地抢掠烧杀，我游击队纪律不好，抗日政府只要粮食，不做工作。其结果使我游击队不能在敌占区立足，形成根据地严重退缩状态。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弱点。加之敌人对沦陷区的无情压榨，我政治攻势发展，敌占区人民对我一改旧观，态度甚为亲切。现在，许多老沦陷区都能进入武装活动了，游击区有很大的开辟，平汉线^[8]也大体恢复到一九四〇年以前的状态。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相配合，在运用上，一年来也有发展。举二分区几个例子：

（1）平西小商工作。平西南下商人很多，商人成分多系失业矿、瓷、染工，雇工及小知识分子，常来往于敌区、我区之

间。我经过工商系统，加以买营业证，每月一换，加以组织教育，离城五里的村庄，都有人参加。他们参加的条件是：（甲）保守抗日秘密；（乙）组员互保，防止奸细混入；（丙）遵守贸易法令。他们做了很多事，如出口粮食四百石（至去年七月），都未落入敌手，并输入很多必需品，建立了锄奸网、秘密游击小组和秘密宣传员，开展了一些伪军工作，并建立了党的组织。

（2）太谷反抽丁同盟。这一组织本来早就存在，但无作用。去年夏荒时期，群众想向大户借粮，所以配合公开武装，把敌人吸引到公路点上，其他地方就借粮。借粮时，先由反抽丁同盟讨论，然后村政委员会（以合法形式存在的，名字叫工作组）讨论，然后召集座谈会。地主们提出三个条件：

甲、保守秘密；乙、不借给料子鬼^[9]；丙、秋后归还，由政府担保，然后当面写约。穷富之间，改善了关系。经过这些工作，同盟中也建立了秘密游击队小组和锄奸网。

（3）榆次反毒救国会。这一组织，是伪区公所批准的，但完全在我掌握之下。各阶层都赞成，它真正在开展灭毒运动，同时在里边掩护了秘密工作。

（4）榆次战斗生产合作社。这是接敌区的组织，土地、劳力以及民兵的武力，都算股份，按股分取收获物。

（5）寿阳卖工队。接敌区青年组织起来，到游击区做短工，带着武器，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就种地，并且做宣传工作。这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敌占区工作。

（6）今年夏季屯粮时，太谷敌占区群众分散地往山上送，遇见敌伪时，就佯向据点前进，并称给皇军送粮，一转眼，就又上了山。这样，一千五百石粮食不到一礼拜就都屯齐，而且都自己送上来了，未用部队掩护。

这样例子，各分区都有不少。

（五）民众团体问题：民众团体在减租减息之后，转为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十分需要。惟保障农民佃权，调解人民纠纷，还仍是农会必须经常注意的事。在组织方面，太行同志认为这样一转，工、农、青、妇都可统一起来（或统一于农会），因为生产、卫生、文化等事业，没有系统分立之必要。惟文化教育上，还可以分开做。此点，他们亦未考虑成熟，只是一个初步意见。

（六）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较前均有进步。去年冬季及今年年节，普遍进行了教育，军民都进行了反省。一般说来，太行军民关系，在减租运动后，即有进步，经过这个运动，更密切了。军队对群众态度比前更好。一般都积极参加了救灾、打蝗工作。节食救灾，自己生产，并帮助人民生产，都给群众影响很大，视军队为救命恩人。爱护军队的例子很多，参军热情很高。如武乡扩兵，每个新战士都带有民兵或农会的介绍信和鉴定表，即其一例。在进行生产运动中，部分队伍与人民实行互助，军队作战时，人民自动帮助军队锄草，这种例子很多。近九月来，民众不和的事很少听到。即有，多能相互原谅。对于抗属，政府一面动员帮助他们生产，建立家务，一面优抗工作，也做得比前切实。在社会上，抗属地位提高。投机抗属到军队来诉苦的人大大减少了。现在的缺点，在军队方面，违反纪律现象还未消灭。特别在生产运动中，还有占民众地者，有为改善自己生活向人民放高利贷者，也还有个别违反政府法令者。在拥军方面，无论政府、人民，个别缺点均很难免，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七）军队轮番训练，非常必要。太行军队任务还是繁重，正规军数量也很不够。此次抽出四个团到太岳作战，抽出两个团向南发展，加之准备工作不够，故须整训时间略为延迟，大

约十一月才开始，军区正从事准备工作。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确吃了长期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亏，政工缺点，较之任何部门特别厉害。这个工作尚未总结。谭政同志报告^[10]已开始引起前方注意。

（八）城市工作，我们及区党委均已讨论。北方局着重帮助太行积累经验，以帮助其他各区。太行区已确定抽出七个地委级干部以及其他一批干部来进行这个工作。最近准备召集一次城市工作干部会议，打通思想，总结经验，并拟定实施计划。估计这批干部下去时，可以干些成绩出来。余尚无可报者。

（九）今年大生产运动后，估计太行只能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未江电^[11]业已报告，不赘。今年收成不坏，人民负担能力尚无问题。太岳历年负担比较太行轻得多，今年因百物昂贵，预算较过去还得增加一些。

（十）军队生活，现在比大灾荒时期略好。但仍只能吃小米一斤四两，七钱清油还吃不到三钱，用菜蔬弥补，勉强够吃。但从十一月起，生产品收入多，供给标准提高，即可大大改善，前电亦已报告。农民自麦收后，基本上已经渡过灾荒。今年互助合作运动都有开展。惟命令主义与形式主义还是严重。这个，尚待材料收好，再行报告。

关于根据地自给，在太行的困难是棉、盐两大问题。两项入口，年需一万二千万元伪钞。准备明年扩大种棉地到十六万亩，则可达到棉布百分之八十自给。盐非到外面买不可，但亦准备从冀鲁豫土盐找出路。其他工业品，大致可以自给。现从敌占区入口的，除棉、盐、布、火柴（火柴入口量不大）四项及军工、医药、电料外，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入口了。

邓小平

八月二十四日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为回答毛泽东询问而写的复电。毛泽东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以及中共鄂豫区委书记李先念、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中共冀鲁豫区委书记黄敬、中共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等，提出就三三制、减租减息、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军队整训、民兵工作、沦陷区敌区、城市工作、大生产运动、军队和农民的生活、民众团体工作等十项重大问题作出答复，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邓小平复电后，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又致电邓小平：“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2]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3] 中原战役，指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阶段。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日军以十四万多名兵力首先向河南发起进攻。河南国民党守军除少数部队作了抵抗外，其余均溃逃。日军只用三十八天即占领河南，国民党守军汤恩伯部损失二十多万人。

[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5] 中央土地政策指示，指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特殊土地处理问题等三个附件。决定在总结抗战五年来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对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作了全面而明确的规定。随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高潮。

[6] 指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河南涉县（今属河北）温村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7] 庞，指庞炳勋，孙，指孙殿英，曾分别任国民党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他们于一九四三年五月率集团军大

部向日军投降，分别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

〔8〕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的一段。

〔9〕料子鬼，俚语，指抽鸦片烟的人。

〔10〕指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代表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报告由谭政起草，毛泽东、周恩来等修改，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批准。主要内容是：1. 军队必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 政治工作要有适当的地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3. 军队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4.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军队的基本任务与当前的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军队基本任务与当前的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5. 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政策；6. 政治工作要发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7. 改革不适合实际需要的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8. 正确对待政治工作的传统。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将这个报告批发全党全军，指出：这一报告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为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党的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的许多问题，全党干部应该引起注意。要求军队和地方一律将这个报告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联系实际，改造思想与工作。

〔11〕未江电，指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太行军区给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部队生产的初步总结》的电报。电报总结了太行军区部队克服严重灾荒造成的经济困难，普遍进行开荒种地的生产运动，同时帮助群众生产工作的情况。还提出了生产中的几个问题，如生产和战争结合的问题；游击区和敌后部队的生产问题；部队生产与群众生产结合的问题；小窝铺的生产基点的自给问题等。

在杀敌英雄劳动英雄 大会上的讲话^[1]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六日)

各位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各位同志：

这次会开得很好，总结了太行区几年来的杀敌经验和生产经验，每个英雄都把自己的宝贵经验作了介绍，最后又由李雪峰同志、李司令员^[2]作了总结报告，戎副主席^[3]宣布了明年的生产计划，所以，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同志们！在这次战绩和生产两个展览馆中，宣布了我们太行军民几年来奋斗的成果，的确是惊人的。我们同华北、华中、华南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样，干出了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这种事业是黑暗专制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不能想象的。

大家回想一下，抗战初期，国民党大军在华北，八路军只有三个师，但是日本一打，国民党大军就垮了，退过黄河了，不要华北了，不要华北人民了。这时候，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同华北人民一条心，不能让华北国土被敌人蹂躏，不能让一万万华北同胞当亡国奴。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共产党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共患难”；“誓死不过黄河”；“坚持华北抗战”。全体军民都下了决心，结果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广大的国土，创造了十几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太行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华北抗战是坚持下来了。以后，国民党在惊惶喘息之余，看到共产党

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敌后坚持，于是又要来向华北抗日军民“收复失地”，前后爆发了三次反共高潮^[4]。国民党回到华北的军队，就是不抗日，只是反共，甚至实行“曲线救国”^[5]的政策，勾结敌人，配合敌人，来进攻、破坏我们的根据地，把他们“收复”的“失地”，弄成暗无天日、民穷财尽、特务横行的世界，最后一批一批地几乎全部地投降敌人，把所谓“收复”区，又变成了敌占区。我们又从敌人手中把这些区域夺回，变成抗日民主根据地。这种事实，我们太行老根据地的人知道得很清楚，七、八分区的人知道得更清楚。真是多么困难啊！我们几年来没有一天不在同敌人作战，又要同国民党破坏抗战的反共逆流作斗争，还遭到去前两年的大旱灾、大水灾和大蝗灾。可是这些人所想象不到的困难都被我们战胜了。在七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太行区的军队打了两万多次仗（许多小小的仗还不算），民兵打了二万八千多次仗，普遍的人民的英勇斗争更是无法统计。从这样多的战斗中，从各色的政治、经济、文化、反特务等等对敌斗争中，我们才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蚕食、“扫荡”和破坏，保卫了根据地，并且发展了根据地，尤以近年来太南、豫北和各边沿地区的发展，成绩卓著。这是我们七、八分区和边沿地区军民结合努力的成果，是值得我们欣慰的一件事。

不但从战争方面看到我们军民结合的伟大力量，就从生产方面同样看出这个伟大力量。几年来，不但军队、民兵在打仗，人民都在打仗。我们进行的是民族的正义的群众战争，我们动员了一切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大家想想，太行山是这样穷的地方，不断受到日寇奸掳烧杀的摧毁，奸细和国民党特务从内部的破坏，还连续受到几年灾荒的袭击，可是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养活了这许多军队。七年来，太行人民出的公粮

不下三百万石，还有款子、军鞋、支差及其他负担，全区同胞的确是尽了一切力量的。他们懂得这种负担是为了自己，无不乐于缴纳，并且总想能够多养一些军队，不断把自己的父兄弟送入自己的子弟兵和民兵。从近两年来每次兵员补充任务不到十天就可以完成而且超过，公粮屯集多数村庄只要一天时间，可以看到人民的觉悟程度和拥军的热忱。我们的工厂，也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保证了战争的供给。工人职员们努力的成果，是值得夸耀的。

我们的生产不仅在农村、工厂发展着，同样我们的机关和部队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今年机关、部队自己生产两月或三月的食粮和全年的菜蔬，还要依靠自己生产来贴补油盐，计算起来，减轻了人民十万石公粮的负担。如果把办公杂支和节约统统计算起来，大约减轻了人民二十万石公粮的负担。这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假使机关、部队不执行毛主席“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方针^[6]，完全由人民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军队保护生产，机关、部队帮助人民生产，军队、政府等机关节衣缩食，帮助人民渡荒等等，无一不表示出军民一致的团结力量。军队的困难就是人民的困难，人民的困难就是军队的困难。军民一体，正是我们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并发展根据地，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

无论战争、生产，无论渡荒、打蝗，无论其他方面，哪一样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哪一样是黑暗专制的国民党干得出来的？

在伟大的英雄事业中，涌现出了成千成万的英雄和模范人物，这次到会的三百多位，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最出色的代表。的确要承认，我们过去对于发现英雄，表扬模范的工作，还注意得非常不够，还有不少模范的指挥员、战斗员、武工队员、

政工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炊事员、饲养员，以及党政群众团体教育机关的模范干部、教员等等，还被埋没着。今后各系统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提出的发扬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去发现他们，分门别类地召开英雄或模范工作者会议，总结他们的经验来推动其他。这样，我们各种工作定能得到更大的进步。

从各位英雄的事业中，我们看出一个真理，就是没有民主政治，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朱彭总副司令^[7]的正确指挥，就没有这几年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也就不会出现这许多英雄。大家想一想，没有毛主席给我们定下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没有朱彭总副司令的正确指挥，没有成千成万的指战员英勇顽强的奋斗牺牲，我们能够干出这样伟大的战争事业吗？我们能够涌现出这许多出色的战斗英雄吗？又如没有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的方向，没有全村、全队、全组一致的努力，没有广泛的减租减息^[8]、互助生产、渡荒、打蝗等运动，能够出现这许多劳动英雄吗？出现了这许多英雄，是全体军民的光荣。英雄们可贵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有觉悟。他们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们，没有广大群众的齐心努力就没有他们，所以他们首先接受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正确领导。别人守旧，他们不守旧。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他们就首先组织起来，成为一切进步事业的推动者，成为群众运动的引线。他们有本领，能以身作则，实干苦干，能克服困难，创造经验，并且不满足，不断求进步，向群众学习。这样，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为大家所佩服。他们懂得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分子，没有群众就没有他们，所以能够处处照顾自己又照顾别人，真正做到公私兼顾的原则，能够处处为大众着想，了解大众困难，想法解决大众困难，特别是做事有民主精神，不独断，不

强迫命令，遇事同大家商讨，不锋芒，不骄傲，为人憨厚。这样自然使人心服，大家容易齐心，事情容易办好，社会风气也会随之改变。这次到会的英雄，大都是合乎这些标准的人物，为根据地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不愧为创造新军队、新农村、新工厂、新学校、新社会的匠师，值得大家的尊敬。

过去有些英雄，不是为群众所公认的，所以很多垮了。其原因就是他们的觉悟程度不够，一时有点成绩就骄傲起来。有的不学好干部的作风，专学坏干部的作风，不愿接近群众，不民主，喜欢强制命令，甚至一味自私自利，神气十足，苦干的精神也丧失了。结果，处处脱离群众，英雄的招牌于是乎也就垮了。这说明，没有真正的觉悟，或觉悟程度不够，当不了英雄，即使当了，也不能持久，也要垮。不是真有本领，以身作则，虚心求进步的人，当不了英雄，当了也要垮。不是为人憨厚，真正民主，公私兼顾的人，当不了英雄，当了也要垮。我们希望到会的英雄，永远是出色的人物，并且在你们的领导下，创造出更多的新英雄，因为抗战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事业，要有大批英雄带头，才能建设起来。

同志们！这次大会把各位英雄创造的经验都总结起来了。总结过去是为了今后，英雄们的宝贵创造，就应该是今后工作的方向。现在的形势，对于争取抗战胜利，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是非常有利的。胜利的时间更快了，但是还要经过一段困难的斗争。这是因为一方面日寇虽接近失败，但仍然强大；一方面国民党的寡头专制，腐败无能给我们民族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使得坚持抗战和反攻的主要责任，不能不落在我们敌后军民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后要把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敌后三大任务（战争、生产、教育）做得更好，使我们的仗打得更好，生产得更多，战争与生产更好地结合起来，教育更好地服从于战争

和生产。

关于战争和生产，大会上对于明年的方向，已经有了很好的讨论，我只说几点零星的意见。说到战争，今年打得不坏，扩大了很大一块根据地，明年更要发挥我们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威力，更多地扩大民兵，更有力地打击敌人的“扫荡”、蚕食和抢掠，更努力地扩大根据地，解放敌占区的同胞。要能这样，就要把兵练得更好。今冬的练兵运动是明年战争胜利的基础，也是反攻的实际准备，务必要达到预期的成绩。各位战斗英雄在技术上和战术上的创造，应该成为练兵的实际材料。其次，军事工厂的努力，对于战争胜利的保证，关系极大。我相信我们工厂的工友、技师和职员，定能发挥更大的热忱，制造更多特别是质量更好的武器，供给前线的战士们。

说到生产，明年计划已经订出来，我们奋斗的目标，是做到耕三余一^[9]和自给自足。我觉得能否达到这个标准，在于我们能否做好三件事。一件是彻底贯彻减租工作，彻底实行政府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法令。这个工作做得不好，就无法使广大的劳苦农民获得生产的条件，地主也无法坚定地建立自己的家务。所以减租交租的政策，对地主对佃户都是有利的。可是我们太行区的减租工作还是极不彻底，今冬明春必须来一个大的检查运动，凡是没有减的或减得不彻底的地区，都应以此为工作的中心。把这件工作做好，明年的生产运动才能更大更好地开展起来。一件是更好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好处大家知道了，组织起来的经验也有不少了，可是我们组织起来的数目还是不大的，特别是有不少是强迫命令编制起来的，一定不起作用，或者早就垮了。今后必须将各位劳动英雄的经验广为传播，大家仿效，使巩固的继续巩固，不巩固的使之巩固，强迫命令的重新改造，发展更多的互助社、拨工队和各式各样的合

作社，把一切劳动力都组织到生产里来，提高劳动效率。这里就需要我们切实照顾贫苦农民的困难。如果减租工作彻底执行，可以解决很大问题，但是有些赤贫农民无租可减，这就一定要有计划地吸收他们参加互助组织，帮助他们开荒获得土地，解决农具、种子等等困难。改造懒汉等等事情都要更好地做。妇女放脚尤应大大提倡，这件事过去做得太不够，对生产和妇女解放影响很大。再一件是经验与科学的结合。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比如我们农林局在张克威^[10]同志领导下，已经收到显著成绩，即以改良种子一项来说，金皇后玉茭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麦子好种的传播，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以多打一百万石以上的粮食。这种了不起的贡献就是得力于科学的力量。太行山土地不够，今后主要是深耕细作，更需要使经验与科学结合起来。这里，我们不应把科学看成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应让科学离开了实际。科学本身就是实际经验总合。我们英雄们的创造，把它整理起来，好的发扬，坏的去掉，就是很合本地条件的好科学。比如有些地方不能种金皇后玉茭，或者一六九麦子、八一—谷子，就应在附近一带去发现好的种子，也可以大大提高产量，也就是合乎科学的精神。如果在各方面都注意发现好的，加以普及，不断地提高，那是没有一件事办不好的。至于说到自给自足，太行区今后的关键在于植棉。如果我们明年能种二十万亩的棉花，加上纺织事业组织得更好，特别是质量能够提高，那我们的棉布问题可以大体自给，其他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希望大家好好提倡，种棉方法尤需讲究。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吴满有方向^[11]问题。过去有些人认为它是发展新式富农的方向，或者把它解释成为很玄妙、很深奥的东西，这是不对的。我以为，吴满有方向就是中共中央土

地政策的具体表现。它的环节有三个，首先是扶助贫农、中农上升；第二是奖励富农经济；第三是削弱封建。忽视任何一面都不正确，奖励富农经济，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容。我们实行的彻底减租，扶助贫农生产，组织起来，劳动互助，公私兼顾，深耕细作，多耕多锄多上粪，就是在实行吴满有方向，就是在实行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方向。这个方向，我们各位劳动英雄了解得更好，真正懂得这个方向的正确。我相信经过各位的倡导，吴满有方向的普遍发展，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进步是不成问题的。

同志们！我的话完了。我希望把大会的精神贯彻下去，把英雄们的经验变为全区域、全部队、所有民兵的经验，把党、政府、军区宣布的军事和生产的方针、计划，变为全区军队和人民的方针、计划。无疑地，我们明年一定能够在战争和生产上取得比今年更大更辉煌的胜利。

最后，我希望全区干部能够从这次大会，从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身上，学习一点东西。过去有些干部和领导同志，在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是有缺点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习气还是很厉害的。我们要学习英雄们切实朴素，认真苦干，处处照顾群众的精神；学习他们的民主作风和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学习他们眼睛向下，了解群众心理，以积极帮助表扬好的为主，而又提倡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团结干部和群众。我们切不要以为他们这些创造是无足轻重的东西，要知道他们才真正实行了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态度的指示，而这恰恰是我们有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干部所不懂得。假如我们从英雄们的事业中体会到毛主席的指示，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得到很大的进步，我们就会更好地去领导群众，使对敌斗争做得更好，新民主主义的事业建设得更好。我相信，

明年开会的时候，不仅在座诸位英雄会带更多的成绩、更好的经验到会，而且将有大批的新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到会。因此，我们有信心，预祝明年战争和生产的大胜利，预祝大批新的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出现。

注 释

[1] 这是邓小平在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太行版。这次大会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七日在山西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

[2]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太行区委书记、太行军区政治委员。李司令员，指李达，当时任太行军区司令员。

[3] 戎副主席，指戎子和，当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

[4]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〇年春季，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等五城，阎锡山进攻山西新军，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等。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于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对得到国民党当局同意、向江北转移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发动突然袭击。新四军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第三次始于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掀起反共的舆论攻势。六月至七月间，国民党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在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三次反共高潮均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

[5] “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6] 见毛泽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 911 页）。

[7] 朱彭总副司令，指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

[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

过减租减息政策。

[9] 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余一年粮食。《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中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号召农民积极生产，厉行节约，做到每家一年有四个月的余粮。

[10] 张克威，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生产部部长兼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农林局局长。

[11] 吴满有，陕西横山人，一九二八年逃荒到延安务农。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绩显著，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指出“吴满有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号召全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掀起了学习吴满有，大力开荒生产的热潮。